★

1993年获普利策奖

1993年《纽约时报》年度关注图书

1994年心理学研究妇女联合会杰出出版奖

亚马逊网站五星级图书

★

Unbearable Weight



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

不能承受之重

[美] 苏珊·鲍尔多 著　綦亮 赵育春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不能承受之重

——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

Unbearable Weight

"本书精彩绝伦！鲍尔多从广博的女性主义视角，用引人入胜、通俗易懂的语言全面分析了有关身体的一系列问题——体重与减肥、健身、媒体形象、电影、广告、厌食症和贪食症等等。我们终于从她的论述中看清了目前的社会现状：为什么女性杂志总是将美味的食物描述为'罪恶的'？为什么有一种蛋糕叫'死于巧克力'？对于不明白这些问题的人来说，这本书太棒了。"

——凯塞·波利特

"苏珊·鲍尔多的《不能承受之重》是一本杰作，它不仅复杂而又细致地思考了女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还分析了我们的文化，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

——苏珊·格里芬

"这项出色的研究将对女性肥胖的恐惧和对女性权力的恐惧联系起来，说明女性的机遇在增加，但她们的身体却在缩减。"

——《纽约时报书评》

"原创、有启发性、妙趣横生。"

——《旧金山记录报书评》

ISBN 978-7-214-05865-2

9 787214 058652

定价:30.00 元

★

1993年获普利策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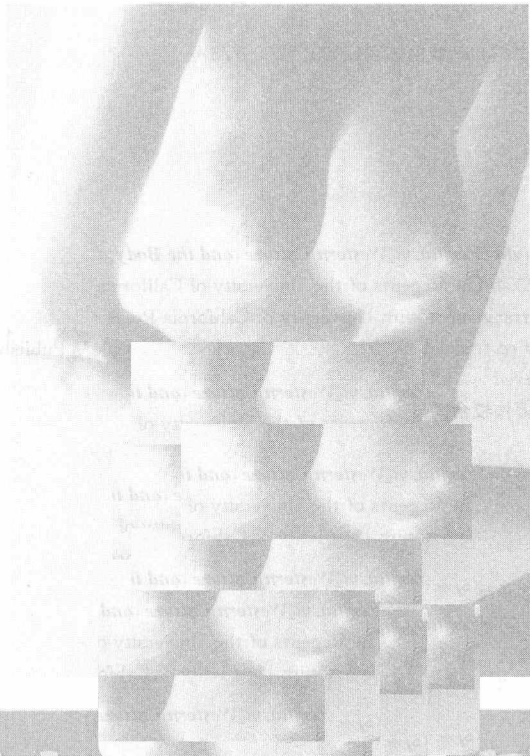
1993年《纽约时报》年度关注图书

1994年心理学研究妇女联合会杰出出版奖

亚马逊网站五星级图书

★

Unbearable Weight



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

不能承受之重

[美] 苏珊·鲍尔多 著　　綦 亮 赵育春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能承受之重 / [美]鲍尔多著;綦亮、赵育春译. 一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6
ISBN 978-7-214-05865-2

Ⅰ.不… Ⅱ.①鲍…②赵… Ⅲ.妇女-问题-研究
Ⅳ.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9723 号

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
Copyright © 2004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9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7-173

书　　名　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
著　　者　[美]苏珊·鲍尔多
责任编辑　汪意云
译　　者　綦　亮　赵育春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865-2
定　　价　3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致　谢

对于我们这些在规模小的大学任教，教学任务繁重的人来说，找时间写作是非常困难的，但我很幸运，并且享受了很高的特殊待遇，得到了来自不同渠道的非常慷慨的机构性赞助，由此得到了时间。我得到了两个驻校奖金，第一个让我参加了艾莉森·贾格尔在道格拉斯学院举办的劳丽研讨班，在那里度过了1985年的春季学期，第二个让我从1987年至1988年，作为洛克菲勒驻校人文学者在杜克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研究。这两次机会提供的不仅是思考和写作的时间，还有能刺激这个过程的出色的知识环境。在获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同时，我还得到了美国学术协会委员会福特研究员奖学金的赞助，让我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继续研究这个课题，莱莫恩学院还慷慨地让我提前放公休假。我最要感谢的就是莱莫恩学院——感谢它在过去为我提供的数项教师科研补助金，并减少我的课程；感谢它为我提供的开放、多样和温暖的知识环境；感谢它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它的第一个讲座教授职位，约瑟夫·C·乔治教授职位，给了一位女性主义学者。在我看

来，这项授予真的太及时了；它是在1991年宣布的，而此时恰逢我写作此书的最后阶段，因此它给了我修改所需的时间，和准备底稿和插图的经济支持，并让我鼓起勇气渡过难关，最终完成了一项时间跨度长、任务繁重的——尽管非常有趣、让人满足——课题。

因为这本书是由几年来完成的文章组成的，所以得到了许多不同的人不同方式的支持。我尝试在每篇文章的起始评注中就这些支持表达谢意；对那些因为疏忽而没有提到的，我在此深表歉意。然而，在这项课题的不同研究阶段，我的朋友和同事私下给予我的感情支持，和与我进行的知识性对话却没有在这些评注中得到体现。

前　　言

——阅读鲍尔多

我第一次遇见苏珊·鲍尔多的时候还是一名研究生，在一个专门研究批判理论的英语系学习。这个系的学生精通解构语言和拉康的精神分析，还有福柯的谱系学。因为感觉有点被疏远，受到排斥，并急于证明我们在那个语境中的价值，一群学生组成了一个女性主义理论阅读小组，这个小组存在了5年。考虑到我们在价值评价方面所受的特殊训练，我们阅读的女性主义理论有其特定的类型，通常和前面提到的理论家相关。就这样，我们在1989年夏天读到了《女性主义和福柯：反思抗拒》(*Feminism and Foucalt: 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这本论文集，里面有鲍尔多的早期论文《神经性厌食症：作为文化具体化表现的精神病理学》。

一篇文章所带来的转变实在是太大了。在读到鲍尔多之前，我和大多数学生一样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不怎么有热情。虽然我能凑出论文，但我以一种似乎受理论鼓励的方式超然于我的工作，并以高度抽象的语调写作，这是人们对那时研究生的期待。用他们的话说，我不投入。但那天下午我坐下来读鲍尔多的文章时，对语言的热

爱，对所读作品的激情都开始随着鲍尔多的话回到我身边：我认为一个文化中发展起来的精神病理学远非异常或越轨现象，而是那个文化的特有表达，实际上是其大部分问题的具体化表现。

那天阅读鲍尔多给我的感觉是，就像康拉德的马洛在《黑暗之心》中谈到库尔茨的著名宣言时所说的，“好像一层面纱被撕破了”。她的著作的确很像一位伟大小说家的作品，因为它恢复了普通批评语言中经常缺乏的东西：那种具体化的感觉，在场的感觉——感觉被写的东西的确是真实的；某些事情真正处于紧要关头；在某些基本方面，我们得到了一个真相。那天晚上我们在阅读小组中进行的讨论具有实质性差别。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感觉自己得了精神错乱，是一些努力证明作为思想家和消费文化成员的价值的女人，这种文化正不断弥漫，并似乎在许多方面将我们界定。但那天晚上在读鲍尔多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努力讲一种对我们而言陌生甚至不友好的语言；我们感觉成为对话的一部分。苏珊·鲍尔多拒绝站在当代文化之外，从高处进行批评，因此给了我们发言的权利和方式。

《不能承受之重》本身就是那篇早期文章的结晶和发展，在文化批评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让许多学术界内外的人对我们的文化有了实质性理解。它在概念界定和批评方法上真正做到了跨学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在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思考、书写和生存。1993年出版后不久，这本书就获得了普利策奖提名。它帮助生成了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一种全新类型，如今叫“身体研究”。在社会学、哲学、英语、性属*研究、伤残研究、心理学和许多

* 原文为gender，为了和sex区分，特译为性属，即社会性别。——译者

其他学科中，它被当做一本基础性著作来引用。新的稿件在它们讨论的所有话题中不断把鲍尔多当做一种理论框架使用，从饮食失调到哲学家，再到卡尔文·克莱因*。在为妇女、男女同性恋、族性、女性主义和波普文化服务的网站上，《不能承受之重》被列为“必读书目”。《不能承受之重》似乎成为年轻一代学者的圣经。我们对其他理论家还抱有几分冷静的赞赏，保持适度的距离，但当我们谈起鲍尔多的时候，我们的冷静就立刻融化了：“苏珊·鲍尔多?”我们会说，“我爱她！我的意思是，我真的爱她!!!”尽管从时间上讲她属于早一代学者，有时会对媒体文化和参与其中的人怀有敌意，但同时她又给我们以启示，是我们中的一员。她讲我们的语言，她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中。从广义上讲，她好像喜欢并且理解我们。

阅读鲍尔多就像在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形象中纵情骑乘，用一种惊人的X光射线看它们，看清它们的血液、内脏和骨骼，并最终看清我们自己。鲍尔多总能在一个清晰时刻清楚地表达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觉察到，但无法组成一个连贯整体的东西，这是她的典型风格。她一点一滴、小心翼翼地展现了我们在哲学史，在性属和种族意识形态中最为深层的焦虑的来源，和这些焦虑在包围并在某种基本意义上构成我们的文化形象中得到表达的方式。鲍尔多向任何被主导文化界定处于其价值边缘之外的人展示了通往拥有一个自我的道路，一种切断主体性和自我否定之间的历史纽带的方式。《不能承受之重》，如同鲍尔多的所有著作，在本质上是一种洞察、包容和理解的巨大天赋。尽管这个版本标志着《不能承受之

---

* 卡尔文·克莱因：即通常所说的 Calvin Klein，简称 CK，一种著名的服装品牌。——译者

重》迎来了出版十周年纪念，但它还是和初版时一样超乎寻常、见解深刻、广受欢迎。在当代的媒体文化这个疯狂的、高速运转的世界里，苏珊·鲍尔多是我们的向导、我们的伴侣和我们的朋友。阅读鲍尔多让我们感恩，并因此变得更加坚强——这就是她给我们的礼物。

莱斯利·赫伍德，2003

在形象的帝国中：十周年纪念版序言

——致凯茜

在我们的周日新闻里；在早晨喝咖啡的时候；在公交车上；在机场里；在结账处。在我们下班和放学后，在被子底下感受刺激和新鲜的时刻；抑或在电视机前把要洗的衣服折起来时用余光看到的。它或许是清晨五点钟守候在电视导购节目前聆听华丽的承诺：减肥药的最新消息；恢复神奇发型；明星们的化妆秘密。或许是在牙医处等待时，努力把注意力从迫近的牙根管上移开时建立的一种瞬间关系。或许是一堆刺激感官、光彩夺目的东西，一种蓄意的卖弄，一种"迫不及待要和你回家"的热情。也许是一本少年杂志：教你如何穿衣，如何梳理发型，如何让他对你垂涎三尺的技巧。或许是在影院看的一场电影，在黑暗中仍然气势恢弘、不可思议。我们相信自己没有注意无穷的商业广告和各类广告。它们不断出现，无处不在，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像金鱼缸里的水一样，很少被金鱼注意到；哪怕是注意到了，却不屑一顾：喜欢"华而不实的东西"——一种无害的放任。它们太容易被接受，进进出出，消化后就被遗忘，几乎无法再让我们感到愤怒。

这些仅仅是一些画面。

“没有人会因为看一幅图画而生病”:跨文化快照

这位年轻女孩站在镜子前。再也不用从胖开始了,因为她已经吃了几周不含脂肪的食物,并且已经实现了她的目标:身高5英尺4英寸,体重115磅——按照医生的表格,这就是她应该具备的体重。但该死的,她看上去还是又矮又胖。她无法让自己不去想《红磨坊》的插曲《橘子酱女郎》的视频。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平克、莱尔·金和马雅都以自己完美的方式演绎了它:每一条曲线都是流畅和圆滑的,瘦而性感,无可挑剔。这个女孩开始恨自己并感到羞耻。视频继续播放,演唱者的身体像磁铁般吸引了她的眼睛;她感觉自己爱上她们了。但嫉妒撕扯她的胃,足以让她病倒;她永远不会像她们,不管减掉多少重量。看看她的那个肚子,看到它是如何醒目了吗?这些东西——它们事实上在摇摆。她的臀部长相恐怖;她是个肥胖、粗大、像面团一样的女孩。

《前线》* 问英国版《时尚》的编辑亚历山德拉·舒尔曼,年轻女孩用不可能具备的形象衡量自己,时尚产业是否应该为创造出这些形象负责。舒尔曼满不在乎地说:“实际上没有多少人告诉我,他们看了我的杂志后决定成为厌食症患者。”[①]

舒尔曼竟然相信是这么回事,这可能吗?

在中非,古老的节日仍然赞美丰满的女人;在某些地区,新娘在新婚夜前会被送往养肥禽兽的农场,在那里变得丰满,被拿捏出

---

* 《前线》(Frontline)是美国公共电视(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一档著名的新闻调查栏目。——译者

理想的身段。在一个艾滋病肆虐的国家里，皮包骨头的身体意味着——就像它曾经在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美国黑人中所代表的——贫穷、疾病和死亡。“一个非洲女孩必须有突出的臀部。”服装设计师弗兰克·奥萨蒂说。“在非洲，我们有臀部，我们有屁股，我们喜欢肉。”多年来，尼日利亚按照地方标准选派佳人角逐世界小姐，但选手们表现得很糟糕。后来一位机智的企业家站出来反对地方标准，并培养出了阿格巴妮·达瑞葛，一位肤色浅，身材极瘦的佳丽（他的灵感来自M网，这是在主要播放美国影片和电视节目的卫星电视上跨越非洲看到的南非网络）。阿格巴妮·达瑞葛赢得了世界小姐头衔，是第一位有此成就的非洲黑人。如今，尼日利亚青少年纷纷禁食和锻炼，努力成为“雷巴”（lepa）——这是风靡一时的让“它”变瘦的女孩所用的一句通俗俚语。其中一位说：“人们已经意识到苗条就是美丽。”[②]

布伦达·理查德森和伊兰·雷尔是《帮助你女儿爱上她身体的101种方法》一书的作者，这本书讲述了新到来的32岁俄罗斯移民萨沙和她14岁的妹妹的故事。萨沙很快减掉了20磅，所以看妹妹的上臂和大腿就不顺眼了。“我妹妹的胳膊和大腿肥肉太多，满是脂肪团。”她告诉理查德森，并且抱怨说她们的母亲给她穿短袖衣服。当她母亲这样做的时候，萨沙会设法阻止，告诉她妹妹“把肥肉盖住”。[③]

租一盘与美国建交之前制作的俄罗斯电影，看一下女演员的胳膊，然后你就明白这件小事多么与众不同，多么能说明问题。[④]

过去几年里我写的关于饮食失调的文章开始被译成日语和汉语，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在我的读者中，亚洲妇女是最为坚持这种观点的人群之一，即饮食和身体形象对她们那个地区的人来说不

是问题；的确，我的最初研究也显示亚洲人事实上不知道饮食失调这回事。但当《不能承受之重》的韩语版在今年发行时，我觉得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我发现了大量报告，报道饮食失调在中国、南韩和日本的戏剧性增加。“随着许多亚洲国家变得西化，被灌输高大、苗条和纤瘦的西方审美标准，一种事实上如海啸般的饮食失调已经将亚洲国家淹没。”尤妮斯·帕克在《亚洲星期》杂志中写道。年长的人仍然记得情况非常不同的时代。比如在中国，革命理想曾经谴责任何关注外表的行为，还发生过数次灾难性饥荒，“小胖子”是表达对孩子喜爱之情的说法。如今，速食无处不在，孩童肥胖症正在增加，胖和瘦的文化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当我年轻的时候，”在北京经营一家健身中心的李晓静说，“人们羡慕甚至嫉妒胖人，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过着好日子……但现在我们大多数人看到胖人时，会认为‘他长得太恐怖了。’”⑤

因为地理位置偏远，斐济群岛直到 1995 年才装了一个电台，播放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节目，人们才有电视看。在这之前，斐济没有饮食失调病例的报道，人类学家安妮·贝克(Anne Becker)的研究显示大多数斐济女孩和女人都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满意，不管她们的体形有多大。1998 年，这个电台开始广播后仅仅过了 3 年，11%的女孩报告说通过呕吐控制体重，而调查显示这些女孩中 62%的人在前几个月有节食行为。

这种改变让贝克感到惊讶；她原以为斐济的文化传统可以“抵挡”媒体形象的影响，因为它赞美饮食，偏爱丰满的身体。那么她如何解释斐济人的脆弱呢？他们对媒体的了解不够深刻，认识不到电视形象不是“真实的”。⑥

形象帝国中的“现实”

我们足够老到，能认出形象不是“真实的”吗？这要紧吗？

在迷人的影片《L. A. 故事》中，史蒂夫·马丁问莎拉·杰西卡·帕克为什么她的胸部摸上去感觉这么怪。“哦，因为它们是真实的。”她回答说。有趣的回答！但这也不再是个玩笑，因为如今真实的胸部在女演员和模特中是异物，带来超出了有关名人身体荒谬文化的结果。许多年轻男子对不符合好莱坞标准尺寸和坚硬度的胸部不感兴趣。他们在意杂志插页中的胸部不是“真实的”吗？他们不在意。2001 年，超过 21 万 5 千名女人购买胸部植入物，她们也不会在意。[7]隆胸是青少年最常见的外科手术之一。[8]这些女孩不是肤浅的人，非要长得像女神，否则不会满意。被实施植入手术的女孩越来越觉得为了看上去正常，她们需要这些东西，因为在她们生活的文化中，“正常的”正从根本上被重新定义，定义者不仅是各种形象，还有外科医生。《莱克星顿先驱》杂志上刊登了一位美容外科医生的广告：“模特和艺人当然做隆胸手术，但你每天看到的女人才是典型患者：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甚至可能是你自己。”

在《不能承受之重》中我描绘了后现代身体，它越来越依靠“重置、转变和修正的幻想，无限改进和改变，对抗历史性、必死性，甚至身体的物质性。如今文化塑料已经取代了这种物质性”。

当我写这些话的时候，最近的来自 1989 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此类外科手术的实施人数是 68 万 1 千。

2001 年，这个数字是 850 万。[9]

它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便宜、安全，而且用途越来越不是为

了“矫正”重要缺陷，而是“勾勒”脸庞和身体。对此，整形外科医师在道德上好像没有任何问题：“我不是来扮演哲学之王*，”兰德尔·霍沃斯医生在《时尚》的一次采访中谈到，“对长得不错但想看上去完美的女人，我没任何意见。”[10]“完美”是什么时候被用来修饰一个人的身体的？这个词让人想起柏拉图的永恒之美——或许对于大理石而言是恰当的，但不适合活生生的肉体。我们改变；我们老去；我们死亡。学会对待这个事实是现世生活的生存挑战——和丰富内蕴——的一部分。但现在，这些能负担得起外科手术的人已经抛弃了生命的混乱和脆弱、私密的弱点、人类延续的自然，去幻想无限成就、“排除”任何障碍、“争夺金牌”。希腊人称其为傲慢，而在我们看来，这是我们的“权利”，去成为我们所能成为的一切。[11]

我们所认为的“完美”的门槛不断抬高——被文化意象，外科医生自己的建议，和习惯将每次背离视为“缺陷”的眼睛，这是霍沃斯没有谈到的。安是《时尚》同一篇文章中描述的一位潜在病人，她肌肉结实，体重105磅，但她眼中的自己大腿内侧的丑陋脂肪团正困扰着她。“不管我多么瘦，它们只是变小，但不会消失。”她抱怨说。霍沃斯认为安是抽脂术的完美候选人，所以她不太会就此罢休。“外科整形手术让你的眼睛变尖，”一位更加坦率的外科医生说，“当你完成一次手术的时候，突然你会每隔五分钟照一次镜子——找其他人看不到的瑕疵。”[12]

必须清除体内的任何脂肪残留，安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想法的？这种想法很有可能不是通过和其他现实中的妇女比较得到的，而

* 哲学之王，这里指的是柏拉图，暗含“柏拉图式”的意思。——译者

是通过和电脑设计生成的人体躯干——在广告中用于宣传抗脂肪团的乳霜和类似的东西——比较得来的，它们的臀部、大腿和屁股就像缓缓倾斜的沙丘一样光滑、细腻。现实中没有人能拥有这样的身体。但这没关系，因为我们的期待、欲望和判断正受数字世界的操控。你上次在一本杂志或视频中看到皱纹，或者脂肪团，或者一个下垂的下颚，一个毛孔或一条皱纹是什么时候？10 年前《哈珀斯》杂志刊印了《时尚先生》因为润色米歇尔·菲佛的一张封面照而收到的发票。照片的旁边是发票的复印件，写道："米歇尔·菲佛绝对……什么都不需要。"事实上，单是菲佛的照片出现在那个封面上，就需要价值 1525 美金的下巴整修、面部去污、颈部软化、皱纹去除和其他五花八门的修饰。

今非昔比了。

如今，实际上你在杂志中、视频中，有时甚至在电影中看到的每一个名人的形象都经过了数字处理。事实上每一种形象都是如此。要充分理解它，不能被动地接收，要正视它的暗示。这不只是欺骗的问题——尽是些广告从一开始就兜售的枯燥的旧玩意，这是关于感知的教学法：如何阐释你的身体。这些形象正教我们如何去看。经过过滤、抹平、润色、软化、锐化、重置的形象转瞬即逝，它是数字产品，视觉电子人，教我们对血肉之躯应该有怎样的期待；训练我们认识什么是有缺陷的，什么是正常的。

我们老练得能一眼认出形象不是"真实的"吗？这要紧吗？没有人会质疑广告："警告：这个身体是电脑生成的，所以别指望你的大腿会有这种效果。"如果有人质疑，会影响安吗？当美丽、爱情和认可在召唤的时候，谁会在乎现实呢？这和老练有关吗？

一次悲哀的证实

在我写《不能承受之重》时，人们普遍相信饮食和身体形象问题完全属于特权阶层的白人女孩。这种看法是过去医学模式的遗留，它相信典型的治疗接受者提供的“数据图”——她的确是来自中上阶级的白人——能说明问题，但没有认识到媒体意象在跨越种族和阶级(和性取向)“散布”饮食和身体形象问题时具有的重要作用。像美国黑人、斐济人和俄罗斯人(还有同性恋女子，拉丁美洲人，和所有其他吹嘘有尊重丰满女人的历史的“亚文化”)一样，非裔美国人也被认为受他们的非传统文化价值的“保护”。因此，许多年轻女孩感到束手无策，独自应对她们不“应该”有的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她们和自己的白人同辈一道，与为了达到目标所感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搏斗，眼看着珍妮·杰克逊和哈里·贝瑞瘦下去。

许多医学专业人士也受困于我所称的“厌食范式”中。他们还没有明白，饮食问题具有不同的形式，产生于不同尺寸和外形的身体。暴食——是非裔美国妇女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和习惯性清肠一样，都是和食物之间的一种扭曲的关系，而且不节食或不愿节食的体形肥大的妇女不一定满意自己的身体。锻炼癖很少被列为判断饮食问题的标准，但它已经成为一代人控制体重的选择，她们模仿詹尼弗·洛佩兹丰满、紧凑的臀部，而不是凯特·莫斯如柴的锁骨。一位少年女子看上去健康和精神并不意味着——在比喻意义上和现实中——她必须在跑步机上生活，她不能走下来，惟恐食物和脂肪压垮她的身体。

直到最近，多数临床医生才接受女性主义者苏茜·奥巴赫（和后来我自己）的论点，即需要将“身体形象紊乱综合征”，暴食/循环呕吐，“贪食症思维”，和所有其他表现理解为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具文化标准化作用。他们想在病态和正常状态之间划一道明确的分界线——当问题在这个文化中涉及饮食和身体形象时，这条线会非常模糊。虽然他们承认形象“起一定作用”，但还是固执地认为只有具有一种“诱病弱点”的女孩才会陷入困境。他们在一种医学模式中接受训练，在个体和家庭病理学中寻找失调的原因，还没有认识到文化对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的要求是多么有力、普遍和有侵害性。

家庭当然是有关系的，种族和民族传统同样如此，但家庭存在于文化的时间和空间中——种族群体亦然，因此，没有人生活在自我生成的“机能障碍”或永久免疫的幻想中——现在尤其如此，因为大众传媒文化越来越为我们孩子的生活提供主导的“公共教育”。有饮食问题的女孩的“数据图”是动态而非静态的，异质而非单一的。现在治疗专家报道说他们在治疗厌食症患者的厌食女儿，并且意识到父母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过度控制”或过分要求他们的孩子中，还体现在树立服从文化标准的榜样中。而且过去对种族和“肥胖认可”的概括或许对老一代的美国黑人来说是合理的，但却无法充分描述年轻一代的复杂并且通常矛盾的态度，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意识到传统价值，还是不断感受到当代要求的影响。在写作《不能承受之重》时，我给致力于黑人妇女健康问题的机构打电话，询问统计数据和临床轶事，被告知：“这是白人女孩的问题，非裔美国妇女满意她们的身体。”20来岁的特尼莎·威廉森患有厌食症，对她来说，这些看法就像她的饮食失调一样不公：“从

一位非裔美国女性的立场看，"她写道，"作为一个种族，我们被鼓励去'接受我们肥大、丰满的身体'。这让我感觉糟透了，因为我不想要一个肥大、丰满的身体！我从来不想总是胖下去，我也从来不想增加体重。我宁愿饿死也不想增加一磅。（这让我感觉自己像）我的种族里无人不知的犹大……难以置信的肤浅。"[13]

实际上，这位忍饥挨饿的白人女孩就是一种前兆，是矿工的金丝雀，警告人们空气有毒。我在杂志、录像和我学生的日记中可以看见这种前兆。如我在《物质女孩》中写到的，我能在麦当娜和其他有意大利、犹太和非裔美国人血统的表演者的转变中看到它，他们在职业的初期似乎抗拒纤细的身体，但后来根本无法抵抗实际看来已经成为海啸的，迷恋拥有一种受规训、标准化身体的文化浪潮。

当把饮食失调分析为一种社会构成，而非个体病理时，它是西方文化中某些特定思潮的"具体化"，这些思潮中有的是历史上的，有的则是当代的，这成为《不能承受之重》的一个中心论点。首先，西方哲学和宗教对作为饥饿、需求和肉体弱点的来源，总是威胁要摆脱控制的身体有长期的焦虑史。但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保持对身体需求的惬意感尤其困难。消费文化不断激励并鼓励我们"释放"，让我们沉溺于对糖、脂肪、性和盲目消遣的欲望中。但同时，以节食、锻炼和增强体质为中心的蓬勃发展的产业又鼓吹自我约束，视脂肪为懒惰的象征，缺乏意志力的表现。想在这一切中找到适度和稳定的位置并非易事，倒是容易陷入失调。对女孩和女人而言，消费资本主义的张力又因在我们的时代中作为女性所具有的矛盾而有不同的层次。我认为这些矛盾在苗条的理想中得到概括性体现。一方面，纤细的身体是对50年代可爱的、生育性女子

气质的反抗，和对一种后女性主义的、非家庭身份的维护。另一方面，女性身体空间的不断缩小似乎又表达了对更强的女性权力和影响力的不安。

让医学专业人士和专业学者严肃地对待文化意象，这是我在会议和公开讲座中表达这些观点时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大多数临床医生习惯于将形象仅仅看作“纯粹的时尚”，在他们看来，文化阐释似乎会削弱饮食失调的严肃性。我坚持认为——这是我在下一本书《黎明地带》（*Twilight Zones*）中明确阐述的论点——关于苗条的形象永远不“仅仅是图片”，就像时尚杂志不断（不真诚地）为它们辩护时所主张的。广告、影像和时装彩页中的艺术化身体不仅是教我们如何看（和评价）身体的有力经验，还提供了对安全、自我抑制、接受、免受痛苦和伤害的幻想。它们不仅对年轻人讲如何变美，还和他们谈如何被主流文化欣赏，如何保持镇定，如何“沉着冷静”。对遭受虐待的女孩它们可能会谈超越，或强化过于脆弱的女性肉体。对身体被注明是外来的、粗俗的和原始的，或按盎格鲁-撒克逊标准判断是没有吸引力的种族和民族群体，它们会以同化，或（在比喻意义上）变“白”为诱饵吸引他们。

就专业学者而言，他们对阐释没有敌意，而是对他们所认为的我对种族和民族“差异”的压制有意见。我对自己论述的理解是，我想唤起对一种可辨别的历史发展的关注——标准化意象跨越种族和国籍的传播。“差异”的确正在被消除，但消除它的是通俗文化，不是我。如今，这个事实的证据是无可争辩的。不可否认，在看待饮食、节食和身体美学的态度方面仍然存在种族差异，但更具戏剧性的是代沟，它证明“对身体的满意”，不论种族或国籍，很快就会成为另一个时代的遗物。[14]当然神话继续存在，它是某种种族

自豪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詹尼弗·洛佩兹和碧昂丝·诺尔斯满意她们的身体，炫耀自己露骨的臀部。“我们姐妹们在后面有衬垫，”碧昂丝说，“拥有曲线优美的臀部和满意自己的身体是一回事。”但显然性感的臀部也是可以的，只要它上翘并且结实，同时身体的其他部位受到严格控制。碧昂丝满意她的身体是因为她不停地锻炼。在这个过程中，她每晚要做500个仰卧起坐，而詹尼弗（她的私人教练说“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有劲头的人之一”）一个礼拜“至少”要做四次90分钟的高强度训练。[15]的确丰满的赛林娜式身体属于遥远的过去，只有用劳拉·弗林·鲍尔做评价标准时，詹尼弗·洛佩兹和碧昂丝才是“丰满的”。

再就是这些男人和男孩，他们曾经有如此强的免疫力。如果说饮食和身体形象问题曾被证实是文化产品的话，那么他们无疑就是这种证实。研究通常显示，女人总是对自己不满，但10年前，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男人倾向于把自己看得（或许）比实际长得要好看。非同性恋者因为自己的大肚子而自豪。“我看上去在乎吗？”是男人味的表现。塑造身体？这在性别上是非常可疑的。节食？一般的白人异性恋男子不会出现在减肥联盟（Weight Watchers）里，就像他们不会戴一条女用围巾一样。“百事1”* 中“1”的目的是为了向男人销售一种节食饮料，同时又不必这样称呼它。

正如我在《男性身体》（*The Male Body*）一书中记述的，节食产业、化妆品制造商，和整形外科医师“发现了”男性身体。既然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发现”的过程为何这么长？害怕被当成同性恋的焦虑让异性恋男子不敢对自己的身体表现出太明显的兴趣，这可

---

* “百事1”（Pepsi One）是百事可乐公司于1998年研发的仅含1卡路里热量的新型饮料。——译者

以说是制造商和广告商所担心的。像迈克尔·乔丹这样的非裔美国超级体育明星，和“吹牛老爹”（肖恩·P·迪蒂）这样的街舞音乐艺人为改变这种局面做了很多贡献。他们让珠宝、最新时尚和炫耀成为显示男子汉气概的东西。但冲破最大障碍的是设计师卡尔文·克莱因。他将扭动的、雕塑般的男性身体公之于众，让所有人，不论是男同性恋还是非同性恋，男性还是女性，屈服于其经典的阳刚之美。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的一则内衣广告时的情景。这位男模不瘦，身体显示着力量、坚固。但他的胸肌虽然漂亮，却没有过于发达，以至暗示了一种因结实的身体——比方说像施瓦辛格那样——而僵化的性。他没有以挑战和好战的姿态注视观众（“嗨，这是一则内衣广告，而且我是半裸的。但我仍然是这里的主管。看谁第一个把眼睛移开？”）。没有，这个模特眼睛往下看但没有合起来，慵懒的身体姿态温和地让它自己成为他者的注视之物：尽情欣赏我吧，我在这里是就被看的。

如今男人们再也不认为个人护理，或在自己的穿衣、身体和美丽中找到乐趣在别人眼中是女人气的表现。但正如男人们所发现的，想要沐浴在羡慕的注视中就必须不断保养身体，因为这毕竟是消费文化。一个好东西永远不会让它满足。它依赖我们过度行事的能力；它想让我们继续下去。卡尔文首次用运动员式的、肌肉发达的男性身体覆盖建筑物、杂志和地铁站，它现在对非同性恋和同性恋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审美要求。“没有胸大肌，就别谈性。”这是前卫的大卫·巴顿健身房推销自己的方式。“我的格言不是‘做健康的人’，而是‘让自己裸体的时候更好看。’”巴顿说。[16]

现在，年轻男子照镜子时会发现自己体态柔弱、体形欠佳，不管他们多么强壮。他们现在开始患我们曾经认为只有女孩才会有

的饮食和身体形象失调；他们现在滥用类固醇，用职业运动员、健美运动员和《男士健康》模特的油光闪闪、经过改善的形象衡量自己的肌肉。强化身体的产业——整容医生、抗衰老乳霜生产商、温泉浴场和沙龙——如今也从男人身上赚取丰厚利润。

既然身体形象问题开始困扰男孩和男人，那么——没有得到认可的——女性主义文化论述好像最终取得胜利。心理学家正绘制图片，表现像“G. I. Joe”* 这个品牌的玩具不断变瘦和强壮的部分，用“类固醇化”的插页照片说明他们的研究，并让读者放心，即便最具“自我调节能力的男人”也有危险。《猛男情结》(*The Adonis Complex*)一书的作者(都是医学专业人士)说：“如果男人能从社会对他们应该长什么样所怀有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中解放出来的话，那么他们会减少许多痛苦。”[17]

我当然同意这种说法。但我无法不去想女孩、女人和她们的家庭所忍受的内疚和羞辱，因为我们的身体失调在过去一直不受重视，并被当成一种患病的证据。该是我们把问题讲清楚的时候了：“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女孩和女人同样有危险；没有弱点的种族和民族是不存在的；身体的风险可以像任何其他有利可图的商品一样在全球范围内出口、进口和交易。

在形象的帝国中老去

35 岁前他们一直给我写卡片。即使当我 45 岁的时候，人们听到我的年龄还感到震惊。即便在我 50 岁的时候还有年轻人和我

* G. I. Joe 是美国“孩之宝”公司的玩具，是全球军事玩具第一品牌。——译者

调情。孩子的时候我不喜欢自己的脸——浓密的红发、满脸雀斑、犹太的鼻子——但长大成人后却非常满意自己的长相，这让我吃惊。然后突然间全都变了：化妆品柜台处的女人再也不恭维我的皮肤了，男人不再用他们眼中调皮的暗示吸引我的注意。

我56岁了。杂志告诉我女人在这个年龄仍然可以美丽动人。但它们指的不是我；它们是说雪儿、戈尔迪、费伊、坎达丝。变老后下颌的垂肉反而不见了，眼睛也不像之前那样下垂了，嘴唇更加丰满，额头更加光滑，它们是指这样的女人。它们是说苏珊·萨兰登，她在1991年的影片《末路狂花》中的样子比现在要老。有风度、自信和活力地度过自己的生命，这是"美丽地老去"曾经的意思，而现在是指完全没有衰老的迹象，而且它——像挑战地心引力的胸部一样——正成为一种新的身体标准。

格里塔·范·萨斯特里恩以前是CNN的法律分析师，47岁。当她做面部拉皮的时候，对普通女性来说的确意味着她们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她有一种独特的风格：不乱讲话，不故作真诚（在辛普森案中，她是许多黑人信赖的唯一白人记者）。她穿着时髦，总是戴头巾，但谈不上真正漂亮。没人认为她的外表是事业的基础，或许恰恰相反，她传递了一种颠覆性信息：即使在电视上，智慧和人格也仍然重要。

当格里塔整形的时候，另外一种灵感和希望的来源也被埋没。故事发生在《人物周刊》的封面上，人们纷纷收看她在福克斯电台中的崭新亮相，为的就是看看她的变化——很大的变化。但对此她至少是包容的。美人从来不承认她们做过"改进"，或者即便承认，也会讲得含糊、不明确，并且把程度降到最低。雪儿说过："如果我像人们说的做过那么多次整形，那我整下来的部位可以拼出

另外一个人啦!”[18]好吧,那么你做过多少呢?采访者接受沉默和回避,甚至装点谎言。你读过的采访中有多少是这样开头的:“她走进饭店,看上去比她实际年龄至少年轻20岁,气色好,神态放松,没有一处化妆的痕迹。”

然而,这种共谋,这种表现雪儿、戈尔迪和费伊·唐纳薇依然如故的神话,是我的长相因为“现在50来岁的人的样子”就发生的变化——而且没有外科手术的好处。和她们的长相相比,我的比实际上要老得多。

由于保妥适*的普遍使用,我的表情看上去也更严肃了(这正是一位女性主义者需要的)。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发现,“在某些社交圈里很少看见一位35岁以上的妇女会生气”[19]。这让一些电影导演头疼不已,比如(《红磨坊》的导演)巴兹鲁曼。“她们的面部表情实在无法到位。”巴兹鲁曼抱怨说。[20]上周我在理发的那家美容院看到一个广告牌,写道:“保妥适派对!赶快报名吧!”所以我56岁的额头要和我邻居的,而不仅仅是戈尔迪、雪儿和费伊的,做比较了。电视上的一则广告将这个产品(真的是一种毒素、一种波特淋菌中毒的稀释)描述为“保妥适化妆品”。它跟染眉毛油和布鲁廷的用法一样,用一根针戳进去让你的额头麻木。

雪上加霜的是,女性主义话语已经被用于推广抗衰老和改变身体的产业并为其辩护。面部拉皮、植入术和抽脂被宣传成能给人权力,是“掌握”自己生命的表现。“我是为我自己做的”——这是脱口秀节目的祷文。“反抗你的年龄!”——这是梅兰尼·格里菲斯为露华浓做广告时说的话。我们正在进行革命,女孩们;快把

---

* 保妥适(botox)是从肉毒梭菌中得到的一种天然的纯化蛋白质,是全球最知名的肉毒毒素品牌。——译者

注射做了，然后选一个标记！

我无动于衷吗？当然不是。我浴室的架子上零乱地放着各种抗衰老洗液和药水，它们贵得离谱，不断在兰蔻和迪奥的柜台向我招手。我想让自己的皱纹、下垂和松弛的部位消失，那些只能在凯马特超市购买果酸护肤品的女人同样如此。但果酸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外科医生研发了功能越来越强、精确度越来越高的手术来修正重力，抹去病人脸上岁月的痕迹，所以经过整容的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别愈发明显。

“其他人”不仅包括这些反对和害怕外科手术的人，还有许多负担不起基本的健康护理，更不用说审美修补的人——她们甚至连凯马特的商品都买不起。名人脸青春永驻，永远亮丽，让人惊讶，所以越来越不现实，正如《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还有《探索》和《今日心理学》）所称，我们现在都能“长生不老”，但穷人继续皮肤松弛、长皱纹、掉牙齿。[21]但在形象帝国中，即使有关股票丑闻或生七胞胎的新闻中的人物也会被立刻实施数字牙科手术，然后上杂志封面[22]，在这里，上述事实是个无人知晓的秘密。名人感谢信、广告、美容专栏都参与到各种虚构中来，即所有人都不必为所需的时间、金钱和技术发愁。[23]

在形象帝国中成长的女性

我能分辨我的演讲听众的年龄：因为我那一代（和更老一代）的人仍然会提到“气刷喷漆”。许多人仍然相信可以“把电视关掉”。他们表现得轻蔑、不屑一顾，相信自己对我所谈论的世界有免疫力。没有人真的相信广告，不是吗？难道我们不知道这些只

是为了推销产品而设计的形象吗？听众中的学者会亮出关于文化抗拒和“力量”的理论；男人坚持认为他们喜欢丰满的女人。

15年前，当我那一代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感觉非常孤独；好像她们生活的世界与我所关注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而且无望消除这种隔阂。现在，我完全可以吸引一位20岁听众的注意力，她们也明白。她们知道，对于广告你怎么抱怨都可以——她们中的大多数的确如此——但还是无力抗拒它们传递的信息。她们清楚无论她们的父母、老师和牧师怎么说，“内在美”在这个文化中是个天大的笑话。

在她们的世界里有零这个尺码，而且它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习惯性节食者从八九岁开始就有这种想法。“饮食失调流行病”不足为奇；别人对她们唠叨它只会让她们恶心。在她们的世界里，厌食症患者在网上交换节食减肥技巧，参加禁食团体，提供建议，如何不让家人看到你的“资料”，并且分享给人消瘦模特的照片。但全面发作的厌食症从来没有成为少女的标准；真正的流行病发生在这些女孩中，她们有看似健康的饮食习惯、看似健康的身体，把强迫自己呕吐、通过锻炼缩小臀部作为一种固定的减肥形式。这些女孩不仅看上去“正常”，而且认为自己是正常的。在少女中流传的新标准是：如果你是通过锻炼而不是清肠或泻药摆脱掉它，那么你就没有问题。在她们的世界里，成群的女孩在宿舍里贪婪地吃比萨饼，先咀嚼，然后再满口吐出。她们失调吗？当然不——瞧，她们正在吃比萨饼呢。

在形象帝国中成长的一代既脆弱又精明。当杂志定期宣布（大约每六个月一次，这也是它们推出“饥饿明星”封面故事的频率），在“新好莱坞”中“任何尺寸的身材都是性感的”时，她们对此

嗤之以鼻。她们是文人，是鉴定形象的行家；她们密切关注詹尼弗·洛佩兹、瑞茜、索拉、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碧昂丝的体重变化。他们在小报上看到，凯特·温斯莱特——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在《泰坦尼克号》中称她为“胖凯特”——“超重了”、“鼓起来了”、“胀起来了”、“体重猛增”，“巨大的”、“令人惊愕”的体重——135磅——“把秤都压翻了”。苗条的考特尼·索恩·史密斯在《甜心俏佳人》中扮演卡莉斯塔·弗洛克哈特的朋友和对手，因为无法忍受戴维·凯利让她们保持苗条身材所带来的压力而退出。米西·艾略特和奎恩·拉提法只是因为健康原因才没有节食。

我怀着特别的关注追踪当代年轻女孩的文化，因为我现在是一位母亲。我四岁的女儿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对自己的身体极其自信，因为能做——而且做得更好——任何男孩可以做的事情而自豪。当看到年轻女孩被文化贬低和折磨时，我现在有更强烈的个人感受。有全新一代的女性运动员为像凯茜这样的女孩提供灵感和支持，我们的偶像也不再是娇小的体操运动员，而是强壮的足球、垒球和网球运动员，和宽肩的径赛明星，这让我深感欣慰。米娅·哈姆、萨拉·沃尔登、塞雷娜·威廉姆斯、马里昂·琼斯。[24]前不久去参观一所中学期间，我注意到一位14岁的运动员谈到马里昂·琼斯对她意味着什么的时候，眼睛是如何明亮。在这个年轻女孩的身上，我看到了10年后我女儿的样子，我满怀希望。

但当我不经意间收看“莫瑞(波维奇)秀”* 时，我的心又被撕碎。那天的主题是“变回女孩”。一个接一个，通过时尚美容，五个美丽的12、13、14岁(如莫瑞所称的)“假小子”被“恢复了她们女人

* 莫瑞(Maury)是著名华裔电视主播宗毓华，波维奇(Povich)是她的丈夫，莫瑞(波维奇)秀是他们主持的一档谈话节目。——译者

的一面”(还是莫瑞的说法)。我们第一次看到她们的时候,她们穿运动衫,戴帽子,坚持认为她们和任何男孩一样强壮,怎么舒服就怎么穿,厌倦人们纠缠着让她们有女孩样。那么她们为什么偏偏服从于这种一次性的、电视上的转变呢?为了让她们的妈妈开心。的确,重新回到舞台上时,她们浓妆艳抹,穿着华丽,头发飘逸(黑人女孩的头发要拉直),明显带有荡妇般超级模特的“权力”姿态,她们的母亲看到她们这个样子啜泣起来,好像刚刚得知她们女儿的癌症得到控制。母亲们如此满足,别无他求,但莫瑞显然想让她们实现彻底转变:“知道你多么可爱吗?”“看看你长得多棒!”“听众中的那个家伙——他已经在地上啦!”“你们将来会经常这样穿吗?”不出意外,多数女孩都给出肯定回答。这是一种正面攻击,无处可逃。

虽然我已筋疲力尽,但这档“莫瑞秀”的确吸引了我。我想把每一个女孩抱在怀里,带出那个演播室。当然,我真正担心的是我无法保护凯茜不受这种攻击,而这已经是事实了。我和她一起看公共电视的儿童节目,对于它们描绘的中性世界我看不出有任何问题。我们去看迪斯尼电影,看到足智多谋、精神饱满的女主人公,她们中有的甚至像《星际宝贝》中的夏威夷女孩一样,腿部粗壮、身体结实。回家的路上,我们在麦当劳吃了一顿开心乐园餐,而且——尽管凯茜坚持自己是男孩,想要男孩的玩具,一辆风火轮汽车——她还得到一个礼盒,里面有一个迷你芭比娃娃。图解这个盒子的是芭比的房间,我女儿还得到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要找出地上所有匹配的鞋。

那天晚些时候,我打开了一个“陶瓷库房”* 的目录,为凯茜的

* “陶瓷库房”(Pottery Barn)是美国的著名家具品牌。——译者

房间寻找灵感。里面男孩房间的颜色是红、黄、蓝三色,床单上摆放着球、球棒和接球手套,文字说明写道:"我会的运动太多了,很难讲哪个是我的最爱。"听上去像我女儿。背面是女孩的房间,用彩色蜡笔画的星星作为装饰,文字说明是:"我喜欢星星,因为它们眨眼睛。"这也像我女儿说的话。但"陶瓷库房"认为一个孩子不能同时住在两个世界里。如果它们的目录也像被性属一样在种族上隔离和模式化,那么人们会抵制的。

我给凯茜租了《天才小子吉米》,它的市场定位是儿童电影,获得空前成功。这部影片总的来说还可以。但之后我们迷上了出现在影片后面、没有任何预告的音乐录影带。演唱者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一个组合,歌名叫"美国的小孩"。演唱者都是女孩,两位13岁,两位15岁,一位16岁。我知道她们的年龄,因为当她们逐一露面时,她们的年龄也随之醒目地出现在屏幕上。她们都身穿泼妇的衣服,专业地扭动着身体,化的妆也是专业水准的,眼神挑逗。

我在想,我们为什么要被告知她们的年龄?我们应该惊叹她们的表演所产生的女人气质的幻觉吗?或者因为她们的青春,小孩看这些的时候应该没有问题吗?还是表达"这是装出来的,只是一种化妆游戏"这种意思?没多久之前,整个文化都对乔恩·贝尼特·拉姆齐戴别针、在孩子的选美活动中表现女性特质感到愤慨。2002年的万圣节夜晚,我们看到幼童版的布兰妮·斯皮尔斯在大街上行走。我们现在真的认为把我们的女儿装扮成小妓女是可爱的?《女孩的秘密生活》一书的作者莎伦·兰姆是这样认为的。她建议母亲们,如果她们的9岁女儿"穿高跟鞋玩可爱的小游戏,脱衣挑逗,情绪暴躁,让自己的胸部突出"的话,不要紧张;如果11岁的女儿出去的时候"涂了厚厚的蓝色眼影,吊带和肩带扭在一起,

穿黑色的短连衣裙，身材苗条，腿部修长”的话，要放松。她告诉我们，“她们虽不懂事但可爱，既性感又不可思议”，因为她们“庆祝她们的客体化”，“表现男性的幻想……但没有危险。”[25]

果真没有危险吗？我不反对打扮，但情绪暴躁是一回事，脱衣挑逗是另外一回事；厚厚的蓝色眼影在妈妈的浴室里是可以接受的，但11岁就在夜间到城里寻欢作乐则要另当别论。读到“没有危险”这些字的时候，我想提醒莎伦·兰姆，所有对女孩实施的强奸中22%到29%发生在她们11岁或更年轻的时候。[26]我们也许会认为，这些强奸是神经错乱的疯子所为，和现实相去太远，可以被周围的文化忽略。媒体应大肆渲染所谓的绑架女孩的流行病，就像我们在2002年的夏天所目睹的，有助于维持这种捏造，并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教自己的女儿不占便宜，不上陌生人的车，我们就是在尽我们所能保护她们。

但实际情况是，年轻女孩更愿意被朋友和家人，而不是陌生人强奸，而且，不管这些男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他们很少不受一种视觉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表现在他们眼前手舞足蹈的早熟女孩，渗透出前青春期女孩不具备的性知识和性经验。女性主义者过去常称其为“强奸文化”。我们再也听不到这种说法了，不是吗？

希望和恐惧

即便如此，进步力量在形象帝国中并非完全沉默。说到这个，我想起了《青年人》少年杂志。这本杂志做了一项调查，显示它的青年读者中有86%的人对自己的身体外形不满，此后便向饮食失调和身体形象问题公开宣战，制定编辑方针，不发表节食方面的文

章,并在所有的时装彩页中故意使用丰满的模特——但不"明确表现"她们是丰满的。[27]这些编辑在获得他们的英语和新闻学学士学位时肯定学过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因为他们很年轻,我想这大概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抵抗脱脂身体的霸权。[28]

当然,媒体方面最进步的发展是市场而非社会良心带来的。因此,4900 万妇女的胸围是 12 厘米或在这之上*,这个事实显然是"大小正合适"**和雷恩·布赖恩特***引发的新式的、肉体标准化运动背后的动机。[29]这些运动骄傲地炫耀丰满的身体,而且和原来对"加码"妇女的销售不同,它们拒绝使用这个说法,(正确地)认为被称为"加码"的东西实际上是普通的。这是个非常棒的盈利策略(我知道它们赚了我不少钱),但也是一种抗拒。"我再也不想让自己处于不被看见的状态",这些广告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宣称。"但我也不会让自己变成一个文化怪人或玩笑,因为我不是。我是标准。"

消费资本主义缺乏道德感,在其不断寻找新市场,和产生并满足欲望的新方法时,还创造了一个种族再现的世界,现在这个世界比我写《不能承受之重》时要多样化得多。这是另外一个对我而言有特殊意义的问题,因为我的女儿具有双重种族身份,而且我敏锐地意识到她看到的世界,和关于她自己,这个世界对她讲了什么。当翻看当代的杂志,注意到上面描绘的不同肤色、鼻子和嘴巴时,

---

* 这个数字是由上胸围减去下胸围得出的,这是计算女人杯罩大小的方法。——译者

** "大小正合适"(Just My Size)是美国著名公司沙拉·李旗下的一个内衣品牌,公司主要经营食品、饮料、服装。——译者

*** 雷恩·布赖恩特(Lane Bryant)是世界顶级的大码女装品牌。——译者

我感到暂时的高兴，庆幸凯茜成长在今天，而不是谢里尔·蒂格斯*统治下的70年代。当然，总能找出这些“再现”中仍然存在的“问题”；种族习俗和美学积重难返。耶洗别**和艺妓依然存在，而且尽管黑人男性模特和小孩可以留头发和“埃弗罗发式”***，但直发——现在已经超出了我所认为的人的头发可以被拉直的极限——对黑人妇女来说几乎是一种强制性的审美要求。[30]

要愤世嫉俗也不难。让我们感受今天的时尚多样化的人，本来就是那些让我们屈从于金发碧眼的霸权，让皱纹和脂肪团变成疾病的人。时尚目前偏爱丰满的嘴唇和具有双重种族背景的孩子，将这种偏爱视为民族时尚和当月的盲目崇拜并不难。可以把它看做一种发掘族群行业和白人美容旅游业(beauty-tourism)的无耻尝试。但孩子给了我另外一个角度，因为我试着去想象她眼中看到的是什么。对于生产这些形象的人的动机，凯茜一无所知；以她的年龄，她只能认识它们的表面。表面上，它们呈现的世界包容她、赞美她，而我成长的世界里没有我，也不赞美我。尽管我们的形象帝国让我愤怒、受挫，对它冷嘲热讽，我还是禁不住要为此感恩。

情况好的时候，少年杂志，还有雷恩·布赖恩特和“大小正合适”的广告中发生的变化让我振奋。或许广告商发现，先让人们对自己没好感，然后再提供承诺改变现状的产品不是赚钱的唯一方式。如种族再现所示，多样性是有销路的。也许，如雷恩·布赖恩特和其他制造商所希望的，鼓励人们从正面看待她们的身体同样

---

* 谢里尔·蒂格斯(Cheryl Tiegs)是美国70年代最著名的模特。——译者

** 耶洗别(Jezebel)是《圣经》故事人物，以邪恶淫荡出名。——译者

*** 埃弗罗发式(Afro)是一种蓬松如灌木状的非洲发型。——译者

可以打开市场。有时，当我考察如今是衡量标准的身体的塑料和数字化世界时，我相信我们现在这种着迷的状态离反感或者是无聊不远了。我看见一位20来岁的女子在当地的一个摇摆派对上跳舞，她的肚子柔和地从低腰牛仔裤厚厚的皮带上荡出来。她没有紧绷的肌肉，皮肤不柔滑，没有像某种难看的畸形一样被巧妙地伪装，而是骄傲地展示自己，给人感官享受，让我想起了变成强壮的、有强烈支配欲的女子之前的麦当娜。我们开始反抗名人身体的人造外观，开始反感他们伪装的“完美”，是这样的吗？

我必须承认，这些给人希望的时刻是转瞬即逝的。我经常会有恐惧感——为我女儿担心。我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公开地表达这种恐惧是危险的，会被当成一个爱说教的假正经，一种过时的女性主义的遗留。为年轻人做讲座的时候，我努力用轻快的方式讲授，肯定积极的方面，确保我对文化的批评不与反对美丽、反对健康或者反对性相混淆。但我也知道当父母和老师与文化打成一片时，孩子们就会深陷其中。我不告诉她们让她们喜欢自己的身体或关掉电视——如今这些告诫是没用的，连我自己都不会遵守。但我的确想干扰她们每天在文化中的沉浸，哪怕是暂时的。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总之，我不会让它把自己当成“常态”蒙混过关。

灯光暗下去，幻灯片升起来，看上去比在杂志上要大许多，但又奇怪地被缩小到精确的尺寸。片刻间，我们遭遇了多么怪诞、离奇和矛盾的形象。在一则宣传乳房植入体的广告中，乳房坚挺直立，奥普拉的头通过数字手段被接到另外一个女人的身体上，我们都对此有说有笑。当看到詹尼弗·洛佩兹之前和之后的照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惊讶不已。我们为马里昂·琼斯的肩膀喝彩，为这个事实喝倒彩，即美国女子篮球联盟的芭比就是那个旧的芭

比，只不过手里拿着篮球而已。片刻间，我们控制了“完美”身体的伪造形象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一同观看并且分享片刻的愤慨。

目　　录

致谢　/1

前　言

——阅读鲍尔多　/1

在形象的帝国中：十周年纪念版序言

——致凯茜　/1

导　论

——女性主义、西方文化和身体　/1

第一部分　身体的话语和概念

这是谁的身体？

——女性主义、医学和饮食失调的概念化　/53

母亲是人吗？　/81

——生育权和主体性的政治　/81

作为意识形态的饥饿　/113

第二部分　苗条的身体和其他文化形式

神经性厌食症　/159

——作为文化具体化表现的精神病理学

身体与女性特质的再造　/190

解读苗条的身体　/213

第三部分　后现代身体

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性属怀疑论　/245

“物质女孩”

——消除后现代文化　/279

后现代主体、后现代身体、后现代抗拒　/312

注释　/339

译后记　/399

导　　论

——女性主义、西方文化和身体

笨重的熊——“身体的同在性”*

与我同行的那只笨重的熊，
用大量的蜂蜜涂抹他的脸庞，
笨拙和笨重地走来走去，
处处都是重心，
因为饥饿变得凶残，
喜欢糖果、愤怒和睡眠，
这个疯狂的杂役，把所有的东西弄乱，
攀爬建筑、脚踢足球，
在一个仇恨肆虐的城市里拳打自己的兄弟。

---

* “身体的同在性”是怀特黑德对施瓦茨《笨重的熊》这首诗的题词。

那只熊在我的一侧呼吸，
和我睡在一起，
在睡梦中为一个糖的世界嚎叫，
一种似水般亲密的甜蜜感，
他在睡梦中嚎叫，因为那条紧绷的绳子
颤抖着暴露出下方的黑暗。
这种趾高气扬的炫耀受到威胁，
他身穿礼服，裤子凸起，
战栗着想必须
最终拿下那块颤抖的肉。

那只甩不掉的动物与我同行，
还在漆黑的子宫里时就一直跟随我，
我到哪他就到哪，扭曲我的样子，
他是一幅漫画、一个肿胀的影子，
一个模仿灵魂动机的愚蠢小丑，
用他自己的黑暗迷惑和冒犯，
腹部和骨头的秘密生活，
他是隐晦的，非常亲近，和我的关系是私密的，但又是未知的，
他伸出手去拥抱那位我想远离他
和她同行的那位亲爱的，
他敷衍地触碰她，尽管一个词
就能表明我的心迹，说明我的意思，
他蹒跚着、挣扎着，努力想得到食物，
他拖着我和他一起觅食，

在他数以亿计的欲望中，
这就是无处不在的食欲的混战。

德尔莫·施瓦茨*

身心二元对立的文化表述

通过将身体比做“笨重的熊”，德尔莫·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形象地传达了西方哲学和神学的标志性二元对立，点明了其对抗和易变的性质。怀特黑德的题词展示了占主导地位的双重构造，那个涵盖并控制所有其他事物的构造，即断裂与连结，分离与亲近。“身体的同在性”：那个不是“我”，但又同我在一起的身体必然“与我同在”。我的身体像一对暹罗胎，** 与我若即若离，“还在漆黑的子宫里时就一直跟随我”，我到哪他就到哪，与我形影不离。即便在睡梦中，“他”也在“我的一侧呼吸”。然而，虽然我无法摆脱这个家伙，虽然我被迫与“他”亲密接触，但他却对我敬而远之：我们的关系是“私密的”、“亲近的”，同时也是“隐晦的”。

身体是一头熊——一只凶残异常的野兽(“把所有的东西弄乱……脚踢足球 /在一个仇恨肆虐的城市里拳打自己的兄弟”)，但没有工于心计的恶毒。因为这需要智慧和远见，但熊只是按本能行事，满足自己原始的需要。他得听口的使唤，饥饿让他盲目“觅食”，寻找糖和蜂蜜，他因此“坠入爱河”——多么细腻、浪漫的情怀——但对象却是最基本、最幼稚的欲望：沐浴在甜美之中，宣泄自己的愤怒，在疲

---

* 德尔莫·施瓦茨(1913－1966)：美国杰出犹太诗人和评论家，被认为是索尔·贝娄的小说《洪堡的礼物》中洪堡的原型。——译者

** 暹罗胎：暹罗是泰国的旧称，暹罗胎泛指畸形的双胞胎。——译者

龛中进入恍惚。即便在恍惚的状态下，他还是会饥饿，还是会渴望，他还依稀记得子宫里的那种饱满的感觉，在那里只有需要和满足，没有挫折（和欲望），他嚎叫着想重温这种感觉。

作为身体的熊笨拙、臃肿、恶心，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傻瓜，在我努力清楚地表达自己、交流爱的时候，他将我绊倒。在欲望的驱使下，他继续愚蠢地，无意识地歪曲我的"灵魂的动机"和更好、更清晰的自我；就像来自柏拉图黑暗洞穴的艺人，他向世界展示了一个错误的我，是对我的"内部"世界的夸张、愚蠢的拙劣模仿。我会是一个感性、体贴的人，我将对我的爱人倾诉内心最深处的感受，但他只是"敷衍地触碰她"，他想要的是粗俗的、身体上的释放。我会勇敢地面对死亡，但他选择逃避，在恐惧中寻找安慰、爱抚和食物麻木自己；他荒谬可笑，是一个愚蠢的小丑，在绷索上表演戏法，迟早会摔下来。

作为我的身体的熊是沉重的，"拖着我和他一起"。"处处都是重心"，用力往下拽——拽向大地，拽向死亡。在他表演绝技的绳索的下方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只熊有一天会变成微不足道、没有生命的东西，成为虫类的"美餐"。他，"那只甩不掉的动物"，会把我拖向这个命运，因为掌控局面的是他，而不是我，他把我带向"食欲的混战"中，一个霍布斯*式的对于本能和侵犯的混杂，在施瓦茨看来，这是人类的生存状况。

将身体比做动物、欲望、骗子，灵魂的牢狱和其目标的破坏者，这些是西方哲学中身体的普遍形象。这并不是说对身体的否定性建构在历史上没有受到任何挑战，或者说，这种建构只有一种形

*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创立机械唯物主义。——译者

式，因为历史上对身体的想象是不固定的。比方说，虽然施瓦茨用柏拉图式的意象来表现身体的扭曲，但他对身体的抱怨和柏拉图大相径庭。柏拉图认为身体遮蔽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它的感觉靠不住，情感善变，不断地诱导我们错把暂时和虚幻当成永恒和真实。对施瓦茨而言，身体和它的激情妨碍我们释放“内部”生命；他表达了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对于孤独自我的失意和对“真实”的渴望，而这对柏拉图肯定是十分陌生的。

不可否认（同时作为另外一个例子，说明西方对身体想象的历史范围），柏拉图对肉体中的情欲持有复杂的态度。《斐多篇》里，激情让哲人无法集中精力求知，但在《会饮篇》中，激情则成了求知的动力：对身体的热爱是通达美的永恒形式的精神之梯的第一步。然而，情欲的身体在基督教教义里又毫不含糊地变成一只施瓦茨想象出来的粗鲁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熊”，体现出我们的天性中动物的、贪婪的一面。但即便在把身体看成动物的这个占主导地位的比喻中，动物性的含义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奥古斯丁看来，人类本性中动物性体现在一个膨胀的、叛逆的阴茎中，它坚持自己的“欲望法则”，反对精神意志的控制——把我们引向罪恶，因此需要驯服。而在17世纪的机械论中，作为动物的身体虽然仍是本能之所在，但已不是罪恶的温床。相反，身体所具备的本能意味着身体是一个纯粹的机械和生物系统，可以被量化并（在理论上）加以控制。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文化、社会和物质变化的压力下出现了新的想象和联想。16世纪，作为认识工具的身体不仅被认为通过不可靠的感觉（柏拉图的主张）欺骗哲学家，而且还被想象成我们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定位，因此是对客观性的羁绊。[①] 因为我们是被

体现出来的，所以我们的思想具有透视性，因此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理解事物的惟一途径是获得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空洞的观点。在我们这个时代（另外一个说明出现新思想的例子），那只熊的“笨重”具有了实在的含义，把它比作身体施加在“自我”上的重负的施瓦茨或许看不到这层含义。我的学生在解读这首诗的时候，把它理解成表现了一名不堪重负的人的痛苦。对于施瓦茨，食物引起的饥饿只是身体众多欲望中的一种，而在我的女性学生看来，则是最持久的渴望和身体给她们带来的愤怒和失意，当然，还有恐惧的重要源泉。

并非所有的历史观念都认为身体是“甩不掉的”。希腊人认为死亡可以将身体和灵魂分离。笛卡尔相信通过正确的哲学思辨，我们可以超越身体认识功能上的局限。在先进技术的帮助下，当代文化好像很热衷于延缓衰老，重新设置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生物钟，甚至抗拒死亡本身。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概念中不变的是这样一种思维，它把身体建构成和真实的自我（不论是灵魂，还是思想、精神、意志、创造力、自由等等）相分离，并让自我的精华消磨殆尽的东西。不是身体的东西是最好的，最高级、最高贵、最接近上帝；和身体有关的则被当成包袱，阻碍自我价值的实现。[2]

作为身体的女人

性属和这个二元对立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像女性主义者所证明的那样，这种二元对立的体系经常被性属化，女人扮演身体的角色，被“它所特有的一切压垮，”波伏娃说，相反，男人的形象则具有“必然性，像一个纯粹的理念，是万物的源泉，万物的代表，是绝对

意志”[3]。丁纳斯坦认为，作为婴儿，我们的身体由女人照看，结果是，“肉体的阴暗和卑微”成为女性的标识；而在另一侧站着一位“正直和高贵的‘他’……代表了人想要与肉体划清界限，并保持对其清醒认识的那一部分：远离婴儿期的混乱和肉欲的氛围，和那种单纯的人性，这样的‘我’为男人所有”[4]。对女性这些刻画的代价显而易见。因为不论这种二元对立的具体历史内容是什么，身体都是一个负面的说法，假如女人是身体，那么女人的形象也是负面的，而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比如说不重视知识，诱惑上帝，放纵性欲，暴力或好斗，缺乏意志，甚至死亡。

尽管施瓦茨的身体概念的确被性属化，但没有以上述方式表现女性。显然，“笨重的熊”被想象成并象征男性（可以肯定，在种族和阶级方面也得到了体现）。金刚的形象（“攀爬建筑”）呼之欲出，男性群体之间的冲突（“在一个仇恨肆虐的城市里拳打自己的兄弟”）也得到展现，整首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比喻之一是把自然界比作足球比赛（“欲望的混战”）。诗歌刻画的不是母性或者女性的原始状态，而是笨重、粗俗，好斗同时又无助的男性兽性。诗里的女性元素体现在对子宫生活（“水的环绕”）的怀念，和当下那个“亲爱的”，那个他渴望和其体验没有被熊的粗野本性糟蹋的关系的爱人。女人在这首诗里的存在痛苦地暗示了往昔的甜蜜和当下的渴望，但对欲望的对象不带有任何积怨、反感或不满。施瓦茨在以所有烦恼的事情观照身体的同时，没有用身体的烦恼观照女性。虽然经受痛苦和隔阂，他还是通过那只是自己身体的“熊”把这些烦恼据为己有。

通过占有一个本能的、婴儿的身体，施瓦茨将自己和大部分的基督教传统，和这个传统所赋予的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意象和

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从经典的诱惑男人的女性形象(夏娃、莎乐美、黛利拉)到电影《致命诱惑》(*Fatal Attraction*)和《无罪推定》(*Presuemed Innocent*)展现的当代世俗版本,西方的这种思维方式都得到了体现。电视肥皂剧中,性感妖妇的出现成为一种模式。没有露西·科或埃丽卡·凯恩*的节目就别想有高的收视率;连肥皂剧颁奖典礼都设立"最佳女恶棍"这个奖项。女人不断地、主动地勾引男人,挑起他们的欲望(还经常引向邪恶),这种描绘实际上不承认男性对身体和其欲望的占有。女性的所作所为是引起这些欲望的原因,因此错在女人。这种思维的力量太强大,以至于一些强奸犯和虐童者声称自己被五岁女孩"勾引"的时候,人们竟然相信。

女人对男人身体上的反应负有责任,不论这种反应是侵犯性的还是性方面的,但这种责任并非一定来自女人有意识的动机。女人之所以不能做牧师,一个既定的理由是,女人只要往那里一站,就会勾起邪念。好多情况下,即便女人保持沉默(或谈论完全相反的话题),她们的身体也在"讲"一种挑逗性的语言(见图1)。当女人对自己的女人味不加掩饰的时候,她们可能会被当成引诱别人,"招摇过市":就在两年前的佐治亚州,一名男子强奸了一名女子后被宣告无罪,原因是他辩护说那名女子穿了迷你裙。当这些诱人的女性身体对男性的调情无动于衷时,可能会被认为是对男性的戏弄、奚落和嘲笑。在蒂莫西·贝内克的《男人看强奸》一书中,一些个人经历证明了这种理解。

* 露西·科和埃丽卡·凯恩均为美国肥皂剧中的虚构人物。——译者

这么说吧，我看到一个女人，她长得很可爱，白白嫩嫩的，很性感，女人味十足，摄人魂魄。我就琢磨："哇，我想和她做爱"，但我知道她不是真的感兴趣，她在戏弄我。很多情况下，一个女人知道自己长得好，就利用自己的美貌到处炫耀，这让我觉得她在嘲笑我，让我有种堕落感。[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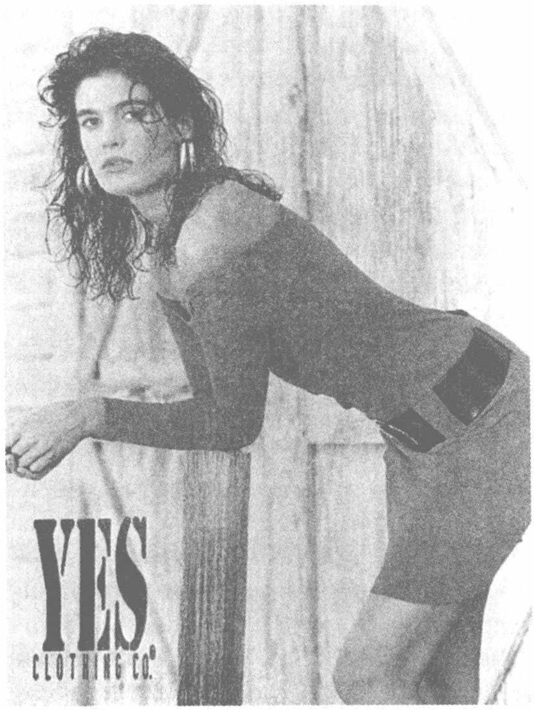


图1　这是一则时装广告，时装模特穿着性感，说明女人即使沉默，身体也有挑逗性。

在大量的"恐怖"影片中，女人性方面的独立被表现为诱发残忍杀戮的原因。习惯性虐妻者常常辩解说是他们的妻子"让他们"大打出手的，可能因为看他们的眼神不对，对他们的态度不好，或者是其他（通常很不值一提的）一些流露出自主意识的身体动作。

如果需要说明的话，我的意思不是想责备男人都有可能成为强奸犯和妇女虐待者；这样做无异于沉醉在一个关于男人的文化神话中，这个神话和关于女人的那些性感妖妇的神话一样有害。相反，我的目的是要展示一种持续的历史力量和一定的文化想象，以及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它们不仅对男人不利，对女人（既然我们同样生活在这种文化中）也是一种威胁。女人和女孩经常将这种意识形态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认为自己应该为不受欢迎的套近乎和性侵犯负责。这种内疚感恶化后，我们便对自己的女性特质产生不安，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并产生自厌。例如，神经性厌食症常发生在性虐待和受到羞辱后，这至少可以被部分看作是对身体的"女性特征"的抗拒和对其欲望的惩罚。这些欲望（正如我在《作为意识形态的饥饿》里所认为的那样）频繁地通过女性的食欲这个比喻实现文化上的表征。厌食症拒绝食欲的极限（到快要饿死的程度）表明了她建构现实的二元性质：她要么完全超越身体，成为纯粹的"男性"意志，要么完全屈服于退化的女性身体和令人作呕的饥饿。她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没有中间地带。

女人可能会非常相信有关其他女人或女人们的文化神话，正如人们对帕特里夏·鲍曼/威廉·肯尼迪·史密斯强奸案*的反应所证明的那样（"她为什么和他回家呢？""她为什么让他吻自己呢？""如果那晚她只是想和自己的女性朋友在一起的话，又为什么和他去酒吧呢？"）。安妮塔·希尔指控当时有望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克拉伦斯·托马斯对其进行性侵犯，考虑到有相同经历的女性不在少数，因此有些女性对此持怀疑态度，就更引人关注了

---

* 1991年，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外甥威廉·肯尼迪·史密斯被指控曾在棕榈滩肯尼迪庄园强奸一名酒吧女子帕特里夏·鲍曼，但最终无罪释放。——译者

(“她为什么跟他去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她为什么喊他听电话?”“她为什么开车送他去机场?”)。总的来说,这些问题是针对希尔的可信度而提的,而不是想说明她主动和托马斯发生性关系。但对我来说似乎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具体的疑问背后是对希尔行为的指责,嫌她行事欠妥当,不够谨慎,太过张扬,不管发生什么,她都是“自找的”。女人们提出这些质疑的强度和表现出的恶意说明了强大的自我观照正在起作用,能让她们远离自我怀疑。“她怎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才说呢?如果她说的那些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才不会放过他呢。”就这样,女人们坚定了对自己毋庸置疑的自尊、自信和“纯洁”的信念,但却以牺牲希尔为代价。

当然,对于安妮塔·希尔的非裔美国评论者——不论男女——来说,情况更复杂。男性黑人被模式化为性欲过剩的动物,在这种普遍的意识形态下,好多人觉得支持希尔就等于相信种族主义神话。一些非裔美国妇女在相信希尔指控的同时,对于像她那样公开揭发一个男性黑人感到愤怒。暂且不说这些批评在多大程度上是公正的(我在《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性属怀疑论》中讨论了希尔/托马斯听证会的细节),它们忽略(当然也是白人、男性议员和这次听证会的媒体报道所忽视的)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将非欧洲“人种”表现为“原始”、“野蛮”,有动物般的性欲,比白色“人种”更加性感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意象[⑥],不仅适用于女性黑人,对男性黑人同样如此。

有些观点认为所有的男性黑人本质上都是潜在的强奸犯,与这些观点相对应的做法是将女性黑人模式化为没有道德的放荡女人,而她们不可能被真正地强奸,因为强奸暗示的是对谨慎和克制的个人空间的侵犯,但女性黑人在人们的想象中不具备这种空间。

有关性的流行神话认为男性黑人的生殖器特别发达，与此相对的是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观念，认为非洲女性的生殖器比（而且构造不同于）欧洲女性的发达，说明了（根据J. J. 维里对种族的研究）她们为什么更加“性感”和“淫荡”。[7]像进化论者把非洲男性的头骨和猩猩的做比较一样，对黑人女性身体的“科学”再现夸大（并常常创造）她们和动物，尤其是猴子之间的相似。“霍屯督的维纳斯”是一位来自南非的妇女，18世纪末在伦敦和巴黎展出，供人参观，被表现为一具体现了黑人女性动物本性的“活生生的人种标本”[8]。一些受他人委托所作的画把她的一半屁股表现得出奇的不成比例，好像把她定格在向男性“呈献”自己身体的状态之中。

作为奴隶主的“收入来源”[9]，女性黑人在当代广告中通常被表现为丛林中的动物（见图2），她们背负着三重身体方面的消极联想。因为自己的性别，她象征着肉体的诱惑和男性道德堕落的源泉。以族性而论，她是只有本能需求的动物，没有隐私，也得不到尊重。她不去挑逗然后再拒绝（就像固定的欧洲妖妇形象一样），她“直入主题”。西班牙女性也通常被表现为只有本能欲望的动物。但奴隶制的遗产为女性黑人人性的消弭增添了另外一层内涵。因为在奴隶制中，她的身体不仅被当成动物对待，还被视为**财产**，可以任意“占有”和使用。这种身体甚至不具备一只野生动物所得到的尊严，它差不多就只是物品、东西。

将男性黑人比作性欲过剩的动物的无意识种族主义形象原本会对克拉伦斯·托马斯的案子不利，但他借助一个讽刺和巧妙的策略将其化解；通过引起对这些想象的关注和争议，他设计了一个局面，这其中，任何不以最大限度的优雅和尊重对待他的白人议员似乎都是种族主义者。与此相反，想当然地（在听证会上）仅从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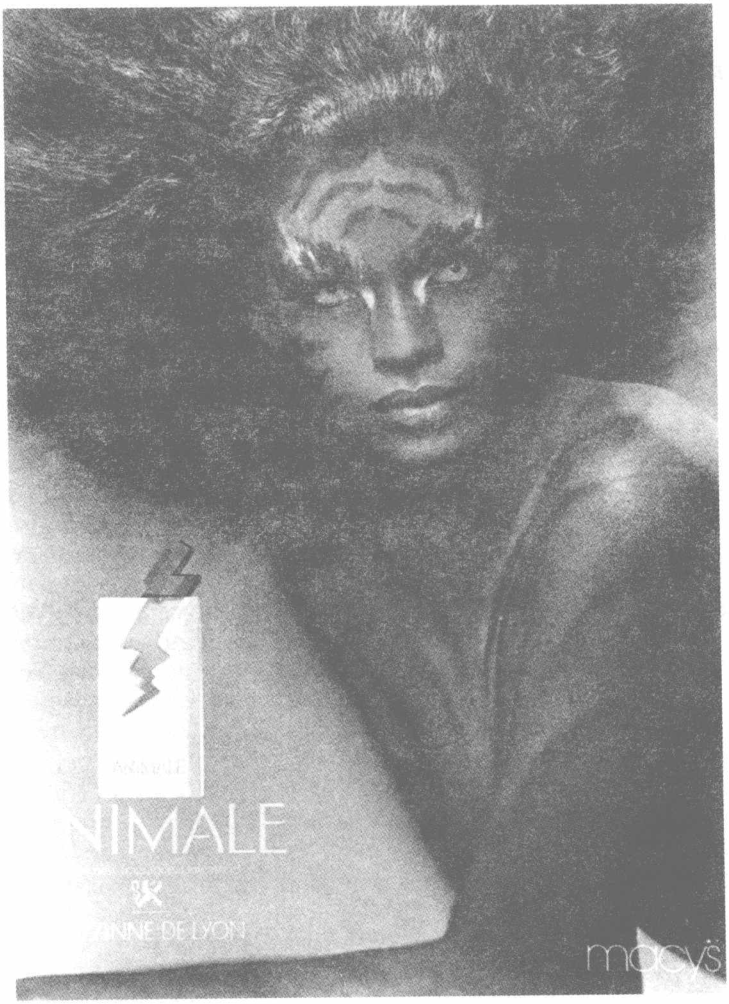


图 2　本图表现了一名被化妆成虎一样的女性黑人。

的角度去建构女性黑人，不慎重对待她们对道德和感情的敏感，这种做法造成的负担则由安妮塔·希尔承受。议员们就阴茎和色情场景审问希尔，同时为只是问了这些问题不停地向托马斯道歉，这个过程中他们所表现出的镇定的超然，在上述传统的语境中，与对女性黑人主体性的历史性抹杀产生共鸣。

主动性、被动性和性属

身体因为被动的物质性，缺乏意志、技巧甚至意识而困扰着我们，这是“笨重的熊”这首诗对身体的表现。只要“灵魂的动机”是导向力量，清晰与意志就成为主导；相反，身体只是接受并隐晦、迟钝地回应印象、感情和激情。这种精神主动/身体被动的二元对立同样被性属化，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二元对立之一，构成了西方意识形态下的性属观。哲学上，亚里士多德首先明确阐述了这种二元对立（尽管在先于他的创世神话和由联想而来的图解中也得到体现），它依然影响着当前有关繁殖的形象和意识形态。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个生命体的形成过程是由“有效和主动的”要素，即男性的精子来激活女性的纯物质贡献：

> 必须有一个可以生成他物之物和一个他物生成之来源；即便这两者是同一物，它们须在形式和本质上有所不同……如果男性代表着有效和主动的事物，女性，或被认为是女性的，代表被动的事物，那么女性所提供的……就不是精子，而是精子工作所需的原料。我们发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因为月经（月经带来的物质）本质上非常接近原始之物。[10]

这种看法的概念性很强（在感知方面也毫不含糊），1677年列文虎克用新发明的显微镜观察精子的时候，发现其中有很小的“微生物”——一种未来生命的形式，将要从一团没有形状的月经物质中挤压出来。

黑格尔通过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类比，以不同（但却是可以通约的）方式表达了男性的主动性和女性的被动性之间的二元对立：

>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区别就好比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区别。男人对应动物，而女人对应植物，因为她们的生长过程更加平和，支配其生长的原则是非常模糊的感觉……女人受教育——谁知道怎么受的教育？——的方式可以说是在观念中呼吸，去感受而非获取知识。与此相反，男性的身份只有通过艰辛的思考和技能的运用才能获得。[11]

现在，请注意这些二元对立——男性是主动、不断努力、头脑清醒的主体；女性是被动、呆板、原始的物质——如何影响了艾伦·古特马赫为《怀孕、生育和家庭计划》一书所写的用药指南：

> 其中的一些精子沿着这条一英寸长，充满粘液的通道一直往上游，胜利几乎是它们的囊中之物，另外一些则在途中陷入困境，绝望地搁浅在布满组织的凹陷部位里。所有射出精子的一小部分最终到达子宫口，然后开始向上完成两英尺的短途旅行。这种前进的过程只是精子本身奋力游动的结果，还是得到了子宫内的液体和子宫肌肉收缩的帮助，还不得而知。那些勇敢的，没有搁浅在这种名副其实的沼泽地中的精子到达两条输卵管的入口处……把握住命运的那个精子从数百万个精子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一场几率很小的筛选……没有人知道会是怎样的力量促成了这种胜利。或许胜利者拥有最棒的体质；或许它是参加这次竞赛的所有选手中游得最快

的……如果排卵在精子结束旅程之前的几分钟到 24 小时之间发生，那么卵子会呆在输卵管内，等待受精；如果受精之前的排卵过程超过 24 小时，那么卵细胞就已经开始恶化并分解，等精子到达的时候便丧失了受精的能力。但是，如果排卵在性交后两到三天内开始，那么活的精子还会在输卵管内巡游。⑫

男性代表了“有效和主动”的要素，女性必须被动地等待他，我们总会有这种期待。但在很多情况下，受精发生时实际上是卵子旅行到指定地点和在无聊中等待了长达三天的精子会合，所以当我的学生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很震惊。的确，古特马赫不想把精子说成“等待”，而是“巡游”——宛如沿着狭长的一带巡游，寻找幼雏将其捡起。这些比喻在一些观念的流行展示中不断得到强化，比方说，《看谁在说话》*（*Look who is talking*）的片头字幕，配上《我逃脱了》的曲子，刻画了“那些勇敢的”的危险种族，并赋予那个“把握住命运”的精子以人性，让他为自己的前行提供持续的口头评论。这幅图画模拟了排卵期间性交行为的后果（这是我们的想象范例，尽管大多数受精过程并非如此）；旅行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海滩球般的卵子，没精打采地上下浮动，等待胜利者的到来。既然取得胜利的精子的声音，那个腹中婴儿的一样，于是亚里士多德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个体的形式的确由男性提供。

显然，身心二元对立不仅是一种哲学立场，可以用聪明的辩论去捍卫或反对。相反，它是一个实践形而上学，已经渗透在医药、法律、

* 美国的一部喜剧影片。——译者

文学、艺术展示、对自我的心理建构、人际关系、大众文化和广告中并得到广泛体现——只有通过转化，维系这种形而上学的机构和实践才能将其解构。再举最后一个例子说明我在这部分中讨论的性属化二元对立的文化积淀(并且通常在“不知不觉”中，隐秘地得到再现)。想一想卡马特公司分别为男孩自行车和女孩自行车做的广告。广告介绍了三种年龄层次的自行车：一种是为幼童设计的(三轮车)，另外一种是为 13 岁以下的儿童设计的，还有一种是为青少年设计的。每一种层次都有男女两款车型，并有自己的名字。幼童自行车名叫“狮子”和“小天使”；13 岁以下儿童的自行车叫“追求”和“圣海伦”。还在前青春期，男性的主动和女性的被动就得到如此明显的体现，一旦性成熟到来，其他的二元对立就会随之而来：13 岁以下儿童的自行车居然叫“花岗岩关口”和“白热”！

身心二元对立的性属化特征，还有其广泛的制度和文化上的表述，是这本书的许多文章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母亲是人吗?》这篇文章中，我探讨了西方有关生殖的法律和医学实践事实上如何——尽管官方的辞令强调所有人的具体的主体性——将这个世界划分为人类主体(胎儿和父亲)和“纯粹的”身体(孕妇)。在《作为意识形态的饥饿》一文中，我思考了对男性和女性饮食的再现(比如，在当代广告中)如何展示了一个二元教学法，用对待“笨重的熊”和其饥饿大相径庭的态度教导男人和女人：女性的食欲需要容忍和控制，而男性的纵容则是合法的并受到鼓励。在这篇文章，以及《神经性厌食症》和《解读苗条的身体》中，“贪婪的女人”和性感的妖妇一样，被看做危险的女性欲望的有力象征(特别在当代文化中)。此外，我还探讨了让这种意象得以盛行的社会语境。

在后两篇文章中，我不仅通过性属化再现探讨二元对立，而且

还把它视为一种更为普遍的塑造男性和女性经历的当代自我建构。当然，二元对立不是 20 世纪的产物，但它在当代文化中以各种独特的方式得到表现，揭示了社会神话的虚伪。这种神话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热爱身体、反压抑的时代。我们或许对自己的身体着迷，但不太容易接受它们。在《神经性厌食症》中，我讨论了身心的对抗性关系控制厌食症患者表现感(sense of embodiment)的方式，和当代文化中其他让人痴迷的身体实践。但我不是想把这些狂热描绘成古怪和反常的行为，而是把它们看做我们文化所孕育出来的焦虑和幻想的符合逻辑的(可能也是过激的)表现。在《解读苗条的身体》中，我进一步论述了这个主题，破解了我们文化中胖和瘦和含义，揭示它们的道德内涵，说明了一个苗条、健康的身体象征着"阳刚之气"对身体欲望的控制，这些欲望不断让人感觉它们威胁着要压制自我。而这种自我建构又存在于消费文化，还有其自相矛盾的要求中，即我们既要体现职业道德的精神品质，又能不断地、不假思索地消费商品。

今天，我们经常听到知识分子催促大家"超越"二元对立，提倡解构构成西方二元对立的等级对立(男性/女性，思想/身体，主动/被动)，嘲讽那些有"二元思维"的人。但正如我在这本书中以不同方式所证明的，要"超越二元对立"谈何容易。在《"物质女孩"——消除后现代文化》和《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性属怀疑论》中，我论述了后现代文化，后结构主义思想和当代女性主义的一些方面，它们体现了超越身体的物质性和历史性的幻想，身体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定位和它的性属。

英美女性主义、“妇女的解放”和身体的政治

考虑一下我们之前讨论的联想的普遍性，再想一想女性主义理论家用分析和解构的眼光看待西方对身体的再现，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他们的努力让我们学会更加成熟、全面地去阅读西方文化中不同种类的文本——文学作品、哲学作品、艺术品、医学文本、电影、时尚、肥皂剧——从中受到了教育，调节自己的思想以认识暗含性属、阶级和种族的二元对立的历史普遍性，注意它们在最普通、看似单纯的再现中的持续存在。既然我们文化现实的大部分都受这些二元对立（尽管不止这些）的影响，所以几乎没有再现——从崇高的宗教艺术到在细胞层面上对生命的展示——是单纯的。[13]

女性主义者最先批判“身体的政治”，但矛头并非指向（在医学、哲学和宗教话语，艺术品和其他文化“文本”中）被再现的身体，而是作为政治斗争场所的物质身体。使用物质这个词的时候，我不是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没有生气的物质，也不是“自然的”或“自发的”意思（因为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文化的形式；不论解剖学和生物学起什么作用，它们总与文化产生互动）。我指的是马克思和后来的福柯，当他们集中思考文化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和身体习惯“直接掌控”（和表象式的影响相反）我们的身体时心里所想的。常规和习惯性行为让我们的身体知道什么是“内部的”，什么是“外部的”，什么样的姿势是禁止的，什么又是需要的，我们身体之间的界限有多么易受侵犯和不可侵犯，身体可以占有周围多大的空间，等等。这些信息通常比我们下意识地通过关于符合我们的性属、种

族和社会阶层的行为的明确指示所学到的要重要得多。

美国女性主义发展对身体实践的“政治”理解所起的作用很少得到认可。唐·汉隆·约翰逊在描述历史上这样一种理解的出现时直接从马克思跳到福柯，忽略了60年代的社会运动（包括黑人势力和妇女解放）在唤醒身体是“权力的工具”的意识时所起到的智力作用：

> 另外一个重要的（对旧的看待“身体”的观点的）解构发生在社会政治学领域。尽管卡尔·马克思于19世纪中叶发起这项运动，但直到20年前，借助已故的米歇尔·福柯的学说它才获得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认为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影响他或她的经验和对“身体”的界定……福柯在分析身体作为权力形式的斗争焦点时延用了这些基本的论述。人口的多少，性属的形成，对儿童，以及对有悖于社会伦理的思想的控制，这些都是政治组织关心的主要问题，而且都集中在对身体的界定和塑造上。此外，对身体的培养对于建立一个人的社会角色至关重要。[14]

有不少女性主义者似乎也接受这种观点。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伊利格瑞、威蒂格（Wittig）、克里斯蒂娃的著作认为身体是“生产新的主体性模式的场所”，波伏娃“把身体理解成一个场所”，琳达·齐雷利对她们的观点表示敬意。同时，她又认为是福柯“让我们了解身体在历史上是如何被规训的”，而英美女性主义只是具有视身体为一个“陈旧的天然物”的“本质主义”观。[15]

几乎每个研究身体这门“新学问”的人都奉福柯为鼻祖，指引

着自己的方向。确实如此(正如我在导论的后面所谈的那样),福柯的确清晰地描述和阐述了影响伴随这门学问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发展时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范畴。“温顺的身体”、“生物电源”、“微观实践”——这些都是有用的概念,福柯运用它们探讨权力的组织和分配中的历史变化,他的分析是精彩的。[16]但福柯和任何后结构主义思想家都没有发现或提出这个观点。再次提一下约翰逊的说法,即对身体的“界定和塑造”是“权力形式的斗争焦点”。这是由女性主义发现的,而且在它与后结构主义思想“喜结良缘”之前就发现了。

“每一个人生活的私人领域都是政治的,而政治问题最终都是个人问题,过去的界线不复存在。”夏洛蒂·邦茨(Charlotte Bunch)于1968年说了这番话,尽管自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出现以来,已经有很多关于“私人政治”的著述,但我认为它作为一个认识范式(intellectual paradigm)的重要性,尤其是“私人政治”引入新的对身体的理解,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什么还会比身体的生命更加私人呢?女人和身体连在一起,并且局限于一个以身体为中心的生活(美化自己的身体,生产、照顾、维系他人的身体),对她们而言,文化对身体的掌控是日常生活中不断出现的、与她们息息相关的事实。早在1792年,玛丽·渥斯顿克雷福特就对这个主题做了经典的陈述。作为一名特权阶层的女性,她的论述集中在社会对柔弱和持家的女性特质的塑造,这是一个受到社会训练的、“温顺的身体”如何产生的例子,和福柯曾经的表述一样明确:

保持自己的美是女人的荣耀!为此她们的四肢和官能被束缚起来,情况比中国那伙人还要糟。男孩在外面嬉戏的时

> 候，她们则久坐不动，这是她们必须忍受的生活，这让她们的肌肉松弛，神经松懈。卢梭曾经说过，她们缺乏教育，所以自然而然地，应该是从出生之日起就对玩具、服饰和闲谈感兴趣，其他数位作家对此也有同感——她们太幼稚了，不能和她们太较真。一个女孩有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是听虚弱的佣人们闲聊，就是被喊去母亲的梳妆台前，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会努力融入佣人们的谈话，这的确是很自然的。她还会模仿自己的母亲和姑母，打扮她的假洋娃娃，给她穿衣服，从中找乐子，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多么可怜和单纯的孩子啊！只要女人行动前脑子里还惦记着自己的美，过分的敏感，就不能指望她能下决心去强身健体，戒掉不利于健康的嗜好。上流社会的女人差不多都是身体的奴隶，并对自己的屈从深感荣幸……所有的女人都身处这种可悲的境地中……还在襁褓中女人就被灌输美丽是自己的王牌的想法，然后大脑就跟着身体走，而且在自己镀金的笼子里溜达的时候，还想方设法为其牢狱增光添彩。[17]

更为激进的一代极力主张女人逃出牢狱，而且早在后结构主义指出身体是一个政治场所之前就认识到，女人的身体存在的最普通、最“微不足道”的地方实际上是社会构建压迫性的女性标准中的重要元素。1914 年，在美国举行的第一次女性主义群众集会——主题是“侵占人类”——尖锐地提出了享受各种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要求，其中一条是“忽略时尚的权利”。[18]此刻，日常生活中的物质的“微观实践”——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又对其做了扩展，不仅包括一个人的穿着，还包括谁来做饭，搞卫生[19]，最近，甚至还涉及

吃什么，不吃什么——已经不再囿于纯粹的个人范畴，而被引入了政治领域。下面是一段写于1971年的尖刻分析，通过为男人设计一套“意识唤起”的练习，让他们意识到女性的主体性如何被日常的身体需要和“女性特质”的弱点教导和压制：

> 坐在一个椅背挺直的椅子上。脚的踝处交叉，膝盖并拢。试着保持这种姿势和别人谈话，但自始至终要注意把膝盖并紧。
>
> 将两处膝部贴近跑一小段路。你就会发现，如果要这样跑，步子就小，脚要抬高。女人被教导说如果像男人一样迈大步，自由自在地跑的话，就没有女人味了。看一下你用这种方式跑30秒能跑多远。
>
> 沿着一条街道走下去。要特别注意你的衣着：确保你的裤子拉链是拉上的，衬衫塞在裤子里，扣子系好。眼睛往前看。每当男人经过你身边的时候，不要理睬，做出一幅没有表情的样子。每次我们离开家的时候，都会看到大多数女人在学这套动作。这样至少可以让我们避开一些陌生男人，他们认为我们是唾手可得的。[20]

直到我几年前教授《女性主义史》这门课的时候，我才记起来，第二次女性主义抗议浪潮的首次公开活动是1968年8月名为“再见了，美国小姐”的示威。这次示威提出的抗议远非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漫画所展示的理论严密、表达精炼的纲要。相反，示威中分发的意见书没有简化，而是复杂地分析了性别歧视、因循守旧、竞争、年龄歧视、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消费文化之间的交叉，这些思

潮聚集在一起，并在碰撞中变得明确。[21]这次"再见了，美国小姐"的示威让"妇女解放的拥护者"成为"乳罩焚烧者"而出名，这是一个从那之后许多女性主义者想摆脱掉的绰号。事实上，示威中没有焚烧乳罩，尽管有一个巨大的"自由垃圾桶"，人们往里扔乳罩，还有紧身褡、卷发夹子、假睫毛、假发、《妇女家庭》、《大都市》、《家庭圈》等报刊杂志的复印本。媒体大肆渲染这起事件，并且无疑受到了作为一个极端政治反动行为的焚烧征兵证的影响，误报或者杜撰了焚烧乳罩的新闻。这次事件像疯狂的胶水一样粘在了人们的脑海中；真的，我的好多学生今天仍然称女性主义者为"乳罩焚烧者"。但不管有没有焚烧乳罩，笼罩于这个形象之中不安的公众无疑认识到了女人拒绝"规训"乳房的深层政治内涵，文化要求乳房完全"为"他人服务——作为母爱的工具和象征也好，作为性感尤物也罢。

1991年艾米·柯林斯为《李尔》杂志撰文《90年代乳罩在何方？》，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 女人又开始用人造小玩意玩弄自己的胸部了。为了让胸部具有时下流行的坚挺、丰满的形态，宝娜生产出一款莱卡乳罩，杯型预先定好，用榨棉做材料。为了让乳沟看上去更深，一些女用内衣公司出售软垫在一边的乳罩，这样乳房可以被轻轻地挤贴在一起。或许运动再次让改变身体曲线的想法变得可接受。无论如何，如果最终需要将身体解剖的话，那么女人便发现了重新塑造两者的新方法。[22]

真的是这样。1992年，伴随将硅树脂注入体内的公开试验中出现

的危险，媒体集中报道了陶氏公司的不负责，和手术后生病的女人们的痛苦。然而，在我看来，这次曝光中最让人沮丧的是一个文化景象：大量的女性做手术只是为了增大自己的乳房或改变它们的形状，她们觉得为了成全自己的自尊，体现“市场价值”，牺牲健康是值得的。这些女性之所以冒险，不是因为她们被媒体制定的美丽标准（几乎都是借助硅树脂增大）所骗，而是因为她们正确地意识到，这些标准左右了她们的潜在爱人和雇主的观察和欲望。她们既非性别歧视文化的受骗者，也非其批判者；她们所关心的就是自己应该享受的被追求、被爱，和成功的权利。因此，禁止或管理胸部注入硅树脂手术的提议被视为对自主、自由和选择的极权主义干涉。好多持这种观点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而且现在许多女性主义学者“为了她们的利益”明确将自己理论化为女性主义者。比如说，最近刊登在女性主义哲学杂志《喜帕蒂娅》的一篇文章就为整容手术辩护，称它“首先是关于掌握自己的命运”[23]。

我在后面会分析这种当代的阐释。现在，我只是想指出它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关于身体的主导女性主义话语有何不同。不同在于：对于女性身体的想象是在社会中被塑造，在历史上被“殖民”的领域，而非个体自主的场所。正如安德里亚·德沃金的论述：

> 美丽的诸多标准准确地描述了个体与她的身体之间的关系。它们规定了她的能动性、自发性、姿势、步态，还有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它们精确地规定了她的身体所拥有的自由度。当然，身体自由与心理发展、智力开发、创造力之间是血脉相连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女人的身体没有一处没有被碰过、被改变过。所有面部或四肢都或多或少经过装点、经历过痛苦、得到过矫正……从头到脚，女人面部每一处，身体的每一段都要被改进、改变。这种改变是一种持续的、反复的过程。它对于经济至关重要，是男女之别的主要方面，是作为女人最直接的身体和心理现实。从十一二岁直到死去，一个女人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去束身、除体毛、化妆、除异味。男人通过抹化妆品，穿女人的衣服模仿自己想要成为的女人，这种说法很常见，但不正确。只要真正了解这种浪漫的风气就会明白，这些男人已经体验了做女人的核心，一个浪漫化的构造。[24]

这里，女性主义颠倒并转变了旧的政治身体的比喻，一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内卡、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许多其他哲学家用过的比喻，将其转化为一个新的比喻：身体的政治。在旧的政治身体的比喻中，国家或社会被想象成人的身体，不同的器官和部分象征不同的功能、需要、社会要素、势力等等——大脑或灵魂代表统治阶层，血液代表人民的意志，神经代表了奖惩体系。现在，人类身体在女性主义的想象中本身就是一个内在政治化的实体，它的机能和形态被关于抑制和控制的历史和实践所塑造——从缠足和束身到强奸和殴打，再到强迫的异性恋、强制节育、意外怀孕和将身体明显的商品化（比如非裔美国女性奴隶）[25]：

她的头和心与她的脊背和双手分离，与子宫和阴道分隔。她的脊背和肌肉被挤压进田地里，她在那里被强迫和男人一起干活，还必须像男人那样干活。她的双手需要服侍和伺候

> 男性白人，就像自家的佣人一样，不管她在技术上受奴役，还是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她的阴道让他获得性快感，通向子宫，那里是他投资的地方——他的投资是性行为和之后出生的作为累积盈余的孩子，可以在奴隶市场上赚钱。[25]

人们可能会正当地反对说，以上芭芭拉·奥马拉德描述的身体在奴隶制中所受的真正束缚不能和19世纪特权阶层的女性与束胸之间比喻意义上的束缚相提并论，更不用说20世纪的“苗条的暴政”了。没有女性主义作家认为它们是相等的。但延伸奴役的概念，让它包含特权阶层女性的自愿行为，这在许多作家看来是发展中的女性主义模式的核心。这种延伸虽然看似成问题，但我认为女性主义所抗议的主要性别歧视的普遍意识形态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保持美丽、展现女性特质方面，时尚带来的奇想和对身体的专横让女人饱受痛苦，而承担后果的则只有女人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推断，男人的欲望没有任何责任；让女人的欲望屈从于男人欲望，将女人的身体性化、商品化，几乎不给她们机会去获得社会或个人的权力，这样的文化也没有责任。倒不如说，是女人天生的柔弱让她们（高兴地，即便有些不解）对这些琐事产生吸引，并愿意忍受由此带来的任何身体上的不便。不论是把她的脚弄坏，塞进四寸“金莲”，还是把腰部束成14英寸长，抑或通过手术在胸内填上塑料，她都是自己“最糟糕的敌人”。文化上与这种论点形成鲜明对比，女性主义的“反面论点”——女性是受害者，而非行为者；男人和他们的欲望是罪魁祸首；束缚而非选择能更好地说明女性对时尚专制的屈服——在形成中的对身体的性别政治的新理解的明确表述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

超越压迫者/受压迫者的模式

可是，简单地将事物对立的做法最终会自我暴露出其局限。用将男性理论化为占有并掌控女性——她们被相应地视为完全无能的——的压迫者/受压迫者模式涵盖男权机构和实践，对于认识男性和女性所处环境的社会和历史复杂性是不够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了不同的批评焦点。不少批评家强调需要构建一种理论，能够更加公正地对待女性在种族、经济和阶级方面的不同。另外一些批评家抗议在他们看来是将女性表现为被动，缺乏能力的做法，这种做法忽视了女性与男权文化的共谋和她们经常对其做出抗拒的努力。与此相对应，“旧”女性主义将男性视为敌人，并把他们“定性”为性畜生和文化统治者，这种做法也遭到反对。从解构的角度看，它的问题在于缺乏文本的复杂性——即是说，它对可以在每一种文化行为和实践中解读的意义的多样性不够敏感。在这个批评模式下，存在着对于各种实践和文化形式的“创造性”和“颠覆性”特征的论证，比如，化妆品、高跟鞋，或者整容，而在“旧”女性主义话语看来，它们仅仅是对女性的压迫。总而言之，“旧”话语被认为对待身体的政治时不够细致，有二元论的痕迹，过于悲观（如果不是偏执的话）。

我对这些批评的看法将会详细地贯穿这本书。在导论里，我想做一些非常概括的评论，主要关注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受形象主导的文化的语境中，旧女性主义话语的优势和缺陷。“旧”女性主义话语没有充分对待意义的多样性和语境性，我同意这种考证。它规定了最初的词汇，别人对其进行阐述，将其复杂化。例如，苏

珊·布朗米勒精彩的《女性特质》将身体作为一个充满性属化的象征和意义的文本来考察，相当有价值。[27]然而，她阐释这个文本所用的词汇——比方说，象征女性特质的长发、裙子和高跟鞋——通常迫切地需要历史和语境方面的进一步阐述。一些风格太过男性化，完全不适合女性（比如19世纪的裤子），除了这样的领域外，展现“女性特质”已经涉及在一个赋予事物以意义的体系中对它们进行编排。语境就是一切，在我们这个以混成（pastiche）和重排（re-arrangement）为特点的后现代文化中尤其如此。因此，如果一个模特涂着鲜艳的口红，穿着带花边的女式短衫，那么平头也可能是“有女人味”的；如果不化妆，而是穿着工装裤，摆出自信的造型，那么就“有男人味”了；当男人的夹克罩在一个极其娇小的16岁女孩身上时，是不太会“有男人味”的，但如果剪裁一番，再配以公文包和一本正经的作风，还是有男性意味的。男子的长发象征着他们对既定权威的反抗（像嬉皮士、摇滚明星、摩托车党），它还能突出一个男人的“男人味”：肌肉发达的男人经常梳又长又直的马尾辫。至于肌肉本身，它们真如布朗米勒所言，一定是男性的吗？当然，这是解读它们的主要方式，但是（正如我在《解读苗条的身体》中证明的），我们还可以从种族和阶级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今天，它们还经常象征性格的品质，而非阶级、种族，或性属身份。

考虑到意义的决定会因种族、阶级、性属、民族等因素而产生差异，“解读”身体变成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然而，我不同意那些认为必须从形象中读出“差异”的人的看法。读者对于同一个形象或符号的反应肯定是多样的；比如，一个女同性恋对麦当娜的“解读”可能和对异性恋的“想要”的理解相去甚远。但如果只关注多样化阐释，就会忽略日常生活中大众文化表现男性特质、女性特

质、美丽和成功时的重要影响。

首先，再现具有均质化作用。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个意味着它们会消除那些干扰盎格鲁 撒克逊的、对异性恋的期待和认同的种族、民族和性别方面的“差异”。毫无疑问，高度时尚的形象会给人异样的感觉：因为胶原而丰满的嘴唇、带玉米秆子的白人模特、芭芭拉·史翠珊式的鼻子、“男性化”*的着装风格。消费资本主义靠不断生产新奇、新鲜的形象来刺激欲望，并且经常潜入边缘群体去寻找它们。但这些元素要么被明确框定为异类，要么在总的意义体系内，它们没有权利克服这种再现，建立一种真正可供选择的，或者“颠覆性”的美丽和成功的模式（白人模特可以在嘴唇上涂胶原，但黑人模特通常皮肤光亮，具有盎格鲁人的特点）。一个明确的（尽管不总是固定或确定的）边界体系让“差异”的真正实现受到限制。

其次，这些均质化的形象具有标准化的作用——即是说，它们具有模型的功能，自我不断地根据这些模型权衡、判断、“规训”和“纠正”自己。如今，整容在美国是个年收入达 17.5 亿美金的产业，每年差不多有 150 万人做各种各样的整形，从面部拉皮到小腿抽脂术。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可以负担这些手术（鼻子整形的平均花费是 2500 美金），而且几乎所有的手术都能以门诊的形式完成——有的甚至利用午饭时间即可完成。可能人们会认为这些整形是为了补救事故中身体的损伤或者出生缺陷，需要指出的是，皮下脂肪切除术（平均花费 1500 美金）是频率最高的手术，隆胸术（平均花费 2000 美金）紧随其后。不同的民族和种族风格的美丽

---

* 原文为 butch，此处的男性化指女同性恋中扮演男性角色的那种风格，并非真正的男性化，所以有引号。——译者

是通过这种整形来确认自己的"差异"吗？肯定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文化中，谁会为看上去更"非洲"，更"犹太"，而重塑他或她的鼻子呢？雪儿是个典型的例子，她所做的不同的整形逐渐地改变了原先传达着强烈、坚定的（可能还是有点不明确的）"种族"信息的面孔，代之以更加匀称、细腻，更具盎格鲁撒克逊风格的美。她46岁时看上去比40岁时还要年轻得多，她那一代的大多数女演员都这样，因为对她们来说，面部整形实际上成了例行公事。这些女演员在电视、录像和电影上的形象包围着我们，她们正在改变对女人45和55岁时"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化期待。流行文化吹捧这种现象对年长女性来说是解放性的；在90年代可以说，女人50，性感依旧。但实际上，雪儿、简·方达，还有其他人并没有让老去的女性身体在性方面变得更好接受。她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标准——只有通过不断地整容才能达到——照此标准，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女性身体逐渐变老，但她们身体的表层却永远不老。

即便在均质化形象的语境中，解读意义也是复杂的。例如，女性的苗条在当代的再现中有广泛，甚至有时对立的意义，苗条的身体在一种语境中意味着女性的软弱和女性社会空间的缩减，在另外一种则代表女性的自主和自由。除非弄清楚这些含义，否则真的不可能理解女性在食物和身体形象方面的问题，而这需要在多样的语境中对苗条进行考察。尽管这本书中只有一篇文章明确要"解读"苗条的身体，其实所有讨论饮食失调的文章都涉及这个问题。它们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饥饿》、《神经性厌食症》、《身体和女性特质的再造》、《解读苗条的身体》和《这是谁的身体？》

女性主义话语已经使用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恶棍和受害者（当然，并非所有作家都如此）的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将现

代权力的轨迹理论化，这种框架就需要重构。在此重构中，米歇尔·福柯的著作已经证明对许多女性主义思想是有用的，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思想。既然本书中有数篇文章运用了福柯的理论范畴和视角，那么我若联系导论中讨论的话题，对他的理论做一番概述，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对福柯而言，现代的权力（和君主时代的相反）不是专制的，没有阴谋，不是分配好的；但它仍然生产身体并将其标准化，让它们服务于普遍的主导和附属的关系中。根据福柯所言，要理解这种新型的权力，需要两种概念上的转变。首先，我们必须不再将"权力"想象成个体和群体的所有——人们"拥有"的东西——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动力系统或者没有中心的力量的网络。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力量不是任意或偶然的，而是配置在一起具有特殊的历史形态，其中的一些群体和意识形态确实占统治地位。然而，在这里统治不是靠法令和"下达的"（就像君主权利的实施那样）计划维持，而是通过多重"起源不同，位置分散的程序"，调节对空间、时间、欲望、具体化表现的建构中最密切、最细微的元素实现的。[28]

这里就是福柯的见地对"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社会和历史分析尤其有用的地方。权力"从下往上"运作的地方，普遍的自我和主体的形式（包括性属在内）被维持，不是通过抑制和胁迫身体（尽管社会关系肯定包含这些元素），而是通过个体按照标准进行的自我监视（self-surveillance）和自我纠正（self-correction）。因此，如福柯所述，"武力、身体的暴力、物质上的限制，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一个注视就够了。一个检查性的注视，在这个注视的压力下，每个人都会最终自省，从而成为他自己的监督者，每个人因此都对他自己实施监视，成为这个监视的对象和对手"[29]。

但并不是所有对女性的压迫都可以在这个模式下得到最佳理解；女性经常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恐吓，暴力的关系和可耻的工作让她们经济上陷入困境。但当问题涉及外表的政治的时候，这些观点是合适并且有启发的。[30]对于我自己的研究而言，它们帮助我分析饮食和锻炼的当代戒律，帮助我理解饮食失调，它们出现于并再生产我们文化中标准化的女性实践，这些实践让女性身体变得温顺，服从文化上的要求，同时以权力和控制的形式得到体验。在福柯的批评框架内，权力和快感不会互相抹杀。因此，让人兴奋的感到有权力或者“当家”的经历，远不一定如实地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反而通常被怀疑为是形式很不相同的权力关系的产物。

福柯在他的后期思想中还强调，权力关系从来都不是密不透风的，通常产生大量新的文化和主体的形式，为转化提供新的机会。他意识到，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31]已经在发展并“在边缘”聚集力量、能量和特殊性的价值、风格、知识不断地渗透和重构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和机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正面的行为不应被理解为仅仅是为那些被排斥的群体讨回正义，而修正历史上的排斥，而应理解为对主导文化的多样化和复兴是重要的)。这些转化不是瞬间发生，而是逐渐地，通过地方的，通常细微的权力更替实现的。矛盾的是，它们也可以通过符合普遍的标准实现。所以，比方说，一位妇女为了拥有时髦的外表而执行严格的力量训练计划，但可能会发现新的肌肉给了她自信，能让她在工作中更具权威。因此，现代的权力关系是不稳定的；对抗是永恒的，霸权则是不确定的。

在福柯/女性主义理论框架内视男性为敌人的确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不仅会忽视男性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状况中的权力差

异，而且还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和女人一样，大多数男人也会发现自己深陷于和被牵涉进各种体制和实践中，这些体制和实践不是作为个体的他们所创造和控制的——他们经常受其统治（现在的男性运动中产生的最佳作品探讨了这种困境[29]；但不幸的是，它经常被最畅销的、煽动性的对男性特质的“改造”所掩盖）。此外，这种框架迫使我们认识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性别歧视和其固定模式中来。例如，早先提到的肥皂剧中的坏女人，她们之所以持续受欢迎，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女性观众喜欢这些角色表现出的力量和能力，以及相对传统的女性行为力量不可避免地对它们实施的中和（要么因为失败，要么因为性格的转变）。

不说大多数，许多女性同样乐意（通常是热情地）参与到让我们客体化和性化的文化实践中来。在此，就没有承认女性的责任这一点而言，我的确认为大多数女性主义的分析是不充分的，而且这种情况还将持续——虽然情有可原，因为从承认女性参与性别歧视的再生产，到认为我们“是我们自己最糟糕的敌人”、“自作自受”、“自找的”，这种转变太快了。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将要以最虚假的借口被激活，在这种氛围中，一些重要的讨论或许是被禁止的，因为它们满载着会爆炸的危险的地雷。比如说，在班里讨论《被告》（*The Aaused*）这部影片的时候，我经常因为不知如何解释朱迪·福斯特在酒吧里的一段艳舞而深感苦恼。一方面，我认为，我们理解美丽和性感如何成为那些因为美和性感才拥有权力者实施权力和控制的渠道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场景为此提供了一个机会。另一方面，我知道只要我们开始用这些话来讨论这段舞蹈，许多学生马上就会认为这是在确认这个女人的确是性感妖妇，勾引这些男人强奸她。面对这些自发的，但是文化上强

有力的观点，我那时想做的一些相关的区分很有可能对我的学生完全不起作用。

作为系统批评的女性主义

福柯有价值的对权力的重新构思不应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观点，即所有的游戏者都是平等的，或者认为主导与附属的位置在权力网中得不到维持。男人不是敌人，但他们通常更有可能维持一些体制，以此让自己历史上一直处于支配女性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努力想改变那些体制的女性来说，他们感觉像“敌人”（对于将历史上因为种族、阶级或性而受到压制的男性的境况理论化，这样一种双重的认识特别关键）。此外，文化抗拒是持续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和具有文化根基的形式是一回事。就像戴安娜·约翰逊评论娜奥米·沃尔夫的《美丽神话》所做的那样，认为“高兴做自己”的没有厌食症的芭比式玩具的发展，意味着女性主义对苗条的文化专制的关注“过时了”，这种想法是荒谬的。[33] 在《物质女孩》中，我强烈反对文化的绝对异质性论的拥护者，认为当代西方对美丽的建构需要应对各种占主导的、有力的“标准化”（种族的和性属的）形式。要有效地与这些形式的强制性做斗争，首先需要认识到它们占主导地位，并且不能通过简单和抽象地宣扬“异质性”、“差异”、“颠覆性阅读”等概念而消除这种认识。

认识到标准化文化形式的存在不像一些作家所论述的那样，代表了一种观点，认为女性是“文化傀儡”，盲目地屈从于美丽的压迫性统治。[34] 尽管许多人被迷惑（坚持认为，比如说，目前对健身的狂热只是出于健康的考虑，或者为了“纠正”一个“犹太的”或“黑人

的”鼻子仅仅是个人的喜好），但决定节食或整容的时候，往往表现出很强的意识。人们知道这个文化中通向成功的途径——关于它们的广告铺天盖地——不能因为寻求这些途径而把他们看作“傀儡”。通常，因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文化自恋的存在，他们的个人幸福和经济安全还得依靠成功。

1990 年，我通过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减肥活动，减掉了 25 磅，考虑到我的工作，这在我的一些同事看来是我言行不一，甚至是虚伪的表现。但我认为，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不是引导个人生活（或者就此而言，政治行为）的蓝图，也不会给人们权力（或要求），让他们“超越”自己的文化，或成为女性主义理想的殉道者。它不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尽管我在大学演讲的时候，人们会不断地问我这些问题）——是否应该减肥，是否应该化妆，是否应该增肥。它的目的在于启迪和理解，强化对权力、复杂性、文化的系统性本质，和文化机能的互联网络的意识。以何种方式，在何时、何处（或者是否应该）在这个特殊的、复杂的和永远变化的语境，即他或者她自己，而非别人的生活中进一步运用这种理解，取决于读者自己。

意识唤醒这个目标的实现似乎属于另外一个时代。但我相信，在我们当前这个以神秘化为特点的文化中——这个文化不断地让我们远离系统的理解，靠近强调个人自由、选择、权力、能力的阐释——只要更有意识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意识上的改变就是生活上的改变，而且，在一个依赖我们保持无意识状态的文化中，它们也是政治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不能像变戏法一样把我们提升到一个超脱的境界，丝毫不受文化形象的影响，它应该帮助我们提防对于文化完整性的惬意感，培养对于文化所提供的快感和权力的健康的怀疑。我知道，尽管减肥在许多方面对我有利，但也削弱

了作为一个可供选择的行为榜样，我对我女性学生的影响。我以前经常证明在一个没有充分标准化的身体中信心、表现、成功的可能性。今天，我的女性学生更加可能会把我视为一个例子，证明只有遵守文化规则才能成功。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会对此深信不疑，但那些不能遵守文化规则的呢？她们缺乏虽然只有一点点但可能会比较重要的自我确认和鼓励。即便我选择节食是对包围我的文化意义体系的有意识的、“合理的”反应（不是“文化傀儡”的盲目屈从），我也不应该欺骗自己，认为我没有在为一个压迫性的体系服务，因为自己感觉更舒适、更有力量。

“旧”女性主义话语或许对意义的多样性，塑造和装点身体的乐趣，父权文化的再生产中女性能力的角色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但它的确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批判，能唤醒女性，让她们团结起来——这是我们今天所没有的。没错，女人们正在其他问题上周旋——比如说生殖权。但在女性身体的性化和客体化的问题上，当代女性主义（当然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35]表现出了惊人的沉默。一些后现代的女性主义（正如我在《物质女孩》中讨论的）还不如沉默好，它们和当下的文化保持一致，赞扬个体的创造力，拒绝系统模式，让人感到苦恼。在我看来，当整形手术可以被说成，正如凯茜·戴维斯（Kathy Davis）所认为的那样，“首先是……关于掌握自己的命运”时，女性主义理论好像发生了一个奇怪的转变。让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约束和指令内变得尽可能愉快和有意义，如果这些整形手术是为此而做出的个人选择，那么当然是解放性的，这一点上我和戴维斯看法一致。但是，对于标准化美丽实践的女性主义批判什么时候曾将矛头指向个体和他们的选择呢？和戴维斯不同，我不认为整容首先并且最主要的是“关于”自主或自欺的。我所关注的是复杂和高度体制化的价值

和实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女孩和女人——也有越来越多的男人和男孩——相信，除非她们穿戴整洁、线条突出，身材不走样，皮肤光滑、有弹性，否则就一无是处(通常还被当成一无是处的人对待)。在当前这样一个文化时刻，身体的吸引力不断地被认为是成功爱情的先决条件，也经常被雇主看重，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我们亟需具有系统化视角的批评锋芒。

我对饮食失调的分析——这本书所展现的标准化实践批判的核心——深受我个人经历的启发，作为一个女人，我一辈子和体重、身体形象作斗争，但我没有在任何一篇文章中回顾那些经历；我受的是哲学家的训练，那种写作方式不太适合我。我尝试保留“旧”女性主义话语的批评锋芒，同时结合一个更为后现代的意识，意识到如果女性主义话语要真实地回应当代女性和男性的复杂经历，并以系统化的视角看待这些经历，那么它必须如何细致、多面。我没有通过这个或那个现成的例子“解释”饮食失调，而是建构了福柯所称的“理解度的多面体”(polyhedron of intelligibility)。我分析问题的不同侧面和交叉点：女性饥饿和女性饮食的文化表征、消费文化的作用，长期存在的看待身体的哲学和宗教方面的态度、与其他常见的女性紊乱(旷野恐惧症和歇斯底里)的相似之处、与当代其他的身体迷恋的关联、与我们文化中“正常”女性经历的连贯，等等。每一种分析都是系统化的。我不希望读者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父权文化和后工业资本主义的交汇处，饮食失调扩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分析是“政治的”。然而它并不是简化式的，我希望它能帮助消除源于琼·布伦伯格[35]和其他人的错误理解，认为女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将饮食失调简化为对苗条的简单追

求。相反，一些女性主义的/文化的分析，如苏茜·奥巴赫的《绝食罢工》，金·彻宁的《困扰》和《饥饿的自我》，一直强调文化与家庭、经济和历史的发展和性别的心理构建之间的交叉。[37]彻宁第一次提出的“苗条的暴政”已经被认为对于理解饮食失调至关重要，就此而言，女性主义者很少仅将那个暴政视为任意的媒体形象，而是将其看作需要文化和历史方面的分析和阐释。在《这是谁的身体?》一文中，我更加全面地探讨了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互相竞争的模式，和正在进行的对饮食失调的文化视角的抗拒。

自然、文化和身体

从总体上看，对性属化再现和对物质身体的政治的女性主义批判也可以被看做一个延伸的论点，和认为身体是纯粹的生物和自然形式的观点相对。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女性主义极大地推动了定义和再现身体的西方认识范式的重要转变。在传统范式中，除了重要的历史变动之外，一些特征是保持不变的。首先，身体（不论作为野兽还是生理时钟）在自然/文化的划分中属于自然的一方。这样，在其最基本的层面上，它的历史就被认为相对稳定并且是单一的。也就是说，我们讲“身体”，就如同我们谈“理性”、“精神”一样——好像每一种模式都能准确地描述人类所有的身体经历，而不考虑性别、种族、年龄和任何其他的个人态度。这种范式被认为是一种中性的、一般性的核心。

150年来，在各种文化力量的影响下，身体被迫放弃了在自然/文化二元对立中对自然一方的长期占据，并且与其他涉及人类的每一种事物一道被鼓励参与到文化中来。在此，卡尔·马克思的

作用至关重要，他将身体重新想象成一种历史的，而不仅仅是生物的场所，受到对人类生活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塑造，并经常因其而变得残酷。马克思首先从前人假定的“身体”概念着力切入。他强调，你在谈论谁的身体很重要——是自给自足的，或者是整日在流水线上工作的，还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别人的。

性属和种族同样重要。现实中，“一般性的”核心通常被当作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的白人或男性身体。例如，当卫生部将“奶制品”列为对所有人的健康都必需的四类主要的食物群时，它将这些大多数不喜欢吃糖的人（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排除在它的人类标准观外（建议在饮食中添加钙可能会不那么民族中心主义一些）。人类的“正常”体温定为 98.6 华氏度，而每个月大约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大多数处于生育期的女性都不符合这个标准（排卵前，孕酮的水平低，体温低于 98.6 华氏度）。即使在文化建构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些群体的表现——比方说，在谈论性、婚姻和亲子关系中对异性恋的假定——也抹杀了种族和性属因素。再比如说，对男同性恋行为可能包含遗传因素的有争议的发现，在大众传媒的标题中不断地被错误引申为所有的同性恋行为都是遗传的。例如，1992 年《新闻周刊》的封面上是两个男人手牵手的图片，但醒目的标题却问了一个直接的问题，“同性恋：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旧的政治身体的比喻将自己表现为“一般性”（即是说，表面上代表全人类，但实际上专指男性）的形式（然而，当自然界被比做身体的时候——比如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和许多其他古代的创世故事中——它被性属化，而且往往是女性，这很有趣。只有当一个像国家那样的人造的理性形式被象征化，当一个文化的创造被想

象为“自然的事物”带来秩序的时候，无性状态的虚构才开始出现)。大量的女性主义研究集中揭露这种虚构，揭示它们的特异性(作为白人、男性、不同的历史定位等的特殊性)。其他研究的焦点在于女性身体的文化建构和历史经历。在这个导论的第一部分中讨论的对文化再现的批判，同样是关于将身体重新置于自然/文化二元论中文化的一侧的女性主义行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和比喻激发了对身体的再现，对其进行批判的一个作用就是质疑这样一个假定，即我们永远直接或简单地了解或面对身体——不仅是他人的身体，还有我们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情况似乎是，我们感受和概念化的身体通常受各种概念、联想和本质上是文化的形象的调解。

这本书中的所有论文都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身体的文化研究。我对饮食失调的分析最具这种文化视角。其他相关的论文涵盖了10年来我对厌食症、易饿病和有关问题的思考，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知识和理解(我自己的和文化的)。但尽管我的分析在这期间吸收了新的元素(比如，我最早的论文《神经性厌食症》表明我当初不了解19世纪的厌食症)，我对饮食失调是复杂的文化再现的理解没有改变。的确，我们对19世纪和今天的饮食失调、女性和她们的饮食问题了解得越多，文化模式就越发明确，这是我在《这是谁的身体?》中论证的。

就饮食失调而言，目前文化上的表现如此明显，文化本身对这个现象又有如此的影响，寻求生物学的解释(我不否认其中含有生物学动力和作用)只能被理解为盲目地向医学模式靠拢。然而，尽管我确信厌食症和易饿病(作为普遍的现象，而不是历史上报道的单个的例子)是文化的产物，我反对当今人文和社会科学中非常盛行的一种概括性观点，认为身体是一块书板，等待文化的刻写。当

身体仅仅成为社会话语的产物时，它们只是在名称上叫身体。理查德·莫尔认为，除非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肉体存在不只是一片“贫瘠的土地”，一块“没有涂写过的黑板”，离开书写和塑造它的社会力量和话语就“没用”，否则这些力量就是“真正的身体”，而且它们——让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好像看上去更像“精神”而非身体，“从像毒气般的社会心理，或者是任何陈述社会‘话语’的事物——当它掠过身体的白板时——中散发出来”(这是莫尔的措词)。[38]生物学在某些领域里的作用巨大，影响着我们的命运，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激励我们的生活。然而，即便在生物学发挥更大作用的领域里，它的作用也不是“纯粹的”，从来不受历史的影响。从我们注定要成为不同性别，或不同种族的人的那刻起，文化就将我们包围。

超越、“差异”和文化转变

许多女性主义者对待生物学的作用和性别“差异”的态度要么是不可知的，要么是矛盾的；他们害怕看似主张固定的、实质性女性本质的观点，这无可厚非，但他们又担心对文化的过分注重会掩盖女性经历中强有力的、有文化转变潜力的方面。怀孕只是一种可以被塑造成众多社会形式的文化建构吗？或者怀孕中独有的成形构造——另外一个活在自己身体里，既是自己的一部分，又和自己分离——构成了鲜明的女性的认知和道德资源？月经前不快症状仅仅是不断进步的身体医学化的又一种调度吗？或者它还提供了一种机会，去释放在正常情况下处于休眠和受压抑的状态中的情感、理解力和创造力(如艾米利·马丁所认为的那样)？[39]

人们可以有理由回答说，女性的身体既是建构也是资源。但这些观点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个人色彩，认识到这点是重要的。女人在经期前头痛得眩晕，因为背部的疼痛无法工作，而且情绪极不稳定，她们会反感任何认为月经前不快症状只在最低程度上是文化产物的看法。有的女人症状很少，或根本没有症状，但她们的男性配偶和雇主不断地讥笑或开玩笑，说女人的行为受其卵巢的控制（这些看法让人想起19世纪的观点，认为女人的生理和心理受其生殖系统的控制），这些女人会认为月经前不快症状只是一种文化神话，保证男性永久主导公共工作场所。此外，在对于“本质主义”恐惧的爆发所产生的两极化的影响下，女性主义者往往分列（或被分列）于一个界线的两端。琼·彼得斯(Joan Peters)巧妙地描述了女人进入更年期的漫长过程，以讽刺的口吻刻画了这个界线。界线的一侧是“超越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女性身体不受自然和历史的影响，可以通过女性主义重新创造。界线的另一侧是“红布卢默”*(Red Bloomers)，对她们而言，女性身体是快乐、知识和权力的来源，需要重新评价，而不是再造。当然，彼得斯意在讽刺。[40]但这些话有助于在看待女性身体的具体语境中突出一个张力，在安·斯尼托看来，这个张力和“西方女性主义一样陈旧”：即“需要和女性一样行动和一个不是由我们的性属决定的身份”之间的张力。[41]

显然，这种张力的两极对于女性主义的斗争和社会变革是必要的。如果文化的深层转变需要“红布卢默”的努力，那么要消除

---

* “布卢默”是以美国女权主义者A. J. 布卢默(Amelia Jenks Bloomer)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灯笼裤。这种裤子问世之初曾遭各方指责，因为它有损女人的“淑女”形象。后来这个词和女性价值联系在一起，被赋予女权主义的含义。——译者

为禁止进入只为男性保留的领域而设置的障碍，“超越主义者”的观点就派上用场了。既然我的教授职位是有任期的，我希望我身份中的“女性”元素能够发挥转变的作用，动摇一些公认的关于学者和哲学的专业知识和权威的认识。但是，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时候，我得证明我可以“像男孩一样”去争论，因为这关系到我的职业。在任何既定的语境中决定一个人可以“成长”* 到什么程度，“超越”多少，是一件微妙和细致的事(对运动和个人都是一样的)，而且，很容易迷失方向，认不清你自己，不知道你起步的时候想要什么，尤其当你感到困惑的时候。而在性别歧视的文化中长大的女人，又有哪一个不对她的“女人本性”感到困惑呢？

正如我在这本书中的几篇论文里谈到的，今天，“超越”的力量好像在后现代女性主义中占支配地位。我对这种支配地位进行理论分析时所运用的方法论和我对饮食失调的分析几乎相同。我没有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去解释，而是分析了我尝试理解的这个现象中互相交叉或具有明确形式的各种不同元素。其中的一些元素是一般的文化态度；另外一些涉及学术文化；还有一部分主要和当代的女性主义相关。我对当代学术范式，比如解构主义，的分析是去探讨它们在文化中的参与和内在性——在学术领域，作为对幻想、焦虑，以及在其他更为“流行”或公共的语境中逐渐显露的时尚的表述。

我的语言可能没有自始至终地体现这一点，但我的总体分析是以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思想之间的区分为基础的。在最一般的文化意义上，后现代指当代社会具有的易变性、流动性、碎片化、不

* 原文是 bloom，和上文的 bloomer 相呼应。——译者

确定性、反讽和混杂的趋势，和对拒绝定义、终结和确定性的事物的偏好。在这个大的前提下，许多源自后结构主义思想的观点——强调符号的不确定性，批判主体性的一元化概念，迷恋体系的不确定性，关注文化上的抗拒而不是主导的形式——肯定是后现代思想的发展。但并非所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都是后现代的。按照我的理解，福柯的理论兼具现代和后现代的特点。例如，当福柯讨论规训、标准化和“驯服的身体”时，他完全继承了马克思的风格，而他后来对权力概念的修正则强调了抗拒的普遍存在——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主题。

我通过全面地考察当代的后现代趋势而将身体“文本化”——朱迪斯·巴特勒将男扮女装的服饰分析为戏仿(《后现代主体、后现代身体、后现代抗拒》)，和苏珊·麦克拉里(Susan McClary)对麦当娜音乐录影带的解读(《物质女孩》)是例子——为以一种自由的、有创造力的方式驾驭了*意义*，但却是以牺牲对身体在历史、实践、文化中的物质定位的关注为代价。如果将身体当成纯粹的文本，那么就能突出具有颠覆性的、非稳定性的元素，高唱自由和自主；但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文本中有*身体*吗？我们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将身体想象为有韧性的塑料，可以被塑造为我们选择的意义，在《物质女孩》中，我分析了这种想象如何*具体地*消除了身体的物质性。

我们生活在文化表述中。为了看上去“更亲切、更优雅”，讨好未来的选民，就连三K党领袖戴维·杜克(David Duke)也做了眼睛和鼻子的整形术。当代电影不断试验身体的可塑性和解构的可能性：年老的身体神奇般地焕发青春(《又十六岁了》)，年轻的身体变老(《飞越未来》)，死亡被超越(《天茧》)或暂缓(《真正

地、疯狂地、深切地》),转世的主题被发挥到极致(《天堂可以等待,天堂制造,再死一次》)。非常流行的《幽灵》甚至异想天开地认为,一个训练有素、能动性强的(死的)魂灵可以不借助身体的帮助,任意摆布物质的东西(和活人)。脱口秀表现出对变性的特殊兴趣;节目的常客是一位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来回变换过数次的人。当然,还有大众文学对"新的生殖技术"所做的夸张描述,即不管年龄或医学问题,任何女人都可以怀孕。在这种文学中,这种新技术带来的困难、痛苦和分裂性的体验不断地被抹杀或弱化,舍曼·西尔伯(此人目前是顶级的生殖专家/大众传媒的宠儿)保证说:即便在绝经后,"你还是可以怀孩子的";"只要一个卵子捐赠者即可"。[42]

我不是想批评那些整形、变性和通过输卵管传输配子的人,我希望这一点是明确的。我是想强调一种话语,这种话语在逐渐改变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看法和体验,鼓励我们去"想象可能性",不考虑限制和后果。正如我在《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性属怀疑论》中所论述的那样,后现代对可能性的痴迷也在后现代思想的一些方法论和认识论中得到体现。在这篇导论的开始,我提到,笛卡尔幻想哲学家超越身体的具体定位(和其认识的局限),是为了获得上帝的视野,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视角"。今天,我认为,一种类似的无实质的理想存在于这些主张以"异质性"和"不确定性"为原则来阐释文化、历史和文本的人的想象中。这并不否认历史和文化的确是异质的。相反,我质疑这种幻想,即受阐释的纯可能性,而非一种具体观点的引导,在"阅读"中不断地为了找差异而找差异,以此来捕捉那种异质性。我称其为"全景视野"(view from everywhere)幻想。

因此，尽管我强烈怀疑后现代文化和后结构主义思想中的某些趋势，但我的看法不是完全否定的。一方面，读者会注意到，我大量借鉴了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深刻见解，特别是福柯的思想。进一步说，“后现代时期”的生活经历，和对我而言，这种经历所意味的必须面对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含混性塑造了我理解文化现象的方法。在梳理自己和后现代性的矛盾关系的过程中，我深受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向往》（*Yearning*）和简·弗拉克斯（Jane Flax）的《思想碎片》（*Thinking Fragments*）的启发。在《后现代主体、后现代身体、后现代抗拒》中，我讨论了她们的著作，它们是我所认为的具体后现代主义的典范，吸收了后现代多样性的精髓，同时始终认可自我的局限和集体历史的分量。

因为弗拉克斯和胡克斯都没有把后现代主体的片断性当成研究的对象，而且，后现代的知识意味着我们不能，或许也不应该把“黑人身份”或“女性经历”作为历史的建构来谈论。在这个方面，她们的研究方法和琼·格利姆肖（Jean Grimshaw），还有其他作家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对这些作家而言，将性属、种族和阶级一般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方法论上已经成为一种禁忌。尽管我承认格利姆肖的批评有合理的一面，我还是非常关注对于一般化的禁忌，在《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性属怀疑论》中，我联系托马斯/希尔听证会，探讨了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相关的对“本质主义”的当代恐慌，建议更多地从心理和文化的角度去看待这种恐慌，将其看成可能表达了女性主义因为自己与女性身份中边缘和缺乏价值的方面的认同而产生的焦虑。然而，这种焦虑并不能完全通过对于我们的女人本性，我们的母亲，我们的身体的心理上的矛盾或内心的冲突，而从理论上加以认识。它也与整个

后现代文化中对于创造性自我时尚化的强调完全一致。而且，必须将其置于我们生活的体制的语境中加以理解——这个体制仍然受控于关于"职业"行为和成就的男性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

我认为，我们就是在这个体制的语境中需要"成长"而非"超越"。但这不代表赞同决定主义、本质主义的本体论。对于女性身体的最有力的再评价是在文化和历史中的身体（或是在历史中发展的实践中），而不是在自然和生物学中，想象女性身体的他异性(alterity)，而非"真理"的。这是我在露西·伊利格瑞、埃莱娜·西苏、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萨拉·鲁迪克（Sarah Ruddick）、生态女性主义者内斯特拉·金（Ynestra King）、艾丽丝·沃克、托尼·莫里森、奥德瑞·洛德（Audre Lorde）的作品中，还有大量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和"文化女性主义"的艺术和文学中发现的一个信息。如果没有对于改变的想象（或者表现），我们该从何种角度去实现文化的转变呢？而如果不与那些没有发言权，受到压制和蔑视的事物站在一起，我们又怎能建构这些想象和表现呢？鉴于此，女性主义哲学家们经常通过重新评价这些"理性的人"所不具备（或者被认为与其不相干）的"女性"特征——自发性、实用知识、善解人意——向主导的理性、道德和政治观念发难。

有些人认为重新评价"女性"资源只是将传统的二元论颠倒过来，而没有挑战二元思维本身。当代的后结构女性主义作品以权威的口吻表明这种尖锐的立场，并将其奉为真理，但它实际上依赖一种关于文化转变如何发生的观念，这种观念太抽象，没有实质内容，并且脱离历史，倒是可以被收录进最枯燥的哲学教科书。不断进行的文化生产、再生产和转变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在交谈中大量接受和拒绝各种形而上学的立场。一种文化的形而上学的转

变是零碎的，在权力、主体性模式和生活组织的关系中，通过真实的、历史的变化实现。

因此，二元论在文化中不能像在理论中那样被解构。要取得具体的——也就是文化上的——成就，我们需要将“边缘”带到“中心”，需要在将其排除在外的体制中，扶正并培育边缘化的认知、叙述和存在方式。因为这种重新布局通常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参与者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所以它们无法一举动摇每一种潜在的二元论，但它们同样也不能“从反面”再生产和之前完全一致的状态。当我们把自己身份中（种族的、性属的、民族的、性别的）边缘化成分推向文化舞台的中央时，它们自己就会被转变并发生转变。贝尔·胡克斯（见《后现代主体、后现代身体、后现代抗拒》）举了非裔美国哲学家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的例子。韦斯特——以在黑人社区中流行的激昂的、戏剧性的布道方式，做了一次理论性、学术性的演说——在那个场合中，面对那些听众，以这种方式具体地解构了理智和激情、内容与风格之间的对立。那么他是否也解构了将布道定为男性所有的言说方式的性属化二元论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需要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参与者。

如果我们不努力迫使我们的工作和工作场所融入我们的具体经验的历史，那么不论在实践中还是象征性地，我们就成为二元论的文化再生产的参与者。苏珊·法吕迪对我们公共机构持续的男性化（不仅体现在它们需要的职业风格，还体现在它们将私人空间——比如父母对孩子的抚养——融入公共领域时的一次次失败）做了清晰的阐述，她将其描述为媒体的虚构，讲述了不快的女人大量地从这些机构“逃走”，回到家里——家是我们真正释放自己的女性特质，完全履行母亲职责的唯一场所。[43] 当然，大多数女性

即使想辞掉工作，也不能这么做。而且，法吕迪认为，不管事实上发生了怎样的出逃，主要是媒体宣传引发的恐慌导致的，而不是相反。但不管是怎样的因果关系，很明显，旧的二元对立正在经历文化上的重写。现在，服装杂志和商业广告大量表现天伦之乐；安逸的家在女人的精心打理下温暖、明亮，是婴儿的天堂。这让我们想起女人就应该和物质的东西打交道，生儿育女是她们的职责。只有男人，黑格尔说，才是在公共领域中承受“艰辛”、“运用技能”的料。

第一部分

身体的话语和概念

○这是谁的身体——女性主义、医学和饮食失调的概念化

○母亲是人吗——生育权和主体性的政治

○作为意识形态的饥饿

这是谁的身体？

——女性主义、医学和饮食失调的概念化

女性主义的挑战

1983年的神经性厌食症和贪食症纽约研究中心的会议上，因为缺乏对性属问题的理论关注，不满的情绪——主要存在于女性临床医生中——比较明显。1973年，希尔德·布鲁克(Hilde Bruch)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饮食失调》，但在阐释厌食性神经症的时候，她几乎没有使用性属概念。在《困扰》中，金·彻宁首先注意到，布鲁克在生动描述厌食性神经症患者与她自己身体成长之间的"战斗"时，自始至终忽略了一个种关键的要素：即对成长受到阻碍的是一个女性身体这样一个事实的重要性的认识。[①]布鲁克之后的10年间，占主导的病原学研究方法强调成长和家庭问题，感知和/或认知的"机能障碍"。不论哪一种方法，对于性属构建和其他社会因素所起作用的理解多是肤浅和零散的。

从成长和家庭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互

动概念化为发生在文化时间和空间之外；父亲的作用被忽略。感知/认知的研究模式将"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理论化，但仅仅把这些因素理解为"想变瘦而带来的压力"，"瘦的伦理教导"；统计显示，20世纪80年代期间，《花花公子》的插页和美国小姐的数量正在减少，而这种做法被误认为文化分析。而且，在这些研究中，交流仅仅被想象为在媒体形象之间，或者女性之间（需要顺应潮流而来自同龄人的压力；母亲的批评）存在；男人和男孩在通俗意象面前的脆弱，他们的欲望和焦虑，女孩和女人因此而承受的压力仍然是主导叙述中的——就像父亲/女儿乱伦对于弗洛伊德一样——一种隐蔽，而且好像是不可言说的秘密。

不管在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经历中，还是作为一种表达了理想、焦虑和社会变化（有的和性属相关，有的则不是）的文化构成，没有哪个领域比美学更能深入地展现想变苗条这一愿望的含义。"媒体"、"麦迪逊大道"和"时尚业"都被典型地当成众矢之的——一个异想天开、变幻无常的敌人，通过它主观想要提升那个季度的销售业绩的任何想象，向被动和易受影响的年轻女孩灌输其思想，并对她们实施专制。苗条何以成为20世纪这样一个主要的文化理想依然没有得到解答；对于各种表现的阐释被认为不属于临床研究的范围。

对于心理分析，性属曾经是一个关键的分析范畴，这种临床模式从理论的角度研究厌食症患者拒绝用传统弗洛伊德主义的术语建构女性身体，因为这些术语表达了本质上纯粹是关于心理和性的焦虑和幻想，比如说害怕怀孕，或者引起男子对性的关注。就揭示厌食症患者症状的象征性本质而言，传统弗洛伊德主义比任何其他研究途径都有效，因为它认识到，比方说，对于腹部和胸部脂

肪的恐惧有性属方面的含义，而不仅仅表明是对最新时尚潮流的趋之若鹜，因此需要阐释。即便如此，弗洛伊德理论还是没有将其分析置于社会文化的背景中（这也是其特点）——比如，它没有意识到，害怕怀孕的原因更多的是害怕家庭的束缚，而非出于受到压制的伊莱克夏情结（Electra fantasies）*，又或，担心卷入性事而带来的危险，可能是对暴露了家庭关系中太过普通的虐待和暴力的一种现实反应（研究显示，正如弗洛伊德最初所假设的那样，许多歇斯底里症患者很有可能受到实际性虐待，许多厌食症患者所谓的性逃避和易饿病患者背后，同样存在着性虐待事件）。[②]

因此，在1983年，性属要么是缺席的，要么被饮食失调方面的顶级权威从本质主义的角度理论化——厌食症和易饿病研讨会组织者们试图矫正这种局势。为此，他们必须求助于那些在官方机构的边缘工作的女性主义者：她们为医学专业人士之外的读者写作，运用和当时的主导模式不同的治疗方法，并且在过去的10年间发展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理解饮食失调的方法。1983年那次会议的主题是"饮食失调与女性心理"，并邀请卡罗尔·吉莉根和苏茜·奥巴赫担任会议主题发言人。

吉莉根介绍了凯瑟琳·斯坦纳-阿代尔对高中女生做的具有争议的研究，研究揭示了食物和身体形象的问题，与效仿媒体想象的美丽、独立、冷静的女超人之间的惊人联系。[③]奥巴赫的论述很具感染力，以客体关系理论（object-relations theory）为基础，以建构女性特质的社会文化语境为背景指出，厌食症患者以极端和让人

---

* 伊莱克夏情结：即恋父情结，伊莱克夏是特洛伊战中希腊统帅阿伽门农的女儿，阿伽门农凯旋后被妻子所杀，伊莱克夏让弟弟把母亲的奸夫杀死，造成了母亲的自杀。——译者

憔悴的痛苦方式体现了当代女性的处境中所特有的一种心理挣扎。社会、经济和心理因素在这种处境中交汇，造就了一代女性，她们认为自己的需要是缺陷，并深感耻辱，而且，除非她们转变成为有价值的新的自我，否则便没有生存的权利（参见《没有需求、没有欲望、没有身体》）。[④] 母女关系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媒介。但母亲没有错，奥巴赫强调，因为她们同样是自己文化的产儿，深深忧虑自己的欲望和外表，并且意识到——这个事实在我们文化中以大量的方式呈现——她们的女儿要靠外表“吸引男人”，妻子和母亲两种角色的满足感来自学会去照顾别人，而不是自己——比喻意义上和事实上都是如此。

对奥巴赫而言，厌食症代表了一个连续体的一极，今天，所有女性都能在此找到自己，只要女性特质的文化建构的要求在不同程度上威胁着她们。这个观点引起了（全部由男性组成的）评论组的强烈反响，包括两名精神病医生和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吉莉根（还有奥巴赫）的演讲对象没有注意到她发言中的政治暗示，在他们看来，她的论文完全表达了一种惋惜，惋惜我们文化中缺乏对善于沟通、善解人意和事事为他人的“女性”价值的尊重。吉莉根的发言（她的作品也经常）被（误）理解为对传统女性特质的简单赞扬，而不是批判了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将“女性”价值囿于孤立的家庭范围内，却将公共和男性空间（和“男性特质”）筑成自主自我的堡垒。

奥巴赫的发言明确批评了我们文化中对女性特质的标准化建构，而这更让评论组成员伤脑筋。他们因此激情地为“传统女性”辩护，女性主义者奥巴赫没有了姐妹和母亲的样子，而他们自己则同情奥巴赫辱骂的那些团体，成了他们的保护者。因此，《神经性

厌食症：一个多维度的观点》一书的合著者戴维·加纳(David Garner)觉得有必要为母亲们辩护，对抗奥巴赫对她们的“指责”，和因为“选择了传统价值”，在“相夫教子”中实现理想而强加给她们的“罪行”。《这个世界中最好的小女孩》(*The Best Little Girl in the World*)的作者史蒂芬·雷文克隆(Steven Levenkron)的辩护对象是厌食症患者本人——他称她为“你办公室里的那个骨瘦如柴的小孩”，奥巴赫没有充分理解她的痛苦(认为她的痛苦可以被理解为与一般的女性遭遇相一致)。在此，女性主义的批评被指责为一个“合理的”政治计划，牺牲对“无助、困惑和挣扎中”的孩子的关注。因此，评论组成员们将自己表现为优于奥巴赫的女性主义者(即是说，更加关注现实女性的生活)，更加优秀的“女性”(更善解人意，更具爱心)，同时还是一位阳刚气十足的白马王子，救女性于抽象、冷漠的女性主义政治。

然而，比批判女性特质构建更具争议的，是奥巴赫质疑将饮食失调称为“病态”。所有的评论组成员都认为她的阐释完全符合并说明了她自己的临床经验，但同时他们又一致批评她的分析，因为(用威廉·戴维斯的话说)它“(缺乏)具体的解释性概念”，推理“模糊、没有说服力的”。她的分析既解释又没有解释，这怎么可能呢？评论组的评价中存在的这种明显的矛盾只能通过这个隐含的约定来解释，即一个理论无论多么出色地说明了一个既定现象，它都是不充分的，除非它制定一般性标准，明确和准确地区分一个人口中“正常的”和“病态的”人。这当然是奥巴赫的理论所缺乏的，或者说，所要证明的。这样，它向医学模式中最基本、最牢固的前提提出了挑战。

病理、文化和医学模式

在有关饮食失调的临床文献中，所有研究的动力实际上都来源于对“病理”的描述、分类和阐释。核心刊物里，将饮食失调与不同的病原（生物的、心理的、家族的）相联的尝试迅速增加，还有研究声称要证明饮食失调是一些已经确定的紊乱种类（压抑的、情感的、感知的、下丘脑的……）中的一种。患厌食症和贪食症的女性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样，总结每一种女性特点的可能性降低。[5]但寻找共同的病理仍然推动着大多数研究。[6]既然每一种研究模式都被现象的实际多样性否定，人们便投入更多的精力对特殊的子类型进行精确分类，并出现了新的“多维”类型（例如，贪食症是一种“生物心理社会”疾病）[7]，满足了追求——越来越缺乏科学清晰度的——现象的精确性和统一性的幻想。

在一体化要素的确存在的地方——在文化语境中，特别在影响性属建构的意识形态和意象中——病理的作用被认为是次要的、辅助的或者是一个“调节性因素”。[8]普遍的认识是，文化激发并加重了已有的反常状态，并赋予其特殊的形式。这种理解没能体现有关饮食失调的两个惊人事实。首先，同 19 世纪的歇斯底里一样，女性饮食失调患者的比例一直出奇地高：大约有 90%的患者是女孩或女人。其次，还是和歇斯底里一样，大致在过去的百年间，饮食失调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具有文化和历史上的定位。[9]历史上，个体患者有少量记录，但直到 19 世纪的后半期，一个类似神经性厌食症的小规模流行病才首次得到医学描述[10]；和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厌食症和贪食症的戏剧性增加相比，这不算什么。[11]

这些要素表明文化——通过意识形态和形象，还有家庭的组织、人格的构建和认识的训练——不仅促进，而且产生饮食失调。女性歇斯底里的形成同样如此。得益于历史的距离和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几乎所有的临床医生和理论家现在都一致认为，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精英女性特有的紊乱症、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的根源在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尤其（尽管不完全）在于意识形态和与性属相关的剧变。我们不该忘记，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都认识不到这一点；当歇斯底里成为一种历史现象时，它的象征、情感和专业意义开始显现，只有在此时，在某些方面，它第一次才变得可见。目前显露的重要元素之一是一个清晰的连续体，对维多利亚女性来说标准和紊乱的方面在上面有其定位；有可能看清女性特质本身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屏住呼吸，放下架子，抑制愤怒和欲望，放弃发言权，拒绝食欲，收缩身体。

所有这些都是明显的，部分原因是，从今天的角度看，维多利亚时期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理想和控制它们的行为风格本身，似乎和那个时代的紊乱一样模糊和遥远。对我们而言，它们的本性被改变，而我们的性属建构却不可以，不管我们思想上多么认同一个社会法令解释观（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view）。同样，受超越陈旧模式和方法的进步神话的保护，当代医学很容易认识到生物学范式对维多利亚时期医学的控制，和后者在性属和政治二元对立中的暗示，我们为超越这个二元对立而骄傲。我们当代的医学模式、性属身份和其他的意识形态信仰不再一味努力地去“征服”歇斯底里，对机械论科学和父权文化而言，它曾代表的神秘和叛逆的女性世界。因此，歇斯底里作为历史中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属文化和医学的一个交汇点，从文化上将其解构已经成为可能。

如前所述，精英女性中自我绝食的现象直到19世纪才以足够高的频率引起了医学界的普遍关注。但在19世纪，像中风和哑巴这样的“歇斯底里”症状比自我绝食更好地表达了维多利亚精英女性所面临的矛盾，对她们而言，温顺、优雅和完全居家的女士的观念是一种强迫性的女性理想。当然，在这个文化语境中，拒绝食物是一个更恰当的症状，不论比喻意义上，还是事实上，它都有对抗女性食欲和欲望的严格禁律，这些禁律和一个发展中的追求财富和享受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起，被禁锢在易变和痛苦的对立中。但（出于这本书的文章中所讨论的多种原因）作为一种被超定（over-determined）的表现文化焦虑的具体形式，饮食失调只是在20世纪后半叶才出现。一位当代女性努力地去理解首次出现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矛盾，而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当这些矛盾和具体的当代元素交织在一起时，她就得面对这些矛盾了，这位女性更容易患饮食失调，而不是癔病性麻痹。

早已作古的医生当时正运用现在看来已无价值的方法，深入研究实际上已经绝迹的紊乱，显然，认识到文化在形成这种紊乱中的作用是一回事。[12]现代医学以类似的方式探究它正试图克服的紊乱的身份，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现在，研究者的确承认，歇斯底里的形成中，文化意识形态起到重要作用，但他们仍然拒绝运用这个历史经验去理解厌食症和贪食症。尽管人们经常承认，文化压力可以让女性“在饮食失调面前尤其脆弱”[13]，但过不了多久又会讲，并非所有面对这些压力的人都会得厌食症或贪食症。因此，他们断言，一个特定的个体要“产生”紊乱，必须具备其他“非社会文化”因素。这些非社会文化因素（其中最常提到的包括：自主性的“不足”、肥胖的趋势、完美主义的性格特征、认知方面的缺陷、感知

失调、生物因素、感情压抑的家庭互动)和社会文化因素一道被认为对紊乱起同样的决定作用。这样,我们就偏离了这样一种认识,即文化本身不足以"引发"个体的厌食症和贪食症(对歇斯底里而言,过去是这样,现在同样如此),而将为紊乱的历史盛行提供必要基础中,文化的重要作用被抹杀和神秘化。正如戴维·加纳的描述,饮食失调的确是"多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厌食症和贪食症的形成中,所有维度的作用都是相同的。

人们通常还会强调,"除了文化之外,还有别的因素导致女性的发病率比男性高"。就像《饮食失调手册》的编辑所说的:

> 为什么饮食失调在男性中不常见呢?当然,男性也会有女性厌食症患者的性格特点和家庭背景。这些男性同样经历着职业和家庭的角色冲突,而且,他们生活其中的文化对他们施加了同样大的压力,让他们变瘦……男性和女性对待习惯性能量限制的方式可能会体现出复杂的生理差异。比方说,对自己的某一方面被剥夺,男性可能比女性有更强的反抗意识,所以迫于对他们而言更强大的饥饿、饱食、新陈代谢,或其他因素的压力,他们必须恢复体重。有可能得厌食症的男性可能会更强烈地抵抗自我绝食的做法,所以从早期症状发展到习惯性状态的男性要少。[14]

同样,在《暴食者的新希望》中,哈里森·波普和詹姆斯·赫德森指出,贪食症可能是生物机能的表现("或许女性的丘脑下部,或者和饮食相关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其他部分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影响"),也可能是不同于男性的,"对(一种)根本性紊乱的典型的'女性'表

达方式”。这些假设和从社会文化角度作出的阐释一样，是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可能性”中的一部分，为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的新领域”。[15]

我不是想否认，在决定哪些人最易患饮食失调时，生物因素可能会起辅助作用（但是，要分清原因和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建议使用的生物标识和原因一样，可能会成为饥饿的结果）。但如果认为生物机能可以让男性免受饮食失调，那么这种做法不但没有看到其他可能性，而且对显而易见的问题视而不见。难道《饮食失调手册》的编辑们不知道这个国家的节食统计吗？难道他们不知道绝大多数去减肥诊所、购买减肥产品的是女性吗？的确，顺便说一句，男性也患饮食失调，而且，很明显，这些男性患者几乎总是模特、摔跤选手、舞蹈演员，和那些从事对体重有严格要求的职业的人。从生物的角度解释男性中饮食失调的低患病率，就好比从遗传的角度解释为什么不吸烟的人患肺癌的几率要小于吸烟的人。当然，遗传和其他因素影响着个人患这种病的几率。但当烟草公司试图拒绝承认，吸烟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吸烟者患肺癌的重要原因，用特例中出现的其他因素转移视线时，我们会把这种行为看做服务于职业利益的蓄意迷惑。

我不是想说明和烟草业一样，饮食失调的研究者也期望人们沉溺于毁灭性的行为，从中获利。我的意思也不是，医学知识在治疗饮食失调方面不起任何作用。从病理的角度看待饮食失调已经带来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医学模式需要保留已经被它划为自己的领域的完整性，因为这涉及它在专业、经济和哲学方面的巨大利益，结果往往对显而易见的问题视而不见。这不是一个阴谋，相反，当有抱负的专业人士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了解他们专业范围之

外的知识，当他们越来越只是彼此“专业地”交流时，每一种学科都会教导他们应该关注什么、忽略什么。

然而，有的论证正严重威胁着医学模式的假设，并因此遭到人们更加自觉和有意的拒绝。我所称的看待饮食失调的女性主义/文化视角即是这样一种论证，我将在这篇论文的后面详细讨论对它的抗拒。在这之前，我想首先描述一下女性主义/文化模式的大致轮廓，考察一些具体的语境，女性主义/文化模式在其中已经明显地向医学模式发起挑战，同时，我将尝试纠正一些关于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普遍误解。

“身体形象紊乱”和“贪食症思维”

上一部分的粗略介绍并没有涵盖所有问题。研究者金·彻宁、苏茜·奥巴赫，和马琳·博斯坎德一怀特(Marlene Boskind-White)的开创性工作已经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为许多研究饮食失调的专业人士采用。

女性主义/文化模式：(1)质疑将厌食症和贪食症视为精神病的做法，强调其后天习得性和让人上瘾的特点；(2)重新定义文化，特别是性属的作用，将其视为根本的、生产性因素，而非触发性、辅助性因素；而且(3)强制将标准医学模式所认为的和个体的机能失调相关的因素重新归为社会原因。根据(3)，在我们的文化中，许多“非社会文化”因素被发现普遍存在于女性中，而它们之前被完全定义为厌食症和贪食症的“病理”所特有的“扭曲”和“错觉”。对饮食失调而言，最终结果是，正常和病态的二元对立本身的临床价值受到质疑。

尽管个别作者间有重大差异，一般而言，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饮食失调的特点是，它表面上承诺要严肃对待女性的看法，进行系统的社会分析。这些调控性假设让女性主义者倾向于将所谓的饮食失调的感知紊乱和认知扭曲，作为通向社会问题的窗户，而不是病人对"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的"特殊"和"先天的……曲解"来探究。[16]从后一种观点看，当一位病人抱怨自己的胸部太大，坚持认为变瘦是我们文化中通向成功的唯一途径，是因为如一位妇女所说，"人们……认为瘦的人自然更聪明、更优秀"时[17]，她的推理被认为是有缺陷的，是一种对现实的误解，治疗学家要加以纠正。从女性主义/文化的角度看，这种对待病人的方法忽略了这个事实，即对我们文化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苗条的确等于能力、自律和智慧，而女性的丰满（特别是过大的胸部）则代表让人吃惊和可笑的乏味。[18]

实际上每一种饮食失调的"根本性精神病理"的标志都被解构，从而显示出更为普通的文化失调。最具戏剧性的例子要数BIDS，即身体形象扭曲综合征（Body Image Distortion Syndrome），首先由希尔德·布鲁克解释为"对尺寸感知的失调"[19]，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神经性厌食症的标志之一，不论在大众的想象中，还是作为诊断的标准。在这两种语境中，BIDS都强调厌食症患者和"正常"人对待体重和身体形象的态度之间的差异。临床文献最初将BIDS理论化为一种视觉空间问题，一种感知缺陷，这种做法将厌食症定格为一种医学和机械论范畴内的疾病（同时也是一种感知的实证主义概念）。具有这种"缺陷"的人（有时被认为是脑部功能损伤所致；有时，如布鲁克所认为的那样，是更为一般化的对身体经历的有缺陷的处理，由不充分的婴儿发育引起）不能"现实地"看待她的身体。在更为通俗的表现中，这种症状的"古怪"和神秘

的性质被突出；这些描述经常伴有素描，画的是厌食症患者站在镜子前，看到的是极度臃肿和扭曲的形象（图 3）。在一本面向护士的杂志里有一篇典型的写于 1984 年的文章，它说道：



图 3 一位厌食症患者站在镜子前，看到的是自己臃肿和扭曲的形象。

> 在某种程度上，“厌食症”是个不恰当的词。遭受折磨的人并不因为没有食欲而感到痛苦，相反，他们对吃有一种古怪的专注——并且有一种执着的欲望，想通过限制饮食和严格的锻炼变得像铅笔一样瘦。更加古怪的是他们扭曲的自我形象；你会经常听到一位憔悴、瘦弱的厌食症患者抱怨自己还是“太胖”。[20]

然而，1984 年，《魅力》杂志开展了一项研究，苏珊·伍利（Susan Wooley）和韦恩·伍利（Wayne Wooley）负责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的 33000 名女性中有 75%的人认为自己“太胖”，尽管按照标准的体重表，只有 25%的人超重，还有 30%的人根本不达标。[21] 类似

的研究随之而来，其中一些就是想测量对身体尺寸的感知，都得出了出乎意料的结果。例如，凯文·汤普森的研究发现，100 位“没有饮食失调症状”的女性中，95%以上的人高估了自己的身体尺寸——平均算来，要比实际情况大四分之一。[22]不用说，这些发现让完全感知缺陷的假定变得有问题——除非设想大多数美国妇女都患有感知障碍。

医疗机构对这些研究的回应是，将“扭曲”的位置从感知构造转移到情感/认知方面：这两方面是引起想象感知的因素。[23]根据这种研究模式，女性实际上没有把自己看成胖子，而是用痛苦的自我评判标准衡量她们所看到的。这样，缺乏自尊就成为女性身体形象问题的原因：“人们自我感觉越好，”汤普森总结道，“就越不容易高估自己的尺寸”。但是，正如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所表明的，女性对她们的身体没有太好的感觉。[24]当问题涉及自我价值、自我肯定、自我维系，和享受她们自己的身体时，我们文化中的多数女性都会“失调”；饮食失调远非“古怪”和反常，而是完全和一个主导性要素相一致，就是在这个文化中做女人的经历。

当然，尝试将 BIDS* 重新定义为情感或认知，而不是感知的现象，不能解决医学模式的问题，相反，问题变得更加明显。因为这种症状一旦被重新归为情感或认知的现象，那么文化的作用就不可能再被忽略或神秘化。最终，文化的作用也成为感知的。文化不仅教女性成为没有安全感的身体，不断地监控自己，留心瑕疵，不断地“改进”身体；文化还不断地教女性（同时要记住，还有男性）如何看身体。既然苗条向来在视觉上有特殊待遇，理想的状态也

---

* 即 Bady Image Distortion Syndrome。——译者

朝着越来越瘦的方向发展，所以 10 年前被认为是苗条的身体，现在看来就有些胖了。比方说，可以看一看大约在 1990 年和 1960 年“穿媚登峰内衣的女人”之间的鲜明对比（图 4 和图 5）。1960 年时的理想身体，现在被认为是“丰满的身材”（图6），居然需要特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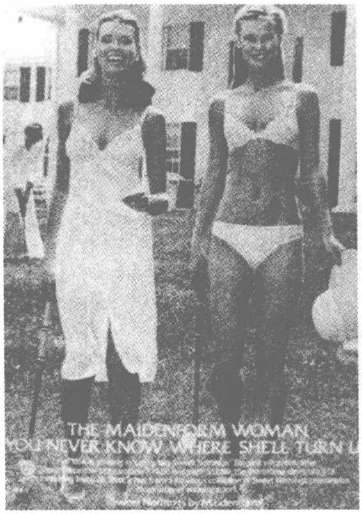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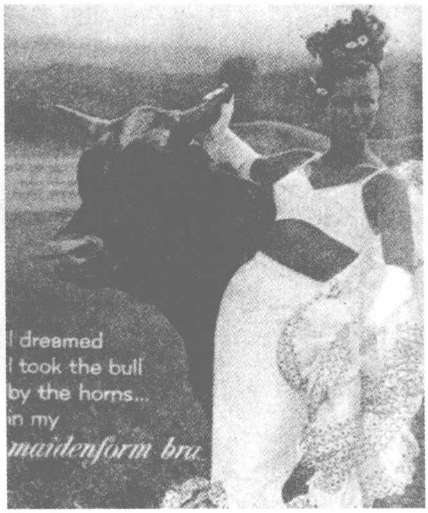


图 5

图 4、图 5 分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和 60 年代媚登峰牌内衣的广告。图 4 中的模特身材苗条，图 5 中的模特身材丰腴。

时尚包装！此外，随着我们的身体理想变得越发坚定，更加包容（我们崇尚的不仅是苗条，还有健美的形体），身体任何部位的松弛和肿胀都被认为是不堪入目的——恶心、失调的“肥胖”，按照流行的健身器材广告的说法，必须被“除掉”或者“整形”。当然，没有违反这些标准的身体要么肌肉紧绷，要么骨感十足。如果达不到这些标准，身体越苗条，任何肿胀就越让人反感。据此分析，厌食症患者没有“错看”她的身体，相反，她很好地掌握了如何按照主导文化标准的要求去看。[25]



图 6

BIDS 是一个典型，而不是例外。另外一个例子，想一想“紊乱的认知”或“扭曲的态度”这些说法，它们被认为是厌食症和贪食症所特有的精神病理。这些“错误的想法”或“有缺陷的推理”的标准内容是：关于某些“被禁”食物的力量的“神奇思想”或“迷信想法”，比如说能引起肥胖的糖果，因为它们，以下这些“神话”得以永存：“如果我有一块饼干，我就把它吃光”；将瘦“有选择地抽象化”，作为“推断自我价值的唯一参考”，而且“对她的幸福和安康是必要的”（如果瘦，我就特别），一个坚持“对抗反面例子”的信念；关于食物、饮食和体重的“二分推理”（“如果我没有完全控制，我就一点也控制不住”或“如果我重了一磅，我会继续，再重一百磅”）；对“非个人事件”的“个人化”和“利己主义”阐释（“别人看我吃东西，我会难过”）。[25]

上述要素的每一种的确都是折磨患饮食失调的女性的想法所

具有的特点。我在这里所质疑的是将这种想法归结为“错误的”、“有缺陷的”、“扭曲的”、“神话”的做法，认为它出自没有根据的逻辑，蹩脚的推理，或者神话思维。这些做法认为，厌食症和贪食症患者错误地处理来自外部现实的“数据”[27]，现实的实际特点与他们的认知和感知相去甚远。但实际上每一种“扭曲的看法”都相当准确地代表了对待苗条和节食中的生物事实的社会态度。

例如，许多有关饮食失调的“错误信念”都准确地描述了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动力，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动力是节食本身，尤其是厌食症和贪食症患者极端的表现所特有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身体有一个强大的自动补偿系统，通过引起欲望，暴食行为，和对食物的沉迷，像对饥饿那样，对食物的缺乏作出回应。[28]此外，已经发现，如果完全不提供固体食物，而不是允许吃限定量的食物，人们更容易节食[29]；因此，贪食症患者认为，为了掌控局面，需要完全控制饮食，这种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完全的控制最终是无法维持的；大多数吃低热量食物的人最后还是将减掉的体重悉数找回。[30]总的说来，“节食”本身就是一个身体存在的不安全、不稳定和自欺欺人的状态——是一个对贪食症和厌食症“失调的认知”而言，再明显和痛苦不过的现实。

回到贪食症患者关于我们文化中苗条重要性的“有缺陷的推理”：将“如果瘦，我就特别”这种信念和女性在吃东西被看时感到的尴尬归结为“扭曲的”态度，这种做法显然是荒唐的。它们扭曲的是什么样的现实呢？在我们这个文化中，奥普拉·温弗瑞，一个光彩夺目的女性成功的榜样，有言道，她“生活中最大的成就”是通过吃流食减掉了 67 磅(一年之后，她又完全复原)。在这个文化中，一个又一个商业广告将女性饮食刻画为关在门里的偷偷摸摸

的行为，甚至在那些需要限制和克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见《作为意识形态的饥饿》一节）。在这个文化中，我的“非饮食失调”女性学生在她们的日记中写道，她们不愿去冰淇淋柜台，因为害怕被食堂里的男孩笑话；在这个文化中，史泰龙说他喜欢“厌食的”女人（他当时的女友科妮莉亚·格斯特马上减掉了 25 磅）[31]；在这个文化中，私人广告始终将“苗条”、“瘦”或“匀称”列为找对象的要求。因此，厌食症患者似乎不是一个独特和“古怪”病状的受害者，而是承载了有关我们文化的十分苦恼的讯息。

文化论证：神话与误解

在这一部分里，我将尝试回应一些经常出现的对饮食失调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模式的关注和批评。我希望以此来澄清文化论证的主张。

1983 年，在神经性厌食症和易饿病纽约研究中心会议上，史蒂文·雷文克隆指责女性主义为了一个“合理的”政治计划，牺牲对“无助、困惑和挣扎中”的孩子的关注。他正确吗？保持饮食失调和“正常的”女性行为之间的连续性，需要否认厌食症和贪食症是极端和让人虚弱的失调这样一个事实吗？我不这样认为。女性主义视角从来没有质疑过厌食症患者的失调，或者她的极度痛苦。成问题的倒是这样一种概念，即认为病态显示了将患饮食失调的女性和“避开”失调的女性区分开来的特殊“数据图”（心理的或生物的）。女性主义分析家眼里没有一个固定的界线，界线一侧可能存在着一种心理舒适和稳定的状态。相反，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程度的失调，其中一些的“功能”比另一些要强，但都破坏着女性的全

部潜能。

在这个连续体的一端是厌食症和贪食症，这两个极端借助生理和心理动力，让病人上瘾，出现了行为和经历的“标准”之外的医学和情感问题。但生活出现“失调”的不只是厌食症和贪食症患者。这个文化中，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每时每刻都在严格控制饮食、锻炼身体——一些研究显示，有的女孩只有七八岁。[32]这些小女孩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中——班里男孩的看法加深了这种恐惧——害怕体重增加一磅，然后就没有“吸引力”了。她们天天慢跑，不停地计算自己的卡路里，冒着严重缺乏维生素和延缓生育成熟期的危险。我们可能会迎来一代年轻的、地位特殊的女性，但她们的月经、哺育和智力却受到严重损害。

但文化分析如何解释患全面饮食失调的只是部分女孩和女人，尽管我们所有人都承受着社会文化压力呢？我们不需要假定一个特殊的根本病理（家庭的或心理的），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容易患病吗？医学专业人士经常提出第一个问题，好像是给文化论证的决定性一击，而且，奇怪的是，它也的确经常被认为是一个毁灭性的批评。然而，它却以一个重要和普遍的误解（或错误的表现）为基础，认为女性主义立场为所有的女性假设了完全相同的文化环境，而没有描述我们文化中控制性属建构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性因素。差异是至关重要的，但即便像琼·布伦伯格这样老练的批评家也完全忽略了。“当前的文化批评，”布伦伯格认为，“没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染上这种病，尽管他们暴露于同样的文化环境”[33]。当然，并非我们所有人都暴露于“同样的文化环境”。我们所生活其中的，是关于“女性特质”和女性美的均质化和标准化的形象和意识形态。这些形象和意识形态催促我

们遵从主导的文化标准。但人们并不仅仅通过与这些形象互动形成自己的身份，尽管它们很强大。构成每个人生活的各种因素的编排（包括民族、社会阶级、性取向、宗教、遗传学、教育、家庭、年龄等）将会决定我们的文化以何种方式影响每一位现实中的女性。

因此，寻找神经性厌食症和贪食症背后特殊的模式、数据图和反常表现并不像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在概念上是需要的；决定谁最容易受感染，起作用的可能是大量混杂的因素，是“家族相似”而非本质特点，不可预测的要素间的组合。也可能是，处在一个越来越具强迫性的大众文化的压力下，受关于美丽和成功的强制性和虚构形象的影响，曾经可以组合在一起的模式和数据图如今正在分解。

例如，自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19世纪出现以来，厌食症就是一种阶级性的失调，绝大部分患者是相对富有的家庭的女儿。[34]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当然，苗条和拒绝食物的含义在物质匮乏时和在物质充裕时是大不相同的。只有当别人有过分沉迷的倾向时，表现出一种“超越”饮食需要的能力才能传递道德和审美上的优越性。在餐桌上几乎看不到营养食品的地方，没有肉，“非物质化”的身体意味着死亡，而不是超脱、自控和对抗父母的期望。此外，实现主导理想（比如，如此多的厌食症患者所效仿的迷人的女超人）[35]的可能性，取决于经济拮据的女性所缺乏的一定的物质前提；这样，因为对于自己能否体现周围的女性成功的形象已经失去信心，她们就被（所谓的）“保护”起来，不患饮食失调。然而，研究表明，一段时间以来，饮食失调在所有的社会经济群体中都有上升趋势[36]；在一个不断将我们引入一个可得权力的虚构世界的文化中，我们生活上的实际物质约束可能不会像以前一样，对我们的想

象有决定性的限制。

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差异”和均质文化之间的张力：有观点认为，通常和对待女性权力和性的不同态度相联的某些关于女性美的民族和种族概念，能够对抗标准化的形象和意识形态。这个已经用于解释，比如说，为什么患饮食失调的黑人要比白人少。[37]我们不质疑这种论点的重要性，但也要注意不能假设太多的“差异”。这个文化中，苗条就等于成功，这不断地让保留可供选择的美丽理想变得渺茫。尊崇丰满身材的遗产并没有让犹太妇女免受饮食失调；就像《本质》杂志中大量有关饮食和锻炼的专栏所表明的那样，有更多的人可以过上层社会生活，这种可能性对年轻的非裔美国妇女有同样的影响。此外，想象非裔美国妇女不受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苗条标准的影响，就非常接近一种种族主义观点，即女性特质的艺术和魅力——和文化——只属于白人女性。相反，一位黑人妇女就是土气的、处于“自然”状态中的女人，不受文明的约束。1990 年版的《本质》中一篇文章的作者坚持认为，“肥胖同样是黑人女性的问题”，她尖刻地批评了一位高中的辅导顾问，这位顾问告诉她不必为控制她的体重担心，因为“黑人妇女不被当成性对象，就是女人而已。所以，真的，你是幸运的，因为你可以超越女人是性对象这种老套的模式……还有，胖（女人）在黑人里更受欢迎”。显然，正如这位作者注意到的，这位辅导顾问自己也没有“超越”作为女性黑人原型的母性的、没有性吸引力的保姆形象。在这些明显的种族主义观点的压力下，一位几年来一直与强迫进食和悠悠节食（yo—yo diet）作斗争的年轻女性，就只能独自对待她本不“应该”患的饮食失调了。[38]

回应女性主义挑战：变化与抗拒

正如之前所指出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模式对饮食失调研究的贡献改变了临床研究的格局。临床医师们更加意识到女性在食物、饮食和身体形象上的问题是多么普遍，对当代女性矛盾的角色要求具有怎样的压迫性和分裂性。家庭关系不再像之前所认为的那样，只包含病人和一位管得太多、过分依赖他人的母亲之间的关系。研究正在探索父亲和男朋友们的取笑和批评所起的作用[39]，还有女性饮食失调患者背后令人烦恼的性虐待事件。[40]一些之前对女性主义怀有敌意的临床医师甚至开始谈论我们文化中对男权主义价值的高估。[41]

但对病理概念的女性主义挑战的最深层暗示不断受到排斥。例如，《饮食失调》杂志的编辑迈克尔·斯特伯没有承认我们文化中对体重的着迷是多么正常，而是认为"没有临床表现的青少年对体形和节食越发强烈的关注"或许"是这种不适在症状上较弱或部分的表现"。[42]我认为，差别不仅是语义上的。斯特伯如此热衷于保留"不适"和"疾病"的概念，以至还愿意"用医学方法对待"大多数青春期女性。

或者想一想琼·布伦伯格的作品。和主导的临床研究不同，布伦伯格的作品是一种文化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对19世纪厌食性神经症的医学化过程所做的优秀的、历史的解释，这个过程将"禁食女孩"的古怪行为从神奇定位为病态。布伦伯格总结说，"疾病是一个文化制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被定义和重新定义"[43]。

尽管布伦伯格在讨论厌食症患者由圣人到病人的转变时有些脱离历史，但对于她所认为的当代女性主义者试图将厌食症“非医学化”的做法，她还是充满了煞有介事的愤慨。女性主义认为厌食症是一种无声的、无意识的、自我毁灭的抗议，布伦伯格曲解了这种观点，将它用做挡箭牌*，她指责女性主义者“崇敬”厌食症患者，并将其“浪漫化”为“英雄的自由战士”，“自由地选择”饥饿罢工作为一种国际政治行动的形式。[44]她继续说道，女性主义者认为“只要为性别歧视和受压迫大声疾呼，饮食失调的女性患者就能治好她们自己和整个社会”。就像1983年召开的关于厌食症和贪食症会议上评论组成员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样，布伦伯格也在这些编造的和不正确的主张面前摆明了自己的立场。她认为，厌食症患者是一个“无助和绝望的”人，其声音不是“社会抗议”，而只是表达了“挫败和恐惧”。我们不应该让她的失调“变得有尊严”，而应该承认厌食行为的“稚气”、自我陶醉，和欺骗性本质（布伦伯格一度将追求苗条比作“妄想狂精神分裂症患者试图躲避想象中的敌人”），并且认识到，饮食失调只能通过治疗“这种毁灭性疾病中的生物医学成分”得到“治愈”。[45]

布伦伯格所有的批评都可以用前些年发表在《新闻日报》上的一封信的标题来概括，这封信是对卡伦·德克罗和罗伯特·塞登博格（此人明确阐述了“社会抗议”论的一种形式）专栏文章的愤怒回应。标题是：“神经性厌食症是一种疾病，而非抗议”[46]。对立面的存在（不管是“疾病”还是“抗议”）预设了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

---

* 原文是 straw-woman，英文中 straw-man 指被用作挡箭牌的人，因为文中布伦伯格的曲解对象是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所以鲍多尔用 straw-woman 代替 straw-man，有戏仿的意思。——译者

下，认识到一种失调有令人虚弱、消耗自我的性质，就等于将其置于政治范畴之外。在此模式下，无助、绝望、挫折和恐惧界定，同时耗尽紊乱的身体；主体感到“既无助又绝望”，囿于意义不大的挣扎中，试图在遵守她的文化中具有毁灭性规定的前提下寻找荣耀，并因此传达了一种关于控制我们生活的性属政治的折磨人的信息，这种状态被认为是不协调的。当然，对文化需要什么有一种深刻和具体的理解或许是厌食症患者（或歇斯底里症患者）痛苦的源泉，承认这一点就等于认为“专家”从病人那里学到的，可能和后者从前者那里学到的一样多。

我们发现的不是这种认识，而是医学对专业技能的重申。关于“真正的”不适和疾病有了新的分界，而且，因为每一种反常现象都挑战了占主导地位的范式，所以需要更加严格的标准和定义来区分厌食症和“像厌食症的行为”、“真正的厌食症患者”和“我也是厌食症患者”、“贪食症思维”和正常的女性“对体重的专注”、“真正的贪食者”和那些不经常暴食和清肠，以至威胁到自己生命的女性，或者说是“职业贪食者”（比如说芭蕾舞演员），她们有同样的行为表现，只是没有相应的“病态”。[47]

问题不是没有办法将这些区分开来；区分总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因为区分总可以实现，所以我们不能仅仅问一种区分是否有助于分析或描述，而要经常问它的目的是什么，掩盖了哪些要素，这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是“全面发作”的厌食症和贪食症，还是“普通的”对体重的专注，饮食失调的医学化过程所掩盖的，是对文化已经并继续对女性身体实施的普遍和完全常规化控制的充分理解，是被蔑视、受辱和自我怨恨的普遍性，和在 80 年代的文化中，这种状况没有改观，反而愈发糟糕的原因。[48] 在这个历史阶段，定义

女性“地位”的参数的确受到挑战，就在这个时刻，我们还耗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忙于急切地转变（通常是缩减）我们的身体，并为此着迷、消沉，这是令人不安的。正如这本书中的文章所认为的，一场关于女性身体的能量和资源的政治战役正在打响，其中，至少一些赋予女性权力的女性主义计划正失去阵地（或者，至少正受到强烈的回击）。

超越医学模式

自从17世纪，科学已经将对身体和其失调的研究“据为己有”。这种所有权要求身体的意义对于合格的专家（在适当的方法和技术的帮助下）而言，要完全透明并可以理解，而对病人则要晦涩。它还要求消除所有前现代的观念，即认为身体或许遵循着一种精神的、感情的或联想的，而非纯粹机械的逻辑。在这些要求的语境中，歇斯底里和厌食症挑战了现代科学，不仅因为它们表面上强调身体的神秘和无理性表现的力量（韦尔·米切尔曾经称歇斯底里为“迷思底里”；对于希尔德·布鲁克，厌食症是个“迷”）[49]，还因为它们对病人的表现。病人被表现为（不管是多么无意识或自我毁灭）以一种科学家的笛卡尔思维无法理解并感到困惑的形式，创造、赋予她的身体以意义。最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将歇斯底里合理化，明确其含义，并将歇斯底里身体的所有权交给科学家和分析师。今天，在女性饮食失调患者的身体上，一场同样的争斗正在上演。

在医学模式中，病人的身体是被动的，像一块平板，失调被写在上面。破译这种书写通常被视为确定失调的“原因”；有时（就像

精神分析)还会涉及症状的阐释。但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受过训练的——也就是说,高度专业的——内行,他的技术本身就能破解失调身体的秘密。相反,对女性主义分析家而言,失调的身体和所有的身体一样,处在制造意义,“在身体上作业”的过程中。在这个视角下,厌食症(比如说)从来不仅仅是退化的,不仅仅是向疾病和混乱的陷落。它也不只是受益于文化形象产生的迷惑,和主观臆断的“教化”,而在当下流行。相反,“对过度削瘦的不懈追求”[50]是一种尝试,它体现某些价值,创造一个以一种有力和有意义的方式为自我辩护的身体。

这种作业不缺工具:和所有语言的词汇和句法一样,身体的词汇和句法也是在文化中产生的。厌食症患者不能让苗条具有她想让它具有的任何意义。但这并不是说,苗条的含义是单一的、固定的,或是清晰的。相反,苗条在当前的语境中是如此咄咄逼人,说明在我们的文化中苗条是被超定的,承载了多重意义。既然如此,它就可以被用作一种媒介,来表达一系列(有时是相抵触的)焦虑、渴望和窘境。在这个框架内,阐释厌食症所需要的不是技术或职业专长,而要意识到在紊乱中具体化的多层文化含义。

我在这本书的其他文章中详细讨论了这些含义,其中包括:(1)承诺超越居家的女性特质,进入享有特权的公共世界,在那里,受到赞赏的不是温柔,而是意志、自主和苛刻;(2)对女性饥饿的象征和实际的控制(参见《欲望》),不断地被建构成父权文化中的一个问题(尤其在性属关系不稳定的时期),并内化于女性对自己的需要和欲望而感到的羞耻;(3)重新划定女性在这个世界中的有限“地位”;和(4)在一个消费文化中,想拥有管理和控制完美的自我,这种想法是撩人的(和让人迷惑的),但对饥饿和欲望的实际管理

在这种文化中变得十分成问题。在最后一种含义的语境中，拒绝食物、减肥、对锻炼的热衷，和承受身体疼痛和疲劳的能力已经成为自主权、意志和道德操守的文化隐喻。

破解苗条，从而揭示其与自主、意志、克服欲望、提升精神、纯洁，和超越女性身体之间的深层关联，这说明鲁道夫·贝尔提出的当代饮食失调与中世纪圣徒的自我绝食之间的连续性，并不像布伦伯格这样的批评家所认为的那么牵强。[51]布伦伯格认为，试图寻找中世纪圣徒和当代女性的厌食症中共同的心理和政治特点，这种做法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即过去的厌食症奇观以追求精神完美为中心，“而现代的厌食症患者奋力要达到的完美境界，是一个身体，而非精神之美的社会理想”[52]。但布伦伯格提出了一个假定——此假定在本书的文章中受到质疑——就是，纯粹的“身体”美其实是存在的。

就算中世纪圣徒完全没有兴趣让自己变得苗条，那也不能说，当代人对苗条的痴迷没有深层的“精神”内涵，这些内涵与中世纪圣徒的禁欲雄心之间没有重要的——也就是说，有启示的——关联。一位厌食症患者的话明确地体现了这种关联：“当我的身体萎缩的时候，我的灵魂好像在成长，”她回忆道，“我感觉自己像以前的一个基督圣徒，在沙漠的烈日下忍饥挨饿。”[53]这并不是说，自我绝食对于中世纪禁食的修女的意义，和对于今天的青少年厌食症患者的意义之间可以简单地划等号。但长期存在的历史传统已经普遍将食欲、缺乏意志、诱惑和身体本身定义为女性所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当然会认为女性超越饥饿和欲望的计划将会揭示一些连续的要素。

苗条是“一种外在的身体构造，而非内在的精神状态”[54]，是一

种没有心理和道德深度的理想，这种肤浅和不加分析的观念依然主宰着有关厌食症和贪食症的文献。为什么呢？一种解释是，只要饮食失调仍然属于医学范畴，那么负责将厌食症和贪食症概念化的就是医学专家，他们缺乏文化阐释和批评的经验，或者根本不感兴趣。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医学模式吸收了这种阐释和批评，那么它本身就将发生转变。一个被动的主体和机械的过程仍然可以从概念上表述对于形象的敏感。意义不断地在各个层面上——文化、主体，还有临床医师——被生产，在根本意义上，在这个制造意义的过程之外，没有身体的存在是中性的，没有身体被动地等待训练有素的专家来客观地破译，如果对此表示赞同，那就等于质疑了一个假设，它是大部分现代科学的基础，并处于我们高度专业化、职业化和分化的文化的中心。或者换一种说法：这种做法就等于说明，对于每个领域的文化批评家，非专业人士，和普通但具有批判眼光的人而言，研究失调的身体都是一个合适的工作，就像它对“专家们”一样。这种大胆的挑战是女性主义对饮食失调的重新概念化所留下的遗产。

母亲是人吗？
——生育权和主体性的政治

许多学术圈内和圈外人士都开始认为，女性主义关于西方文化的偏见和排外的争论要么因为性属关系的进步而过时，要么是一些偏执的错觉，在对于“政治正确性”，而非真理的狂热中升温。尽管指向反面的文化证据愈发有力，这些观点还是不为所动。正如克拉伦斯·托马斯/安妮塔·希尔听证会所表明的，在这个文化中，女人是说谎妖妇的形象仍然胜过女人在法律下享有平等申辩的权利。同样的工作，女人的薪水比男人差得多。而且，目前看来，关于家庭内部平等的劳动分工的女性主义理想还不能和这种思想意识相提并论，即女人必须继续承担主要的责任：做饭、清洗、带孩子，即便她们也从事以前只有男人可以从事的全职工作和职业。

女性在法律和社会中遇到的一些最为顽固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生育控制这个领域。尽管在这个领域内已经开展了高度公开、振聋发聩的斗争，但最显著的不平等还是没有得到它们应得的关

注和强调。我认为，造成这种缺失的部分原因至少是这个事实，即堕胎权虽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但赞成堕胎和反对堕胎的争论都太拘泥于修辞和策略，没能将这个斗争置于生育控制的大背景中。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尝试在这个背景中考察有关堕胎权的争论。

文章的前三部分将主要揭示并阐释关于保护"主体"的法律和医学实践中一些显著和有害的矛盾，考察一些引起这些矛盾的文化意识、隐喻和形象。尽管在个人权利方面，法律和医学断言有一个统一和连贯的传统，但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为具体化的主体而建，另一种为那些仅被当作身体的人存在，尽管官方的辞令坚决摒弃这种对待人类的方式。我还将在更加日常的领域探讨这种实用形而上学——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二元性——的表述，而且，它在为胎儿和父亲争取权利的运动中也有具体的表现。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里，我将简要论述我的分析对于女性主义在生育上的话语所提出的一些暗示。

我考察了法律中关于有孕和无孕之身的身体完整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建构成胎儿孵化器，赋予胎儿"超级主体"地位的做法，和父亲权利意识形态的出现，我相信，我的分析将会揭示，女性主义的愤怒和挫败远非偏执狂的表现，或者是过时的。我希望它们还将证明，关于堕胎争论目前的表述——作为胎儿想成为人的要求和女人的选择权之间的一场角力——是狭隘和误导的。在本文我的分析语境中，当前关于生育控制的论战实际上是对女人的人身攻击。

具体化的主体与非主体化的身体

我们的法律传统对于身体完整性有高度的——有些人可能会

认为太高了——正统评价，正如一百年前美国最高法院所承认的：

> 没有权利比每个人拥有和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更加神圣，或者受到普通法更为仔细的保护。他摆脱所有来自他人的限制和影响，除非面对的是一个明确的、毋庸置疑的法律权威。正如法官库利的精彩表述，"对于自己身体的权利可以说是一种完全的豁免权：不能干涉"[①]。

在笛卡尔那里，人类身体是人，那个自觉自愿，有欲望、梦想和创造力的"内部"自我，即"我"的"家"——就是吉尔伯特·赖尔所称的"机器里的幽灵"[②]——这个观念从哲学上将身体完整性和"对于自己身体的权利"连在一起。这种建构对于西方现代性，尤其是身体完整性、隐私和人格在法律上的概念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机器里的幽灵"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并不总是法定的隐喻；有时，完全机械的身体观占主导地位，在这些观念里，对于内部自我的所有关注不复存在。实际上，就像笛卡尔对所有现实的划分一样，我们的法律传统把人类世界分为两部分：有意识的主体和纯粹的身体（广延物）*。在这种二元性的社会表述中，有些群体显然被赋予主体的地位，并受到相应的保护，而其他人则经常被剥夺受保护的权利，为了医学和法律的需要，成为纯粹的广延物，和没有生气、尊严和人性化"主体性"的身体。

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有关具体化主体的传统。在这个传统

---

* 广延物（resextensa）是笛卡节二元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概念，指物质的东西，和它相对的是思维实体（rescogitans），指精神的东西。——译者

里，身体完整性享有如此的特权，以至在没有得到医学处理的同意时，法官永远不会强迫个人服从，即便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所以，在麦克福尔诉希莫(1979)一案中，希莫的身体完整性受到法律保护，他甚至可以拒绝执行一个程序（取出骨髓并捐献），这个程序原本可以挽救他堂兄的生命，后者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除非进行骨髓移植，否则必死无疑（决定宣布两周后，麦克福尔死去）。其他类似的诉讼也都不成功，其中包括广为人知的一些案件，比如一位西雅图的妇女要求自己患白血病的孩子的父亲捐献骨髓，还有一位伊利诺斯州的父亲起诉他儿子的半孪生兄妹的母亲，要求化验，看看他们的骨髓和他儿子的是否一致。[3]我们中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会认为希莫的行为和类似的拒绝是不道德的。但是它们完全受法律认可，法律规定任何医疗程序都必须征得知情同意，因此，为了维护被视为构成（用关于麦克福尔的决定中的话说）"我们社会的……本质"[4]的原则，我们成了邪恶的撒马利亚人。*

在真正的意义上，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原则是保护相关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它承认身体永远不能被仅仅当成一个可以量化的过程，可以客观地评价，而必须被视为具有个人的意义、历史和价值，它们的最终决定权属于生活在身体"内部"的主体。根据知情同意的原则，即使对病人是"有好处的"，没有其他人——不管是亲戚还是专家——可以替具体化主体决定什么样的医疗风险值得承担，哪种程序的侵害性小，哪种大，什么痛苦是次要的。当赋予意义的功能面临被从主体夺走的危险时，普遍的意

* 撒马利亚人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旁支，在《新约全书》的《路加福音》中有记载。——译者

识形态（和相应的法律回应）就将这种情况断定为对身体个人空间的暴力入侵。例如，医师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治疗，在法律上被视为殴打。[5]或者，考虑一下裁决麦克福尔诉希莫一案的法官为自己的判决所做的激昂辩护：

> 对于一个尊重每个个体权利的社会而言，把牙齿放在它一位成员的颈静脉或脖子上，为另一位吸取维持生命所需的物质，这样做有违我们来之不易的法律观念。强行提取有生命的身体中的组织为司法所不容。这会唤起纳粹党党徽和宗教法庭的可怕形象，让人想起它所预示的恐惧。[6]

吸血鬼的习性是这段话的主要隐喻，它不仅表现了人类身体的脉动、流动和生气，还暗示着如果入侵它就无异于寄生，盗取人体的内部精华。很明显，身体在这里不只是物质的实体，而是一个自我体现的，或者是（反过来讲）一个充满主体性的身体。纵容这种入侵的体系被比作纳粹德国和宗教法庭，或[如在罗克林诉加利福尼亚州一案（1952）中]中世纪的迫害。

> 非法干涉上诉者的隐私，用力掰开他的嘴，清除里面的东西，强行取出他胃里的东西——这都是政府机构所为，目的是为了取证，这种诉讼过程即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难以容忍。这种方法与用刑具拷问犯人没有什么两样，无法用宪法的条文鉴别。[7]

罗克林是一个有嫌疑的毒品贩子，他只不过被强制吐出了之前吞

下的两粒胶囊。此外,在保护身体完整性方面,对于罗克林隐私的侵犯属于一种明显认可的可能发生的例外:当需要提高州政府指控罪犯的兴趣时,小规模的侵犯是允许的。[8]所以,比方说,可以通过血液测试有醉酒驾车嫌疑的驾驶员。[9]但即便对嫌疑犯,法律在重要的手术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在温斯顿诉李一案中(1985),法律实施机构需要从被告的胸腔里取出子弹,作为指控他的证据。巡回法庭和最高法院都反对此州的做法,最高法院争论道,"未征得病人的同意,为了寻找犯罪证据,用一般的麻醉剂对其进行手术,这种做法实际上让病人完全丧失了对在自己皮肤下进行的手术的普通控制"。有趣的是,巡回法庭和最高法院都特别强调,违背这个公民的意志,"用药物"让其"进入无意识的状态",这种做法是可耻和"有失身份的"。[10]

与"主体的"身体所依据的神圣理由所受到的特殊待遇相反[11],医学和法律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干涉女性的生育生活时所用的方式是随意和专横的,尤其当她们没有欧洲血统,贫穷,或者来自非英语国家时,更是如此。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看到种族主义、阶级论和性别歧视危险地交织在一起,不论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的强制绝育史,还是有关法院下令对生产进行干预的统计,抑或是最高法院对拉斯特诉沙利文一案的判决。这个判决禁止医生在联邦政府资助的诊所里谈论或者提供有关堕胎的信息,也不能提示在何处能获得这些信息,即使一位妇女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获得医疗服务。[12]

强制绝育史无可争辩的对象是"精神有缺陷的人"("意志薄弱的"、"迟钝的"、"有精神病的"),它是这个国家中最为昭著的例子之一,体现了医学和法律对某些群体的人格的漠视,这段历史已经

受到了种族、阶级和性属政治的强大影响。1900 年至 1960 年间，美国有六万人在没有经过自己同意的情况下被绝育，好多人从来没有被告知这个手术的性质。[13]

对这个国家中“精神有缺陷”的人实行强制绝育，最初的动力来源于 19 世纪版的进化理论（几乎总是带有种族歧视的色彩），和受优生学启发的对于一个没有“缺陷基因”的社会的想象。实际上，这段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那些被认为有遗传问题，属于劣等种族的群体：那些被定罪的犯人，穷人，非裔美国人，美国土著，西班牙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人。[14]

大萧条将有权进行绝育的官员的注意力从防止遗传缺陷，转移到消除那些被认为不能充分照顾他们孩子的人的父母身份，于是 20 世纪 30、40 年代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性属歧视，但这一点经常被忽略。在《手术解决方案》中，菲利普·赖利注意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和绝育的男性和女性在人数上越来越明显的差距[15]，但是他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今天，实际上所有对绝育的滥用（和对程度较轻的身体侵入的建议，比如说使用诺普兰）都是在福利方面针对女性，并用“没有能力照顾”的说法为自己开脱。在多数情况下，就像拉斯特一案所表明的那样，法律没有完全剥夺贫穷妇女的生育权，但它们还是受到威胁。例如，在沃克诉皮尔斯一案中，被告承认他所做的是为了获得许可，为前来找他的享有医疗补助的病人实施绝育，这个病人怀了第三个孩子。如果得不到许可，他将拒绝治疗病人，而且有时还会威胁要终止她们的政府补助。他对没有医疗补助的病人则没有这些限制，不管他们有多少孩子。[16]

将目光转到法院下令对生产进行的干预——包括强制剖腹

产、强行拘留妇女、往子宫内注液——统计表明，在这个文化中，一位身怀六甲但身无分文的女人（尤其当她没有欧洲血统的时候）在医学和法律上，像一个人所能被认为的那样，几乎被认为是“纯粹的身体”，她的愿望、欲望、梦想和宗教方面的顾虑微不足道，并为了胎儿的健康（基于医生或法官的评估）而被轻易忽略掉。1987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在21个需要法庭下令进行生产干预的案例中，86％是成功的。涉及到的女性中有81％是黑人、亚洲人，或西班牙人。[17]

作为最极端和最具启示性的强制剖腹产案例之一，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得到了一项法院命令，要求在危重病人安吉拉·卡德尔的胎儿能自主存活之前，对其实施剖腹产，而不顾她本人、她的丈夫和在场医生的意愿。这位妇女和她的婴儿在术后不久死去。尽管有请求延缓审理，哥伦比亚地区上诉法院还是肯定了这项命令的合法性，判定有理由不谈女性避开身体侵扰的权利，因为她“这种安详的生活最多还有两天”[18]。在此，很明显，一个生命犹在的人类主体，为了满足法律的目的，成了死的东西，一个纯粹的胎儿容器。当一个女人怀孕时，法律就认定她只是一个维持胎儿生命的系统，但这个国家中没有哪个法院能强迫她为一个垂死的亲戚输血。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案例法律上的类似物不是，像一个耶和华见证会被命令允许一个贫困儿童接受输血时所发生的干预，而恰恰像麦克福尔诉希莫这样的案例中的干预，在此案例中，法院指令对象的身体是干预所需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保护身体的完整性在后面这样的案例中是个问题，而在只是涉及蔑视父母的意愿，但没有涉及父母身体的案例中不存在。想一想类似的道德事件就

会清楚地发现，即便赋予胎儿充分的人性，也无法消除法律和道德矛盾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希莫拒绝执行一个原本可以挽救他堂兄生命的程序，他的拒绝得到了法律的支持，因为不这么做，就是公然入侵主体身体的特权领土。另一方面，在大量的案例中，法官不但要求孕妇服从危害性极高的程序[19]，还将这些干预概念化为对胎儿权利的保护，对抗母亲对于这些程序的物质、情感和宗教的可接受性的不恰当和自私的评价。

想一想法院下达为孕妇进行医疗救治的命令所使用的语言。这些命令经常不考虑建议实行的干预，认为它是次要的、无足轻重的，对一个过度渴望个人自由和“便利”的人才有意义，和暴力镇压时的辞令，刑具的隐喻，麦克福尔诉希莫一案的判决中与法西斯政权的类比形成强烈对比。所以，塔夫特诉塔夫特一案（1982）中的法官在签署强行为一名妇女实行宫颈手术的命令时（她的丈夫希望得到这个命令），称这个过程是“为了保护妊娠而做的少许缝合”[20]。对于这名孕妇来说，这是对知情同意的完全回避，而知情同意要求患者最终决定侵害程度和可接受的危险度。如果没有这个要求，知情同意就毫无意义了。

然而，我们可能会认为宫颈环扎术几乎不是侵犯[21]，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忘记，对于发生在嫌疑犯身上更为不起眼的侵犯（像罗克林案中的强制回吐这一问题），司法方面所表现出的恐惧。强行剖腹产的不适、危险和侵害还需另当别论。法庭纪录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参见温斯顿案），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进行重大手术，是对身体完整性和控制的极端和自取其辱的侵犯；这样做也是危险的，不论程序是多么“常规”。如果骨髓移植，甚至血液测试都可以免除，那么拒绝承受一个重大手术所造成的“大规模侵

犯”[22]的做法理应受到尊重。但当艾莎·马达恩(Ayesha Madyun)出于宗教原因拒绝了一个强行剖腹产时,法官认定,对于他而言,不签署法庭命令强行对其实行手术,是牺牲胎儿的安全,“纵容”马达恩的“欲望”。[23]

正如几位分析家指出的,孕妇和没有怀孕的人所接受的治疗之间的差异,法律上没有合理的解释。[24]如果要解释这种矛盾的话,我们必须离开理性的范畴,进入性属意识形态领域(在很多情况下,也涉及种族歧视)。显然,这些决定受到关于孕妇的恰当角色和作用的标准观念的间接影响。请注意法官在马达恩案中的措词,他选择“欲望”(而不是,比如说,更加符合法律习惯的“愿望”)。女性的“欲望”暗示着性、个人满足和变幻无常的私利——尤其,就像在前面这位法官的判决中,和纵容这种意义挂钩的时候——在我们文化中是一个强大、有威胁的观念。我们应当记住,马达恩的反对是具有宗教意义的(大多数母亲反对干预生产也是同样的)。[25]然而,对于法官而言,当宗教方面的顾虑和孕妇所应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胎儿孵化器——相冲突时,它们和最不值一提的个人奇想没什么两样。为了扮演这个角色,如果需要的话,孕妇应当消除自己的主体性。而当她拒绝这样做的时候,那个主体性就被认为是多余和邪恶的(显然,在许多签署命令干预生产的法官的想象中,潜伏着表现冷酷、自私母亲的文化原型——神话和童话中的邪恶女神、女王和继母)。

因此,从本体论的角度讲,孕妇已经被我们的法律体系视为抽象主体的镜像,这种主体的身体完整性受到法律的坚决保护。对于后者而言,主体性是人的存在的本质,即便是为了拯救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也不能以此为代价。个人的评价、选择和意识本身(想

一想温斯顿一案中，对于未经许可的麻醉，法庭所表现出的恐惧）是既定价值，任何对利益或公共利益表示关注的要求都必须严格以此为评判标准，并很少得到满足。与此相反，孕妇的本质是在保留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时，她所起到生物的、纯机械的作用。对她而言，这是既定价值，她对主体性的要求必须严格以此为评价标准，而且，只要它们与她的生命维持功能相悖，就经常被忽略。在这种冲突面前，她的评价、选择和意识是可以束之高阁的。[26]

与这种性属意识形态相交叉的，像马达恩一案所反映的，是我们抹杀有色人种作为人的存在的历史传统，对于他们“无责任感”的种族主义信念，和对宗教和文化多样性的蔑视。这些要素在侵犯生育权的两个极端——强制节育和强制剖腹产——中都起作用。在强制节育中，起负面作用的种族主义形象是通常是一个行为放荡的生育者，像一只未经阉割的雌性动物一样，恣意生育，不计后果。沃克诉皮尔斯一案中的一位证人说皮尔斯是这样教训她的：“他说，‘小姐，请听好……在这种事情上花的是我纳税用的钱……我受够了人们到处生孩子并用我纳税的钱为它付费’。”[27]像马达恩这样的强制剖腹产案，其中的种族主义形象可能就是一位愚昧的、未开化的原始人，他的返祖的宗教信仰与现代科学的开明态度相抵牾。

胎儿的超级主体与母亲的孵化器

> 黛比之前滥用可卡因，虐待子宫里的儿子。现在，多亏得到联盟的支持，她学会了如何做一名小里基需要的负责任的家长。
>
> 1991年《联合道路》手册

显然，法律传统对于那些拥有主体文化定位的人而言是一种，而对被视为“他者”的人来说则是另一种。在一次广为人知的决定中，哥伦比亚地区上诉法院宣布原先对安吉拉·卡德尔的判决无效，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会有一种足够特殊、足够迫切的情况，可以不顾一个人的意愿，对他的身体进行大规模的侵犯，比如，像一次剖腹产”(注意到安吉拉·卡德尔是一位白人女性并不是要贬低法院的判决)，强制剖腹产的不公正性在此刻才最终得到一定认可。上诉是由美国医学联合会和其他 39 个机构提出来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林恩·帕尔特罗，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乔治·安拿斯，和其他几位让卡德尔和其他案子受到全国关注的人[28]，他们的努力极大地唤醒了这些机构的觉悟。1987 年，接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调查的产科医师中，47％的人赞成强制剖腹产，并一致认为应当扩展在为胎儿实施紧急剖腹产的情况下法院设定的判例，将其他程序也包含进来，比如子宫内输血。[29]安吉拉·卡德尔案之后，这些看法或许正在发生改变。但对于普遍的生产干预，还有极其活跃和强大的拥护者[30]，在其他方面，孕妇还继续被当作胎儿孵化器。过去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已经脑死亡的孕妇被维持生命长达七到八周，直到胎儿足够成熟，能够通过剖腹产取出[31]，而且，天主教会已经宣布，“如果继续治疗可能会对她未出世的孩子有好处的话”[32]，那么对于孕妇来说，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就是义务。

的确，我相信认为女人是胎儿孵化器的思想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强大，对孕妇生活的侵蚀力度也越来越强。区别在于，今天，它最有可能出现在和孕妇的“生活方式”相关的问题的背景中。1986 年，劳伦斯·纳尔逊和他的同事警告说：“强迫孕妇接受医学治疗，

为进一步侵犯一个女人的隐私和身体完整性提供了一个苦涩的先例。”仿佛预见了一幅未来反面乌托邦的恐怖景象（就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女仆的故事》中所描写的），他们列举了如下潜在的侵犯：

> （这些）可能包括：法院下令禁止孕妇使用酒精、香烟，或其他有危害可能性的物质，禁止她们继续工作，因为工作场所存在胎儿毒素，强迫她们服药或接受子宫内输血，要求患厌食症的少年孕妇强迫进食，强迫女性接受产前检查和诊断，比如羊水诊断、超声波扫描，或用胎儿镜观察胎儿，或者命令女性接受为胎儿做的宫内或宫外手术……法院实际上控制了孕妇的生活，并广泛地侵扰她们的身体活动，这种前景是恐怖的，而且和我们社会中行动自由所起的基本作用相悖。[33]

仅仅过了5年，这种景象就不再显得如此遥远。尽管最高法院禁止雇主采取“保护胎儿”的政策，让分娩时期的女性远离危险的工作，但在当前的时代精神下，保护胎儿的权利已经萌发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迷恋，这种决定看上去几乎是反常的。因为危及胎儿而起诉和防范性拘留孕妇，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现在正变得越来越普通。1985年发生了帕米拉·蕾·斯图尔特案，帕米拉因为在怀孕期间没有遵循医学建议，对她的孩子造成犯罪性忽略而被控告，自此以后，以上案例成倍增加。1989年，一位佛罗里达州的法官判了23岁的詹妮弗·约翰逊15年缓刑，因为她被定罪通过脐带向她的两个婴儿传送非法药物。一位马萨诸塞州的妇女因为醉酒，在一起车祸中流产，之后被起诉用车辆杀害她的胎儿。当警察准备逮

捕一位康涅狄格州的妇女时，她吞下了大量的可卡因，因此被控告危害自己的胎儿。因为伪造支票被逮捕后进行的药物测试显示服用过可卡因，布伦达·沃恩被一位华盛顿的法官判了将近4个月的监禁，目的是为了保护她的胎儿。[34] 1990年，警察控告怀俄明州的一位妇女怀孕期间饮酒，并以虐待儿童的重罪将她起诉。在南卡罗来纳州，12位妇女去医院做产妇护理时被检测出服用可卡因，之后因为虐待胎儿被医院告发，交给警察，最后被逮捕。[35]

在某些方面比这些诉讼更加让人烦恼的是人们日常态度的转变。1991年3月，两位餐厅服务员试图劝一位怀有九个月身孕的顾客不要点代基里酒，因为饮酒对她的胎儿有害，却被解雇。[36] 不久他们就出现在"奥普拉·温弗瑞"脱口秀中，许多听众表现出他们强烈支持这两位服务员的行为。可以预见，这位顾客的行为被认为是轻率和"自私的"，即便在她怀孕的后期喝一点酒几乎不会影响她胎儿的健康。听众们则坚持他们的看法，就像专栏作家卡尔·托马斯一样，认为孕妇参与任何哪怕是危险性最低的活动，也是"自私的"的表现，而别人为她们指出这一点则是负责任的做法。在托马斯对这位顾客的指责中，所有的差别——不同伤害级别之间的、胎儿和孩子之间的、对母亲自己身体的使用有影响和没有影响的禁令之间的——都被抹掉：

一个月以后，这位妇女和她刚出世的孩子又来了，并点了两份酒，一份给她自己，另一份装在这个婴儿的奶瓶里，因为这个孩子一直哭，母亲觉得给他喝点酒是让他入睡的好办法，如果是这样哪又当如何呢？服务员因为婴儿未到法定年龄而拒绝为其服务，这种做法会得到认可吗？当然。那么想要保

护一个刚出世的孩子，和保护一个就要出世的孩子之间有什么区别呢？[37]

邪恶母亲的恐怖形象再次突显。从总体上讲，孕妇或许是我们文化中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这是一种尖刻的不公。绝大多数人都会遭受大量个人方面的不便，承受痛苦，面对危险，不能自由地按照医生建议，去做对她们的胎儿最有利的事情。正如一位产科医生所说的，他见到的大多数女人"拼了命地救她们的孩子"[38]。具体到这位点代基里酒的顾客，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她在怀孕期间是极其小心的，并且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点这份酒的：

> 我比正常预产期晚了一个礼拜……我想在吃晚饭的时候喝这一点酒不会有问题……我特别注意阅读一切有关怀孕期间饮酒的信息。事实上，点了这份酒让我感到十分内疚……他们想让我觉得我在虐待儿童。[39]

这段话的最为尖刻之处是这位妇女对于自己越轨行为的内在感觉，在我看来则是一种暗示，不是暗示她认识到一口酒对她胎儿健康的实际危害，而是人们期待孕妇所应具备的，和她们自己本身具有的非同寻常的警惕性。孕妇需要关心的事情太多，甚至超出了她们的职责，但与此同时，不管是父亲、州，还是私营行业，对成长中的胎儿造成的危害，他们都没有任何责任，也没有要求让他们关注。父亲的药瘾、吸烟、酗酒、莽撞的驾驶，和怀孕妻子心理和身体上所受的待遇也是胎儿"生长环境"的一部分——有时通过影响母亲的健康，起间接作用，但有时也是直接的（被动吸烟，空气中的精

炼可卡因粉尘，身体上的虐待，酒精对精子的毒害，暂且说这些）。但父亲们可以逃脱罪责，就像那个医疗卫生系统一样，贫穷的女性想得到产前护理，上瘾的母亲想得到帮助是那么困难。[40] 如凯塞·波利特所指出的：

> 法官只知道监禁上瘾的孕妇，却不下令让药物处理计划接收她们，或者让为治疗海洛因吸食者付费的医疗补助将精炼可卡因毒瘾也涵盖进来——更不要说下令不让老板驱逐她们，或者让产科医师接纳未参保的女性，或者让联邦政府充分资助妇女、婴儿和儿童的辅助摄食计划，在符合条件的对象中，只有三分之二的人享受到此计划。二战以来，多数西方工业国家实施的承担母亲和婴儿医疗费用的政策——一种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带薪休产假，直接支付母亲薪水，政府资助的日托，为初为人母的女性工作的家庭卫生访视员，反映生活开支的福利金——在美国，即便在思想最开放的人士看来，也仍然是一项没有希望的事业。其他人则视其冒着掏空政府预算的危险，复制了一个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的愿望清单上没有意义和虚无缥缈的条目。[41]

虽然电视上的公共服务公告指责孕妇的吸烟和饮酒习惯，好像它们是造成婴儿出生时体重轻和残疾的唯一原因，但一个由政府委任的工作小组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为孕妇实行常规的临床和社会服务，那么我们可以减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婴儿死亡率。"目前，每三个孕妇中就有一个得不到充分的产前护理（当然，如果嗜药的母亲因为害怕被出卖给警察，而不寻求医疗救助，那么这种情

况就不会有改观）。除了做出其他改进之外，这个工作小组还推荐了一种宣传运动，和借助护士、社会工作者和其他顾问的家庭走访，以“给予营养的方式”对待孕妇的需要。然而，布什政府没有实施这其中的任何一项措施，并为了保证行政部门“审议过程的机密性”[42]，扣压了多数来自国会的报告。

显然，只有孕妇“有义务照顾别人”[43]。的确，根据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中考察的建构，这就是她的本质功能。人们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她的生理状况上，显示这种功能还在完全机械的术语中——作为肉体的孵化器——得到表达。偶尔喝点酒能让她放松、平静，不断警惕她所提供的“环境”（如果不是公共审查的威胁和谴责本身）会让她一直感到紧张和焦虑，这些因素同样会影响胎儿的健康，这些事实都得不到关注。相反，对于她和胎儿之间身体联系的粗糙、机械的描写泛滥成灾。母亲喝一口代基里酒被认为等于用鸡尾酒招待胎儿。这种想像令人如此反感，不难得出更进一步的等式：一口酒＝胎儿酒精综合征。

子宫有时不被描述成孵化器，而是监狱。“有存活能力的未出世的孩子实际上被俘在母亲的身体里”，卡德尔案上诉中持异议的法官争论道。反对堕胎的发言人伯纳德·内桑森将胎儿描述为“宛如被困在一堵无法穿透的用肉、肌、骨头和血液做成的墙的后面”[44]。或许这些想象和那些空想家的一样不值一提。那么迈克尔·哈里森的描述则典型地体现了胎儿存在的不断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因为很明显，当孕妇作为人的存在被从她身上抽去，作为胎儿孵化器的功能被激活时，胎儿的主体性就得到了提升：

只要在医学上，胎儿仍然是不透明的子宫里的一名隐士，

> 他就得不到严肃对待；直到本世纪后半叶，超声波图的窥探才让曾经不透明的子宫变得透明，剥去黑暗的内部圣所的神秘面纱，用科学观察的光芒照亮那个羞涩和隐秘的胎儿……具有超声检查功能的偷窥者暗中监视毫无戒备的胎儿，惊奇地发现他或她是一个活跃的小生物，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被动的寄生物……从圣经中的“种子”和神秘的“雏型人”到一个有可以被诊断和治疗的医学问题的人，也就是说，一个病人，胎儿经历了漫长的旅程。尽管他不能和别人约定，也从不抱怨，但这位病人无论何时都需要一位医生。[45]

弥漫在这段话中的性属意识形态是多方面和明显的，在此无需赘述。我只想强调哈里森在“不透明的”，无法穿透的子宫，一片本身没有意识之光的领域，一个洞穴，一个仅供睡觉的地方，和心理复杂，既“羞涩和隐秘”又生机勃勃的“活跃”（而且，当然，不像他的母亲，他“从不抱怨”——一个理想化的“病人”），充分人形化的胎儿之间建构的二元对立。露丝·哈伯德也注意到这个假设的明显傲慢，即在超声波发展之前，“我们”已经将胎儿想象为一个“被动的寄生物”。这个“我们”是谁？她问道。“当然不是，”她指出，“在疼痛中被胎儿踢醒的女人！”[46]当然，哈里森已经让这些女人在比喻意义上变得无意识，只有她们无生气的、处于遮蔽中的子宫还在。

当然，对于医生和母亲，超声波检测的日益常规化已经让胎儿看上去更像一个人。[47]由于对胎儿身份认识的这种变化，加之能让医生直接把胎儿当作自主病人对待的先进技术，所以当母亲们拒绝接受推荐的治疗时，医生开始变得困惑、愤怒，而且，或许还受到道义上的谴责。我能理解他们的不安和失意。但让人不安的事实

没有改变，即更多地认同胎儿通常意味着减少对母亲自主性的尊重。[48]而且，总的说来，就女人的主体性而言，新生殖技术已经变得不伦不类，让人摸不着头脑。一方面，高速发展的技术摆在女人面前，表面上致力于实现她们的愿望：怀孕、预防流产、足月分娩。另一方面，倡议者和从业者们又不断地鼓动女人，让她们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实现这些目标的被动工具，准备并乐于忍受，“如果她们真的非常想要孩子的话”，诊断测试、日常监测、注射，和手术程序，不论它们多么复杂，侵害性多么大。因此，女人主体性的一个要素的确得到发展，而所有其他要素（职业上的投入，其他感情需要，其他私人关系的重要性，等等）则被贬低、边缘化，而且（当它们拒绝被抑制的时候）还会引发内疚和自我怀疑。

斯蒂芬·塞姆奇夏恩医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令人不安的例子。塞姆奇夏恩争论说应该用一种侵略性的方式预防流产，质疑了（普遍接受的）观点，即许多早期流产是基因缺陷不可避免的后果，因此不应该用严酷的方式预防。他让读者放心，基因检测（羊水诊断和超声波）将会在妊娠中三个月的开始阶段发现这些缺陷，而女人仍然可以在此时决定堕胎。[49]我觉得，塞姆奇夏恩应该知道在妊娠中三个月堕胎所造成的身体疼痛和（有详细记录的）心理创伤；但对于他而言，这些因素显然太微不足道，甚至没有必要作为可能会考虑的事情提一下。[50]在我们当前的文化语境中，新生殖技术的确迎合了女人的需要（更确切地说，是能够负担这些技术的女人的需要），但它们只能是正确的需要，是让所有其他事情（即便在技术成功率持续不景气的情况下）都服从于生一个孩子这项计划的需要。

胎儿的法律地位也得到了极大提高，这个过程在19个世纪

是渐进的，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0 年间则势头迅猛。[51]迪特里希法规(1884)盛行了半个世纪，它规定胎儿所受的伤害(比如，意外死亡或伤害)是不能单独获得赔偿的，因为胎儿是“母亲的一部分”。[52]之后，1946 年，在被称为“整个民事侵权法的历史上，对于一项既定法规最为轰动的突然颠倒”中[53]，一个联邦地方法院在审理博布雷斯特诉科茨一案时认为，如果有生机的胎儿出生后是活体，那么它之前所受的伤害是可以获赔的。[54]然而，纳尔逊(Nelson)指出，即便发生这种转变，也不能将胎儿视为一个享有充分法律权利的人；这项裁定的目的是让有特殊医疗救治，受教育等需要的出生时就有伤的人，能够因为当他们还不是法人时不该受的伤害而得到赔偿。

在史密斯诉布伦南一案(1960)中，新泽西最高法院用不得体的措词做了声明，说“每一个孩童均享有以健康身心开始其生命之法律权利”，其背后的用意和纳尔逊的分析如出一辙。史密斯认识到，由疏忽导致的产前伤害可以作为一个孩子的诉讼理由，但他明确否认这需要承认胎儿作为人的存在。这份声明的目的只不过是让活产婴儿的人身伤害索赔具有合法性。[55]但这句话就其本身而言(不考虑这个决定的背景)是有问题的，它不仅暗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利范围，在权利的归属上也存在歧义。在过去的 30 年间，随着生产干预的拥护者随意地援引胎儿所享有的“以健康身心开始其生命”的权利，作为他们诉讼的理由，这种歧义经常被发挥，甚至以牺牲裁定的目的为代价。从活产婴儿对其还是胎儿时所受的伤害进行诉讼的权利，到胎儿违背其母亲的意愿，强迫她接受治疗的权利，这种转变是深刻和有害的。

但为了便于说理，我们先不谈民事侵权法的误用。让我们承

认，出生时的健康和健全是胎儿的权利，为了实现此目的，胎儿有权享有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如果我们对此没有疑问，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这赋予了胎儿这个社会中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享受的权利。此刻，我们又遇到了关于胎儿权利的争论带来的一个奇怪的问题，即一个两岁的孩子所享有的权利竟远不如一个六个月的胎儿！[56]

我**不是**想否认胎儿所应受到的保护和尊重，也不是想说明它只不过是母亲的组织和附属。实际上，我将在后面的文章中强烈反对这种观点。相反，我的目标是让认为胎儿有权利的立场所带来的（但从来没有被公开承认的）本体建构受到关注，在我们文化的许多方面，这个立场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简单地讲，在那种建构中，孕妇完全不是主体（不论在法律中，还是在时代精神下），而胎儿则是超级主体。好像有孕之身的主体性被吸干，转移给了胎儿。

父亲的权利

> 这个孩子没有经过母亲便来到人间。
>
> 孟德斯鸠，《法律精神》引语

> 为什么上帝，
> 聪明的造物主，住在最高天上的
> 阳性的神明，竟会在地上造出这样新奇小巧的东西，大自然的
> 美的瑕疵；若只造男人和天使来

充满世界，不造女人，用其他方法来繁殖人类的后代，该多好呢！

弥尔顿，《失乐园》

卷十，888—895 行*

与将孕妇的身份定义为纯粹孵化器的做法相呼应，为父亲争取权利的运动也越来越有声势。詹姆斯·博普(James Bopp)非常公开地支持这种运动，他还是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的总顾问，推销一种“为父亲权利诉讼的装备”(Father's Rights Litigation Kit)，一种教人如何起诉妻子和女朋友的指南。[57]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些案子在高一级的法院总是败诉，但在 1989 年的 11 月份，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通过一项立法，在阐述父亲的权利方面，这项法案走得最远，它规定女人要让她们的丈夫知道自己的堕胎计划，而且，如果医生在没有证明丈夫已被告知的表格的情况下实施堕胎，那么还要因对丈夫造成民事损害追究医生的责任，并处以 5000 美金的惩罚性损失赔偿。[58]

争取父亲权利的运动发展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是文化上强有力的“平等”话语，这种运动借此宣扬自己的主张。“它是对权利的平衡”，詹姆斯·博普说。[59]但以这种方式将父亲的情况概念化是弄不清问题的，仿佛目标是公正的分配，就像监护中分配孩子的时间一样。因为这些情况的基础通常是一个具体的场合，其中母亲和父亲的目标互相排斥，在这种背景下，平等的对待是无法实现的。相反，在争执中，一方必须盖过另一方。任何在这种情况下寻

---

* 本段借用朱维之先生的译文，参见约翰·弥尔顿，《失乐园》，朱维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01—402 页。——译者

求自己"权利"的父亲，都在要求他的欲望不仅要和母亲的相当，还要胜过它们，也就是说，有关父亲权利的案例所寻求的不是父亲的平等地位，而是赋予父亲利益以特权。

父亲不仅是生命创造过程中的一个搭档，还是孩子的真正家长，这种想象是西方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建构。《福灵》(*The Furies*)* 生动地表现了理性、公正的阿波罗式正义战胜了母系的"血缘"正义，此剧中，帕拉斯·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部以完整的形式生长出来，埃斯库罗斯让阿波罗指着没有母亲的她，争论说"父亲"才是"生父"：

> 母亲决不是生产她的所谓"世系"，
> 而不过是抚育新播的种子；
> 父亲才是生父，养育出新的芽苗，
> 她受孕了，像从外族人受孕而已；
> 像一个旅舍主人，保护幼苗的生意，
> 除非神灵降下疫症，把它害死。
> 关于这点，我给你一个证据证实；
> 你旁边就有一个活生生的实例，
> 宙斯之女，雅典娜，就是。
> 她没有孕育在娘胎的黑暗里，
> 但是女神不能生产这株秀丽。[60]**

---

* 《福灵》是埃斯库罗斯《奥瑞斯提亚》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译者

** 本段借用灵珠的译文，参见：埃斯库罗斯，《奥瑞斯提亚》三部曲，灵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0 页。——译者

詹姆斯·希尔曼认为，创世说颠倒了人类出生的实际情况，让“男人成为女人的前提和其可能性的基础，而不是相反”，这是幻想“男人是真正家长”的另一种版本。[61]占主导地位的17世纪对生育的记述，为亚里士多德的生长论披上现代的、机械论外衣，这当然又是一种。

从亚里士多德到当代对精子和卵子的浪漫史的表现[62]，男性的付出被认为是生育中“有效和主动的”要素[63]，而女性的则是被动的、未成形的物质，等待那个得到她的勇敢的精子赋予她个体特征和活力。但带有机械论色彩的预成和具象理论（theory of preformation and embodiment）走得更远，女性身体在其表现中甚至都不提供人类得以成形的物质材料（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而仅仅是一个为已经成形的人类提供住所和起孵化作用的容器，上帝起初将它放在亚当的精液中，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分给他所有的男性后代。[64]1577年，荷兰显微镜学家列文虎克在雄性动物的精液中发现了蝌蚪状的生物——“微生物”——在他看来，这毫无疑问地证实了这个理论。他宣布这个发现从经验上验证了亚里士多德的直觉，即“形成胎儿的完全是男性的精液，女人所能做的只是接纳这些精液并为其提供食物”[65]。女人是胎儿孵化器，现在这种观念的上升势头让人不安，而男人是真正的家长（明显想卷土重来），可见，这些想象有深厚的历史根源。

1976年，在中密苏里的计划生育诉丹福斯一案中，最高法院明确、高调地驳回了关于父亲权利的争论，裁定配偶一方的权利不能和女人选择堕胎的权利相对抗、平衡，或者让其受到限制。法庭理解“对于自己妻子的怀孕和胎儿的成长和发展，一位用心和让人有安全感的丈夫所表现的深切和恰当的关怀”，但也认识到这个事

实，即（同罗伊案一样）丹福斯案暗示了母亲可能会在未经她丈夫批准的情况下单方面行动。但法庭坚持认为，既然“一对配偶中只能以一方为主”，而且既然“孩子是女人生的，女人更直接、即时地受怀孕的影响……所以天平应该倒向她”。[66]

从他们争论的言辞和策略判断，这些起诉他们妻子的人已经明显认识到，只有母亲才能体验怀孕的具象，这个看似无可辩驳的事实（时下流行讲夫妻怀孕，模糊了这个事实）是他们争取父亲权利的有力障碍。埃林·康恩是詹姆斯·博普的一个客户，听一听他在 1988 年 7 月的一档“晚间热线”节目中对自身情况的描述：

> 我有权利，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婚姻中，我和我的妻子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层关系，我成为从这个家庭走出来的孩子的父亲。天哪——你是知道的，这个体制设定的方式，女人怀孩子。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愿意，但这个体制不是这么设定的。关键的是，孩子生下来以后，孩子的一半——孩子的一部分是我。而且我也是那个孩子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她有权打掉那个孩子，就等于有权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毁掉我的一部分。而且你知道，她想控制自己的身体。那我呢？难道我就不允许控制我的身体吗？那个婴儿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67]

埃林·康恩将怀孕的生物事实描述为“体制设定的方式”。我认为，尽管康恩选择这个机械的意象出于本能，而非有意为之，但这并非偶然。康恩开始认识到，他必须把所有情感、精神和宗教方面

的意义，所有能唤起艰难或负担的因素，和所有与孕妇的经历相关的事情从怀孕中剔除。他必须将女人生孩子这个事实变成仅仅是一个客观、随意的“体制”的一次客观、随意的运转。在这种想象中，没有女性主体，只有胎儿的“携带者”*，而且，那些被（这个“体制”）如此残酷和不公地排除在外，不能做“携带者”的男人（这是暗示），是主观经验惟一的真正所在。事情就是那么“设定”的，可怜的家伙能做什么呢？

当然，康恩说如果可以的话，他也愿意怀孩子，这话说起来容易——因为这不可能。但这样的细节和康恩对自己充满激情的描述相比就逊色了，他与胎儿那么如胶似漆，以至不仅他是“孩子的一部分”——这是事实——而且，孩子也是“（康恩的）身体的一部分”——这不是事实。从作为孩子一部分的父亲到作为父亲一部分的孩子，这种转换实际上可以让康恩——从情感上，如果没有从视觉上——唤起他怀孕的形象，然后挪用并从情感上利用赞成堕胎运动（其实还有他妻子）的辞令。“她想控制自己的身体。那我呢？难道我就不允许控制我的身体吗？”这种由女性主义者介绍到文化中的对观点的利用是父亲权利论的典型策略。在 1989 年 9 月的一次听证会上，一位诉讼当事人过分地声称——无耻地将他的情况和一位身体受到侵犯的女人的相提并论——如果他输掉官司，那么他会感到“自己的生育权被强夺”[68]。

这些花言巧语试图用女性主义自己的绳子（“生育权”）将其勒死，并为男人，那个被残忍化的“强奸”的受害者，赢得同情。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试图创造一种作为女人的男人的形象（就是说，

---

* 原文是 carriers，其实这个词是和上段引文中“the woman carries the child”中的 carry 相对的，但为了方便行文，特将其译为“携带者”。——译者

像我们的文化对女人的想象那样）。作为“女人”他可以变得敏感、温柔、培养直觉、关心他人——这些是加在我们身上的主体性建构，在许多人看来，能解释为什么母亲的要求比父亲的特殊。要赢得父亲的权利，这种解释必须被破坏；因此，将父亲权利带上法庭的男人很少因为哭诉、大谈自己的无助，将自己“女性化”而感到羞耻。“我真的感到无助，”加里·贝尔在描述他的女友堕胎后自己的感受时说，“我哭了好几个小时。我内心如此受伤。”[59]

这种策略是想强调男人也是温柔的，特别是父母般的温柔。他们确实有这种情感（还有许多其他情感，因为西方对男性气质的主导建构没有得到充分表达），这是毋庸置疑的。再次说明一下，我的意思——就像我对于胎儿权利的论证一样——不是让男人非人化，或质疑他们对于增强主体性的要求，而是想指出女人的主体性所要付出的相应代价。在涉及父亲权利的案子中，对男性感情的每一次维护都伴随着对女性情感的否认；每一次证明男人也可以抚养他人的同时，试图怀疑女人的抚养能力——比如，将她描绘为缺乏关怀、无私等一位“真正的家长”所必需的品质。男人将他们自己说成是脆弱的花朵，容易受伤，而女人则被描述为冷酷地摧残胎儿的生命，践踏父亲的情感。

在这些案子中，以下这个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印第安纳州男子想要得到一个法院禁令，阻止他的女友堕胎，因为她要堕胎的理由是“她想在今夏穿泳装的时候好看……不想在夏天怀孕……不想和婴儿共有这个上诉人”。法官批准了这位男子的上诉申请（没有考虑这位女子的意见），判定既然这位女子不在上学，没有职业，并和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那么“不终止妊娠就既不会影响她就业，也不会妨碍她受教育”。此外，他继续说，“这位被告的外表

和举止说明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年轻女士，身材修长，身体健康，完全可以把孩子生下来，而不是一种过分的负担”[70]。我们这是在法庭上，还是在小母牛的拍卖会上？

重新拥有生育的主体性

罗伊诉韦德案的将来目前是生育控制斗争的主要文化舞台。但我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强调，有必要在一个更广阔的语境中考察堕胎权利斗争。当堕胎权利从涉及强制医疗救治，妊娠管理中的法律和社会干涉等现象的问题中抽象出来考虑时，被掩盖的是一个事实，即当前受到挑战的不仅是女人的生育权，还有女人在一个对“主体”的保护仍然是中心价值——不论是好是坏——的体制中作为主体的地位。同样可能被掩盖的是，当女人被视为种族或经济上的“他者”时所带来的连环和互相支撑的主体性消除。只要关于生育控制的争论完全按照堕胎争论的主要术语来概念化——就是说，作为胎儿对于生命的权利和女人的选择权之间的一种冲突——我们就会受到蒙蔽，认为处于争论中的只是胎儿的伦理和法律身份。孕妇（作为一个人的伦理和法律身份在堕胎争论中不被当作一个问题，而且多数人错误地认为它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被看作不为她作为人的存在，而“只是”为了控制自己生育前景的权利战斗。

然而，怀孕的性质是如此这般，以至剥夺女人对她生育生活的控制——不论通过无意识的或者强制绝育，法院下令进行的剖腹产，还是禁止堕胎——就一定是攻击她的人格完整和自主（这是我们文化中人的存在本质），仅仅把她当作怀孕的广延物，胎儿主体

性的物质孵化器。遗憾的是，过去女性主义者有时也参与到这种建构中来，认为生育和怀孕是可以从主体的存在中分离出来的“功能”，而且——像所有异化的劳动一样——有义务被出售或出租给另外一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的严重缺陷已经显而易见，“M婴儿”/玛丽·贝丝·怀特黑德(Mary Beth Whitehead)代孕案也让许多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即我们现在应该将我们的话语和策略从一种抽象的关于选择的修辞切换到另外一种修辞，它将集中(1)暴露我们有关身体完整性的法律传统中的矛盾，这种传统坚持认为，法律给予女性的平等保护要求这些矛盾得到解决[71]，并(2)通过(从目前垄断这种观点的右翼那里)收回认为怀孕和堕胎是经验上的重大事件的观点，质疑胎儿容器的概念。只有以这种回收为基础，我们才能维护女性的道德权威，不仅通过我们与众不同的具象，也通过我们的社会历史，去裁定出自我们生育性的复杂的伦理困境。

上文包含了几个概念，这些概念可能会让当代的女性主义者踌躇，同时也需要进一步解释。首先，存在女人的“经验”这一成问题的概念，和随之而来的将某些群体的女人的经历本质化，而将其他女人的历史和经历抹杀掉的危险。尽管我承认这种危险，但我相信利用女人的具体化经历不一定等于和“本质主义”挂钩，只要我们注意那种经历的历史、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例如，只要我们承认不同社会历史中，让女人可以有孩子的自由和经济条件和不要孩子的权利一样微弱。同时，意识到我们自身的多样性不应该淡化这种认识，即作为女人，我们都有一种男人所缺乏的“经历的权威”，它可以让我们“从一种特殊的批评位置去评述”和生育相关的问题。[72]女人不同的生育和分娩的历史经历——如艾米莉·马

丁[73]和安吉拉·戴维斯[74]的描述，和那些不能生育和自愿不要孩子的女人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权威的位置。那些更具哲理和重建性的分析同样如此，比如艾丽丝·扬对“怀孕具象”(pregnant embodiment)的研究。[75]

强调怀孕和分娩在经验上的重要性的想法也会让女性主义者不安，因为她们担心这些观点在概念上与将做母亲建构为女人的惟一真正命运的做法相近。但是，如果我们建构一种关于怀孕的公开的、女性主义的话语，而不是把它留给“反对堕胎的人”，我相信我们更有机会成功地对抗这种思想。比方说，我现在认为，女性主义者似乎从来不应该让关于胎儿身份的争论成为公众想象的中心，而应尝试以一种承认并明确表达胎儿的伦理和情感价值的鲜明的女性主义视角抢占这种争论[76](在非裔美国妇女的历史经历中，她们的身体和孩子都被挪用，如果她们在塑造早期女性主义政治的修辞和论证中曾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的话，那我想我们已经具备这种视角了)。正如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论述的，赋予胎儿以价值，甚至是作为人的存在都不能减少社会对女人生育的控制带来的问题。换种角度，贬低胎儿生命的做法给了右翼充分的空间，让他们想象出一个可能存在的世界，在那里女人冷漠而又随意地把胎儿从她们的体内清除，就像清除盘中的剩饭一样。这种形象——完全扭曲了大多数女人的经历——必须受到质疑，必须被证明是“邪恶母亲”原型的投影，反映了对于女人的自主，而非其使用现实的深厚的文化焦虑。

最后，还有像权威和主体这些概念目前成问题的身份，这些概念曾经在西方现代性中起关键作用，但如今正在各种哲学和文学领域内被宣布是没有中心的，正在死亡，或已经死亡。这里不是详

细讨论这些争论的地方。但我相信，只要我们仍然处于盛理论(high theory)的层面上，主体性、权威和身份这些概念在其中的作用是去抽象，只是因为这个而要求对它们进行全面解构是不难的。这些概念在法律和医学等语境中得到体制和社会层面的体现，在这些语境中，哲学的蓝图被转化成真实的社会构造，一旦我们开始考察这些概念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一种不同的模式就会显现。这就是关于当前生育控制的法律和社会斗争场所中显露的主体性的政治和修辞，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讨论的。

在这场斗争中，不论为了理论先锋主义，还是政治正确性，我们都不能放弃像主体性、权威、具体化意识，和人格完整这样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完全按照它们被我们继承时的形式来生产它们。我们必须记住，当后结构主义者宣布“作者”或“人”(“形而上学”或“哲学”)已死的时候，他们指的是那些历史上由欧洲人，在他们的文化优势条件下发展的概念。在那些条件下，主体性因为排除在它之外的经历而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例如，艾丽丝·扬对怀孕具象的研究表明，怀孕造就了(尽管不保证)精神和身体、内部和外部、自我和他者之间关系的独特存在，这种关系完全不同于笛卡尔、霍布斯、洛克，和其他现代主义主题设计师的设想。比方说，他们的模式所假定的自主概念受到了一种实际上置“他性”于自我中的具象的挑战。

扬的论证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事实，即树立边缘化主体权威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主体性本身的重建。这并不是说附属群体的(历史)主体性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或不受主体的主导建构的影响(比如，好像女人没有寻求过自主权，或者没有实现个性化和自我发展的可能)。但我们和这些价值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变得更加矛

盾，更难以识别；甚至可以说，不那么受压制了。[77]虽然历史上被排除在哲学、法律和政治之外，但我们依然在分配给自己的“领域”里创造了文化，现在，当我们开始在公共领域参与到哲学、法律和政治中的时候，这些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资源。

作为意识形态的饥饿

吃得过少的女人

在一个电视广告中,两个法国小姑娘身着她们母亲的羽毛状的漂亮衣服。这是两个优雅、完美、天真的小姑娘,广告的画面强调了她们年轻、自然的风格,这都是法国女人的特点(字幕说明这个广告是在法国摄制的)。其中一个小姑娘仔细地看着另一个女孩的妈妈的照片,大声惊呼道:"天哪,你的妈妈,她这么苗条,真漂亮!她吃东西吗?"另一个女孩听了咯咯直笑,回答道:"真傻,当然吃,只是吃得不太多。"然后她拿出她母亲的"助手"——一瓶"纤维瘦身"。* "你妒忌吗?"最先说话的小姑娘又问道。另一个小姑娘微笑着,羞涩但镇定自若,颇为老练地回答道:"才不呢,如果我也知道她的秘诀的话。"

无可否认,各种减肥产品的广告和关于减肥的电视节目一直困

---

* 纤维瘦身(Fibre Thin)是一种减肥产品。——译者

扰着妇女，但是前面提到的这则广告尤其让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到不悦。它暗示年轻女孩从小就学着去控制她们的体重，并且将减肥药片浪漫地神秘化为晦涩、永恒的女性技艺的一部分，代代相传，这很明显是一种冒犯。这种浪漫的幻想是美国商业广告惯用的伎俩，利用我们对（想象中的）“欧洲”的礼仪、传统以及处世之道的不断迷恋（和我们美国人的笨拙、粗鲁和强势相对，这些是有品位的表现）。两个小姑娘年轻、娴静，其举止仪态虽难以确定，但人人都明了它属于“欧洲风格”——就是说，美国大众文化词典中定义的那种风格。在这则广告中，“纤维瘦身”绝对不像减肥药片那样粗糙、“专业”和有实效（参阅美国人），而是一种神秘、珍贵（而且被暗示是年代久远的）“秘诀”，只有那些有底蕴和品位的人才能识别它。

但是我们期待从当代的诸多广告中看到这样的花招。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广告的关注点中尖锐的心理学问题。其实这则广告关注的并不是女性身体的尺寸和形态，而是某种**主体性**，其代表者就是那个缺席但重要的人物——母亲，那个“吃得不太多”的女人。我们并没有看到她的照片，只能想象她完美的外表和身材。但无论怎样，她的长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与食物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冷漠的”（即随意的）关系。她并没有让自己挨饿（一种强迫症，表明了食物持续不断的力量），但她也没有在某个隐蔽的角落拼命而又羞愧地暴饮暴食。饮食对她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广告中关于欧洲“差异”的隐喻唤起了这个吃得不太多的可爱法国母亲的形象，以此将自己呈现为一种方式，再现那种值得羡慕的，真正的外国“另类”：一位女人，食物对她而言只不过是寻常之物，吃不吃无所谓。

另一个版本的广告展现了一个漂亮、时尚的美国黑人妇女，轻

松地为弗吉尼娅·斯利姆斯牌薄荷香烟做宣传。(图 7)这则广告出现在《本质》杂志上,是主要以美国黑人妇女为销售对象的系列



图 7　一位穿着时尚的黑人女模特在为弗吉尼亚·斯利姆斯牌香烟做广告。中间一行文字为:"做决定很轻易。如果我路见刀叉,我就会吃东西。"

广告中的一个。同时出现在《大都市》和《人物》杂志上的弗吉尼娅·斯利姆斯香烟系列广告继续把它们的产品同历史上妇女所获机遇的增加联系起来(“亲爱的,你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仍然是广告短语的主题)。和它们不同,《本质》杂志上的广告通过嘲弄人们在把握住这些机遇之后表现出的严肃和自以为是推销自己:“如果你并不打算欣赏风景,又何必爬上梯子?”“骄傲的女孩决不哭泣。她们上街去购物。”以及图7中的变体文字:“做决定很轻易。如果我路见刀叉,我就会吃东西。”

主流的、白人文化(那些不去“欣赏风景”的人)无法在成功中放松自我,得到快乐,这可以说是这些广告想要唤起的一般性潜台词。广告暗示,努力争取上流社会地位的黑人消费者做起来会更有派头、更酷——当然,手中得有一支非常酷的弗吉尼娅·斯利姆斯牌香烟。在这则具体的广告中,谈话者不仅可以借助专业或人际间的决策,而且还可以通过食物来藐视强迫症。她含蓄地把自己同那些焦虑、烦恼的女人区分开来,在与食物的关系方面表现出完全的“轻松”状态。她与“纤维瘦身”广告中的母亲不同,只要她想要,任何时间她都可以吃东西。但和那位母亲一样(这在我看来是关键的相似之处),她也已经达到超越渴望的境界了。她不受未被满足的、内在需求的控制,不仅可以自由地吃东西,而且没有深层的欲望,也没有明显的后果。“这很轻松,”她说道。可以假设,如果马路上没有那些刀叉一类的餐具,她也许根本就想不起什么食物。

弗吉尼娅·斯利姆斯香烟广告中的女人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物,她对食物的冷漠态度与大多数当代非裔美国妇女的生活相去甚远,也与任何其他女性的生活大相径庭。的确,如果我们调查一

下文化看待女人的食欲以及身体尺寸的态度，我们就会发现一种巨大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受种族、国家、历史、阶级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我80岁的父亲是移民的后代，他总在每顿饭后问我是否“吃饱了”；除非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我变胖了，否则他总认为我过于削瘦。他的态度不仅反映了经济困难时期的记忆以及犹太裔俄国人偏爱身材丰满女人的传统，而且表明进入20世纪后，欣赏丰满女人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普遍文化依然得到延续。19世纪中叶，饭店、酒吧多喜欢悬挂各种丰满女人的裸体画，画的灵感来自布格罗。* 19世纪90年代，美国有个名叫莉莲·拉塞尔的女人，到处都是她的照片，她因为食欲旺盛、体态丰盈（在她红得发紫时体重超过200磅），并具有“撩人、肉感的”美而声名远扬、受人羡慕。[1]甚至进入20世纪以后，当这样的肉感美变得不再那么受人欣赏时，来自希腊、意大利、东欧，以及带有非洲血统的男人，由于受他们自己独特文化传统的影响，仍然喜欢丰腴、肉感的女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崔姬**和琼·施林普顿***开始为极端消瘦设定一种新标准时，美国的女同性恋文化仍然认可，甚至是赞美肉乎乎的、需要占据相当空间的女性身体。

当然，如果我们放眼全世界，回顾历史，类似的例子就更多了。在过去，许多文化都崇敬身形硕大、食欲旺盛的女性。有些文化今天依然如此。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将苗条等同于美丽和成功的做法日益普遍，这让文化多样性中的对抗性声音越

---

* 布格罗(1825—1905)：法国学院派画家，维护正统艺术，排斥印象派，多画裸体、田园、宗教、神话等题材，风格严谨细腻。——译者

** 崔姬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最为走红的模特儿，也是模特儿职业问世以来的第一个超级名模。——译者

*** 琼·施林普顿与崔姬齐名，也是以身材削瘦著称的模特。——译者

来越微弱。从70年代中期开始,十几岁的少年,无论他属于哪个种族或哪个社会阶层,都倾向于把细长的双腿、扁平的腹部和结实的臀部看作是女性美的基本要素。肌肉松弛的身体再也不像以往在女同性恋社区那样易被接受。甚至苏联的选美冠军也变得苗条、瘦削,而那些曾经在俄国影片中走红的强健而粗壮的女演员,如今也已经被更加苗条和西化的女演员取代了。

(中产阶级的,异性恋的)白人妇女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是强迫性的,而非裔美国人社区则以更为宽容的态度看待妇女的食欲,应当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过去是有文章可做的。但到了90年代,在读者群为非裔美国人的杂志上,关于节食、健身、身体形象的特辑日益引人注目。这一现象反映出的文化现实是,对今天的绝大多数妇女而言——无论她的种族或民族身份是什么,也不论她属于哪种社会阶层,有怎样的性取向——与食物之间自由、轻松的关系充其量也不过是往昔的遗风遗俗而已(除了进一步美化苗条的身材外,杂志中的内容可能会把焦点集中在非裔美国人超重的身体带来的健康问题上,这样的内容,《本质》比《大都市》更多些)。我们中所有有经济能力可以吃得很不错的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节食,还在挨饿。

因此,不是弗吉尼娅·斯利姆斯牌香烟,而是"代您瘦"* 更为现实地再现了女人与食物间的主观关系。在"代您瘦"广告中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的食欲遏制剂渐渐失效了,于是她就像一块活生生的吸铁石,一路横冲直撞,被呼吸的、危险的冰箱吸附过去。饥饿成了一种固执的、强大的力量,甚至是有生命的。这种建构反映了

* 代您瘦(Dexatrim)是美国著名的减肥药品牌。——译者

节食的生理现实，是一种肉体无法从饥饿感中将其辨认出来的状态。[②]同时，它也反映了节食的心理现实；对那些长期生活在拒绝食物状态下的节食者而言，食物永远是充满诱惑力的存在，当禁止获得满足的约束力变得越来越严格时，它的诱惑力也随之增强了。通过个人努力可以获得苗条的身材，但与食物间的"冷漠"关系，以及"纤维瘦身"广告中美丽"他者"的真实"秘诀"则挑逗地提醒我们，什么是不足和饥饿的自我无法得到的（当然，正像广告所暗示的，通过"纤维瘦身"和弗吉尼娅·斯利姆斯香烟，心理与文化的转变是可以实现的）。

揣摩女性消费者

有时，当我在课堂上分析和阐释各种广告时，学生们会指责说，对作为文化的载体和再生产者，这些再现所具有的重要性，我有一种偏执的表现。他们认为，这些广告仅仅是形象而已，不是"真实的生活"；傻瓜都明白，广告商为了推销产品而利用现实。我认为在某些层面上我们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但如果广告是有意义或可用的知识，那么，我们将不太可能亲眼目睹节食、健身风潮当前在各个民族、种族中盛行，也未必能看到旨在"修正"和"强化"的各种技术层出不穷了。

关于我们对形象与"现实"间的关系以及相对重要性的文化评价，让·鲍德里亚提供了更加准确的描述。在《仿真》中，他回忆起博尔赫斯*的寓言。绘图人在寓言中为强大的帝国绘制了一幅地

* 博尔赫斯（1897—1986）：阿根廷诗人和小说家，作品基调孤独、迷惘、彷徨，带有神秘色彩，代表作有诗集《面前的月亮》、短篇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等。——译者

图，地图非常详细，基本完全覆盖了帝国的领土。后来，地图破裂了，作为帝国的代表，这象征着帝国即将衰落。如今，在鲍德里亚看来，我们可以反向理解这则寓言：不是帝国的版图为地图提供了模型，而是地图界定了帝国的版图；而且正是帝国版图的“碎片在地图上缓慢地腐烂着”。然而，经过进一步思考后他又宣称，即便将这则寓言颠倒过来解读也是“没用的”。因为它仍然采用的假设恰恰是今天已经丢失的东西——即，领土与地图、现实与现象的区分。如今，在我们的经历中一切有意义的事物都是现象。[③]

因此，我们都“知道”雪儿和几乎每个年龄超过 25 岁的女明星都做过面部和身体的整形手术，是这些手术的塑料产品。但在（如鲍德里亚所称的）“超现实”（hyperreal）时代，这种“知识”就像博尔赫斯寓言故事中的旧地图一样，正在衰落、破损，无法质疑那些令人炫目的、咄咄逼人的、权威的形象。尽管人人都知道雪儿的外表是伪造的，但这一认识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抽象概念，正如我们年轻、健康时都明白终有一天我们会走向死亡一样；这根本无需估算。正是人为创造的形象控制了我们最活跃、最直接的认识：什么是什么，什么更重要，什么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当然，建构形象时，连续的使用是由关于消费者日常生活的知识（或者，至少被想象成知识的东西）构成的。的确，如果仔细解读当代广告，就会发现它们不断并且狡黠地利用各种问题。从心理学和大众传媒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正是“当代妇女”典型的两难处境，她们都经受着相互冲突的角色要求和时间方面的压力。“控制”——这个单词很少会在商业性背景中出现——已经成为广告中常用的比喻，用来宣传像睫毛油（“完美的眼线笔。让你掌控局面。这种转变你不喜欢吗？）和猫盒子防臭剂（“控制。我要努力得

到它。我的猫已经具备了”）这样全无联系的产品。“感觉柔软的笔尖可以让你完全控制你的线条”（图 8）。当你漫不经心地浏览这



图 8 这是一则美国著名化妆品牌美宝莲的眼线笔广告

则广告时，你完全可能将“线条”读成“生活”*，而这显然是这类广告的弦外之音。“征服”这个单词在化妆品和护发品广告中也经常使用：“用新式的、可随意变化的烫发征服你的卷发。”这些广告中的用语与面向男性消费者广告中的“征服”与“控制”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后者传递的信息几乎总是征服和控制他人，而不是自我：“如今在曼哈顿获得权势比任何时候都容易”（一家曼哈顿健康俱乐部的广告），又如“不要只当陪衬，要统治”（一则速比涛网球鞋的广告）。

广告商们还意识到妇女生活失控更为具体的表现，其中就包括证据充足的饮食失调问题；他们常常把对食物的迷恋融入到商品广告用语中。无糖吉露果子冻布丁的广告就利用妇女的饮食问题，掩盖问题背后的黑暗现实，是一种典型的商业策略（当然，广告商自己会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在“我的舌尖”广告（图 9）中，那个有强迫症倾向的食者，其困惑被描绘得相当精确，从而确保有这种问题的人会产生共鸣：“如果我没在吃甜点，那我就在谈论它。如果我没有谈论它，那我就是在品尝。而且我总是会想到这些甜点……它总是在我脑子里转悠。”

不过，这种想法属于那些苗条、自信，而且——最重要的是——丝毫不消沉的女人，对于自己持久的饥饿感，她们乐观、坦然和包容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大多数出于强迫而饮食的妇女。“暴饮暴食的背后，”吉宁·罗思写道，“深奥而黑暗。处于核心的是……丧失、不足，以及一种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感觉。”[④]一位学生描述她的饥饿感就像“一个黑洞，我不得不填满它”。相比之下，

---

* 英文 line 和 life 的形式比较接近。——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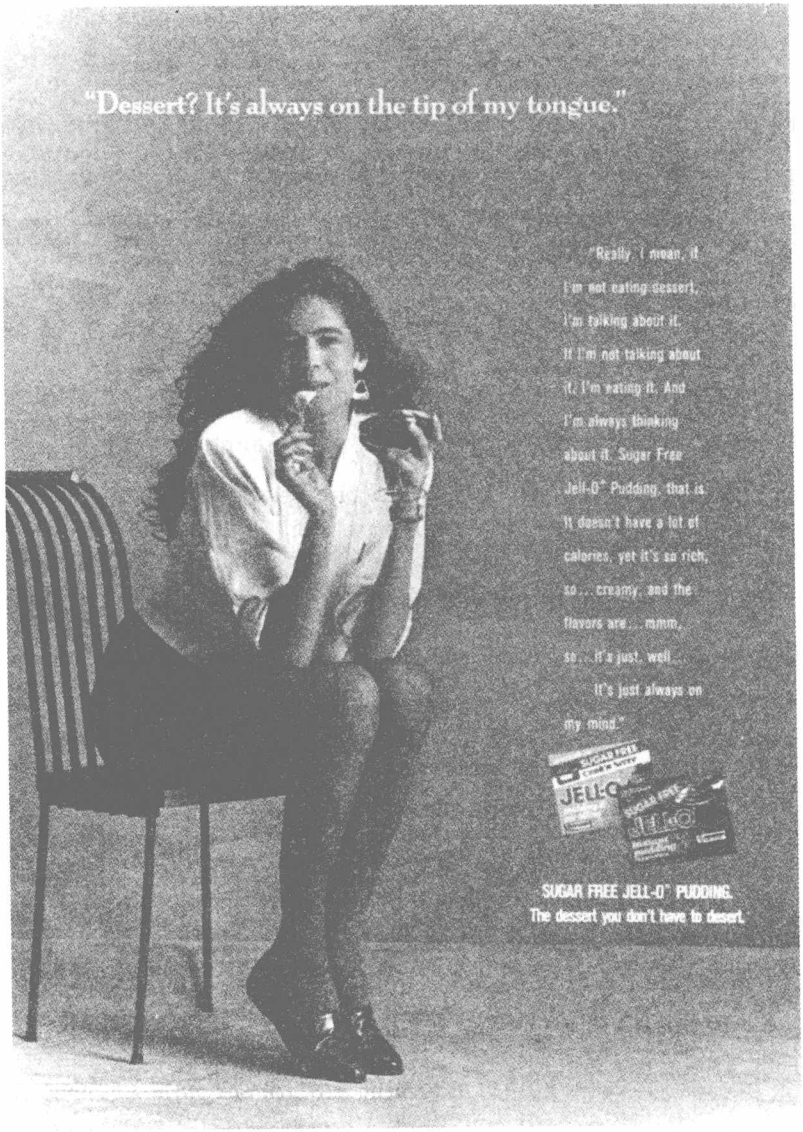


图 9 这是一则吉露牌果冻布丁的广告，广告语是“甜点？它总是在我的舌尖”。

无糖吉露果子冻布丁广告所表现的精神状态非常像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少年所具有的状态；不断感到饥饿被表现为一种正常的状态，虽然有些可笑，偶尔还会令人烦恼，但不会造成肉体和情感方面灾

难性的后果。

在当代广告中，广告商的策略之一就是塑造一个男性形象，表明强迫性饮食是“自然的”，甚至是可爱的。男人就应该有个好胃口，甚至贪吃也是正常的。本能而豪爽地吃东西是有男人味的标志，而且，男子气也是推销大分量产品时经常使用的广告暗示：“男人三明治”(Manwich)、“饥饿男人的晚餐”(Hungery Man Dinners)、“男人驯化者”(Manhandler)。甚至当男人为减肥食品做广告时(他们更加频繁地推出这类广告，因为对男性完美外形的要求和对女性的要求一样正在日益加强)，他们也吹嘘自己的胃口。例如，在汤米·拉索达*为“苗条快”减肥饮料所做的广告中，三个健壮的足球运动员(他们个个无可非议都充满阳刚之气)宣称，如果“苗条快”减肥饮料能够满足**他们的**食欲，那么它一定可以满足任何人的胃。在广告中用男性替换女性(这种替换发生在销售对象实际上是女性时)，这样可以消除各种顾虑，如害怕上瘾，担心危险，感到不快，而将强迫性饮食(或总是想着食物)建构为一种具有“自然”倾向的良性嗜好。看看图10中的广告内容：一名男子纵身跃入哈根达斯牌巧克力冰淇淋中，享受“尽情尽享，尽善尽美”的快乐。

高度兴奋、强度、爱情、震颤：习惯在食物中寻找这些感觉的是女人，而且她们很有可能因为与食物之间的关系而不知所措，发现食物不仅危险，而且恐惧(特别是那些味浓、易使人发胖，有镇定作用的食物，如冰淇淋)。哈根达斯的经销商知道这一点；他们意识到在妇女中普遍存在的强迫性饮食和暴饮暴食具有高度的公开

---

* 汤米·拉索达：前美国洛杉矶道奇棒球队经理，曾率美国棒球队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夺冠。——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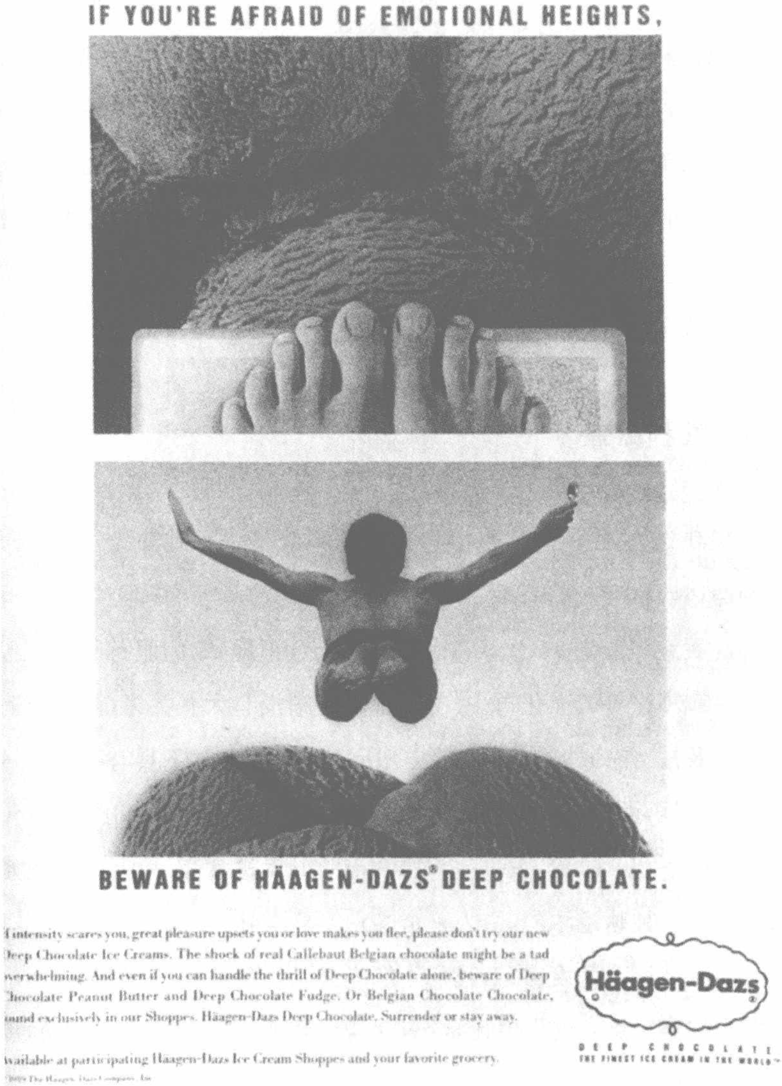


图 10 这是一则哈根达斯牌冰淇淋的广告，刻画了一位男子纵身跳入冰淇淋的形象。

性。的确，这则广告以巧妙的精确性发掘出某些关联性，而它们正好能引起那些带着深切情感去吃东西的人的共鸣。那么，为什么

要塑造一个男性跳水者的形象呢？正如我所论证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替换是必需的，它可以确保女人饮食问题的严酷现状仍然不受人关注；毕竟，广告的目的是推销冰淇淋，而不是提醒人们食物对妇女而言实际上会有多么危险。不仅如此，广告商也许会认为，女人可能乐意看到面对冰淇淋的诱惑，男人被描绘成心醉神迷的俘虏，这其中也包含着一层隐喻，即许多女人都渴望她们的丈夫和情人成为情感的俘虏。

食物、性和欲望

但我认为，在这些广告中起作用的不仅是一种纯粹为了获取最大利益，具有中性意识形态的美国广告业精神。它们还应当被视为一种性属意识形态——即(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专门服务于性属差异和性属不平等的文化再生产，与市场营销没有太多关系(虽然有时也会涉及)。作为性属意识形态，我所谈论的广告并不具有特别显著的当代特征，而是一种毫无新意的再现传统的延续，可以证明这种传统始于维多利亚时代。在那个时代，描绘妇女进食是一种禁忌，当她们在感官上被味道浓烈、令人兴奋的食物征服时尤其如此。⑤

若要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不妨先尝试想象这样一则广告，一位有魅力的年轻女人处于沉迷状态，就像宝氏麦片广告(图 11)中的那个男人一样随意而又色迷迷。这种形象不符合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期待，在许多人看来是恶心和有违传统的。当女性被明确描绘成对食物有感官上的贪欲时(这种情况在商业广告中几乎没有，即便在小说和电影中也只是偶尔出现)，她们对食物的渴望完全是她们性欲的隐喻。比如，在影片《汤姆·琼斯》(*Tom Jones*)和《闪电舞》

(*Flashdance*)的就餐场景中，女主人公进食时表现出的狂喜起到性交前戏的作用，预示着稍后在床上的放纵。女人只有在怀孕，或者明显快要饿死时才可以放纵一下食欲——例如，在影片《麦凯布和米勒夫人》(*Mc Cabe and Mrs. Miller*)中，由朱莉·克里斯蒂扮演的米勒夫人在麦凯布惊异的目光下，狼吞虎咽地吃了六个鸡蛋和一碗炖牛肉。颇有意味的是，这一场景的作用在于表现米勒夫人的“男子气”；影片暗示，如此吃东西的女人不可轻视，应当认真对待。



图 11 这是一则美国宝氏水果纤维麦片的广告。这种广告很容易引起消费者的食欲。

在表现男性食者时，隐喻的情况实际上被颠倒过来。虽然贪食偶尔也可能暗示男人的性欲（如在《汤姆·琼斯》中），但我们常常会

发现性欲是一种象征饮食快乐的隐喻。在表现男性食者的商业广告中，面对撒了厚厚一层糖霜、口感甚佳的餐后甜点，男人欣喜若狂。他们完全失控的状态不仅是适当的，甚至被看作是可爱的；随后，韵律简单的背景语言厚颜无耻地响起，声音性感，充满欲望：

> 我一整天都在想着你（对着“皮尔斯伯里”蛋糕低声吟唱）。我已经爱上了你。
>
> 你就是我的唯一，我的奶油极品（“贝蒂妙厨”糕饼糖霜）。
>
> 你让我飘飘然，我无法拒绝，你令我窒息（“贝蒂妙厨”糕饼糖霜）。
>
> 你的巧克力小方饼令我狂热、你的蛋糕又让我直打冷颤（各种品种的“贝蒂妙厨”调制食品）。
>
> 你的巧克力让我无法抗拒。我几近疯狂，完全失控了（各种品种的“贝蒂妙厨”调制食品）。
>
> 情况不妙了，我应该知道的，因为我身体的每一处*都渴望拥有它（“皮尔斯伯里”脆皮土豆）。
>
> 我难以自禁。这可是邓肯·辛尼斯（什锦蛋糕），不是别人。

在这些广告中，食物被建构成欲望的性对象，饮食被证明不仅仅是纯粹的营养摄取过程。更确切地说，食物**应该**可以提供感官快乐和援助——不是作为其他什么东西的隐喻，而是因为其本身就是一种情欲经历。女人只能在适量的食物中获得这类满足感。在另一个吉露系列减肥食品广告中，饮食在隐喻的层面上被性化：

---

* 原文是：I crave it from my head right down to my potato. 英语俚语中的 potato 表示趾头戳破的袜子洞，所以这个词有一语双关的意思。

“我是不会拒绝的那种女孩，我一定要吃甜点，”广告中那个衣着天真无邪但坐姿颇具挑逗性的模特（图 12）承认道。虽然这则广告



图 12　这是一则吉露牌减肥食品的广告，广告中的模特眼神、坐姿都具有挑逗性。

中的饮食行为具有温和的性暗示，但它同时也是较为克制的。她可以“在说‘行’的时感觉良好”——但要非常端庄，并且面对的是无害的低卡路里产品。超越了这些界限就会有炫耀之嫌，像一种“欺骗”行为。(图 13)女人可能受到鼓励(就像那个站在高高的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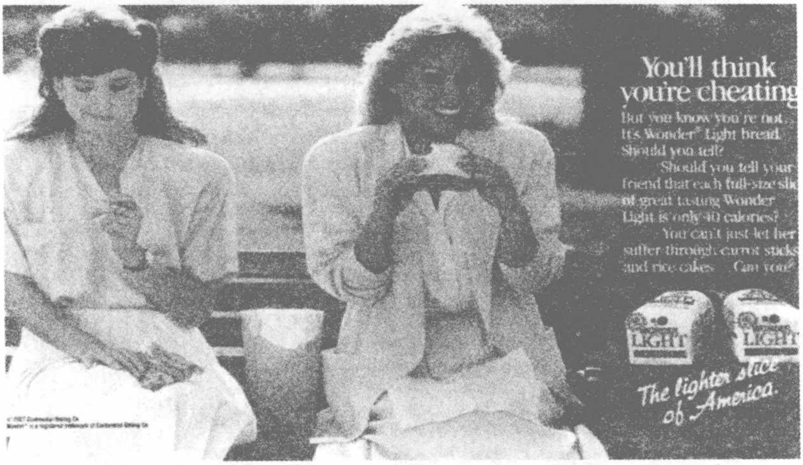


图 13　这是一则减肥食品的广告，广告语是：“你可能会认为你在骗人，但实际上不是。”很明显，这是为了宣传这种产品的减肥效果。

根达斯跳板上的男人)“纵身一跃”——但不是跃入危险的哈根达斯巧克力冰淇淋的池子，而是进入减肥中心的意大利扁面条，尝一尝其中“令人精神振奋的汤汁”。(图 14)这则广告以职业女性为消费对象(“如果你想从日常工作中重新振作起来，这就是你需要的”)，它还唤起了让人联想到水的隐喻，以此唤起女性的独立和解放形象。(“在兴风作浪这点上，难道它不像我们吗？”)

所有这些看起来似乎都特别具有当代特征，总也离不开减肥产品大规模的市场营销。但实际上，同样的隐喻空间，以及相似的禁止女性放纵的实践禁令(因为这些广告不仅旨在推销产品，也在教授适当的举止)，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期性属意识形态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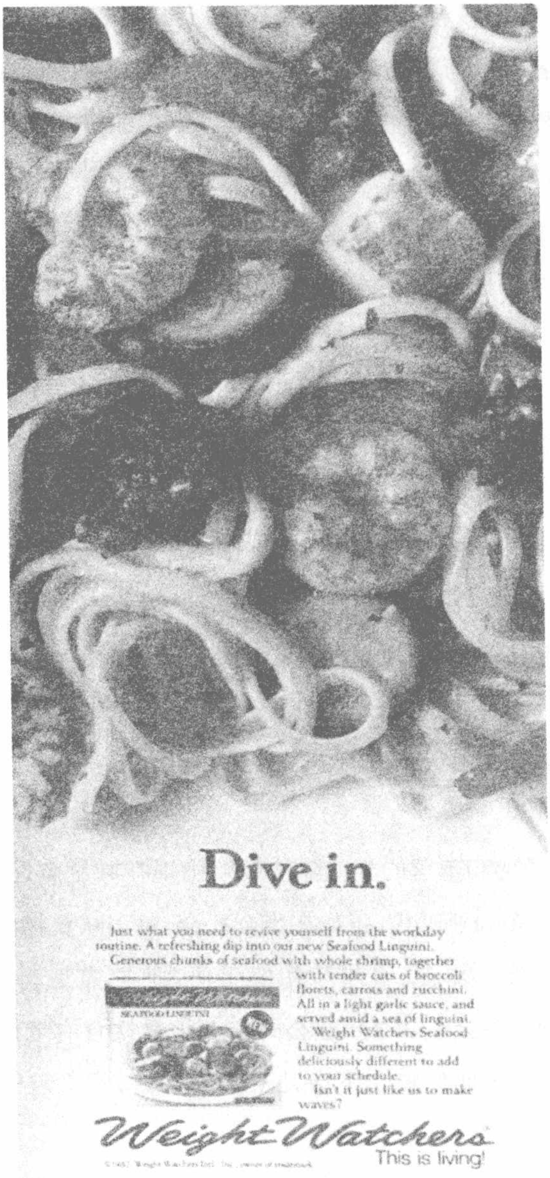


图 14 这是一幅意大利扁面条的宣传画，宣传语是“跃入”，和图 10 表现的男子跃入哈根达斯冰淇淋相呼应。

当然,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不看《大都市》杂志和电视。但他们的确有各种行为指导手册,告诫精英女性放纵和过度刺激的饮食会有怎样的危险,并指导她们如何以女性的方式消费(尽可能地减少浪费,最大限度地防止流露出不体面的贪欲)。《戈迪女士手册》* 提醒女士们就餐时在盘子里盛过多的食物是粗俗的行为;而年轻的姑娘们被告诫“饮食要节俭、朴素”。[6] 详细的专业词汇对不同食物——引起性欲和让人冷淡——的效果进行了比较,而且为男女两性开出了专门的处方。[7] 对潜在越界行为的描述中弥漫着关于性的隐喻:

> 每一次奢侈的饭菜都是一种诱惑,若想经得起诱惑,就需要坚定的原则和开明的头脑……没有什么能比盛宴上的佳肴更能引起食欲;随着胃里的食物越来越多,对食物的自然欲求逐渐减少,只有更加美味的菜肴才能满足味觉的需要,直至被诱入没有节制的暴食。[8]

如今,表现诱惑和堕落的类似隐喻频繁出现在减肥食品的广告中。(图 15)在维多利亚时代,正如在当今社会,对美味食物的禁戒常常导致私下的暴饮暴食。《芭莎礼仪手册》把它描写为“秘密午餐会”,在这种午餐会上,“平日在公开宴席上最饮食有度的人全都狼吞虎咽起来……他们能吃下十几个奶油馅饼,吞下若干磅的焦糖和巧克力”[9]。

---

* 《戈迪女士手册》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本女性时尚文化杂志。——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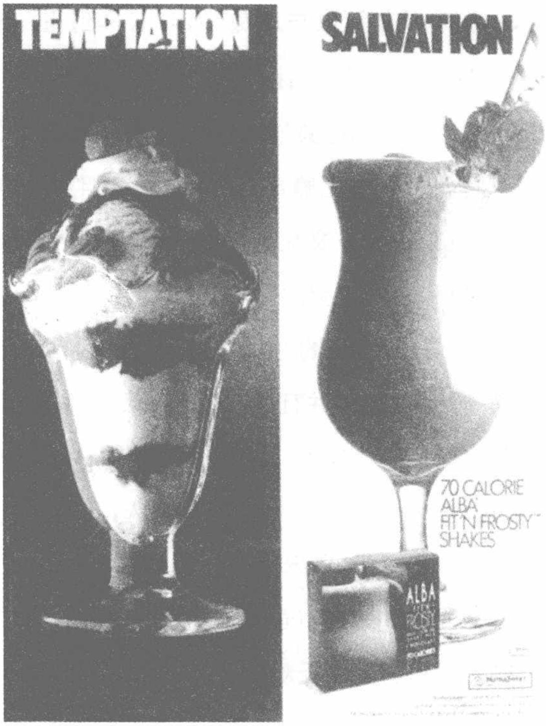


图 15 这是一则冰淇淋的广告。图的上方有两个英文单词，分别表示"诱惑"、"救赎"，是表现"诱惑和堕落"的隐喻。

对女性的食欲和饮食如此严格和高度道德化的种种限制的出现可以说是布拉姆·迪克斯特拉所谓的19世纪"文化意识形态的反击防御"的一部分，对象是"新女性"，防止她挑战普遍的性属约定和这些约定对女人的种种限制。[10]来自多种文化和时代的神学、艺术、辨术和科学话语表明，作为象征不受约束的女性力量和欲望的文化隐喻，女性饥饿具有怎样的效力——从嗜血的卡莉*（在某个版本的描述中，她在吞噬自己的内脏）到《女巫之锤》["为了满足

* 卡莉：印度教女神，形象恐怖，既能造福生灵，也能毁灭生灵。——译者

子宫的嘴巴，(女巫)甚至可以与魔鬼为伴”]，再到霍尔和欧茨当代的摇滚乐歌词：“啊，她来了，伙计们要小心啊，别让她毁了你们。”[11]

在《汤姆·琼斯》和《闪电舞》中，从几个颇具吸引力的女性角色身上，观众可以看到饥饿被比喻成女性的性欲；但更普遍的情况是，作为性欲的女性饥饿在西方文化中是通过厌女的形象来展现的，这些形象充满了恐惧和怨恨，没有温情和赞美。在食人者的形象中，贪食女人的隐喻揭示了它深层的心理基础。饮食并不是性行为的象征；实际上，当一个女人想要并且引起性行为的时候，性行为本身就被想象成一种饮食过程，是吸收并毁灭欲望客体的行为。因此，女人的性欲必须被控制，因为她们有可能耗尽男人的肉体和灵魂。正如迪克斯特拉所证明的，这种意象大量出现在19世纪末的西方艺术中。可以说，同样的文化反应(虽然形式不同)也出现在当今社会中——比如，各类通俗影片的受欢迎度越来越高，它们惩罚女人的性欲和独立，表现方式包括：强奸和肢解(正如我们在大量凶杀影片中所看到的)，失去家庭和孩子(《好母亲》)，疯狂和死亡(《致命诱惑》和《无罪推定》)，以及当众羞辱(《危险关系》)。

当然，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饮食的禁戒不仅仅关系到性属意识形态。或者更恰当地说，性属意识形态还包含了其他的范畴。“女性特质”的建构不仅具有重要的道德和性方面的内涵(如表示性被动、胆怯、纯洁、天真的女性特质)，而且涉及阶级性。在那个时代，根据占主导地位的身体象征性，身体虚弱和缺乏食欲不仅意味着精神上超脱肉欲，还象征着在社会层面上超越靠苦力谋生的“经济学”身体。就像在今天一样，保持贵族式的冷淡，不关心物质生存在当时也是相当时尚的做法。饥饿的资产阶级希望像贵族一样，表现出对物质欲求的超越，但物质恰恰制约着他们的生活。因

此，最佳方式就是拥有一个身段轻飘的妻子，以时尚的方式表达他的贵族品味。如果他自己不是贵族出身或是无法娶一个拥有贵族血统的女人，那么他可以拥有一个看起来像贵族的妻子，她恬淡的气质和挑剔的胃口表明她不属于生活艰难的"大众阶层"。[12]

女人准备，男人吃

此处隐喻上的二元论，无论它的阶级内涵是什么，预设了一种理想化的（而且很少实现过的）性属化劳动分工，即男人在公众领域里奋斗、竞争、大展身手，而女人则像蚕茧一般待在家里（一个被浪漫化和神秘化为平静、悠闲的场所，暗示着超越不断劳作的资产阶级身体）。为了让这种劳动分工看上去合情合理，我们发现另外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工业化社会中，这种基础也许是最重要的）也在起作用，从文化上遏制女性食欲：即认为女人在满足和滋养别人而不是为她们自己时最有成就感这种观点。当然，作为一种实际行为，早在"家"被看作是女人专有的活动场所之前，女人就负责为别人做饭了。卡罗琳·拜纳姆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给别人做饭在欧洲中世纪就已经被固化为女性的活动。[13]不过直到进入工业时代，当家庭被理想化为给男人和孩子提供养分和舒适生活的场所时，为别人做饭才具有它今天所具备的情感色彩。

"母亲颂"的专栏作家巴德·奎因把母亲界定成"这样的人，当她们看到五个人准备吃四块馅饼时，马上说自己从来不喜欢吃这种东西"。[14]否定自我和为别人服务无望地交织在对理想母亲的建构中，就像它们交织在 19 世纪理想妻子的形象中一样，"她饥肠辘辘地站在……她丈夫的身边，而他四肢放松，狼吞虎咽地吃着她用

心准备的美食；她耐心而又无言地等待着他迟来的许可，然后以最卑微的感激之情，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他不屑的残羹剩饭吃下肚”[15]。然而，“女人中的佼楚”（查尔斯·巴特勒这样称她）却不认为这是一种自我牺牲，因为正是在照顾和服务他人的过程中，女人才感受到了一种适合她的欲望形式：伊莱亚斯·卡内蒂简洁地归纳道：“为别人做饭是她的激情所在。”[16]

十几年前，约翰·伯杰尖锐地总结了在他看来在艺术史和当代广告业中控制性属差别再现的基本原则：“男人行动，女人表现。”[17]今天，这种对立似乎不再像以住那么绝对（对女性的描述的确越来越客观，但在形象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环境下，男人同样如此）。但如果这种二元论不再适用，其他二元论的复苏反而更具教育意义。让我用一个显然更能经得起考验的定律替代伯杰的：“女人准备，男人吃。”这种劳动分工在1991年如在1891年一样是约定俗成的，至少在通俗再现的领域是这样的。尽管无论年龄和阶级，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到“公共”领域中，但在意识形态层面她作为养育者的“私人”角色仍然没有改变。

毫无疑问，这其中的一些再现形式是我们之前就有的——例如，富态而慷慨的妈妈们和祖母们象征性地准备了如此丰富的食物：杰迈玛大婶、史密斯夫人、保罗夫人、布朗奶奶。* 然而，我们文化中强烈的怀旧情绪并不能帮助我们摆脱困境。20世纪90年代初（而且这种现象似乎比五年前更加明显），各种通俗再现几乎从未把一个男人准备食物表现成日常行为，常规性、不计报酬地为别人服务。偶尔，男人会以为别人准备食物的形象示人——作为男

---

* 这些都是美国商业广告中的虚构形象，并非真实人物。——译者

管家和男性侍者。男人也许会在营火中烤各种食物，烧烤肉类，为一次特别的聚餐准备色拉，或是在准备速溶咖啡（这通常发生在度假木屋或度假游艇上）。但所有这些行为都是非常规性的，而且各类广告还常常强调它们不同寻常的特性。在一则商业广告中，一个男人正准备为他尚未起床的妻子冲一杯速溶咖啡，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这很麻烦吗？”他问道。“每天的早餐可都是她准备的。”在另一则广告中，一个男人正在为他的儿子准备薄煎饼早餐。（图 16）广告中的黑体粗字写着：“我的薄煎饼散发着屋仔糖胶浓郁



图 16　这是一则糖浆的广告。一位父亲正在为儿子准备早餐。

的槭糖味”,暗示着(“我的薄煎饼”)男性所有权和厨房里轻松的气氛。父亲亲切地为儿子准备早餐,这种视觉形象无疑破坏了(种族和性属方面)固定的文化模式。但广告下方较小的铅体字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与儿子相处的“特殊时刻”。于是,被破坏的形象又立刻回复到那个我们熟悉的形象:就像老爸秘密的烧烤调味汁食谱,这则广告中父亲的薄煎饼只是在特殊场合才会出现。或者,让这种情况成为一个意味深长、亲密无间的分享时刻的是父亲在做饭这个事实。(设想一下,如果广告中出现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女人,那么“特殊时刻”这句话看起来是不是有些奇怪呢?)

在描绘男人准备食物的再现中,经常存在一个明显缺席的妻子或母亲(比如,她可能此时正在医院生孩子),她被暗示在通常情况下每天负责准备食物。即便男人或男孩子们已经习惯了广告中的方便食品,母亲往往还会将专门的食用方法告诉他们。在“遗产”系列吉露果子冻广告中(图 17),缺席的母亲形象(不清楚是母亲还是祖母)出现在大图右上角的小插图中,大图描绘了一位大学里的青年,捧着若干吉露果子冻快餐。颇有意味的是(虽然有些荒唐无稽),她从混合调料中准备即食布丁,而不只是打开一份已经准备好的布丁快餐,为此,她和提供“坚实的基础”之间有了联系。一位祖母正在准备真正“从头做起的”布丁,这种怀旧形象当然不会出现在吉露果子冻广告中,因为它会让人们怀念过去,那时女人不依赖这些广告推销的产品。不过,就这则广告中隐含的对立关系而言,即食布丁也无大碍,因为与轻轻揭开布丁快餐盒的盖子比较起来,准备即食布丁也算不容易了。因此这种事情属于女人。人们几乎从来不会看到男人在烹调上花费太多的时间。真正的咖啡总是女人准备的,需要相当时间才能做好的糕点和菜肴也不例



图 17 这是一则吉露果冻的广告，由两部分组成。大图里，两位貌似父子的男性坐在一起，手捧若干果冻快餐；一位女性出现在右上方的小图中，暗示着母亲形象的缺失。

外。当广告展示男人准备一桌精致菜肴时，通常还会有一两个雅皮士参与其中，这样，一种日常的服务变成了一次欢乐的"老友聚会"。但即便是这样的展现也极为罕见。在《三十而立》(*Thirtysomething*)* 中，在霍普和迈克尔举行的大部分晚宴聚会上，男人从未在厨房出现过，除非是去偷吃一点霍普、南希和梅利莎准备好的食物。

食物与爱

1992 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初期，记者们不断纠缠希拉里·克林顿，问她关于职业追求的问题，于是她用挖苦的语气回击道："好

---

* 《三十而立》是美国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一群二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在 30 岁时的故事。——译者

吧，我觉得我本该待在家里，烤烤饼干，喝喝茶……”听众们从来没听到她这番话的结尾（或是前面的提问）；“饼干和茶”的采访原声成了这次竞选中性属越界（gender-transgression）的例证，被反复播放，并被对手利用，作为证据，证明希拉里狂热的女性主义倾向和对传统母性价值的蔑视。为了恰当地反驳这种解读，希拉里·克林顿亲手制作她最喜欢的燕麦巧克力饼干食谱，证明自己的确具有女性气质。芭芭拉·布什显然感觉受到严峻挑战，于是用实物回应，拿出一套营养更加丰富的，纤维含量更低的食谱。全国的报纸提醒读者做好准备，投票选出哪个第一夫人的饼干做得更好。

全国都在讨论希拉里·克林顿能否胜任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此过程中，饼干竟成了一种象征和争论的中心，这不足为奇。在我们的文化中，食物始终等同于母亲和妻子的爱。几乎在所有表现男人吃东西的广告中——例如那则蛋糕广告，前面引用过其中具有性暗示的广告语——女人（无论是看得见的，还是暗示的）总在背后，准备好食物（在“贝蒂妙厨，你甜蜜的对话者”系列中有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拥有一双女人的巧手，提供蛋糕，另一个是贝蒂妙厨本人，所有激情的吟唱——“你的巧克力让我无法抗拒。我几近疯狂，完全失控了”——都是唱给她的）。最值得注意的是，背景中的女人总是通过提供食物来表达她的爱意和关切：“什么都不能像烤箱里的食物那样传达爱意”；“让我品尝那棒极了的爱的味道”；“什么都无法像雀巢巧克力酥饼那样说出：‘饼干，我爱你’。”在这些广告中，男性饮食总是与女性爱的付出结合在一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自我放弃。实际上，这表明女人借助传统方法（口味与好心情），或者以关注健康的方式，在为别人提供食物的时候得到满足：

她的声音(画外音):他就像一个小男孩——通常表情严肃,而当他蘸着黄油吃英式松饼的时候(镜头中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脸,带着孩子般愉快的表情),看他吃东西简直是一种享受。一点黄油带来许多快乐。

他:你在做什么?

她:我在聆听你的心声。

他:它说什么?

她:它说它很高兴,因为你开始慢跑,而且饮食比以往更健康了。我正给我们俩准备新的"承诺"人造黄油,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吃低胆固醇食品对你和你的心脏有好处。

他:还有什么对我有好处?

她:是什么?

他:是你。

她微笑着,紧紧地依偎在他怀里。

我要强调,我的分析不是为了说明关心他人的身心健康有何不妥,这种"母亲的"工作虽然被理想化和神圣化,但整个社会还是令人反感地低估它的价值。我也不想反驳这些广告中的论点,认为这种角色就是女人的负担。因为这对许多女人的个人经历而言是不真实的,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经历。我至今仍记得,当我母亲看到她拿手的夹心卷心菜被我父亲,我的姐妹们,以及我自己狼吞虎咽,一扫而光时,她的快乐与骄傲,尽管生活的其他方面不尽如人意,让她感到焦虑。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喜欢看她卷起每一片卷心菜叶子,包住适量的肉馅,她技术娴熟,包裹肉馅时,软嫩的卷心菜叶子根本不会破裂。这样的时刻让我感觉很安

全、很踏实，是我从来不曾有过的感觉。当我让她教我做这道菜时，她面露悦色，而当她准备把原料的分量和操作细则整理成正式的食谱，我要把它们都记下来时，她就显得非常激动了(直到那时，这样的菜都是由母亲们现场示范传授给女儿们的，我母亲认为把操作过程记下来，表明我十分重视这件事情)。当我发现自己终日忙于写作、教学、旅行，没有时间和精力为我心爱的人准备特别的饭菜时，再回想我生命中的这段时光，就会感到自我深层的一部分被剥夺、被压抑。

有些群体被迫为别人的家庭服务，被系统地剥夺了照顾他们自己家庭的自由，我不希望自己的评论被理解成抹煞了他们的集体和历史经历。贝尔·胡克斯曾指出，黑人妇女为治愈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贫穷造成的深重伤害，创造了“家乡”，和脆弱的、来之不易的“照料与抚育的空间”，这种创造与其说是服从专制的性属准则，不如说是建构了一种“文化抗拒的场所”。[13] 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遗产”系列吉露果子冻广告比我分析得要复杂得多。这则广告是更为广泛的通用食品系列的一部分，以美国黑人为销售对象，旨在宣传美国具有黑人历史的大学，因此，它把母亲形象与“坚实的基础”联系起来，远不只是为了唤起对母亲传统烹饪的怀念。在这则广告中，与母亲形象连在一起的是一份黑人的“遗产”，以及对这种文化的保护和交流。

胡克斯敦促当代的黑人文化尊重黑人妇女为家庭和社区服务的历史，但同时又警告人们不要在思想意识上把这样的服务看作是女人天生的职责(尽管我做饭时是开心的，想到我所应该扮演的角色时也无异议，但对它我还是深恶痛绝)。这正是在我一直分析的各种再现中得到强化的意识，这些再现没有把男人刻画成可以

“自然地”履行这种职责，也——更加有害的是——没有把女人描绘成合适的接受这种照料的人。我们偶尔才会在广告中看到小姑娘被喂养；通常情况下，广告表现她们（从来不是小男孩）学习如何为别人准备食物。（图18）照顾别人的行为就是这样被再现性地



图18 这是一则广告的宣传画，图中一位女孩正在为比她小的女孩准备食物。

“复制”，成为女性特有和专属的行为。通用食品系列并不包括表现女学生在大学里发现她们的黑人传统（或是学习如何依赖方便食品！）的广告，这一点很有意义，也令人不安。也许这些系列广告就是一种蓄意的行为，它们在利用当代人的观点，即“黑人男子的危机”源自黑人妇女的错误，并把自己的产品与一个虚构的世界划等号，在这个世界中，黑人男性的机遇与“自然的”、前女性主义的性属关系形影不离。它们暗示，黑人男子肯定会进入大学深造，只要女人站在他们背后，支持并鼓励他们，而不是同他们竞争，暗中搞破坏。

女人—食物—男人这种结构无处不在，食物表达了女人对男人

的爱，同时也满足了女人给予爱的渴望，这种结构让男性饥饿感完全从社会上与异性恋家庭和爱情关系的网络融为一体。男人可以在吃东西的同时被爱；的确，他们得到爱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从女人那里获得食物。相比之下，对女人而言（几乎从来没有广告表现过别人为女人做饭），吃东西——私下里，自己准备食物——被描绘成人类爱情的替代物。在“谁说你不能靠爱情活下去?”这则广告中（图 19），减肥中心显然扮演了这种角色。在另外的广告中，它把低卡路里的意大利面条调叶汁说成是“一位朋友”。健怡可口可乐强调要保持性感，坚持认为“最佳的关系有时完全像气泡一样飘忽不定”。清淡的卡夫奇妙酱把自己宣传为“点燃你激情的火花”。*

请注意，这些广告中没有提供食物，并真正给予“爱”的那个伙伴，无论是看得见的还是隐含的。在许多广告中——实际上这是一种类型——伙伴的缺席明显成为一种主题，是广告叙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一则广告中，一个女人正躺在床上接电话，为了能晚上单独在家品尝冰淇淋夹心糖，她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约会：“阁下大人吗？今晚不行！”“就职典礼？明年再说吧！”在另一则广告中，一个女人承认她花大量时间独自品尝她“最新的迷恋物”，一种巧克力饮料，因为这种饮料给予她“堕入爱河般的感觉”，而且能够“在（她）需要时随时满足她内心深处的渴望”。她请求我们这些观众别把这些告诉她的男朋友迈克尔。

这些广告命中了女人们的痛觉神经。夹心糖广告看起来也许有些可笑，但巧克力饮料广告开始朦胧而又令人不安地让人想到妇女饮食问题的心理和物质现实。对“迷恋物”和“内心深处的渴

---

* 清淡卡夫奇妙酱的英文名是 Miracle Whip Light，light 又有火花之意，这是广告中常见的一语双关现象。——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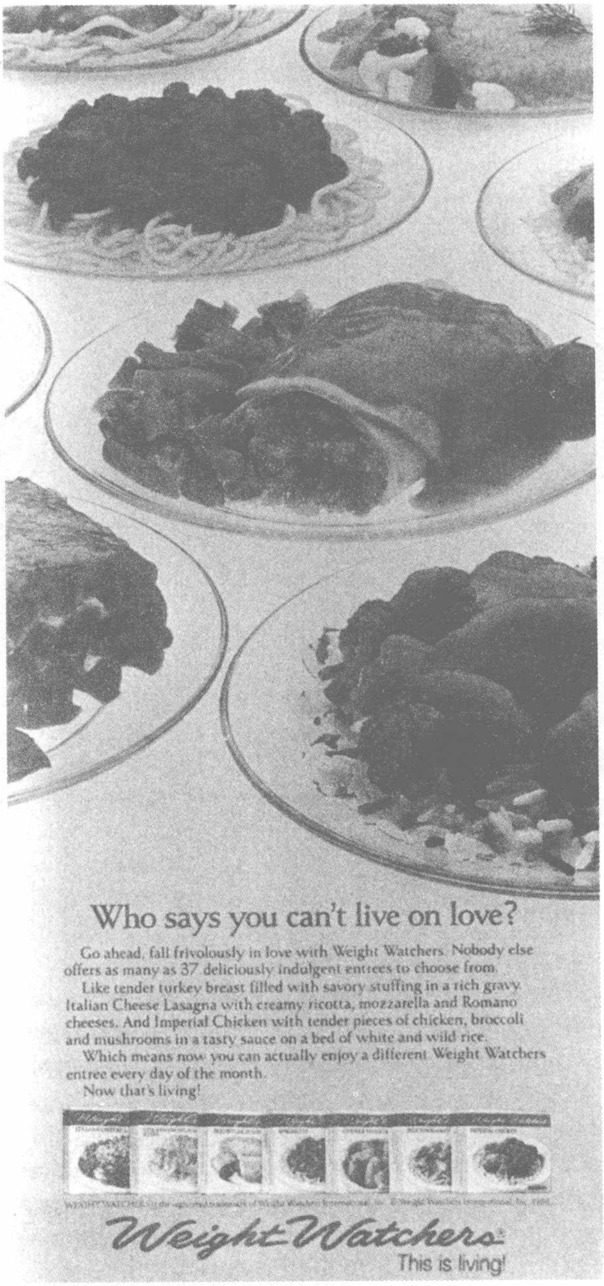


图 19 这是减肥中心宣传减肥食品的广告。

望”的表白，偷偷摸摸，保守秘密，靠食物来满足情感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是暴饮暴食行为的重要成分。Frusen Gladjé 冰淇淋展示了另外一种广告，揭穿了其他更为活泼的广告的虚假性（图20）：“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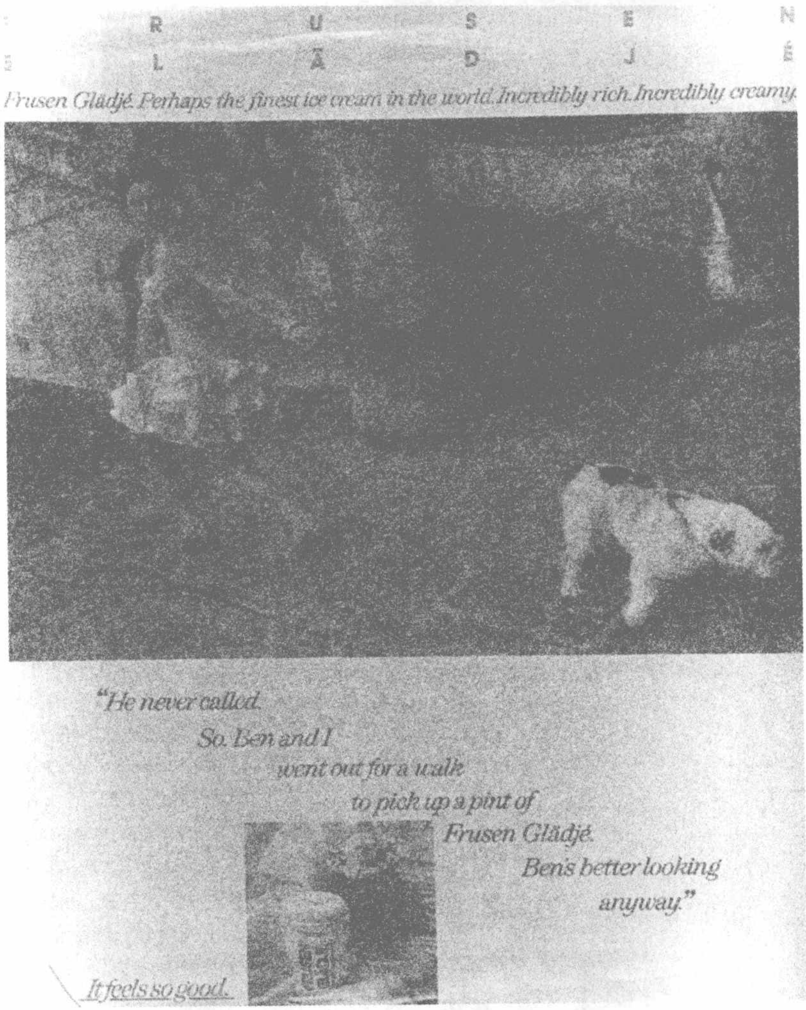


图 20 这是一则宣传冰淇淋的广告。一位女子正欲和自己的宠物狗外出，去买冰淇淋。

从不给我打电话。所以本和我出门散散步，买一品脱 Frusen Gladjé 冰淇淋。反正本的样子更好看。”Frusen Gladjé：“感觉好极啦。”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哈根达斯广告，这里也强调了冰淇淋给予的感官享受；但和哈根达斯广告不同，Frusen Gladjé 从情感的深层，而不是借助一时的高度兴奋感给人提供慰藉。实际上，这就是普遍存在的性属现实。对女人而言，自己准备食物时获得的情感安慰很难带来快乐和独立，而是失望、空虚、孤独和绝望。正如一个女人所说的，食物是“唯一能够照顾好我的东西”。

作为越界表现的食物

男性贪食症患者有一点是非常有趣的，那就是他们很少独自暴饮暴食。他们通常在正餐时间和公共场所狂饮作乐，但女人通常在正餐时间几乎不怎么吃，而在私下里狼吞虎咽。[21] 甚至在我们的失调症中(或者也许我们的失调症尤其如此)，我们依然遵循着性属规则。在我前面分析的广告中，女性饮食实际上总是被描绘成隐秘的、躲躲闪闪的，甚至是不正当的。女人对丈夫、家庭和朋友行窃，然后躲在某个隐密的角落里，和她的食物独处。门上悬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一个女人坐在屋里咀嚼着她的“紫色激情”，纽约德利薯片。丈夫回到家中，发现他不在家的时侯，妻子坐在地板上吃光了所有的 Frusen Gladjé 冰淇淋。她的声音虽然温柔，但带有一丝挑衅的味道——“我吃了所有的 Frusen Gladjé”——不过她的神情羞怯，目光躲闪。男人公开宣称他们极度渴望“贝蒂妙厨”蛋糕；女人的渴望则是龌龊、可耻的秘密，只能在没有他人在场时才可以拥有。

然而，女人往往私底下也不能奢侈地放纵一下，完全消除她们的饥饿感。最常见的是，广告利用女人来推销独立包装的、一口就可以吃掉的小糖果，如“安第斯”糖果、“好时”巧克力、“樱桃”巧克力，而不会让她们宣传冰淇淋和薯片(吃这些食物容易上瘾)。表现男性食者的广告中，蛋糕成堆，诱人的糖霜不断往外渗，而女人只能品尝“一小勺”糕点，或是“一小块”巧克力。正如在减肥中心的扁面条广告中(“跃入”)，虽然放纵的意思被表现出来，但最终还是遭到产品本身的抑制：“稍稍放纵一下吧，”“安第斯”糖果劝说道。“尝五口美食，满足一下你的暴食欲望吧。”广告经常会强调糖果的体积，和有限的体积所包含的味道：“每一小口都会为你带来咀嚼奶油巧克力的快感。”表现男人的广告强调大同小异的感官享受，而以女人为销售对象的广告词则突出在集中刺激感官，并且有限的经历中获得的细腻的快感。广告传递给女人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稍稍放纵一下吧”(但只能在他人看不见的地方；甚至那些小小的夹心糖也得关上门，躲在门后悄悄地独自品尝)。

如果暗示暴饮暴食的私密是广告的一种类型——拒绝女性希望自我限制和自我约束的欲望；为别人“做饭”，自己却从未享受过别人为自己做饭时的失落感——那么，“一口嚼”糖果广告则把女性饥饿表现为被成功地限制在适当的女性行为的范围内。的确，在所有这些广告中，我们发现女人只是在为别人服务了一整天后才“放纵一下”。在这些广告中，女人只有先满足了别人的食欲后，才能给自己准备食物(如果这种优雅的细嚼慢咽值得描述的话)：

> 为了我的天使，我做了一天的针线活儿。现在我应该得到点表扬。我要用“安第斯”糖果犒劳一下自己。

> 你很有可能要为别人忙一整天。难道你不应该奖赏一下你自己吗？尝一块"樱桃"巧克力吧。（一个女人躺在浴缸里；背景中隐约传来一天当中的各种声音："亲爱的，你找到了我干洗的衣服了吗？""琼斯太太，请你把这封信打出来好吗？""妈妈，我们想去公园玩！"她沉入浴缸，在美妙的期待中剥开了糖果的包装纸。）

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行为指导手册一样，这些广告为引发与食物和饥饿之间的混乱关系提供了一个实际蓝图。把无度的食欲表现为女人不当的行为，把女人吃东西描绘成隐秘、越界的行为，这让限制和拒绝饥饿成为建构女性特质过程中的核心特征，并让补偿性的暴饮暴食实际上成为必然发生的事情。此外，控制食欲不仅是关于食物摄入的问题。确切地说，社会对女性饥饿的控制是一种有效的"规训"（借用福柯的说法），用于训练女性的身体，让它们了解自己的局限和潜能。在关于女性自我约束和克制冲动的教育中，拒绝食物成为重要的微观实践。

人们告诉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在盘子里装满食物是粗俗的举止；1990 年，我的女学生们向我抱怨她们在自助餐厅受到的折磨——在男同学面前吃冰淇淋的让他们感到尴尬，迫于压力仅仅吃一份色拉，或者最好什么都别吃。到了晚上，当她们单独在一起时，她们得面对这种现状所造成的空虚与被剥夺的感觉。正如广告中的情况一样，食物起到了自我补偿和安慰的作用。但问题是，经过一天的自我抑制，如何才能进一步控制一个变得贪婪的自我。不论是为了家人，还是在一个挤满青春期男孩的自助餐厅里得体而优雅地表现出缺乏食欲，大多数女人都把欲望埋藏在心底，因此

根本不会像“安第斯”糖果广告所称的那样吃一口糖果就能获得补偿，不管它包含了多少巧克力般的“快感”。私下里，我们羞愧地，偷偷摸摸地狼吞虎咽。

破坏形象的稳定性？

当我们课堂上讨论当代社会中的各种再现时，我会鼓励学生们举些例子，一些看上与传统的性属二元论，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信息相悖的例子。我的学生们经常把我们对这些“颠覆性”再现的考察视为一种研究，以此来确定有没有取得“进步”。他们非常希望相信已经取得进步，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进步”这个词不足以描述她们所提供的反例的文化状况。相反，它们几乎总是展现出一个复杂的、令人困惑的状况，诸多新的可能性与旧的再现模式交织在一起。它们反映了让旧有二元论和意识形态的持续再生产陷入困境的各种不稳定性，但无法清晰地表明我们在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举个例子，有一则推销可用微波炉烹调的荷美尔儿童套餐的广告，广告开始的时候，两个小姑娘在修一辆自行车。在一边观看的小男孩提出要帮忙，称“我无所不能。我爸爸让我修理他的汽车，我妈妈让我准备晚饭”。当两个小姑娘表示怀疑时（“哦？好吧，证明给我们看看！”），他给她们做了一份荷美尔儿童套餐。他的烹饪技术给两个小姑娘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让她们开始相信他具备机械方面的天赋。于是，她们问道：“你知道怎么修理自行车吗？”“自行车？当然知道！”小男孩热情地回应道。那么，这个广告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呢？小姑娘不会修理她们自己的自行车，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女性的”缺陷。但在这个广告中，两个小姑娘并没有表现得无

助或娇里娇气。恰恰相反，她们对那个小男孩说起话来粗声粗气，并带有挑战性，那个男孩个头比她们小(而且看上去年龄小一些)；当男孩宣称他“无所不能”时，她们不屑地低声说：“饶了我吧！”尽管她们水平有限，但并没有低声下气，因此她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中和了这种行为中的性属含义。她们似乎相信，谁都有可能不会修自行车。我们或许也开始这样认为。

此外，男人为女人烹饪、服务，这也是这则广告中一个不寻常的内容。虽然只需按一下微波炉的控制板，但做这件事的毕竟还是个小男孩。广告中传递出的一个信息也许是，男性可以干传统意义上“女人的”活，而不见得会威胁到他们的男性气质。为一个女人做一顿饭并不意味着第二天清晨她就不再尊敬你了。她还是会把你看作可以修理她自行车的行家(实际上如果你能在“她”所擅长的领域也游刃有余的话，她也许会更加相信这一点)。因此，由于男孩子们各种能力的延伸，女孩子要为她们在某些方面的持续无能(或者至少是无能的显露)付出代价，而且还得依赖男性。但有一段时期，绝大多数职业女性发现她们从事两份全职工作——第二份工作始于下午五点，就是她们下班回家后要为丈夫准备晚饭，把家收拾得既干净又舒适，还得同情地倾听家人的倾诉——为别人做饭和服务尽管在许多方面是成问题和倒退的，但不是“女人气”的表现，这种信息也许是我们在这个时期仅有的，能传递给小男孩的(对女人而言)最有实际益处的信息。

妇女大量涌入职业场所，造成了含糊和不稳定的意象，这对性属的再现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吸引希望被认为(至少在工作中)自己的权力和能力与那些男性同事是不相上下的女性，广告商们尝试在描写或让人想到职业夫妻生活的再现中实现性属间的对

称。因此,名为"猜猜'瞬间'今晚快速准备了什么晚饭?"的"瞬间米饭"广告有两个版本。在一个版本中,父亲下班,儿子放学后,发现母亲在用"瞬间米饭""快速地"做一份爆炒鸡肉。在另一个版本中,一位职业女性下班回家后,发现她的男性伙伴在"快速地"做晚饭。这种搭配让我们意识到它在现实中是多么罕见,但这足以说明它的确具有破坏稳定性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和更为传统的版本不同,第二则广告中没有出现孩子;孩子的缺席暗示这对夫妻属于雅皮士,而这正是它所试图吸引的人群。

哈根达斯最初是雅皮士们的冰淇淋,为了抓住这个市场,它设计 了一系列广告(图21、22)。这些广告准确地说明了当代性属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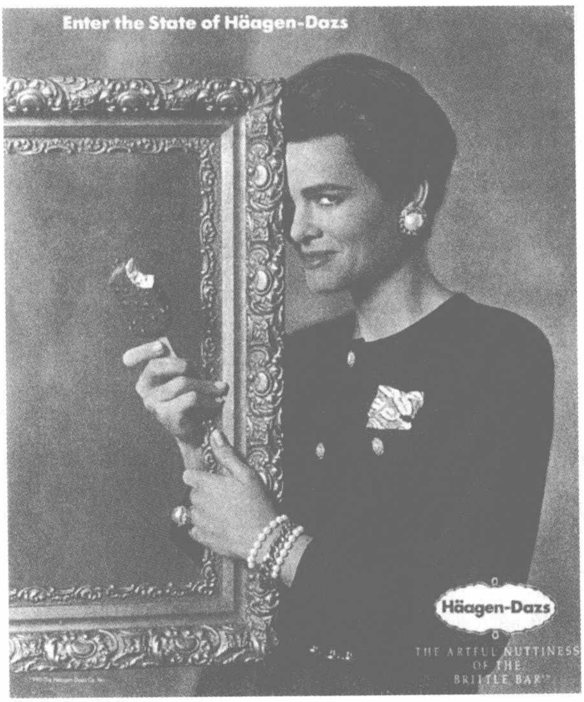


图 21 这是一则哈根达斯的广告,表现了一位女性雅皮士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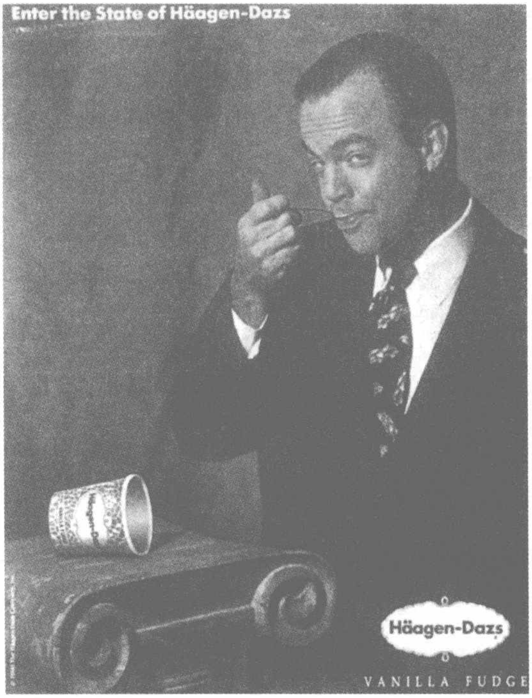


图 22 这是一则哈根达斯的广告，表现了一位男性雅皮士的形象。

告不稳定的定位：他们试图满足在精神层面仍然牢牢控制着西方文化的再现传统，同时还要表现社会脉搏的每一个新的节拍。“进入哈根达斯状态”——这显然是公共领域而非家庭的召唤。广告里男人和女人的着装实际上完全一致（因为性属差异存在细微差别），都穿严肃的黑色套装，象征权力的服装式样。他们的发型也颇为相似，都往后梳，修剪得较短，但不松软。他们的表情接近：有些顽皮，被人发现在吃冰淇淋，但丝毫不觉得羞愧。他们似乎很享受在工作间歇品尝冰淇淋；这凸显了这则广告在表现内容方面引人注意的不一致性，和它的现实性。冰淇淋一直被看作休闲食品，

是用来享受的，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或竞争精神无关。身穿职业套装吃哈根达斯就好像在办公室感受“匆匆的”性爱，既不同寻常又不守规矩。但人人都知道大家的确在休息和午餐时间吃冰淇淋。因此，这个广告看起来既现实，在表现方式上又十分怪异；我们意识到，除了在真实生活中，这些形象是我们之前不曾见过的。当然，女人在现实中的确吃哈根达斯，而且吃得至少和男人一样多。

性属平等和饮食现实主义是为了迎合那些“进步”青年男女的感受力，但这种精心设计的世界还是摆脱不了那种不可避免的差异，即男人与女人如何吃以及分别吃了多少冰淇淋。他：吃了整整一品脱香草巧克力冰淇淋，颇有情调地弄倒一个空纸盒，意犹未尽地吮着手中的勺子。她：极为克制地从一根薄脆冰淇淋上（经过美学处理，具有“精巧的”美味，与他突兀、无修饰的“香草巧克力冰淇淋”形成鲜明对比）咬了一小口（已经吃过了；没有再舔或吮）。不论是无意的复制，还是蓄意的设计，这种差异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心理矛盾、爱憎兼具的预期观众，它来自我们关于性属最牢固、最无异议的深层观念。

第二部分

苗条的身体和具他文化形式

○神经性厌食症——作为文化具体化表现的精神病理学

○身体与女性特质的再造

○解读苗条的身体

1983年，当我准备教授“性属、文化和经验”这门跨学科课程时，我感到有必要谈一个话题，可以让我把女性主义理论生动地呈现给一代好像越来越怀疑女性主义的学生。我的妹妹宾尼·克莱因是一位治疗师，她建议让我的学生读金·彻宁的《困扰：反思苗条暴政》(*The Obsession: Reflections on the Tyranny of Slenderness*)。我照做了，而且发现我里根时代的学生突然具有觉悟提高聚会*(consciousness-raising sessions)里那些女人的口吻。这些会议第一次让我意识到，我作为女人所有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偶然发现一个对她们如此有意义的话题让我高兴，但在她们的日记中读到的和私下在办公室听到的也让我不安。彻宁这本书总的主题让我有强烈的认同感，但我自己与食物之间失调的关系从来没有到达厌食症或贪食症的程度，而且我也没想到会发现，原来我有好多学生在挨饿、暴食、清肠，并且充满自我怨恨和绝望。我开始阅读我能找到的所有关于饮食失调的资料。我发现，尽管病人的话和日记非常有启发性，但大多数临床理论不是很有帮助。文化视角的缺失——尤其涉及女人的情况时——是很明显的。

作为一名哲学家，我对我的学生在描述他们的感觉时经常使用的经典二元论语言同样感兴趣，所以我决定在我的形而上学课程里添加一个章节，讲解看待身体的当代观念。我因此发现，尽管把自己的生活体验为一场和自己身体的永久战斗的绝大多数是女生，但不少男生在写跑步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在我看来似乎是关于身体的一系列观念的文化显现让我着迷，尽管它作为思想不是新鲜事物，但在当代文化中却得到特殊体现，而且我开始看到

* 觉悟提高聚会是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为了增强妇女的政治意识，以对抗对女性的体制性压迫。——译者

这种文化假设的种种证据。一个从那时起吸引了我大部分注意力，而且我相信也逐渐被证明是正确的计划就这样开始了。1983年，身体实践和观念在我看来支持了自己的试验性直觉，和我目睹它们从那时起开始具有的地位相比，当时只不过是文化层面上的一波涟漪。

《神经性厌食症：作为文化具体化表现的精神病理学》最早发表于1985年，在我的"性属、文化和体验"和形而上学课程里，学生们的经历将我导向不同的文化轴，这篇文章就是我对这些文化轴的最初探讨。《身体和女性特质的再造》和《解读苗条的身体》都于1989年首次发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面一篇文章的拓展，因为它们探讨了更多承载饮食失调的轴线的内在动力：历史上是女性的心理失调，对待"胖"和"瘦"的构成的历史观念的变迁，和消费社会的结构张力。然而，这些轴线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所以与其说这些文章解释了饮食失调，还不如说通过一系列文化互联和交叉跟随它们。

当然，自从《神经性厌食症》1985年首次发表后，关于饮食失调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书面材料、媒体关注和临床研究。我没有尝试为这些先前发表的材料添加新的研究或数据，尽管大部分新信息明显证明了我的观察和阐释。我也没有试着让我最初的构思和我思想的发展保持一致。相反，我选择让我的观点的发展——和在某些情况下，现象本身的发展——在文章中体现它们自己。为了避免重复，我删除了原版文章的某些章节，此外，还澄清了少许表述，添加了一些新的插图，并修订了准确性不够的尾注。除此，本书这部分中的文章和它们的最初版本完全一致。

神经性厌食症

——作为文化具体化表现的精神病理学

很久以前，历史学家就开始书写身体的历史。他们在历史人口学或病理学领域里研究身体；他们将其视为需要和欲望的场所，生理过程和新陈代谢的中心，微生物或病毒攻击的对象；他们的研究表明，历史进程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像杆状菌的传播，或寿命的延长这样看似纯粹的生物"事件"中。但身体也直接包含在政治领域里，权力关系直接掌控它，它们在它身上投资、做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执行任务、举行仪式、释放信号。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做最好的我，我相信此举的价值，

监控每次摄入的卡路里，我相信这样做的好处……

——"水晶之光"电视广告

饮食失调、文化和身体

精神病理学，正如朱尔斯·亨利所言，“是一个文化所有问题的最终表现”[①]。没有什么比厌食性神经症和易饿病更能明显地验证这种说法，它们在一个世纪前几乎不为人所知，现在却成了流行病。这些失调远非一种肤浅的流行现象的结果，我认为，它们反映并且让我们关注我们文化中的一些痼疾——从鄙视身体的历史传统，到丧失对将来的控制的现代恐惧，再到在一个女性的影响和权力空前的时代，当代的美丽理想所具有的令人不安的意义。

厌食症的发病率[②]已经发生了戏剧性变化。[③]1945 年，德维希·宾斯万格在记录现在看来著名的埃伦·韦斯特病例时：“从精神病学的角度讲，我们正面对一个新的事物，具有一种新的症状。”[④]1973 年，作为认识和治疗饮食失调的先驱之一，希尔德·布鲁克仍然认为厌食症“的确少见”。[⑤]1984 年，据估计，13 岁至 22 岁之间的女性，每 200 到 250 人中就有 1 人患厌食症，大约 20%到 33%的女大学生通过呕吐、利尿剂和通便剂控制体重。[⑥]厌食症和贪食症纽约研究中心报道，1984 年的前 5 个月，它收到了 252 份治疗请求，而 1980 年全年才收到 30 份。[⑦]对饮食失调的社会意识比以前增强，患者更愿意公开他们的病情，但即便如此，这些统计还是令人震惊并可以引发争论的。90%的厌食症患者是女性，每年有 5000 人切除一部分肠子帮助自己减肥，其中 80%是女性[⑧]，这些事实同样如此。

神经性厌食症明显是，如保罗·加芬克尔和戴维·加纳所称，一种“多维的失调”，家族的、感知的、认知的，可能还有生物的因

素，在不同的个体身上，以不同的组合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最终的共同通道”。[9]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越来越多的证据不仅显示这种疾病发病率的升高，还有在某些群体中更高的发病率，这时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文化因素，将其看作饮食失调发病机理中的重要成分。[10]然而，直至最近，文化和社会分析最多能提供的，除了个别例外，是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认识，即厌食症和时尚在过去的15年对苗条的不断强调有关。[11]遗憾的是，这只是用一个谜团代替另一个，而且第二个比第一个更难破解。

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文化为什么如此痴迷于让我们的身体保持苗条、有形和年轻，以至当500人被问及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怕什么的时候，190人回答说“发胖”[12]。我们的孩子经常做噩梦，梦见核战争，在这样一个时代，作为成年人，我们竟做出这种回答——我们最害怕“发胖”——这比厌食症患者对她身体形象的错误感知，或者易饿病患者的强迫性呕吐要奇怪得多。当然，关于核战争的噩梦和我们对作为控制域(arenas of control)的身体——或许是我们在20世纪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可用控制域之一——的疯狂固恋之间不是没有联系的。如果这种联系得到研究，那么它可能会变得重要，能破解谜团，并具有指导意义。

我们也要研究这个事实，即最受金·彻宁所称的“苗条的暴政”压迫的是女人，而且这种特殊的压迫是一种后60年代，后女性主义现象。相反，50年代，随着中产阶级女性再次走出工厂，被安全地禁闭在家，女性美的主导理想在玛丽莲·梦露身上得到典型体现——很难和你双性的、运动的、青少年的体形相提并论。在她最受欢迎的时期，梦露经常被描述为“女性特质的化身”、“女人本性的象征”；上个学期，我的一个学生说她是“一头母牛”。这仅仅

是被认为有吸引力的臀部、胸部和腰部的尺寸发生了改变，还是人形化的女人本性这一观点具有了不同的含义、不同的联想，和为80年代的文化激发不同的幻想和想象的能力？如果我们要深刻理解目前的饮食失调流行病，那么这些就是必须被提出的问题。

这篇文章的副标题表达了我的主要思考方向。我认为一个文化中发展起来的精神病理学远非异常或越轨现象，而是那个文化的特有表达，实际上是其大部分问题的具体化表现。因此，作为文化自我诊断和自我审查的答案，有必要对它们进行研究。“每一个时代，”克里斯托夫·拉希说，“都有其独特的病理学形式，以夸张的方式表达了它根本的品格结构。”[13]关于厌食症，这句表述唯一让我不敢苟同的一点就是，对一个根本、单一的品格结构的表达这一观点。厌食症不像是一种品格结构的极端表达，更像一种明显被超定的症状，反映了我们时代某些多面和异质的苦恼。正如厌食症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个体患者的心理经济（psychic economy），多种文化趋势或潮流也在厌食症中汇合，寻找它们完美、准确的表述。

我称这些潮流或趋势为“连续性的轴”（axes of continuity）：称它们为轴是因为它们在厌食综合征中相遇或汇合；之所以有连续性，是因为当我们将厌食症置于这些轴上时，就会出现它的家族相似和与其他现象的联系。这些轴中的一些代表了厌食症与当代其他文化实践和形式——比如健身和慢跑——的共时性。其他轴则显示了历史关联：例如，厌食症和早期对女性身体极端控制的例子，像女子紧身之间的联系，或者厌食症和西方文化中长期存在的传统和意识形态，比如希腊基督教的二元论传统之间的联系。我在这篇文章中将要讨论的三个轴（尽管它们绝不会穷尽从文化角

度理解厌食症的可能性)是二元论轴、控制轴和性属/权力轴。[14]

贯穿我的讨论的一个假设是,身体远非某种本质上稳定,与文化隔绝的常数,我们必须用它对照所有和文化相关和体制化的形式,而是不断地处于文化实践的,如福柯所言,"掌控中"。倒不是说这是个关于本能或自然身体受文化压制的问题,相反,"自然的"身体是不存在的。文化实践非但没有运用其权力对抗自发的需要,"基本的"快乐或本能,或身体经验的"根本"结构,反而已经而且总是被刻写,如福柯所强调的,"在我们的身体和它们的物质性,它们的力量、能量、感觉和快感上"[15]。我们的身体和其他任何有人性的事物一样,是由文化构成的。

文化实践不总是,却经常影响被体验的身体(现象学家称其为"生活过的身体"),而非物质的身体。例如,福柯点出了 19 世纪对性的医学化,它把性从一种家庭问题重塑为一种私人的、黑暗的、身体的秘密,受到像医生、精神病医生和学校教育工作者这样的专家的正常调查。不断的探究和讯问,福柯认为,揭露、色情化并固化了各种各样的性行为类型和性反常行为,而这些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尽管他们最初不是这样做的)是对他们的身体可能性和快乐的表达。医学告解室的使用,换句话说,通过不断地搜查性秘密和隐藏的故事,实际上产生了新的性秘密——也将讯问和忏悔的行为色情化。[16]在此,社会实践改变了人们对他们的身体和身体可能性的体验。同样,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节食行为——对饥饿说不的行为——让厌食症患者不断感到饥饿是一种自我某些异样部分的危险爆发,并且越来越醉心于控制这种爆发。

然而,物质的身体同样可以作为权力的工具和中介。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举了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之前(Ancien Regime)的

公共酷刑这一经典的例子，通过这种刑罚，如德赖弗斯和拉比诺所言，“君主的权力被以一种尽可能克制、悦目和细致的方式，真实并公开地刻在罪犯身上”[17]。同样，19 世纪的紧身胸衣导致它的穿戴者丧失身体能力，但它也象征了文化将自己的设计强加在女性身体上的能力。

的确，历史上，文化对身体控制的两种形式的极端对女性身体的威胁比男性身体大得多。这种现象或许和这个事实有关，即女人不仅拥有身体，还与身体相联，这经常被认为是女人在家庭生活、神话、科学、哲学和宗教思想中的“领地”。当我们在后面考察医学史和时尚史的某些方面时会看到，社会对女性身体控制的出现是过去百年间维持两性间权力关系的一个绝对重要的策略。这种历史认识必定深刻地影响我们对厌食症和当代对苗条的痴迷的理解。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我正在做的是揭露一个长期存在的男性陷害女性的阴谋，或是指责社会力量游戏中的某些参与者。在这点上我还是赞同福柯的观点，他提醒我们，虽然一个完全清晰的逻辑在其目标是完全可解释的情况下，能描述历史权力关系的特征，但“情况经常是没有谁会去发明”这些目标和策略，不管通过个人的选择，还是通过某些指挥“总部”的合理的游戏计划。[18]因此，我们谈论的不是计策、布局，或总揽全局的策略。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不会下意识追求实际上能提高他们地位的目标。但它的确拒绝承认，个体在这么做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引导总的权力关系运动，或策划它们的形态。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形态指的是什么。权力关系涉及某些群体的支配——比如，警卫看管犯人，男性使唤女性，内行领导外行——这个事实也不意味着统治者就完全掌控局势，

被统治的有时不主动推进并拓展局面。[19]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没有什么比厌食症更能清晰地体现这种压迫中的协作。

二元论轴

我首先要谈的是最一般，也是最没新意的连续性的轴，它始于柏拉图，几经周折在奥古斯丁那里得到最绚丽的表达，最终被笛卡尔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固定并科学化。我指的当然是我们的二元论传统：认为人类存在被分成两个领域或实体的观点：一方面是身体的或物质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精神的或心灵的存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些有趣的变动，它们不属于我的讨论范围，除此之外，这种二元论的基本形象是相当稳定的。让我简要描述一下它的主要特征，我们将会发现，它们构成了厌食症患者的基本身体形象。

首先，身体给人异类、非自我、非我的感觉。按照柏拉图在《斐多篇》中的描述，它被"紧紧地系在、粘在"我身上，"钉在"并且"固定在"我身上。[20]在笛卡尔看来，身体是包裹内部、本质自我，那个有思想的物的没有感情的物质外壳；从本体论上讲，它完全不同于那个内部自我，运转起来像机器一样呆板，简直可以和动物相提并论了。

其次，身体被认为是束缚和限制：是一个"监狱"、一片"沼泽"、一个"笼子"、一团"雾气"——柏拉图、笛卡尔和奥古斯丁都使用过这些形象——灵魂、意志，或思想奋力从中脱身。"敌人("淫欲的疯狂")的力量俘获了我的意志，他的力量化作锁链将我束缚，"奥古斯丁如是说。[21]这三位哲学家的著作都明显传达了被身体"拖住"的灵魂这一形象。在柏拉图看来，身体是"沉重而又笨拙的"，它把

东西往下拉。[22]

再次，奥古斯丁一再明确地描述，身体是敌人，柏拉图和笛卡尔抨击身体，认为它是我们思想中隐晦和混乱部分的源头，他们有同样的强烈暗示。“一个因为仅仅需要食物而导致无数次分心的源头，”柏拉图说道，“还容易患病，这些病突袭我们，妨碍我们追求真理；它让我们充满爱意、淫欲、恐惧，各种各样的幻想，没完没了地做蠢事，而且，的的确确如人们所说，让我们完全失去思考的能力。战争、打斗和党派是怎么产生的？不是从身体和身体的淫欲那里产生，还会有别的地方吗？”[23]

最后，不论作为通往理性的障碍，或是“让人反感的肉体欲望”（奥古斯丁的命名）的栖身地，身体是我们尝试掌控时所遇所有威胁的中心，它突袭、压制、爆发并破坏。这种情况对二元论者而言，已经成为一种刺激，激励他们和身体的蛮横力量战斗，证明谁是主宰者。因为如柏拉图所言，“自然命令灵魂统治身体，让其服从并服务”[24]。

三个人——柏拉图、奥古斯丁，和最明显的，笛卡尔——都为如何控制身体提供了指导、规则，或范例，最终目的是——因为这是其制度的最终落脚点——学会在没有它的情况下生活。[25]意思是：要将心智从身体假想的诱惑中解脱出来，不受它分散注意力的影响，而且，最重要的是，消灭它的欲望和饥饿。一旦控制成为灵魂的首要问题，只有这些才是表达胜利的合适措词，艾伦·瓦兹说得很清楚：

> 有意的控制会在有机体中造成二元的感觉，意识与欲望相冲突的感觉……但是这种控制模式独特地说明了这个谚

> 语：没有什么比成功更失败了。因为意志的成功所个体化的意识越多，一切外在于个体的事物就越像一个威胁——包括……不加控制的自己身体的自发性……因此，每次控制的成功都需要一个进一步的成功，所以这个过程是无限的。[26]

二元论在此显示为自我与控制认同的产物，副产品，在瓦兹看来，这种认同处于基督教排斥性的伦理的中心。为了控制而试图抑制身体的自发性只会让它们变得更异类，更强大，因此更需要控制。想要在这场没有赢家的游戏中获胜，唯一的途径是超越控制，完全消灭身体的自发性——就是说，不再体验我们的饥饿和欲望。

这就是许多厌食症患者所描述的他们的最终目标。“（我想）达到一种境界，”一位患者说，“一种不用吃饭的境界。”[27]金·彻宁回忆起自己禁食后又开始饥饿时的惊讶：“我（当时）意识到我节食的秘密目标一定是要完全消灭自己的食欲。”[28]

女性厌食症患者对饥饿和对苗条一样着迷，这在有关这个话题的一般文献中经常被忽略。典型的厌食症患者非但没有失去胃口，反而受其折磨——很像奥古斯丁对于受到性欲折磨的描述——而且一直担心被它征服。许多患者将害怕饥饿，害怕“失去控制，将其拱手让给生物本能”，“让给那个渴望中，永不满足的东西”[29]描述为“最初的恐惧”（如一位患者所言）[30]，或者，按照埃伦·韦斯特的说法，是“真正的困扰”。“我认为真正的……神经病不是怕胖，”她写道，“而是对食物的不断渴望……饥饿，或者说对于饥饿的恐惧，跟随了我一个上午……即使我吃饱了，我还是害怕接下来的时间，因为饥饿会重新出现。”她解释，害怕变胖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而是“刹住了”她对自己无法管理、失去控制的食物欲的恐

惧。[31]布鲁克报道说她的病人连一口饭都不敢吃，因为担心停不了。[32]（贪食症的厌食症患者有极为旺盛的食欲——有时每天摄入15000卡路里的热量[33]——他们真的停不了。）

在这些女性看来，饥饿是一位外来的入侵者，在看似主观的念头的驱使下前进，与任何正常的自我调节机制无关。的确，它不可能和自我有什么联系，因为它被体验为来自自我之外的一个地方。布鲁克的一位病人说她之所以吃早饭，是因为"我的胃需要它"，表达了与她的饥饿（和她的肉体自我）之间的疏远，奥古斯丁在讲他的"俘虏者"，"我身体中的罪恶定律"时表达了同样的感觉。[34]布鲁克注意到，这种，如她所称的，"与身体和它的感觉相分离"的"基本错觉"是所有饮食失调患者的典型症状。"这些病人表现得，"她说，"好像进食是[自我]之外的行为。"[35]让人吃惊的是，身体感觉的外在性并不局限于饥饿感。患饮食失调的病人都无法识别冷、热、情感和焦虑是源于自身的反应。[36]

身体给人的感觉是异类和外在的，灵魂或意志被描述为陷于或被禁闭在这个异类的"监狱中"，如一位妇女的描述[37]，"我感觉陷在我的身体里"，"身体是我的监狱"[38]：这个主题被一遍一遍地重复。一个让人想起柏拉图的典型幻想从身体监狱的完全解放："我希望能彻底摆脱我的身体去飞翔！"[39]"帮帮我吧，我的主……我想摆脱我的身体，我想出去！"[40]艾伦·韦斯特一如既往地敏锐，她看出了她的自我挨饿在这个"想要变得很瘦，并且没有身体的理想中"[41]的一个重要含义。

厌食症不是一种哲学态度，而是让人憔悴的折磨。然而，这些女性经常展现出一种高度自觉和清晰的想象和联想机制——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这种机制具有明显的奥古斯丁风格，和某些

柏拉图的特点。当然，这并不说明厌食症患者是柏拉图或奥古斯丁的信徒，而说明厌食症患者的形而上学让若干要素变得明晰，这些要素的历史根源在柏拉图和奥古斯丁，在我们文化中有深厚根基。[42]正如奥古斯丁经常谈到他身体中“一种为肉体当差，另一种为精神服务”，“把我的灵魂撕成两半”的“两种意志力”，厌食症患者也描绘了一种“精神的挣扎”，一种“善与恶之间的争夺”，经常被明确地想象为思想或意志与欲望或身体间的一场战役。[43]“我相当被动地感觉到，”韦斯特说，“舞台上两股敌对势力正互相毁灭。”[44]有时思想和身体之间的对抗火药味更浓：“当我不能按我想要的频率锻炼时，我会感到内疚，因为我的身体又从我的思想那里‘赢’了一天。我不能等到这个学期结束……我的身体要为它现在不工作的状态付出代价。我等不及啦！”[45]

在这场战役中，瘦代表意志战胜了身体，与瘦的身体（就是说，非身体）相连的是“绝对的纯洁，高度发达的智力，和对肉体的超越。当我的身体萎缩的时候，我的灵魂好像在成长；我感觉自己像以前的一个基督圣徒，在沙漠的烈日下忍饥挨饿。当骨骼雕刻出我的轮廓时，我感觉是不会受伤的，纯净而又结实”[46]。肥肉（即是说，全都是身体）象征物质和肉体的污点，“放纵”[47]，精神恍惚和智力衰退。[48]一位妇女描述了吃过糖后她如何感到“被玷污，恶心和粘粘的感觉穿过两条胳膊，好像一些不好的东西进入体内”[49]。性也经常被卷入这种联想中来，而且饥饿与性在精神实质上相通。切丽·布恩·奥尼尔描述了一次深夜的暴食，吃狗的盘子里剩饭的残渣：

我慢慢地开始，享受每一口的美妙滋味和感觉。不久我

便开始撕咬骨头上的少量残留，迅速把肉撕下来塞进嘴里。

（她男朋友的出现让她大吃一惊，他的脸上“写满厌恶”。）

我当场被逮……独自在地板上，在黑暗中，沉浸在动物般的狂欢中。这就是丹所看到的可怕事实。我感到罪恶深重、身败名裂，像个异教徒……那天，在丹看来，我对食物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50]

100 页之前，她就用几乎同样的语言描述了她的第一次浪漫体验：“我感觉自己放不开，可能会引起误解，而且……这种正在发展的关系有损名声”（最多也就是接吻的程度）[51]。对于刘艾梅，性同样是“一件可恶的事情”；对她而言，保持芦苇一样的身材是一种通过，变得“双性同体”而避开性的方式。[52]同样，雷文克隆的一位病人萨拉将害怕增加体重归结为“不想成为男人的一个‘诱惑’”[53]。在刘和萨拉的病例中，不想引起男人的注意和对之前的性虐待的焦虑和内疚有关。不管这些插曲是否为许多厌食症病例所共有[54]，按照布鲁克的说法，“避免任何性接触，畏惧所有的身体接触”是厌食症患者的特点。[55]

控制轴

我们已经考察了从柏拉图到厌食症的连续性轴线，现在应该谨慎起来，不要动辄认为厌食症表达了完全现代的态度和恐惧。鄙视身体，将其看作一股异己的力量和灵魂成长的障碍，这在我们的希腊基督教传统中早已存在（尽管这种观点的最强音发自男性哲学家和神学家，而不是青少年女性！）。

尽管二元论和柏拉图一样古老，但在很多方面，当代文化似乎比之前的时代更痴迷于控制任性的身体。看一看当代的美国生活，就会发现第二条用于考察厌食症的连续性的轴。我把它称作控制轴。

年轻的厌食症患者通常认为她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和饥饿。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且永远无法以符合她的严格要求的方式完成她给自己定的任务。她受对立和矛盾的期待和要求的折磨，想在学生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出色，而在成为一名成年人的过程中，又不知道该在何处发挥自己的能力，该把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典型的情况是，父母对她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她能有一番作为（外形上也不能差），但却替她做了许多重要决定。[56]通常，厌食综合征不是有意想变得尽可能瘦，而常常是当她采纳了一位非常成功地减掉了5或10磅，然后就迷上了让人兴奋的成就感和控制欲的家长的建议后，不经意间开始节食的后果。

回忆起患厌食症的那段日子，刘艾梅讲述了她的感觉：

> 成就感让我兴奋，激励我继续、再继续。它让我有方向感，塑造了我的生活，让我有安全感……我可能会成为一名（减肥）专家……不知为什么，（磅秤的）连续下降让我感到欣慰，这明显地证明我可以实施控制。[57]

节食，她意识到，“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而完全控制它的是我，并且只有我”[58]。

饥饿引起的失意，厌食症患者经常参与的身体活动的严酷性，厌食症的许多身体并发症造成的痛苦：这些对厌食症患者而言都

不算什么。事实上，她能忽略它们，这进一步证明了她能掌控自己的身体。“这在我的控制范围内，”布鲁克的一位病人说，“我还是不知道我看上去怎样，或者我的体形如何，但我知道我的身体什么事都可以胜任。”[59]“活力、训练，我自己的力量让我永不停止，”刘这样说。“我不需要什么精神动力，也不要别人的帮助，而且我可以证明……掉在地上时，我可以滚动。我的尾骨重重摔在了坚硬的地板上……我一点不疼。如果我不能做到别的，我将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我发誓。”[60]最后，布鲁克的一位病人说：“你把你自己的身体变成你自己的王国，而你就是暴君，绝对的独裁者。”[61]

当然，我们必须在最后这个真诚而露骨的说法中认出控制当代资产阶级焦虑的惯用伎俩。想一下强迫性慢跑和马拉松，尽管小腿上绑着夹板，忍受其他疼痛的伤处，但如果哪天没跑，或没有达到某一次跑步的目标，人们还是会感到强烈的不安。想一下越来越流行的像“铁人”这样的三项全能运动，它们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人们弄清楚多大的压力——通过长距离游泳、骑车和跑步——才会让他们的身体垮掉。想想每天早晨跑10英里的麦克·法兰克福律师：“带着疼痛跑步是生命的本质。”[62]或者看看一些学生日记的节选：

> 我最喜欢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跑步。我喜欢在我能找到的最热、最潮和最陡的地形上跑……对我来说，跑步和跑步带来的伤痛不足以让我停下来。我总是努力克服它，我最大的失败就是因为疼而不跑。我曾经带着严重的腿部痉挛跑了50个英里的长跑，但还是坚持下来——停下来就是失败。[63]

当我跑的时候，我是自由的……快乐让我的身体失去知觉——好像我的腿与地面的连续撞击太彻底，都感觉不到疼了。跑步没有优雅和美丽可言——倒是要忍受运动鞋和人行道的不和谐。光芒四射的疼痛在震颤和分裂中将它白热的箭刺向我的胃和肺，但它无法穿透我的精神。我处于自动驾驶状态——记不得受过什么苦，只有自由——我正脱离这副沉重的肉身，失去我自己……我充满了无限力量。[64]

这些都证明，当代对健身的关注同样有非病理学和非二元论的方面。历史上无处不在的强奸和虐待，有文化根基的认为我们自己是没用的信念，无法使用和享受用于严格身体训练的设备和计划，这些都让女性苦不堪言，对她们而言，力量、机敏和信心的培养显然有积极的一面。日常锻炼的客观利益和对营养的关注也无需质疑。相反，我所关注的是一个日益显著的主观立场，它虽然专注于身体，专注于从身体的外表获得自恋的享受，但很少从具体化的经历中获得快乐。它倒是与精神（或意志），精神完满的理想，绝对控制的幻想产生基本认同。

当然，不是每一位把身体训练当成日常工作的人都持这种立场。考察女性健身者的语言能对此做出解释。健身特别有趣，因为表面上它似乎与厌食症的构造相反：毕竟，健身者增强了体质，而不是削弱它。健身给人以力量。在我们的想象中，健身者是骄傲的、自信的，并且最重要的是，意识到并接受她身体的存在。这的确是一些女性健身者对自身的感受：

我感到……平静，更加强壮（陈莉迪娅说）。锻炼让我身

体中的每一处都有快感，我能感觉到这种能量。我感觉到肌肉在生长，我看着它们膨胀起来，血脉贲张……我的整个身体都在流汗，而且还有些事情比汗流浃背更让我开心。那就是当我真正感觉是一个女人的时刻。[65]

但对活跃和有活力的身体感到高兴并不是特里克斯·罗森（Trix Rosen）采访的女性中最显著的表现。她们中许多人谈论自己身体的方式都与典型的厌食症主题产生让人不安的共鸣。

对意志、纯洁和完美有同样的强调："我已经学会做一个更强壮的人，具有坚强的意志……纯洁的专注、能量和精神。""我想拥有尽可能完美的身体。""健身符合我对完美的追求。""我的目标是拥有完美的肌肉。"[66]强迫性锻炼者——在《纽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迪尼亚·史密斯称她们为"新清教徒"——用类似的语言谈这个问题：凯茜·克劳奇是纽约的一位艺术指导，她每天骑12英里自行车，游二英里半泳，她说她在"追求完美"。麦克·法兰克福在描述他参加马拉松跑的动机时谈到"它的纯洁"。这些人，史密斯强调，不在乎他们的健康："他们对自我否定所赋予的纯洁有一种近乎神秘的信念，为此他们把自我否定当成最终目的。"[67]

和许多厌食症患者一样，许多健身者也让人气馁地视身体为异类、非自我：

我的肌肉不断让我惊讶。我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朝下看我的"腹部肌肉"，并弯曲双腿看看"伤口"在不在……我的腿一直是我身上最顽固的部分，我很想让它们强壮起来。我看到每天它们都在变化……我不像我想的那样会炫耀我的

肌肉。我对它们的感觉不一样;它们是我的产品,我穿毛衣保护它们,给它们温暖。[68]

最突出的是,健身者同样强调控制的重要性:强调他们的生活从根本上失去控制,强调对身体的完全掌控所带来的成就感。这种掌控的感觉和厌食症患者的一样,有两个来源。首先,存在一种让人放下包袱的想法,即一个人为了追求他的目标,可以克服所有的身体障碍,让自己承受任何极限(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也是强迫性跑步者的典型动机)。其次,也是最富戏剧性的(女性健身者一再谈到这点)来源是完全掌控自己的体形时所感到的强烈兴奋。"创造一件杰作,"《健康》杂志说,"把你的身体雕刻成一件艺术品。"对于健身者,就像对厌食症患者——她只能按照自己的内在现实所规定的来看她的身体,并受到一种苦行后的苗条的理想形象的无情驱使——一样,一个纯粹的精神概念支配了她的生活:"你想象出了你想变成的样子……然后就变成那个样子。""挑战很明确:需要重新安排。""如何雕琢在于你自己;你成为一位女性雕刻大师。""你的身体在改变,多么神奇啊!……锻炼时,我脑子里有一幅图画,告诉我我想成为什么样子,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69]符合自己的已经选择的身体设计的性质,正如对厌食症患者一样,也是健身者的主要目标。

达到这个目标所带来的满足感首先表现为支配和独立的快乐。"现在,"康奈尔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副教授迈克尔·萨克斯说,"人们再也不感觉他们能控制自身之外的事物——比方说,他们的工作业绩或者人际关系——但是他们可以控制摄入的食物和跑动的距离。节欲、测试耐力,这些是他们自足的方式。"[70]此外,我们生

存的延续经常要靠"专家"、机器和先进的技术，在这样的文化中，身体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弱点和依赖性。我们的生命可能会延长，但疾病和死亡周围的环境可能会比以前更加怪异、费解，随意性也更强。

然而，当代对身体的迷恋，在一种越来越难控制的文化中不仅表达了掌控自我的幻想，还反映了我们与文化的结盟，对抗所有让人想起身体的衰老和死亡的东西。"每个人都想长生不老"是《泵铁》(Pumping Iron)* 主题曲中的叠句。最受青年人推崇的通俗电视节目《名声》的开场歌曲的第一句是"我想长生不老"。让人惊讶的是，尽管厌食症患者会非常接近死亡(确实有 15%的人死去)，但病中的主要感受却是不会受伤。

长生不老的梦想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战胜死亡已经成为一种科学幻想，而非一种哲学或宗教神话，这是现代性所特有的。我们再也不梦想与诸神永恒结合；相反，我们建造能让我们无限期活下去的机器，而且我们研究让我们的身体在 40 岁时可以和 18 岁时一样光滑、健美和有弹性。我们甚至梦想让变老的过程完全停止。广受欢迎的《长寿》一书的作者德克・培森和桑迪・肖认为，"晚年是一种让人不快、没有吸引力的折磨"[71]。他们声称，他们提出的超级维生素食物疗法能够阻止，甚至颠倒老化机理。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在以过度消费为特点的文化中，(如彻宁所称的)"征服和压制身体的意图"表达了一种审美和道德上的反叛。[72]厌食症患者最初来自富裕的家庭，而且，目前对长跑和禁食的狂热主要是年轻、有上升趋势的专业人士中的现象(迪尼

---

* 《泵铁》又名《铁金刚》，是记录 1975 年南非奥林匹亚先生大赛的健美记录片，造就了日后风靡好莱坞的硬汉阿诺・施瓦辛格。——译者

亚·史密斯称其为“对剥夺的热衷”)[73]。当然,对于这些不情愿挨饿的人而言,饥饿无法表达意志的力量。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将厌食症看作一种精英和特权人士所患的时髦病,相反,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力量。

性属/权力轴

90%的厌食症患者是女性。当然,即便没有这项统计,我们也能意识到,当代“苗条的暴政”在性属上远非中性。女人比男人更加迷恋自己的身体,也更为不满自己的身体[74],而且,因为她们自己、男人和文化的原因,不能充分地拥有自己的身体。《魅力》杂志在1984年对33000名女性做了一项调查,75%的女性说她们认为自己“太胖”。但根据本身就出了名的受文化标准影响的《都市生活保险报表》,这些女性中只有25%的人超过她们的最佳体重,整整30%的人低于此标准。[75]厌食症患者对自己身体形象的扭曲——除了太胖,她看不到身体的其他方面——尽管更为极端,但并非与相当普遍的女性误解完全无关。

想一想男星尼克·诺尔蒂和威廉·赫特,即使他们的腰部有一定程度的松弛和肥胖,还可以饰演重要的浪漫角色。即便在我们这个迷恋健身的文化中,个人风格、才智、智慧的表现、阅历和效率仍然不是男人所必需的,但如果没有合适的身体,没有女性可以成为浪漫或性感的理想化人物。那个身体,如果我们用电视广告作为标尺的话,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已经越来越瘦了。[76]过去被认为只有超级模特才需要的极端风格,如今成为吸引高中和大学女生的主导形象。已经很苗条的女学生再三抱怨说恨自己的大

腿或胃(最让厌食症患者害怕的危险地带);她们经常受到男友的取笑,常常因此担心、生气。珍妮是我以前的学生,她身高5英尺10英寸,体重132磅。但她的男友比尔,也是我的学生,却叫她“胖子”和“大屁股”,并坚持认为她的体重应该是110磅,因为(他在我的课上写的文章中解释说)“这是波姬·小丝的体重”。他把这种想法称为“建设性批评”,并且感到极度焦虑,担心她的体重可能再次增加:“我看得出这让她烦恼,但我仍然揪着这点不放。我想如果我继续提醒她的话,情况会好得快些,这是我的猜测。”[77] 正如我在学生的日记和论文中所发现的,这种女人的体重在其中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的关系是非常典型的。

希尔达·布鲁克报道许多厌食症患者说自己体内或周围有一个“幽灵”,“一个支配我的独裁者”,“一个抗议我吃东西的小人”。[78] 这个小幽灵,独裁者,“另一个自我”(他经常被这样描述)通常是男性,布鲁克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厌食症患者的另外一个自我——无法控制的食欲,杂质和污点,松散的意志和精神麻痹的趋势——是身体。但它也是(在此,厌食症患者引发的联想肯定处于西方文化的主流)女性自我。人们发现这两个自我始终是对立的,但正在厌食综合征中得到表达和发展的是男性的一面——它具有更强的精神性、更多的智慧、意志的力量这些相关的价值——这是明显的。[79]

厌食症患者中这些性属联想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与对传统的女性角色和社会限制的恐惧和鄙视有关。另外一层,也是更为深刻的一层,是关于“女性”,还有它所引起的更为可怕的、对贪婪的饥饿和旺盛性欲的全部原型联想的深度恐惧。

青少年厌食症患者表达了一种她们特有的恐惧，她们害怕成为成年的、性成熟的，并且有生育能力的女人。“我非常害怕有一个丰满和完全成熟的成年女子的身体。我想有一个结实、强壮和瘦削的身体。”[80] 切丽·布恩·奥尼尔明确谈到她对成年女子的恐惧。[81]“真希望能一直瘦下去”，其中一位说，“我再也不用为有一个女人的身体烦恼了；和彼得·潘一样，我可以永远做一个小孩。”[82] 彼得·潘在这里很能说明问题——她的意思是，永远做一个男孩。的确，如布鲁克所报道的，许多厌食症患者在她们的孩提时代梦想和幻想长大后成为男孩。[83] 一些患者非常自觉地在她们的厌食症中表现出这种幻想；阿德里安娜，雷文克隆的一位病人，对于通常伴随厌食症出现的面部和身体的毛发感到极其自豪，尤其是她“皮包骨头的、多毛的胳膊”。[84] 许多病人也说，她们的父亲本想要男孩，却失望地得到了女儿，当女儿开始性发育时，他从感情上冷落她。[85]

厌食症通常出现在青春期伊始。厌食症患者感受正常的身体变化，这不足为奇，因为令人作呕的、女人气的肥胖接管了身体。“我抓自己的乳房，”刘艾梅说，“捏它们直到疼为止。真希望能除掉它们，如果必要的话就把它们切掉，再像一个孩子那样胸部平平的。”[86] 当她的经期停止时，厌食症患者会欢呼雀跃（正如在所有的厌食症[87]和许多女性跑步者中那样）。反感月经是典型的表现：“我在一个女性艺廊中看到一幅画，”另一位女性说，“一位女子身上拖了一条长长的红纱，好像在行经……我有那种感觉——在我感觉不舒服的身体的那个部位……我的胃、大腿和骨盆。那种令人厌恶的感觉。”[88]

一些作家认为这些症状是一种潜意识的女性主义抗议，痛恨传统女性角色的局限，反对与它相关的价值，强烈反抗让她们将来

步她们母亲的后尘。[89]在勾画典型厌食症家庭的轮廓时，布鲁克几乎将所有的母亲描述为对她们的丈夫唯命是从，对自己的孩子却有强烈的控制欲。[90]实际上所有的母亲都有过前途光明的职业，但为了全身心地照顾她们的丈夫和家庭，她们放弃了自己的职业，这是一项她们非常看重的任务，尽管经常诉说失意和不满。

当然，许多厌食症患者似乎担心陷入她们与自己母亲联系起来的生活方式。这是刘艾梅的小说《单人游戏》中的重要主题。另外一位妇女将她的感觉描述为“（我被）我的母亲占据……她在我的身体里，即使她不在的时候也是如此”，她几乎以同样的口气诉苦，说自己不断担心“不是人了……停止存在”[91]。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埃伦·韦斯特就已经把变胖等同于（对她那个时代的一位精英女子而言）不可避免的家庭生活的限制，以及她认为与之相关的家庭麻木：

> 恐惧的感觉让我疯掉了……我感觉最终将失去一切；所有的勇气，所有的叛逆，所有的行为动力；感觉它——我的小世界——让我胖了又胖，让我懦弱，让我像乞丐。[92]

我一些患饮食失调的学生说她们的家庭劝她们不要选择，或禁止她们从事传统上是男性的职业，之后便出现厌食症。

女性的病弱和“歇斯底里”的流行病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中产和中上阶级中普遍存在，它是厌食症真正的同类现象。[93]那个时代在许多方面和我们这个时代很相似，就女人所面对的互相冲突的要求而言尤其如此：面临新的可能性，但又不断受旧有期待的羁绊。一方面，过去由父亲主管一个自足家庭生产单位的前工业化

秩序已经被垄断所取代，劳动妇女获得了新的、家庭之外的机遇。另一方面，它让许多宝贵的“女性”技能——纺织品和衣服制作，食物处理——脱离了家庭，成为工厂体系的一部分。[94]在新的机器经济中，中产阶级妇女的生活比以前要空虚得多。

这同样是一个见证了第一次大规模女性主义浪潮的时代。1840 年，在世界反奴隶制会议上，第一批女性主义者就已经高调谈论废除奴隶制和女性权利之间的联系。1848 年，赛尼卡福尔斯会议（Seneca Falls Convention）召开。1896 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论妇女的屈从》（*On 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89 年，潘克赫斯特（Pankhursts）组织了妇女选举联盟。但这也是（而且，如我将要讨论的，并非没有联系的）一个这样的时代，那时，女性特质的普遍理想化人物是一位优雅、富裕的女士，除了操持最有保障的家庭生活外，没有任何其他顾虑，完全依赖自己成功的丈夫，当他结束每天公共领域里的工作回到家后，为他提供一个平静、舒适的天堂。[95]在一封现在看来著名的信中，弗洛伊德批评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 让女人和男人一样去为生存挣扎，这种想法确实是无法实现的。比如说，假如我把自己文雅、可爱的女儿想象成一个竞争者，那我只能告诉她，就像我 17 个月之前做的那样，我喜欢她，并恳求她退出这种争斗，回到平静的、与世无争的家庭生活中来。[96]

当女人开始生病，因为急性抑郁症、剧烈的头疼、虚弱、神经质和自我怀疑而抱怨时，男医生确实就是这样做的。[97]这些女人中有

像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简·亚当斯(Jane Addams)、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英国活动家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和德国的妇女政权论者海德蔚·多姆(Hedwig Dohm)这样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我感到疲倦,讨厌问自己我是做什么的和应该做什么",吉尔曼回忆道[98],她后来在那部令人战栗的中篇小说《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中以虚构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的精神崩溃。她的医生,著名女性问题专家S·韦尔·米切尔(S. Weir Mitchell)告诉她,如吉尔曼所回忆的,让她"尽可能过一种居家生活。让孩子一直陪伴你……每顿饭后躺一个小时,天天如此。每天只能用两个小时思考问题。只要活着,就永远不要碰钢笔、画笔或铅笔"[99]。

弗洛伊德肯定了米切尔1887年出版的那本书,并建议对歇斯底里病人的精神疗法应该和米切尔的静养法("为了避免新的心理印象")[100]结合,和米切尔一样,他也没有认识到,隔离、厌烦和智力上的挫折构成了歇斯底里的病因。《歇斯底里研究》中,弗洛伊德认为几乎所有的受验者(和后来的多拉)都有超凡的智力、创造力、精力、独立性,而且,通常受过出色的教育[如我们所知,恢复健康后,安娜·欧(Anna O)成为一名活跃的女性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珍妮特认为歇斯底里病人"心理不健全",弗洛伊德评判了这种观点,甚至评论了歇斯底里与"最有内涵和最独到的天赋"间的典型共存。[101]但弗洛伊德从来没有(布劳耶开始)[102]将这些女性完成学业后所应该过的单调的家庭生活,和强迫性的白日梦、幻觉、分裂和歇斯底里转化联系起来。

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的确做了这种联系。在《黄色墙纸》

中，她描述了处方规定的隔离状态和强制的家庭生活，如何导致了虚构的女主人公全面的歇斯底里症状、疯癫和崩溃。一个女人被困在她卧室的墙纸里，挣扎着要脱身，这个症状，这个幻觉是一个十分明确的抗议，也是一种完全让人憔悴的固定观念，让这位女性角色看不清她的处境，没有思考的自由，在过她的身体和灵魂渴望的积极、有创造力的生活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机会。

对厌食症患者同样如此。抗议女性专心于家务这一理想[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称其为"女子的神秘感"]的局限是这种疾病的一个内涵，认识到这点真的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这种理想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在这个时期，她们母亲中的大多数开始建立家庭。我们应该不会忘记，这是二战结束后的时期，妇女统统被从她们战时所在的岗位上解雇，并受无耻宣传的影响，重新做回全职妻子和母亲。也是在这个时期，"更加丰满的体态"，简·罗素(Jane Russell)目前的提法，再次成为时尚，这是一个"乳房疯狂"的时代[或如洛伊斯·本纳(Lois Banner)所称的，"复兴的维多利亚风格"]，它美化了妖娆、胸部丰满的妇女。[103] 20世纪60年代晚期、70年代初期之前，这种形象一直是主导的时尚暴政。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厌食症患者的抗议，和典型歇斯底里症状一样，被写在女性厌食症患者的身上，而不是被当作一种自觉的政治——它当然也完全不反映任何社会和政治上的认识。此外，这些症状本身还阻止了这种认识的形成。这种固定观念——保持瘦的身材——在其最为极端的方面过于强大，以至任何其他观念或生活计划都是没有意义的。刘把它描述为"什么都包含在内"[104]。韦斯特写道："我感觉所有的内在发展都停止了，所有的变化和生

长都被遏止，因为一个单独的想法占据了我灵魂的全部。”[105]

矛盾的是——并且常常是悲剧的——实际上，这些女性抗议（我们必须把旷野恐怖症、歇斯底里和厌食症也算进来）的病理好像在和产生它们的文化条件的共谋中起作用。[106]当下，女性对苗条的痴迷更为温和的表达同样如此。女性可能会感觉到，她们自己被目前拥有男孩身体的理想所传递的自由和独立的信息深深吸引。然而，在焦虑地追寻那个理想（因为对大多数成年女性而言，这不自然）上所花的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实际上是耗费了实现内在发展和社会成就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作为一种女性主义抗议，对苗条的痴迷永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让厌食症患者害怕和反感的不仅是传统的女性家庭角色——她把这种角色和精神疲乏与虚弱联系起来——还有一种女性的原型形象：饥饿、贪婪，什么都需要、什么都想要，认识到这点同样重要。她感觉对食物的渴望是无法满足、失去控制的，正是这种形象塑造了并渗透到这种感觉中，让她觉得只要吃一口，就停不了。

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形象。让我们把食物放到一边，先看看这个隐喻：饥饿……贪婪……大量和过分的需要……没有节制……总是想要……总是想要太多的温情、保证、感情和性的接触，还有关注。这是许多女人对自己的感受，也的确是男人对女人的感受。“上帝，请不要让我给他打电话，”多罗茜·帕克的经典之作《一次通话》*中的女主人公祈祷说[107]，感觉自己对保证和接触的需要失去了控制，是可耻的，就像厌食症患者看待自己对食物的渴望一样。劳伦斯《儿子与情人》中的保罗·莫瑞尔则体现了与此相

---

* 多罗茜·帕克（1893—1967），美国作家、诗人，以机智、尖刻的文风著称。《一次通话》是她的一部短篇小说。——译者

当的男性观点。当米利亚姆抚弄花朵的时候，保罗责怪她："你喜欢什么东西，能不能不要紧紧地抓住它们，好像你想把它们的心挤出来?""你为什么不能克制一点，或者矜持一点，或诸如此类的……你总是在乞求爱，像一个乞丐。即便是花，你也要奉承一番。"[108]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这些形象有多少心理真实性？我班里的一位女性出色地洞察到她对自己的认识和强迫性节食者的焦虑之间的联系。"你知道，"她说，"厌食症患者总是深信她占据了太多空间，吃得太多，太想要食物。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但我总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太多感情，太多需要，太招摇和苛刻，在某些方面太过分了，如果你知道我什么意思的话。"[109]

女人害怕"太过分"，这种恐惧的最极端的文化表述——几乎总是围绕她的性问题——明显充满了关于饮食和饥饿的隐喻。"对于女人反常的、无法满足的欲望，哪个国家、哪个村庄不抱怨呢?"伯顿在《解剖忧郁》中问道。[110]"你是真正的鬣狗，"沃特·查尔顿说，"我们被你白皙的皮肤诱惑，当愚蠢让我们成为你的囊中之物时，你扑向我们并将我们吞噬。"[111]

有关贪婪和无法满足的女性的神话/意识形态（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厌食症患者所内化的她的女性自我形象）在历史上时盛时衰，但不是没有规律或原因的。在发生明显的环境和社会危机时期，如15和16世纪的政治迫害时所发生的标志性危机，它似乎十分盛行。[112]"所有的巫术都来自色欲，女人的色欲是无法满足的"，克雷默和斯普伦杰说道（他们是官方的猎巫手册《女巫之锤》的作者），为了满足"子宫的嘴……（女人）甚至可以与魔鬼为伴。"[113]

对女人无法控制的饥饿的焦虑，同样在女人变得独立、开始维

护自己的政治和社会权利时达到高潮。19 世纪后半叶发生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同时也见证了黑暗、危险和邪恶女性的艺术和文学形象的实际泛滥："尖牙俐齿、贪得无厌的"斯芬克斯们、莎乐美们，和黛利拉们，"咬人的、撕扯的、要命的女人"。彼得·盖伊称，"没有哪个世纪像 19 世纪那样持续、系统和赤裸地把女人描绘成吸血鬼、去势者和杀手"[114]。也没有哪个世纪如此痴迷于性问题——尤其是女人的性问题——和对其实施的医学控制。治疗女人过度的"性兴奋"和自慰方法包括：在子宫上放置水蛭[115]，切除阴蒂，去除卵巢（也建议用来对待"引起焦虑的困难，像农夫一样吃东西的行为，色情倾向，被迫害妄想症，和单纯的'倔强'"）。[116]女性自慰在"真性神经症"病理中的重要性，是年轻的弗洛伊德和他的朋友兼同事怀赫姆·弗立斯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弗立斯认为，控制这种"性虐待"的秘密在于治疗鼻子的"性点"；在一次弗洛伊德批准的手术中，他尝试通过去除弗洛伊德的病人爱玛的鼻甲骨，"纠正"她的"不良性习惯"。[117]

尽管女性主义者和卫生事务改革者作出一系列努力[118]，但要求胸衣比以前更紧的风格化"S 曲线"还是在 19 世纪后半叶成为时尚。[119]"尽管选举权有力地激励所有女性实现法律和政治上的解放，"阿莫里·德林考特说，"时尚和风俗对她身体上的束缚是她从未经历过的。"[120]被托尔斯坦·凡勃仑描述为一种"为了减少主体的活力，让她永远并且明显不能工作而进行的残毁"，胸衣恰恰做到了这一点。[121]穿着胸衣，女人几乎不能坐或弯腰，每次移动脚步的距离不能超过 6 英尺，而且经常晕厥（1904 年，一位研究员报道说"被这些胸衣束紧的猴子闹情绪，变得极为烦躁，在几个礼拜的时间里就病倒并死掉"！）[122]。在通俗杂志中，忍受紧身胸衣经常与自我克

制和控制联系在一起。胸衣是“一个永远在场的监视器，”1878年的一则广告说，“属于一个训练有素的头脑和管理有方的感觉。”[123] 当然，今天我们通过节食实现这种控制。

有必要强调，虽然对身体的粗暴操纵和外在控制所使用的方法是怪诞和荒唐的（阴蒂切除术，中国的裹足，为了穿紧身胸衣而去除胸腔里的骨头），但这种控制在维持性属/权力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对次要的。历史上每一种危险、好斗的女性形象都对应一种幻想——一种不带任何威胁性成分的理想化女性特质——为了实现这种幻想，女性从内部残害她们自己。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实施手术控制女性的性问题，与此同时，威廉·阿克顿、理查德·克拉夫特·埃宾和另外一些人正宣布官方的科学原则，即女人天生是被动的，并且“不太在乎任何性方面的感觉”[124]。与这种男性的医学幻想相对的是通俗的艺术和道德主题对女人的展现：守护天使；可爱、温柔、居家，性情平和，没有任何个人抱负。[125] 彼得·盖伊正确地指出，这些理想必须被理解为这个时代“对男子气处于危险中的普遍感觉”的反应形式，他还认为没有几个女人真正符合如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所称的“乏味的好太太”的形象。[126] 但盖伊所忽视的是，大多数女人努力让自己符合这个形象——这种“挥之不去和无处不在的”完美女士的理想形象影响了劳动阶层和中产阶层。[127]

历史上女人对于“太过分”的恐惧时增时减，女性身体在性属/权力轴上就无意中成为这种增减的载体。这就是如我们所看到的，厌食症患者如何感受她女性的、身体的自我：贪婪、放肆，需要男性意志的有力控制。生活在与第二次重要的女性主义浪潮对抗的文化潮流中，建构这些形象的不只她一人。在《自恋文化》中，克

里斯多夫·拉许谈到他所称的“性解放女性明显的挑衅姿态”，它“传递给许多男性同样的信息——女人是贪婪和无法满足的”，并且唤起“对占有欲强的，令人窒息的，贪婪和让男人丧失元气的母亲的早期想象”。[128]

相反，用金·彻宁的话说，我们当代的美丽理想似乎失去了“回忆过去的能力，和能让我们想起一个女人神秘力量的一切”[129]。这个理想是一个“还没有成为女人的女人形象”：黛瑞·汉娜在影片《现代美人鱼》(*Splash*)中是一条瘦长、新生的美人鱼；罗莉·辛格(看上去的确患厌食症)在《浑身是劲》(*Footloose*)中是一位冒失的、运动机能亢奋的女主角；查利女孩；“穿短裤的谢丽尔·提格丝，头发潮湿的玛葛·海明威；裸露在一个岛上的波姬·小丝”[130]；很多出现在可口可乐广告、牛仔裤广告和口香糖广告中的少女。

这些形象表达了愉悦的超然、随意的戏谑、主动的调戏，和轻松的格调；拒绝过分严肃地对待性、死亡，或政治；是一种与她身体之间令人快乐的无意识关系。当然，20世纪已经出现过这种女性理想。20世纪20年代，年轻女子开始让自己的胸部和腹部变平，把头发剪至齐肩处，炫耀修长的、像雄马驹一样的腿，此时她们认为自己正在追求一种新的自由和勇气，需要一种无忧无虑的、男孩的风格。如果传统的女性沙漏体形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话，那么这些问题就是限制和不流动性。但不受传统约束的年轻女子的自由，如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和多罗茜·帕克的短篇小说所精彩展现的那样，多半是一种幻觉——任何在痴迷中形成的性方面的风格都必然如此。尽管现在的形象或许会说明双性同体的独立，但我们只要考虑一下谁是这种形象的受众，就会发现其中所

包含的可怜的矛盾。

看广告的是数以千计饱受焦虑折磨的妇女和少女(有些完全可能就是广告中出现的),她们和自己身体间的关系是*有意识的*。她们陷入一种绝对矛盾的境地,一场完全没有赢家的游戏:拼命、强烈、痴迷地想获得一种冷静,轻松的自信和不经意间的自由的理想状态。看广告的是一位大概 10 岁的小女孩,我在中央公园看到过她,她入迷地凝视着父亲,满怀骄傲地说:"知道吗,爸爸,我减掉了两磅!"看广告的还有厌食症患者,她将自己对瘦的不懈追求和权力与控制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毁掉了自己的健康,束缚了自己的想象。她当然最惊人、也最赤裸地说明,在个人动机和目标方面,权力关系是多么漠然,同时又多么深地铭刻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身体又是多么出色地为它们服务。

身体与女性特质的再造

在身体上重构女性主义话语

身体——我们吃什么、怎么穿戴和照料身体的日常习惯——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正如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表明的，身体是一种有力的象征形式。文化中的主要规则、等级制度甚至形而上学的承诺都记录在这个表面，并且通过身体的具体语言得到强化。[①] 身体也可以充当文化的隐喻。柏拉图、霍布斯、法国女性主义者露西·伊利格瑞等来自不同角度的观点都认为，关于身体形态学的想象为诊察、展望社会与政治生活提供了一幅蓝图。

身体不仅仅是文化的文本，按照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等人的观点，身体也是社会控制实际的、直接的中心所在。用布尔迪厄的话说，通过就餐礼仪、排便习惯和看似无足轻重的惯例、规则与实践，文化是转化为机械的、习惯性活动的“虚构身体”。照此说来，它“超出了意识的

控制……是主动、故意的转变(所无法触及的)”[2]。我们有意识的政治行动、社会责任和争取变革的努力都有可能被我们的身体生活破坏和背叛——不是柏拉图、奥古斯丁和弗洛伊德想象的充满渴望、为本能所控制的身体,而是福柯所说的“驯服的身体”,它受控于文化生活的规范。[3]

在福柯后期的“谱系学”著作中(《规训与惩罚》,《性史》),他一再提醒我们注意,实践比信仰更重要。我们的身体受到训练、塑造,并铭刻上历史上各种流行形式,包括自我、欲望、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等,这主要不是通过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时间、空间与运动的组织和调节来实现的。对这种观点的强调为当代的情形蒙上黑暗和令人不安的阴影。因为一项又一项研究表明,相对过去而言,妇女现在花更长的时间管理、约束身体。在一个以公共领域向妇女重新开放为标志的时代,对这些控制的强化显示了它的牵制性与破坏性。通过追求一个不断变化、均质化和难以捉摸的女性特质的理想——这种追求是没有终点的,它要求妇女不断注意时尚中细小而反复无常的变化——女性的身体成为驯服的身体,这些身体中的力量和活力习惯于外界的规则、征服、转变和“改进”。通过对饮食、化妆、服装等苛刻的规范化训练——这是许多妇女一天中组织时间和空间的主要原则——我们对社会的关注减少,更加聚精会神地专注于自我修饰。这些训练让我们继续将缺憾感、不足感和不完美感的记忆留在身体上,并对其深信不疑。最极端的情况下,对女性特质的实践可能会导致我们做出伤风败俗之事,体弱衰竭甚至死亡。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女性身体的训练与规范也许是唯一一种自行实践的性属压迫,尽管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跨越年

龄、种族、阶级和性倾向的限制。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女性身体的训练和规范是一种社会控制的策略，其耐久性和灵活性令人惊讶。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承认，当代对于外表的全身心关注对妇女的影响力远在男性之上，即使是在这个自恋、视觉的文化中也是这样；这是一种反挫现象，它重申现有的性属结构，反对任何改变或者转变权力关系的尝试。[④] 的确，现在我们处于这种反挫的阵痛中。我们每天在报纸、杂志上读到各种各样的报道，它们宣扬传统的性属关系，对变化感到不安：如带着钥匙独自在家的小孩的故事、日托中心的虐待、"新女性"在男人那里遇到的麻烦，她们嫁不出去的问题等等。在青少年杂志中，一个主要的视觉主题是妇女躲在男人的阴影里，在他们的臂弯中寻求慰藉，自愿地缩小自己占据的空间。当然，最后这一点也描述了我们用以衡量妇女的当代审美理想，对这种审美理想的过分追求已经成为许多妇女的痛苦生活的根源。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关于女性身体的有效的政治话语，能够分析现代社会控制的阴险，而且常常是矛盾的路径。

要发展这样的话语，需要重新建构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女性主义范式，它将政治范畴划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坏人与受害者。在这里，我相信以女性主义的方式挪用福柯后期提出的一些概念是有帮助的。按照福柯的说法，我们必须首先摒除这样一种观点：权力由一个群体拥有，针对另一个团体；而要将它看作由实践、习惯和技术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维持一个特定领域中的支配与从属的位置。

其次，我们需要一种分析论，能够描述这样一种权力：其中心机制不是压制性的，而是构成性的："一种决意于生成各种力量的

权力，让这些力量发展起来并规范其秩序，而不是一种要全力妨碍它们、使其屈服或者摧毁它们的权力。”在女性特质的领域中，大多数情况取决于表面上对各种标准和实践的自愿接受，我们尤其需要一种福柯所说的“来自下面”的权力分析，例如，分析那些塑造、扩散——而非压抑——欲望，生成并凝聚我们的能量，建构关于正常和反常观念的机制。[5]

第三，我们需要一种话语，这种话语可以让我们解释潜在反叛的颠覆。虽然这种话语坚持有必要对权力关系、社会等级、政治对抗等等进行客观分析，但是它能让我们直面这样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主体不时陷入与维持她受压迫状态的各种力量的共谋中。

本文并非意在沿着这些线索提出泛泛的理论，而是要集中在某一特殊的领域进行分析，在这个领域中各种动能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突出，或许可以说具有代表性。这是一个有限但不同寻常的领域，是一组与性属相关，历史上有特定群体的失调的领域：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和神经性厌食。[6]我承认这些失调在历史上有阶级和种族的倾向，主要（尽管并非完全）在中产与上层阶级白人妇女中出现。但是厌食症、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可能提供一种范例，表明在维持和再造现有权力关系的过程中，潜在的抵抗不仅被暗中破坏，而且被加以利用。[7]

我要描述的中心机制包括意义的转变（或者，可以说意义的二元性），通过这种转变，客观上（在某个层面，也是经验上）是抑制性、奴役性和谋杀性的环境，却被体验为具有解放、转变和赋予生命的功能。尽管我提出的这种分析限于一个具体范围，但它可以作为例子，说明当代各种各样的批评话语如何联合起来，帮助我们认识在性属的象征和再造中，我们的身体发挥的细微而且常常是

无意的作用。

作为一个女性特质文本的身体

通过对这些失调症状的细读，女性失调与“正常的”女性特质实践之间的连续性得以清晰地展现出来，妇女在这些失调症面前特别脆弱。当然，这些失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神经衰弱与歇斯底里出现于19世纪后半叶；旷野恐惧和最具戏剧性的神经性厌食症、贪食症出现在20世纪后半叶。这并不是说19世纪不存在厌食症——许多病例被记录下来，通常是在歇斯底里症的诊断过程中[8]——也不是说20世纪妇女不再受典型的歇斯底里症状的折磨。但是，大规模的饮食失调为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所独有，正如歇斯底里是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流行病。[9]

这些失调的症候学显示了它自身的文本性。失去活动力、失声、无法走出家门、自己挨饿却喂养他人、占据空间、缩减身体所占据的空间——在支配性属的历史建构不断变化的规则下，这些特征都具有象征意义与政治意蕴。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我们发现无论是歇斯底里、旷野恐惧还是厌食症，受害者的身体都深深地铭刻着象征所述时代的对女性特质的意识形态建构。当然，这种建构总是均质化、规范化的，它抹平了种族、阶级和其他差异，认定所有妇女都渴望实现强制的、标准化的理想。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些失调症状中，女性特质的建构以令人不安的具体而夸张的方式被记录下来：对流行的女性神秘感进行夸张的、极度真实的、有时实际上是漫画式的表现。对于诠释者来说，患失调症妇女的身体由此将自己呈现为一种高度图示化文本，这一文本坚持，实际上要求被

当作文化陈述来阅读，一种关于性属的陈述。

无论是19世纪的男性医生，还是20世纪的女性主义评论家，他们都从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症状中(随着本世纪的消逝，症状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少)发现一种对模式化女性特征的夸张表达。19世纪“女士”的理想化形象是敏感、爱空想、性欲被动、性情多变但迷人。[10]从阿克顿、克拉夫特·埃宾到弗洛伊德，这些看法在男性理论家的著作中被形式化和科学化，他们用这些措词描述“正常”、成熟的女性特质。[11]在这样的背景下，分裂、漂移朦胧的感知、神经性的惊恐与昏厥、知觉麻木以及与19世纪女性失调相关的症状的极度不稳定性，都可以被视为该时期女性奥秘的具体化表现，这些都是依据支配当时普遍的女性特质建构的规则而产生的。对于后来被称为歇斯底里的性格特征，医生们当时的描述是“敏感、易受暗示、自恋、极不稳定，她们的情绪变化很突然，非常戏剧化，表面看来是基于不合逻辑的原因……极端自我中心……基本上没有性欲，还经常性冷感”[12]——这些都是符合那个时代女性特质的特点。正如埃莱娜·肖瓦特指出的，“歇斯底里”这个词本身与该时代文献中的“女性”一词几乎可以互换。[13]

但是，与旷野恐惧和厌食症巧妙的写实手法相比，歇斯底里所体现的那个时代的女性奥秘显得微妙，而且难以言喻。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写实手法是可以理解的。随着电影、电视的出现，女性特质规则越来越多地通过标准化的视觉形象，在文化的层面上传播。结果，按照欧文·戈夫曼的描述，通过对自我进行恰当的表层展现，女性特质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关于建构的问题。[14]关于什么是女人或者女性特质由什么组成，我们不再看到文字描述或者是范例，而是直接通过身体话语了解这些规

则:各式各样的形象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服装款式、身体形态、面部表情、动作姿态以及行为举止是女性所必需的。

在旷野恐惧和更有戏剧性的厌食症中,失调本身是对20世纪女性特质建构的实质讽刺,虽然这种讽刺有悲剧色彩。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即旷野恐惧症刚刚在妇女中间逐步蔓延的时期,是一个将家庭生活与附属依赖重申为女性理想的时代。"职业妇女"成了贬义词,程度比战争时期严重得多,由于妇女自觉地承担"男人的工作",战时的经济才得以发展。贝蒂·弗里丹对女性特质的主导意识形态进行了精彩描述,在当时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中也得到完美展现,那就是天真无邪、优柔寡断和失去男人时的无助,"满足于卧室、厨房、性、婴儿和家庭构成的世界"[15]。不能外出的旷野恐惧患者真实地展示了这种女性特质的建构方式。"你想我在这个家里?我就在家中——彻底地!"许多治疗专家曾经对这一点进行评述,这里就不详述了。正如I. G. 福德所言,旷野恐惧似乎是这个时代"妇女固有的文化性别角色虽然极端但合乎逻辑的延伸"[16]。

当代妇女的理想形象是骨瘦如柴,厌食症患者瘦弱的身体正是对这一理想的直观和讽刺的模仿,尽管这一理想存在种族与民族差异,但现在已经成为妇女的标准。但是苗条只是冰山一角,因为苗条本身也需要阐释。"C'est le sens qui fait vendre"——影响销售的是意义,这是巴尔特谈到服装款式时说的。[17]因此,同样地,是意义让身体变得令人羡慕。如果说厌食症是"关于"苗条的,苗条在此也是作为当代与历史意义的储藏库而被涉及的,而不是空泛的时尚理想。既然如此,对苗条的阐释便产生多重解读,有的与性属有关,有的无关。为适合本文的目的,我将提供一个简略的、

以性属为中心的解读。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解读仅仅揭示了部分问题，许多本文中未涉及的思潮也具有重要意义，包括经济、社会心理、历史、种族和阶级的视角。[18]

我们首先研究的是，控制当代女性特质建构的规则在厌食症患者的身体上留下的真实的痛苦印记。这种建构是一种双重约束，规定了自相矛盾的理想和指令。一方面，我们的文化仍在大肆宣扬女性特质的家庭生活观念，这是对劳动进行严格的二元性别分工的思想支柱，这样，妇女被定位为精神和身体所需养分的主要提供者。这种女性特质（我在此使用的语言既是字面意义，也有象征意义）建构的规则要求妇女学习养育他人而非自我，将任何自我培养、自我养育的欲望解释为贪婪、过分。[19]因此，妇女必须开发完全为他人着想的情感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对女性食欲的控制不过是控制女性特质建构总则的最具体的表现：女性对公共权力、独立自主、性满足的欲望受到抑制，妇女可以占有的公共空间受到限制。图 23 出现在一本女性杂志的时装广告中，戏剧性地说明了苗条在复苏的阳刚之气，以及当前男性身体理想的衬托下，面对男性对社会空间的决定性占有，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脆弱和缺乏权力的内涵。这些规则冷酷而深刻地铭刻在厌食症妇女的身体上。

另一方面，即使当今的年轻妇女继续被灌输传统的“女子”美德，但由于职业领域已经向她们开放，她们也必须学习这个领域中的“男子”语言和价值——自我控制、意志坚强、头脑冷静、情绪约束、掌控力等等。女性身体用她们纤弱瘦削的形态与流行的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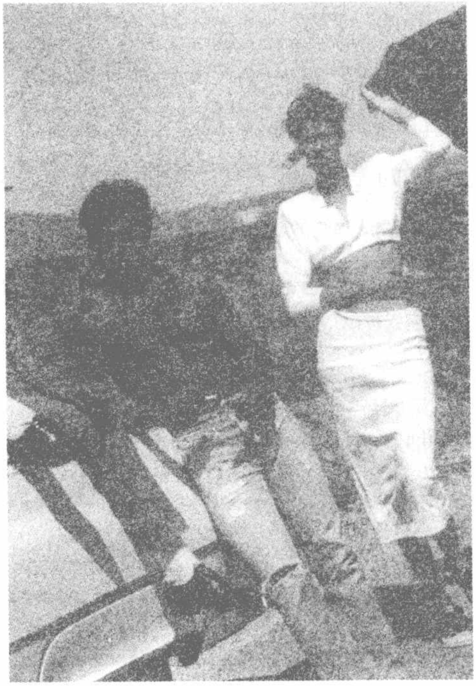


图 23 这是一幅时装广告，图中身材纤细的女模特与身形健美的男模形成鲜明对比。

化服装的外表，象征性地诉说着这种必要性（如图 24 所示的当代服装界一个巧妙的镜像标识中，模特的姿态既暗示出阴茎自信，又有女性的妩媚，为“新男性”提供女性时尚）。当我们每天不辞辛苦地走进健身中心，拼命抗拒饥饿和欲望来安慰自己时，我们的身体也正在越来越多地实践关于控制和自律的“男性”美德。图 25 阐明当代的这个等式：身体约束等于成为自己灵魂的“指挥者”。厌食者一心一意、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些品德。“活力、训练和我自己的力量将使我前进，”曾经患过厌食症的刘艾梅在回忆她厌食的岁月时说，“没有要求，也不需要任何人……如果我不能做到别的，我将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我发誓”[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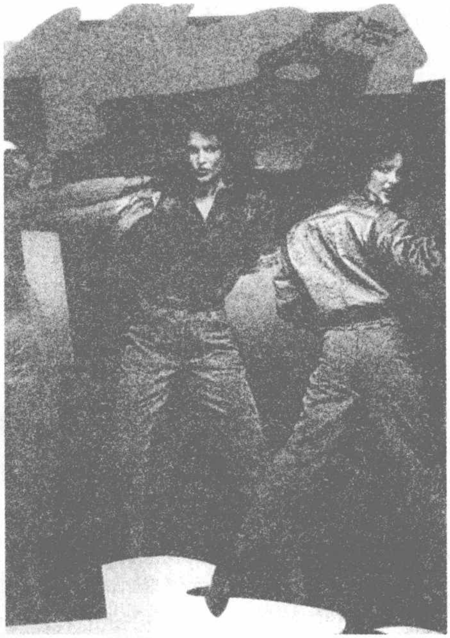


图 24 这是一则服装广告，广告中的女模特正展示具有鲜明男性风格的服装。



图 25 这是一则服装广告，广告右侧有一段女模特的内心独白："他是我的灵感，我的爱，让我惬意，但我是自己灵魂的指挥者。"

因此，苗条的理想，以及与之无法分开的饮食、锻炼的生活习惯，通过身体提供了一种幻象，似乎达到了当代女性特质的矛盾要求。流行形象反映了这种双重要求。在《完全妇女》(*Complete Woman*)杂志的同一期中登载了两篇文章，一篇关于“女性的直觉”，另一篇则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有男子气概的新式妇女吗？”在电影《夺标 27 秒》(*Vision Quest*)中图 26，年轻的男主人公爱上了女主人公，用他的话说，是因为“她拥有我喜欢的女孩子的全部优点和我喜欢的男人的全部优点”，也就是说，她坚强冷静但热情迷人。在风靡一时的电影《异形》(*Aliens*)中，女主人公的性格通过近乎连环漫画书的坦白率直被刻意地建构，她既体现了传统的养育型女性特质，又有惊人的男性威力和控制力；其扮演者西戈尼・韦弗称这个角色是“女兰博”。



图 26　这是影片《夺标 27 秒》的宣传画。

通过追求苗条、否定欲望，传统的女性特质建构与对妇女的新要求相交叉，新的要求是妇女应该体现公共领域里的“男子”价值。正如我已经说明的，厌食症以其特别痛苦和生动的方式体现这种交叉和双重约束。[21] 在此，我所谓的双重约束强调的是字面意思。至少，自从 19 世纪起，也许更早，“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都是在相互排斥的过程中被建构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历史上的女性美

德和男性美德相加，就产生一个新女人、新男人，或是新的伦理、新的文化。即使是在银幕上或者电视中，以创造出来的角色来体现这种相加，如《异形》中的女主角，结果也是一种拙劣的模仿。不幸的是，在这个充斥着眼花缭乱的形象的文化中，要辨清拙劣模仿与自我可能性的界限已经日益困难。当我们把“双性同体”作为一种自我可能性进行挖掘时，这种理想最终暴露其内部矛盾，成为一场将主体撕裂成两半的战争——许多厌食症患者明确认为这场战争的主题是男性自我与女性自我间的战斗。[22]

相同姿态的抗议和退让

因此，在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和厌食症的状态下，妇女的身体被视为一个表面，传统的女性特质建构在这个表面上以极端或极度真实的形式刻写下来，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当然，用来书写的语言之痛苦骇人听闻，似乎这些身体等候在“正常的”女性特质的视野中，向我们诉说着潜伏在附近的病理与暴力。在女性主义文学中，一个持续不变的关于女性失调的主题，就是用病理来体现抗议，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抗议存在于无意识、处于萌芽状态，或者事与愿违，虽然它没有有效的语言、声音或者政治，但仍然是抗议。

美国和法国的女性主义者们都已听到歇斯底里症患者在说一种抗议的语言，甚至当她沉默的时候也是如此，或许更明显。安娜·欧的失语症表现为不能使用她自己的本族语德语，黛安娜·亨特将此解释为对她父权的语言和文化规则的反叛，和向“母语”——婴儿时期符号性的牙牙学语、一种身体的语言——的回

归。亨特和其他许多运用拉康理论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回到符号水平既是一种回归，也是亨特所说的“与父权制思想”的“富有表现力”的交流，是“女性话语自我否定的形式，身体通过这种形式表示因社会条件限制无法用语言说明的信息”[23]。凯瑟琳·克莱门特在《新生的妇女》中写道，“歇斯底里症患者在控诉，她们是有所指的”，她们对“文化进行冷嘲热讽”[24]。在同一本著作中，埃莱娜·西苏谈到“那些了不起的歇斯底里患者，因为她们，弗洛伊德必须忍受许多羞于启齿的骄奢淫逸的时刻；她们利用自己放荡不羁、充满激情的身体语言攻击他拼凑起来的摩西定律，用听不见的雷鸣般的谴责困扰他”。在西苏看来，令弗洛伊德倍感无奈的朵拉，就是“妇女内在抗议力量的核心典范”[25]。

抗议的文献既包括实用的方法，也包括象征的方法。例如，罗伯特·塞登伯格和卡伦·德克罗这样描述旷野恐惧症：它是对于“通常要求妇女履行的自我克制”和家庭主妇的职责的“罢工”，这些职责包括购物、开车送子女上学、陪伴丈夫出席社交活动等。[26]卡罗·史密斯-罗森伯格对歇斯底里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认为通过阻止妇女尽到妻子的责任，如照顾小孩、做丈夫和孩子的“守护天使”，歇斯底里“成为传统妇女表达对生活某个或几个方面不满的一个途径——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表达”[27]。许多女性主义作家将厌食症阐释为一种无意识的女性主义抗议，其中表达最清楚有力的当属苏茜·奥巴赫。用奥巴赫的话说，厌食症从事的是“绝食罢工”，她强调这是一个政治话语，在这个话语中，拒绝食物和身材的戏剧性变化“与身体一道表达出（厌食症患者）无法用语言传递的信息”——这是她对一种文化的控诉，这种文化轻视、压抑女性饥饿，使妇女为自己的食欲和要求感到羞耻，要求妇女不停地转

变她们的身体。[28]

当然，厌食症患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发表政治声明。事实上，她也许会对女性主义以及其他任何批评观点抱有敌意，因为她认为这些评论怀疑她自己的自主权与控制权，或者质疑构成她生活的文化理想。她正是通过追求这些理想以至将其破坏潜力公之于众，借助具体而非刻意的示威，对这种理想进行揭露并予以控诉。

而且，表示抗议的相同姿态也是退缩的信号，或许这一点才是这一症状真正的诱人之处。例如，金·彻宁认为，当这一代人有可能超过母辈，过着较少约束、更加自由自在的生活时，她们会产生内疚和分离焦虑，通过阻止或者延缓个人的发展，让人身体衰弱的厌食症偏执能缓和这种内疚和分离焦虑。[29]旷野恐惧在许多情况下也明显发挥这样的作用，这种病症多发生在新婚不久，当女性面对不满和烦恼等无法忍受的躁动情绪时，这些症状可以增强女性的依赖感与附属感。

尽管我们可以意味深远地谈论抗议，但我要强调这种抗议的本质：它的反作用与悲剧性的自我挫败（其实是自我解构）。从功能上讲，这些失调的症状使患者孤立、衰弱、受到损害；同时她们将身体的生命变为吸纳一切的拜物对象，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受到关注的事物都相形失色，变得不真实。同样地，在象征层面上，抗议走向反面，宣布主体的彻底投降，屈服于紧缩的女性世界。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歇斯底里症患者的失语及其向纯粹、基本的身体表达性的回归，已经被解释为放弃父权制的象征秩序，恢复已经失落的符号、母性价值世界。但与此同时，失语当然是沉默不语、没有怨言的妇女的状态——是父权制文化的理想。通过自己的失声抗

议遏制女性声音的行为——即利用女性特质的语言对女性世界的状态提出抗议——总会涉及诸如此类的模棱两可。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用女性特质的语言明确表达的症状如此完美地适于表达这些生活在性属变革边缘时期的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妇女的困境,她们拥有社会和物质资源,能够将传统的女性特质建构传递到象征的极端,但是又面临着新的可能性带来的焦虑。在 19 世纪末、二战后和 20 世纪末,性属都成为有待探讨的话题,在这些时期里,有关"妇女问题"、"新妇女"、"妇女需要什么"和"女性特质是什么"的话语急速扩散。

共谋、抵抗和身体

矛盾的是,女性抗议的种种病理似乎与产生这些病理的文化条件相互串通,恰恰再造而不是改变它们所抗议的一切。在这层关系中,在文化上对抗试图重组和重新定义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历史时期,歇斯底里和厌食症达到最高峰,这个事实意义重大。女性的病理学在此自我展现为极其有趣的社会构成,一种抗拒和反叛的潜在资源由此被用来应急,维持已经建立的秩序。

当我们试图解释这种构成时,我们不能对权力关系做客观的描述,因为无论产生这种病理的客观社会关系是什么,症状自身必须由主体产生(无论多么不知不觉或漫不经心);就是说,个人必须为身体赋予各种各样的意义。用马克·波斯特的话说,只有从主体的立场上考察这一生产的过程,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中生产意义的程序中阐明统治机制",就是说,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发现主体的欲望与梦想如何蕴含在权力关系的矩阵中。[30]

在这里，考察厌食综合征产生的背景将具有启迪意义。因为某人（通常是父亲）漫不经心的批评，人们开始比较适度的节食养生，然后突然演变成厌食。厌食症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常规的女性实践中开始并从中产生的。在实践的过程中，出于各种各样的个人原因，这种做法稍微超越了适度节食的界限。年轻女性明白渴望、希望、需要是怎样的感觉，而通过实践自己的愿望来战胜需要又是怎样的感觉。在此过程中，一个新的意义领域被发现，即西方文化向来编码为“男性”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可能性，这些观念和可能性很少适用于妇女：自我控制和自我超越的道德体系和审美标准、专业知识，以及通过胜人一筹的意志力和控制力而显示的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力量。这样的体验令人陶醉，并逐渐演变成为习惯。

在学校里，厌食症患者发现自己日渐消瘦的身体受到羡慕，不是作为审美对象或性对象，而是因其投射出的意志力和自控力。在家中，父母为让她进食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争战，从中她发现她的行为对于周围的人具有极大的支配力。随着躯体开始失去传统的女性曲线，她的胸部、臀部和丰满的小腹，无论在感觉上还是外表上都更像瘦削修长的男性身体，她开始感到自己不可触及、不会受到伤害，如一个学生在日记中叙述道：“当骨骼雕刻出我的轮廓时，我感觉是不会受伤的，纯净而又结实。”她尤其鄙视那些继续表明她是女性的身体部位。刘（艾梅）则说：“真希望能除掉它们（我的胸部），如果必要的话就把它们切掉。”[31] 正像许多其他厌食者一样，对她而言胸部代表自我中迟钝、无意识和容易受伤的一面。刘的身体象征主义完全是主流文化联想的延续。布雷特·西尔弗斯坦对“女性以苗条衡量身体魅力的若干成因”进行研究[32]，从经验上验

证了每一部包含一位身材傲人妇女的喜剧所传递的明显信息：我们的文化是把曲线美与无能联结在一起的。当然，厌食者也明确地意识到，拥有女性身体在社会与性两方面都是非常脆弱的。事实上，她们许多人在童年时期曾经遭到性虐待。

相反，在厌食症中，她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条通向拥有特权的男性世界之路，一种在我们文化中被重视的方式，一种生活在安全之中并且出人头地的方式——对她而言，这一切具有相同的意义。矛盾的是，她是在过度追求传统的女性品行——在这种情况下，她将身体作为一个物体进行规训与完善——时发现这条路的。在这种过度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传统的女性被解构，走向了她的反面，认同那些被我们的文化编码为男性的价值观。厌食者体验到解放的喜悦，为了保持这种感觉，她将与家庭、朋友和治疗师作战，如果必要的话，她将以死相抗，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厌食者对权力的体验是一种彻底的幻觉，非常危险。将我们的身体重新塑造为男性身体，**并非**为自己增添了男性的力量和特权。强迫身体与灵魂进行身体实践，由此获得独立自主、自由自在的**感觉**，这种做法是服务于，而非改变一个限制女性发展的社会秩序。另外，对女性而言，变为男性只是把自己置于容颜衰退反面的另一面。女性塑身的新“力量外表”鼓励妇女锻炼健硕的、三角形的体型，而这一直都是男性健美者的准则；它并不比传统的“女性”标准更少受到等级制与二元论性属建构的制约，这种标准多年来支配了像贝弗·弗朗西丝(Bev Francis)等女性健美者。

尽管歇斯底里和旷野恐惧的具体的文化实践和意义都有所不同，但是，我觉得发挥作用的机制是相似的。这些病例也一样，当女性特质的语言被过度利用时，当她们喊叫和坚持、破坏和苛求

时，这些语言被解构，陷入其对立面，使妇女拥有一种虚幻的权力体验，而因为性属，她过去没有过这种体验。在19世纪女性特质的病例中，那些冲破枷锁，尤其是道德和情感枷锁的体验是要被禁止的。精神病院的改革者约翰·康诺利建议收容“想要对激情进行限制，否则将失去其女性特征”的妇女。[33]歇斯底里症患者往往令男性医生感到愤怒，因为她们缺乏的正是这种品质。S·韦尔·米切尔说这些病人“让医生深感绝望”，她们“霸道的自私损害了护士和挚爱亲友的健康，在无意识或半清醒的自我放纵中摧毁身边每个人的舒适生活”[34]。对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病人来说，能够这样瓦解19世纪一成不变的家居生活，她们一定从中感受到了难以言传的快乐。我相信，旷野恐惧的体验也包含了与此相似的权力形式。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失调症的基本事实不是痛苦和圈套。显然，厌食症同样有身体上沉溺于饥饿的生化效应的一面，但无论涉及何种生理学现象，都不能把主体理解自己的经验和赋予其意义的方式简化为一个机械过程。厌食者能够靠摄取最少的食物而生存，这一点使她感到自己强大有力，值得在一个“世界”中被羡慕，如苏茜·奥巴赫描述的，“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她)感到自己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而且不受重视。[35]有关厌食症和歇斯底里症的文献记载着患者和试图“治愈”她的人之间的战斗，这是关于意志力的战斗；奥巴赫认为，而后者，很少认识到，对于妇女而言，她奋力争取的精神价值比生命本身更为重要。

文本性、实践与身体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厌食症、歇斯底里和旷野恐惧提供的“解

决方法”是从女性特质实践本身中发展而来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对女性特质的追求仍然被视为女性得到认可、获得成功的主要途径。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这种实践过分出格，也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按照苏珊·布朗米勒所说，如果女性特质在其本质上是“强加限制的传统”[36]，那么，不愿意限制自己就是违反规则，即使是为了追求女性特质。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些规则固若金汤，不会被打破。患者执著于一种强迫性的实践，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任何有效的变化。正如陶丽·莫依所言，她仍然“受制于女性角色，没有发言权”，复制了女性特质驯服的身体。[37]

一种失调的心理意义可能产生反叛的幻象，并将抗议的语言具体化，而失调身体的实际生活可能彻底击退反叛并颠覆抗议，如果仅仅强调象征意义，缺乏对实践的关注，或许会模糊这两者之间的紧张状态。正如我们从拉康学派的女性主义者对歇斯底里症的解读中看到的，这种做法会导致片面的阐释，将憋在床上的歇斯底里症患者对菲勒斯中心秩序的象征性颠覆浪漫化。这并不是说“憋在床上”的意义一目了然、没有歧义，如无能为力、体质虚弱、附属依赖等等。“实际的”身体不是粗野的生物或物质的实体，它也是文化的媒介形式，其活动受制于阐释和描述。我转向现实的维度并不是向生物或自然的转变，而是转向福柯所说的文化身体的另外一个“语域”，是“有用的身体”的语域而非“可认知的身体”的语域。[38]我相信，这种区分对于女性主义的话语是有益的。

可认知的身体包括科学、哲学和美学对身体的再现，是我们的文化关于身体、美的标准和健康典范等的观念。但是，同样的再现也可以被视为能形成一套实践的规则与制度，通过这些规则和制度，活生生的身体受到“训练、塑造，遵守并做出回应”，简言之，成

为适应社会、对社会“有用的身体”[39]。以下就是一个非常明显、恰当的例子：19世纪的沙漏体形强调蜂腰衬托下的丰乳肥臀，这就是可以认知的象征形式，代表一种家庭的、性别化的女性特质理想。通过使用紧身胸衣和女裙撑架表现出来的女性形式和男性形式之间强烈的文化对比，以象征的方式将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二元划分明确表现为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与此同时，为了获得这种规定的外表，需要特殊的女性实践——用系带缚紧、吃最少的食物、减少活动性——使女性身体不适宜在指定区域之外活动。用福柯的话说，这就是符合审美准则的“有用的身体”。

可认知的身体和有用的身体是一种话语的两个方面，就像在上面的插图中，它们相互反映、互相支持。在17世纪关于身体的哲学观念中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即将身体视作机器，反映越来越自动化的劳动力生产机器。但是两个身体也许会相互抵触、相互嘲讽。如前面提到的，一系列当代的再现和形象已经在权力、意志、支配权和在专业领域成功的可能性方面，为超越女性食欲、公开展示苗条的理想编码，这些联想以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和卖座电影中的苗条的女超人为视觉载体，通过在女性时装杂志、节食指南和关于减肥的出版物中定期出现得到推广。但是有成千上万的苗条少女和妇女努力表现这些形象，在努力的过程中忍受饮食失调的痛苦，体验克制不住的冲动和无休止的自我检查、自我惩罚，但她们决非自己生活的“主人”。

只有当分析涵盖对“有用的”，或者我更喜欢说的实际身体的关注和阐释时，才能暴露形象与实践之间矛盾而难解的关系，并对此进行有效的文化分析。尽管这种关注的形式往往不成熟，缺乏理论深度，但对于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发端至关重要。20世纪60

年代末、70年代初，对女性身体的物化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所有女性特质的文化装备，所有学习通过身体实践达到视觉与性欲满足的文化装备——媒体形象、选美游行、高跟鞋、束腹带、化妆品、伪装高潮——都是维持性属统治的关键因素。

令人不安的是，对于当今时代的女性主义者而言，对女性实践的政治的关注，尽管还存在于个别女性主义者的作品中，但已经不再是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中心了。[40]在流行的前沿，我们看到《女士》(*Ms.*)发行的几期关于健美与"风格"的杂志，它们是为80年代为定位"自我表现"和"权力"重新建构的修辞学。尽管女性主义理论的确有自己的工具，但尚未提出消解此修辞学并揭开其神秘面纱的批评话语。法国女性主义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框架，使我们能够理解菲勒斯中心和二元文化如何被刻写在性属化的身体上，但是在将女性身体作为一个实际文化控制的聚焦点进行具体分析这方面却贡献甚微。在这个国家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中，对于女性身体的文化象征的研究蓬勃开展，经常提出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有助于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解读文化。[41]但仅仅研究文化的再现而不考虑再现与身体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使意义模糊甚至产生误解。

关于这一点，海伦娜·米奇的《肉体制造的词语》)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该书的标题含义丰富。米奇考察了19世纪对妇女、食欲和饮食的再现，敏锐地发现在女性饮食和女性性欲之间耐人寻味的隐喻性联系。她认为，女性饥饿"象征难以言传的对性和权力的渴望"[42]，这一点我也同意。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不能刻画妇女进食(用米奇的话说，很明显，这是只能"发生在后台"的活动)，这样，这种"再现禁忌"(representational taboo)成为压抑妇女

性欲的“代码”，就像文化的一般要求一样，这些要求记录在当时的礼仪手册、性别手册中，有教养的妇女要吃得少、吃得优雅。米奇认为，在当代女性主义者“颠倒”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念时，运用的是同样的编码系统，这种颠倒就是通过为女性饮食、女性饥饿而欢呼的形象来颂扬女性性欲和权力，明确、丰富而又兴高采烈地将这种编码系统描写出来。

尽管米奇的分析围绕妇女的饥饿、食品和饮食习惯等问题展开，但并未提及在19世纪末期浮出水面、至今还在蹂躏年轻女士们的严重的饮食失调。在某种程度上，她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属意识形态的研究暗示了妇女节食、禁食、束身等实际的领域。但是在研究的结尾处，米奇转而考虑当代女性主义文学颂扬女性饮食与女性饥饿，对妇女今天实际上如何控制她们的饥饿连轻描淡写的涉及都没有，这就使她的分析因缺乏任何具体社会事实的支撑而显得轻浮。米奇关注的唯一焦点就是女性主义文学不可避免地未能逃开“阳物崇拜的再现代码”(phallic representational codes)[43]。但是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体的颂扬并不仅仅在书写的纸张或是画布上遭到解构。这种颂扬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反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文化的层面上已经被当代截然不同的现实取代。如今，在我们的文化中，妇女们，包括女性主义者们，几乎将自己饿死，此时颂扬女性的肉体显得十分不合时宜。

这并不是要否定节食、锻炼和其他形式的身体管理的好处。事实上，我将我们的身体视为一个斗争场所，在这里，我们必须努力保持日常习惯，为了抵抗性属统治，而不是为了顺从和性属规范化。我相信，这种努力需要一种坚定的怀疑态度，怀疑我们文化提供的看似解放与快乐的途径。它还需要意识到形象与实践、修辞

与现实之间通常矛盾的关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流行的再现可能有力地运用权力授予、个人自由、“胜人一筹”的修辞学和象征意义。但追求这些理想的女性身体却可能落得精神涣散、情绪低落、疾病缠身，就像19世纪追求小鸟依人、家庭生活、纤细脆弱的女性理想的女性身体一样。要认识到这些矛盾及其他的文化借以让我们的身体参与到性属再造的共谋、颠覆和诱惑，并对其进行分析，需要我们恢复对女性实践的关注在女性主义政治学中原有的中心地位。

解读苗条的身体

可以证明，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这些衣食无忧的西方人第一次为了追求一种审美理想，开始系统地拒绝食物。[①] 当然，其他文化中也存在节食现象。高贵的希腊文化曾研究过如何控制食物摄入，将其作为掌控自我的途径，也是一种以适度原则对待万物的实践。[②] 禁食的目标是净化精神、支配肉体，它是中世纪基督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这些节食方式可以被明确视为“自我”发展的工具——不管是对基督徒而言的“内在”自我，还是对希腊人而言的公共自我——将自我建构为一个领域，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的优点。因此，只有少数人、贵族或神父才有资格禁食和禁欲，他们被认为能够实现这种精神上的卓越。但到了 19 世纪晚期，中产阶级开始热衷于管理身体，对节食的关注也与追求一种理想化的体重或体形联系起来；对身体的管理成为一项服务于身体而非灵魂的计划。肥肉取代食欲和欲望成为众矢之的，而且人们开始用磅秤上的数字，而不是他们控制冲动和过度的水平来衡量自己的节食成果。此时，（如金·彻宁所称的）资产阶级“苗条的暴政”[④] 开始确

立它(尤其对妇女)的支配地位,为了纯粹改变身体,各种手段——节食的、锻炼身体的,还有后来的化学药品和外科手术——也应运而生。

如今,我们已经敏锐地认识到这些技术和其周围的产业具有规模大、层面多的性质。如果存在一种普遍的批评意识,那么它也将大部分注意力(这并不奇怪)放在那些被视为病态或极端的事物上——那些"上了瘾的"或走"极端"的不幸的少数群体。电视脱口秀讲述灾难性的故事,起因是胃间隔手术、胃泡、胃肠绕道手术、流食、强迫性锻炼。各种杂志警告人们减肥手术和抽脂术的危险。关于贪食症和神经性厌食症的书和文章迅速增加。大众媒体对饮食失调的描绘通常是骇人的;当受众们看到骨瘦如柴的身体的图片,或对一般的暴食过程中所吃大量食物的详细描述时,他们都目瞪口呆。这种展现在("正常的")受众和这些被展示的人("反常的人")之间创造了一种"附带"关系。即便受众仍然能从前台的人的行为或报告的经历中认出他们自己,他们所面对的是"病态的"或在这种标准之外的自己。

当然,只要原因是这些行为所需要的财政资源,那么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这个标准之外的,但对于肥胖、节食和苗条的关注不是反常的。[5]的确,这种关注或许是我们这个世纪中最强大的标准化机制之一,为生产自我监控和自我规训的"驯服的身体"保驾护航,这种身体对任何偏离社会规范的现象都很敏感,并为了服务于这些规范而常常进行自我改进和自我转化。在这种背景下,对"病态"、失调、事故、突如其来的灾难,和怪诞行为的关注模糊了节食和身体管理技术的标准化功能。女人受这种控制的支配,程度上比男人更深,而且从历史上看,范围更广,对她们而言,对"病态"的

关注(除非嵌入一种政治分析)将注意力从一种性属再造的主要手段上移开。

在这篇文章中,我通过分析各种通俗再现,考察节食和锻炼的标准化角色,这些再现将节食和锻炼的文化意义明确化、用隐喻的方式编码,并加以传播。更确切地说,我在此继续思考玛丽·道格拉斯的深刻见解:“微观世界”,即物质身体的形象能象征性地再现“宏观世界”,即社会身体的主要弱点和焦虑。[6]我将解读一些在我们的时代和苗条的形象相关的主导性含义,将它们作为象征性记载文化的文本或表象,以此来分析这种观点。[7]

我论述的第一步是对当代理想进行解码,以此来揭示其中所包含的心理焦虑和道德评价——关于对冲动和欲望的正确和错误管理的评价。在这个过程中,我将描述身体外形和尺寸的两种不同象征功能间的关键差异:(1)表示社会地位,如阶级状况或性属角色;(2)个人的精神、道德,或感情状态的外在表征。然后,借助罗伯特·克劳福德的重要著作,我转而分析消费文化这一社会身体,以此说明这种文化中对欲望的“正确”管理,尽管事实上需要对人格进行矛盾的双重约束式建构,却如何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不稳定的贪食症性格类型作为其标准,同时还有肥胖和自我挨饿这两种相对的极端。[8]我认为,这些现象象征了社会身体的矛盾——这些矛盾让自我管理在我们文化中成为一种无休止和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我将性属引入这个象征框架中,说明其他的相关因素(一方面,存在对女性欲望的文化控制;另一方面,女性拒绝做一个纯粹的生育者)如何从多方面将苗条定为女性当前的理想。

当代焦虑与敌人般松弛的肌肉

在专题节目《20/20》中，人们让几位10岁的男孩看一些时装模特的照片。这些模特体形纤细，但是她们摆出的姿势却让臀部微微凸起，然后身体的活动将其隆起——除非一个人的身体只剩骨头，要么肌肉是最紧凑的，否则这种变化是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弯腰、坐下的时候，肉自然会在聚集在一处。这些小男孩指着她们的臀部，厌恶地称这些模特是"胖子"。在看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被这些男孩的反应惊呆了。但不可否认，当我回顾20世纪70年电影中的女性身体时，我自己的看法同样让我吃惊；曾经苗条和健美的身体现在似乎变得松弛、难看。在这些改变的看法中，体重不是关键——我并没有对更瘦的身体产生好感——相反，我所期望的是一个更紧凑、更光滑、更从容的身体轮廓（见图27，它出色地体现了这种理想的本质）。

同样，厌食症患者的自我批评所关注的通常是身体特别柔软、凸出的部位（经常是腹部），而不是整个身体。在艾拉·萨克和马克·齐默的《疯狂瘦身》中，卡伦（Karen）努力破除厌食症患者错误地将自己的整个身体视为肥胖的神话：

> 我希望能恰当地表达我的意思，因为这是重要的。你必须理解。我不认为我的整个身体都是肥胖的。当我照镜子的时候，我没有在里面看到一个胖子。我看到我身体的某些地方确实是瘦的，比如胳膊和腿。但我一吃东西的时候，我就感到自己的胃胀了起来，就像猪的一样。我知道它胀了起来，这

让人恶心。这就是我内心的想法——我所坚持的想法。[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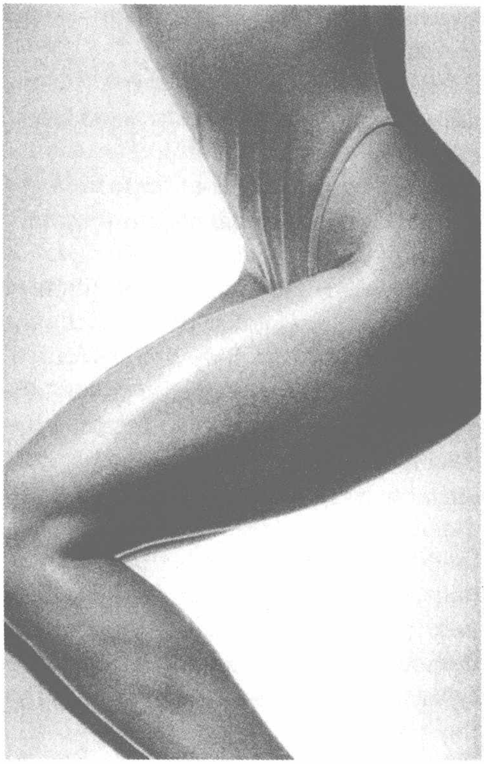


图 27

又如达尔马·海恩关于“身体视界”的文章中芭芭拉的看法：

有时，我的身体看上去太肿胀，都不想穿衣服了。我只喜欢每个月的两天中它的样子：通常是我经期过后的第八、第九天。其他日子里，我的胸部、我的腹部——它们简直是可怕的肿块、肿胀和膨胀。我的身体可以在任何时刻找我的茬；它是一堆无法控制的肉。[10]

从心理分析和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于这些说法已经做过很多评论。但现在我想从性属象征主义之外的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些多余的肿胀和喷发的胃的形象。我想把它们看作一个隐喻，象征对于失去控制的内部过程的焦虑——无法控制的欲望、无法克制的饥饿、失去控制的冲动。在当代的恐怖电影和"狼人"影片(《嚎叫》(*The Howling*)、《伦敦的一只幼狼》(*A Teen Age wenewolf in London*)，还有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重拍的《苍蝇》(*Fly*)中，身体喷发的形象常常以这种方式象征性地起作用。原版的《苍蝇》想象了苍蝇身体和人身的机械结合，是"半人、半兽"形象的变体。在柯南伯格的《苍蝇》中，就像在"狼人"类型的影片中一样，一种新的、异类的、好色的和失去控制的自我从受害者之前的肉体的伤疤中迸发出来(与此相关并被经常复制的形象出现在《异形》中，在此影片中，一个寄生虫从人类寄主的胸腔中冲出来)。在广告中，将身体想象为一个异类的攻击者，威胁要以丑陋的方式，作为膨胀的肉体冲出来，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形象。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超标的体重一直是多数节食产品广告的靶子；今天，人们很有可能会发现敌人成了肿胀、脂肪或者松弛的肌肉。"现在，"一则典型的广告说道，"摆脱这些尴尬的肿块、肿胀、肥胖的肚子、松弛的胸部和臀部。让自己焕发青春，远离臀部和腿部的脂肪团……拥有一个没有肚子的好体形。"要实现这些目标(通常被想象为完全消除身体，就像"没有肚子"所表明的那样)，就需要对敌人发动猛烈攻击；必须"攻击"并"毁掉"肿胀，"烧毁"脂肪，"毁坏"并"消除"肚子(或者，更恶心的说法，"内脏")(图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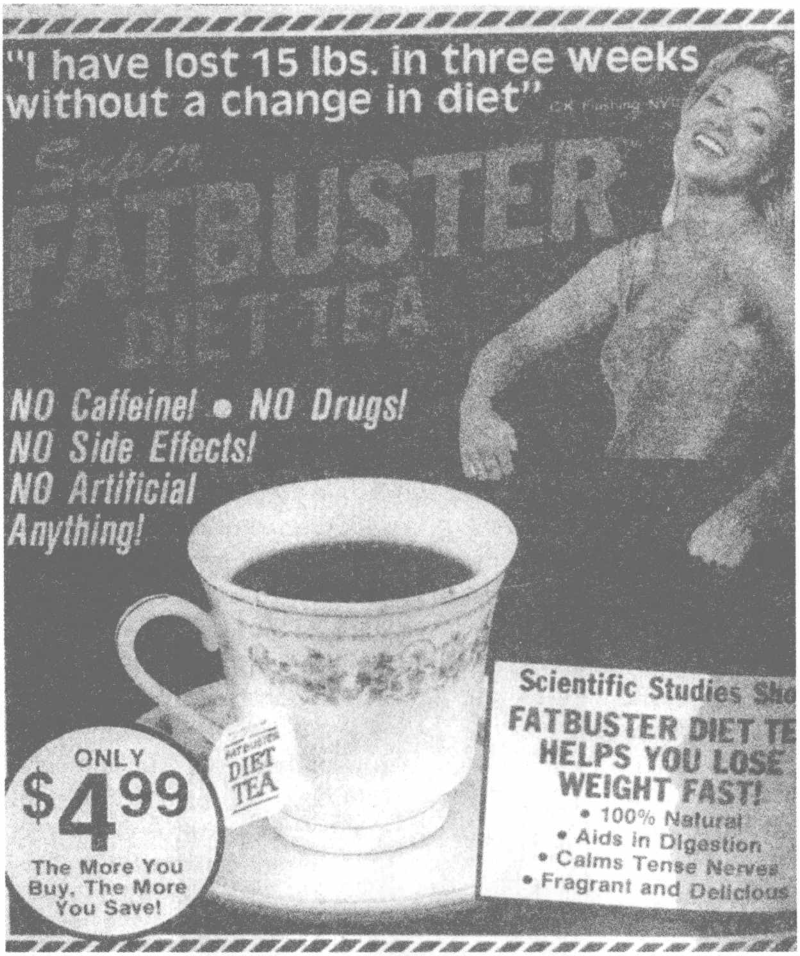


图 28 这是一则减肥茶的广告，减肥茶名为 Fatbuster，buster 在英文中有“推、铲”之意，说明此款减肥茶有很好的功效。

皮下脂肪切除术是一项主要用于抽取正常体重的人（不建议用于肥胖的人）身上多余肿胀部分的技术，虽然很不安全，却越来越受欢迎，这说明我们对身体肿胀的反感到了什么程度。这里的理想体形是一个绝对紧凑、自如、“拴紧”、结实的身体：换句话说，是一个与内部的爆发隔绝，内部过程受到控制的身体。柔软、松垮，或“波状”的部分是不可接受

的，即便极其苗条的身体也是如此。控制脂肪团的方法，像皮下脂肪切除术，和减肥没有关系，完全是为了追求结实的身体曲线。

这种视角有助于说明我们文化中强迫性节食和健身之间一种重要的意义上的连续性，并揭示当代的女性魅力的形象为何能如此轻易地在一个瘦弱的、“极简的”外表，和一个结实、强壮、运动的外表之间摇摆。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形象之间的共存并不表明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个包含空洞的、互相之间不断区分的形象的后现代世界。相反，尽管这两种理想表面上不同，却联合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柔软、松垮；不结实、多余的肉。在我们的文化中（即便对女人而言），分量重、块头大是完全可以的，只要不松垮即可。仅仅 苗条是不够的——肉不能“荡来荡去”（图29）。这样，我们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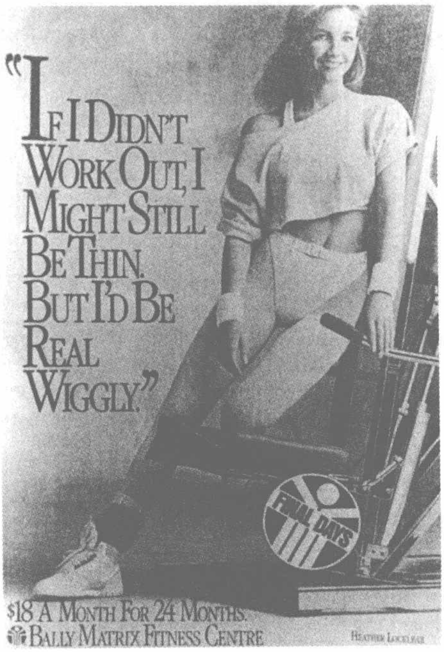


图 29 这是一则宣传健身中心的广告，左侧的广告语写道：“如果我不锻炼，我可能一样瘦，但会不结实。”

会明白，为什么理想的苗条形象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越来越瘦，为什么身材极其苗条的女人还是常常觉得自己胖。除非经常锻炼肌肉，否则想要除掉松弛的肉和赘肉，人们就得把肉减到贴着骨头了。

苗条和自我的内部状态

在自我抑制能力与对冲动和欲望的控制方面，对肥胖/苗条身体的道德——和我们将要看到的，经济的——编码，代表了处于历史变化中的身体重量和尺寸的社会象征主义的高潮。19 世纪晚期之前，阶级、种族和性属是公认的主要区分点；身体是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因此，比方说，19 世纪中期的成功商人和政客们鼓起来的肚子象征着资产阶级的成功，并从外部表现他们积累起来的财富。[11] 相反，优雅而苗条的身体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因为蔑视资产阶级炫耀财富和权力的需要，它以隐蔽的而非侵略的方式掌控社会空间，表面上超脱于欲望或饮食的需要。之后，随着苗条的妻子成为她们丈夫成功的样品，这种理想开始被寻求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挪用。[12]

到了 19 世纪末期（即便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也为了减肥而节食，他在职的时候体重超过 300 磅），肥胖不再被中产阶级视为时尚。社会权力与纯粹的物质财富积累之间的联系弱化，而更多地体现在控制和管理他人的劳动力和资源的能力上。同时，超标的体重被视为反映了道德和人格的缺陷，或缺乏意志。[13] 这些联系只有在“过剩的”文化中——也就是说，在一个这些控制“文化”生产的人有

*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1857—1930）：美国第 27 任总统。——译者

吃不完的东西的社会中——才能实现。节食的道德要求有赖于一些物质前提，这些前提让节食的选择成为可选之物，让个人“超标”的可能性成为现实。尽管苗条继续保有一些传统的与阶级之间的联系（“女人钱越多越好，越瘦越美”），但这种等式的重要性自 20 世纪 70 年起已经大不如前。身体的尺寸和外形越来越作为个人、内部秩序（或失调）的市场起作用，象征着个体的情感、道德，或精神状态。

考虑一下这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即肌肉发达的身体的含义所发生的变化。发达的肌肉曾经具有多种文化含义，这些含义不让发育健全的身体在中产阶级对于魅力的看法中起重要作用。当然，肌肉已经并继续将男性权力象征为身体力量，经常表现为一种为性别差异的“自然性”编码的方式，就像《时代》的封面和“秘密”* 的广告所表明的那样（图 30、32）。但与此同时（如“秘密”的广告所示），它们也与体力劳动和无产阶级身份联系在一起，而且经常充满种族含义（正如大量影片中所展示的黑人奴隶和职业拳手大汗淋漓、油光闪闪的身体那样）。因此，在我们文化的种族和阶级歧视中，肌肉就和麻木、愚钝，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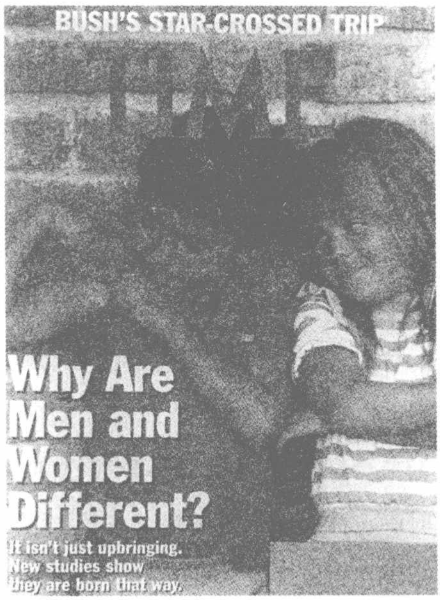


图 30 这是《时代》周刊的封面，一个小男孩正向一位小女孩展示自己的肌肉，说明了两性之间的差异。

* 指秘密牌除臭剂。——译者

动物性联系起来(想一想身形健硕的马龙·白兰度在《欲望号街车》中饰演的感情粗俗、身手粗野的斯坦利·克沃斯基)(图31)。此外,在西方,因为身体本身在自然/文化二元对立中总是被想象为属于"自然"一方,所以一个人与身体的联系越多,就越被认为远离文化和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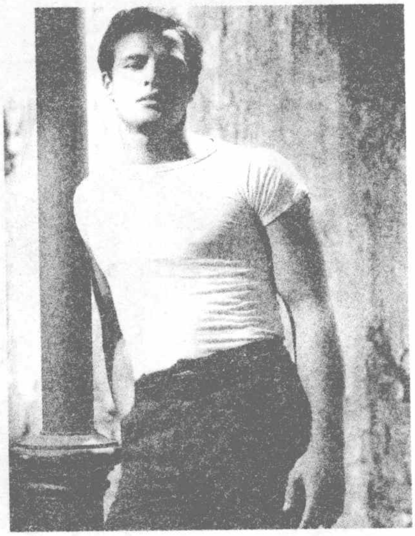


图 31 著名演员马龙白兰度

然而,肌肉发达的身体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偶像;"锻炼"是一项被美化和性别化的雅皮士活动。结实、健全的身体不再代表低等的身份(但当锻炼至极限时除外,因为旧有的肌肉与无理性、无意识的物质性的联系会再次浮现),转而象征正确的态度;它意味着一个人"在意"自己,和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形象,暗示着意志力、能量、对婴儿冲动的控制、"塑造你生活"的能力(图 33)。"你边锻炼边节食,"希瑟·洛克莉尔在推销巴利·乔山健身中心(Bally Matrix Fitness Center)时说,"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肌肉代表性欲,但这种性欲受到控制和管理,不会以令人讨厌和尴尬的方式爆发。[14]

如果说阶级问题在所有这些现象中依然存在,那么它也是和社会流动性(或者社会流动性的缺乏),而不是和阶级定位相关。因此,比如说,当出现肥胖和下层阶级的种种联系时,它们也通常涉及道德品质——肥胖被视为懒惰、缺乏纪律、不愿服从的象征,意味着缺少在主导意识形态看来,所有可以让人往高处走的"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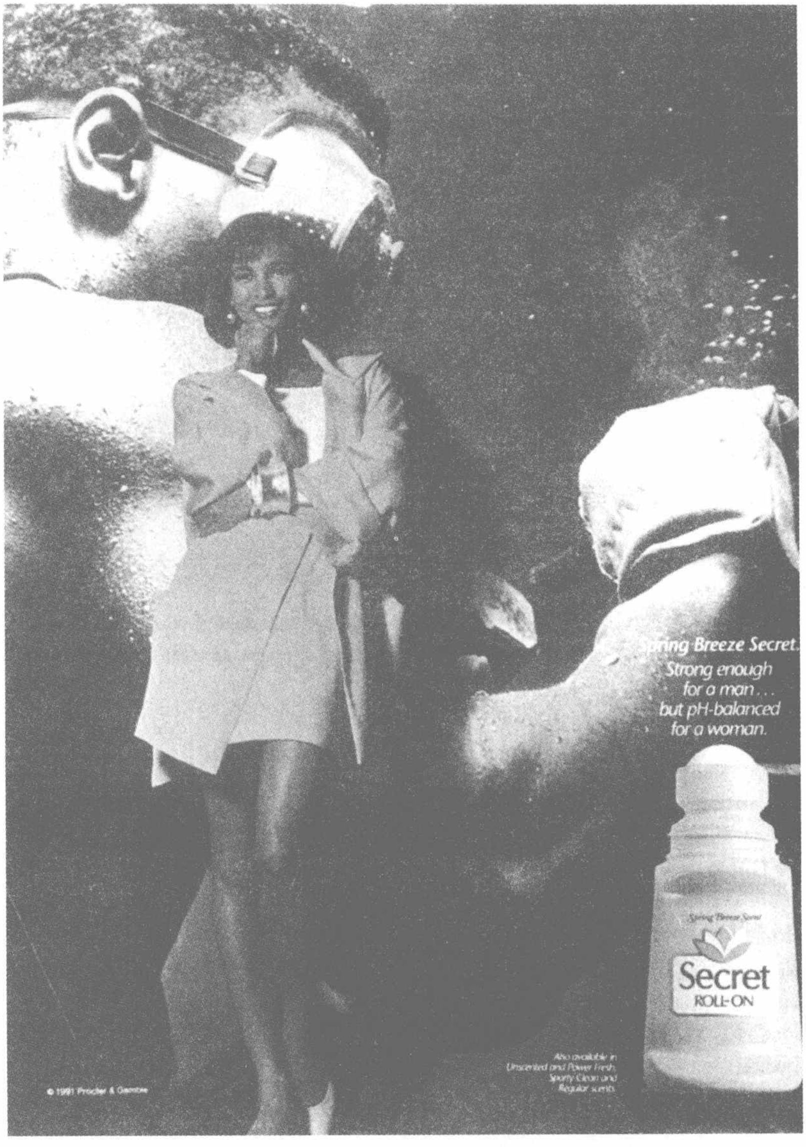


图 32 这是一则“秘密”牌除臭剂的广告，背景中一位男子正挥汗如雨地劳动，形象地说明了体力劳动与阶级之间的关系。



图 33 这是一则推销健身中心的广告，上方的广告词是："你不仅塑造身体，还塑造生活。"

能力"(图 34)。同样，在像《闪电舞》和《夺标 27 秒》这样的流行少年影片中，(劳动阶层)的女主角和男主角修剪、束紧和掌控身体的能力明显象征了成功进入上层社会的渴望，和那些"符合要求的"人所具有的穿越阶级的能力。这些影片(如影片的一个名字所表明的)是当代的"探索神话"；和它们的原型《洛奇》一样，它们也沿用个体不畏各种艰险和磨难，为实现个人理想而奋斗的路线。但和前期的影片不同(它们将史密斯先生送去华盛顿，将迪兹先生派往城镇，分别对抗腐败的政府和财团等社会祸害)，《闪电舞》和《夺标



图 34 这是一家曼哈顿健康俱乐部的广告，广告语是：“如今在曼哈顿获得权势比任何时候都容易。”

27 秒》通过减肥、锻炼，和忍受、克服身体疼痛和疲劳能力的隐喻，

来展现男、女主角的责任感、意志和崇高的精神(比如,在《夺标27秒》中,当年轻的摔跤手不顾由严格的训练和饮食引起的眩晕和鼻出血时,观众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

患饮食失调的年轻人通常用类似的语言描述他们自己的经历,也就不足为奇了。下面是采访一位年轻的女性跑步健身者的节选:

> 嗯,我有意志力,我的训练可以达到竞赛水平,我可以随时拒绝食物。我记得感觉自己处于不断的兴奋中。痛苦?当然有痛苦。真是不可思议。在饥饿和连续的锻炼造成的肌肉疼痛之间,我无法告诉你我受过多少伤。
>
> 你可能会想,我让自己不断经受强烈的痛苦是疯狂的表现。但你必须记住,我在打一场仗。当你在战斗中受伤的时候,你会为此骄傲。当然,你的内心可能会喊疼,但如果你勇敢和真正出色的话,你就会泰然处之,因为你知道这是赢得胜利所要付出的代价。而且我需要胜利。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不赢的话,我会死掉……所有这些敌人部队都向我袭来,我必须用计打败它们。如果我有足够纪律性的话——如果我能保持精瘦和强壮的话——我就会赢。疼痛只是我必须应对的自然情况。[15]

就像在《夺标27秒》中,外部环境也是为一次体育赛事所进行的训练,但这也要服从于一个内在目标。真正的战斗最终是和自我的较量。在这一点上,这篇文章的起始段中提到的短暂历史的局限得以显露。在那一段中,我把当代社会对节食的关注和充满道德

含义的管理身体的历史计划做对比。但在这一部分中，我指出，即便分析哪怕最肤浅的再现（少年影片）也会揭示一种道德意识形态——实际上，这种意识形态表面上接近于福柯在《快感的享用》中描述的高贵的希腊理想。这种理想的关键要素，如福柯所描述的，是“一种与自我的对抗关系”——目的不是为了“纯洁”而铲除欲望和饥饿（就像基督教的二元论一样），而是通过不断的“精神战斗”实现对欲望“男子汉般的”掌控。[16]

但对希腊人而言，对欲望“男子汉般的”掌控发生在一个推崇中庸的文化中，而当代的身体管理文化在一个致力于繁殖称心商品的体系中努力控制欲望，这是非常不同的。在如《夺标 27 秒》和《闪电舞》这样的文化幻想中，掌控自我处于一种可实现并且稳定的状态；但正如我在这篇文章的下一部分中要指出的，发生在当代的自我冲突的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

苗条与社会身体

玛丽·道格拉斯将身体视为再现社会范畴和关注的“自然象征”的体系，她认为，对于维持严格身体界限的焦虑（比方说，体现在与粪便和唾液相关的各种仪式和禁忌，还有对“内部”和“外部”的严格划定中）在一些外部界线受到攻击的社会中有最明显和集中的表现。[17]同样，我假设，对身体进行“内部”管理（就是说，管理它的欲望）的热衷，源自可以被称为在社会身体的体系内对欲望的宏观管理中的不稳定性。

在发达的消费资本主义中，按照罗伯特·克劳福德的精彩论述，经济生活的矛盾结构产生了一种不稳定的、对抗性的人格建

构。[18]一方面，作为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我们必须升华、暂放、压抑为了获得即时满足而引起的欲望；我们必须培养职业道德。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我们必须表现出向欲望和冲动妥协的无限能力；我们必须不断渴望即时满足。因此，当我们发现自己不断被诱惑围困，同时又因过度放纵而遭社会谴责时，管理欲望也就成为一种持续存在的问题（当然，这些作为消费者能放纵得起他们的欲望，却被这种文化嘲弄和打击的人，面临一个更加严峻的窘境）。

食物和节食是表现这两种矛盾的主要场所。在电视上和通俗杂志中，每过一页或仅仅在两则商业广告之间，美味食物的形象和表现渴望与欲望的修辞马上就被推销柚子餐、低卡路里食谱和健身器材的广告取代。但比这些明显的反差更令人不安的是，广告商不断地将它们神秘化，暗示这些反差实际上不存在，人们可以"全部拥有"。节食和锻炼计划也相应地被配以表现即刻满足（"用 21 天的时间化肥胖为神奇"，"立刻从 20 寸变为 10 寸"，"六分钟拥有一个奥林匹克级别的腹部"）和轻松（"不用移动一英寸就能做 3000 个仰卧起坐……平躺着慢跑 10 英里"，"不用节食就达到 85 磅"，还有不知羞耻的说法，"不做锻炼的情况下得到锻炼"）的形象。但在现实中，对立不是可以被轻易调和的，相反，它代表了一种经典的双重约束，按照两种互不相容的方向将自我分裂。这种矛盾不是抽象的，而是源于"消费激情"的具体历史建构，而所有在平衡、适度、理性和远见方面表现出的倾向都被排除在外。

因为一看到中意的产品就会失去控制，所以为了控制我们的欲望，我们必须对其严加防范。苗条的身体为一个管理有方的自

我的诱人理想编码，尽管存在消费文化的种种矛盾，但一切都井然有序。因此，不论斗争是否围绕食物和节食展开，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在受“行为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严格制约的白天，和沉迷于无意识“释放”(食物、购物、酒精、电视，和其他让人上瘾的药物)的夜晚和周末之间摇摆。通过这种方式，这个体系的中心矛盾将它自己刻写在我们的身体上，贪食症也显现为一种现代社会特有的人格建构。因为贪食症准确、明确地表现了对不受约束的消耗(体现在贪食症患者无法控制的暴食上)的极度渴望，这种消耗处于不稳定的张力中，并伴随着让我们保持清醒，“净化我们的行为”，在礼拜一早晨恢复严格控制(清理肠道的需要——体现在贪食症患者人的呕吐、强迫性锻炼，和借助药物的排泄上)的要求。

在这个国家中我们有一种神经性厌食症流行病，“尽管事实上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超重的”[19]，这被(不正确地)称为“似非而是”，而它也包含相同的结构性矛盾。厌食症和肥胖的共存远非一种似非而是，而是揭示了当代人格建构的不稳定性，和在作为生产者的自我和消费者的自我之间寻找平衡的困难。贪食症体现了消费资本主义内不稳定的双重约束，而厌食症和肥胖症则代表一种消解这种双重约束的尝试。因此，厌食症可以被视为否定自我和压抑欲望的极端表现(处于职业道德的绝对控制下)；肥胖症可以被看做一种向欲望妥协的极端能力(消费主义掌控局面)。两者都植根于对欲望相同的消费文化建构中，在这种建构中，欲望压倒并超越自我。由于存在这种建构，我们要么完全屈服，要么奋力抵抗。

在文化看来，厌食症和肥胖症都不是一种恰当的回应。一种

消费体系永远不能容忍对饥饿和欲望的彻底征服，即使我们文化中的基督教二元论同样让我们容易被厌食症患者看似能超越肉体的能力迷惑。厌食症患者为拥有这种能力而自豪，但随着失调的发展，她们通常认为有必要隐藏自己瘦骨嶙峋的身体，不让周围的人看到。如果对于厌食症患者的文化态度是矛盾的，对肥胖症患者则并非如此。如玛西娅·米尔曼在《一张如此漂亮的脸》中记录的，肥胖症患者在我们文化中容易引起让人失去理智的愤怒和反感，并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在母亲胸部饥饿、无意地吸吮着的婴儿：贪婪、陶醉、慵懒，没有自我控制或意志力。[20]人们不愿坐在肥胖症患者旁边（即使他们占据的空间没有妨碍别人）；喜剧演员从不掩饰他们的尖刻；社会上，他们被认为不具备公共职能（一位男子写信给"亲爱的艾比"，说他准备不邀请他的弟弟和表妹作为嘉宾出席他的婚礼，要另觅他人，因为"他们两个都太胖了"）。值得注意的是，肥胖症患者身体构造中最常受到恶意攻击，也最被他们自己鄙视的部位是象征着消耗的胃（就肥胖症患者而言，不受约束的消耗接管了有机体；玛西娅·米尔曼的一位受访者回忆她的丈夫被一位朋友的丈夫称为具有"一副可怕的、看上去要得癌症的体态"）。[21]

苗条、自我管理与标准化

我一直在论证，在消费文化中，自我管理在变得日益紧迫的同时，也越发令人难以捉摸。对于这些无法"自然地"获得满意身体的人而言（不管是借助遗传、新陈代谢，还是高活动水平），要得到它们是极其困难的，而且，由于这种理想越来越严格和苛刻，越

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外。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人们需要不断留心食欲，并在塑造身体本身上下大工夫，但最流行的“纠正”方法——节食——却常常注定要失败，因为拒绝带来的是补偿性的暴饮暴食，和随之而来的挫败、无用和绝望感。表现自我约束和自我掌控的媒体形象和不断由人们的外表造成的日常压力和焦虑之间存在巨大反差，这种反差产生了惯于监控自己并将自己标准化的身体。

最终，身体(除了被用将自己纳入正轨时的成功和失败评价之外)被认为显示了对于标准化本身的要求的正确或错误的看法。因此，肥胖症患者和厌食症患者令人反感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体现了对文化标准的抗拒。相反，贪食症患者的典型表现是，努力获得传统意义上有吸引力的体形，这种体形是由他们更加“标准的”管理欲望的方式决定的。而具体到肥胖症患者，被认为是他们对标准化的公然反抗似乎成为他们所激起的敌意的来源。厌食症患者至少会向主导的文化价值表达敬意，并用自己的方式超越它们：

> 我想让人们注意我，注意到我的特别之处。在面对一个陌生者的时候，我想在他的眼中看到羡慕，这样我就知道我完成了一些大多数人正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以我所见，减肥比其他任何一种目标都让越来越多的人遭受挫折。我发现如何做其他人都不会做的事情：我可以随意控制体重，想减多少就减多少。而这意味着我比任何人都强。[22]

因此，厌食症患者试图借助在遵守规则方面的优势从大众中脱颖而出；但这样做的同时，她也暴露了隐藏的不利后果。但肥胖症患者——尤其是这些尽管超重，还声称自己是快乐的人——被认为完全不按规则行事。如果我们这些剩下的人正努力获得认可，向"正常"靠拢，我们就不能让她们轻松脱身；她们必须被提醒注意自己的位置，必须让她们蒙羞、受挫。

许多脱口秀已经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一次节目中，许多听众都对一名肥胖妇女的讲述表示怀疑，并试图证明她是不快乐的："我不相信你不想苗条和美丽，我就是不信。""我听你大谈你的自我感觉是多么好，你多喜欢自己，但我确实认为你是在欺骗自己。""我很难相信玛丽·简真的开心……坐不进椅子，穿不过门道。在地铁里，天哪，别提了。"当玛丽·简坚持认为自己是快乐的时候，人们一种不怀好意、自以为是的口吻提醒她，这种快乐是不会长久的："玛丽·简，如果你想保持现状，你最好马上开始节食，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就会越来越胖，真的。"[23]在另一次节目中，为了制止听众越来越不友好和无礼的言行，一位医生嘉宾向他们保证，他们所攻击的"胖并快乐着的"靶子不是真的不想减肥，而是不断的尝试和失败让她心生厌倦。这种处理方式让人们同情肥胖症患者，事实上认同了肥胖症患者的看法：成为"正常的"是最想实现的目标，只是因为自己的不足才难以实现。这些愿意将自己表现得可怜、痛苦，并意识到自己平庸的人——在这些节目中，往往通过主动承认隐私性的身体行动上的不便、对自己的过度仇恨，或描述自己大口进食的场景得到展现——赢得观众的同情和关心。

苗条与性属

大量资料已经表明，在我们的文化中，女人受当代社会苗条理想的制约程度比男人要深，就像一般的美丽理想对她们的典型制约一样。自己的伴侣要有苗条的身材，这对男人比对女人重要得多。[24]和男人相比，女人更容易认为自己太过肥胖。[25]而且，正如现在都知道的，女孩和妇女更有可能依靠猛烈的节食瘦身，滥用泻药，从事强迫性锻炼，并且远比男人容易患饮食失调。但饮食失调不仅仅是“关于”苗条的，正如（我所一直认为的）苗条不只是——甚至主要是——身体上的单薄。因此，我在这部分的目的不是“解释”事实，因为人们已经从历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些事实做过大量论述。我想继续分析苗条身体的形象，将其视为一个性属化的身体（作为女性身体的苗条身体——这种形象通常以这种方式呈现）（图 35），一个永远不存在中性性属含义的身体。这层带有性属代码的含义，与其他含义一道，将苗条超定为体现女性特有吸引力的当代理想。

将当代的苗条形象阐释为象征正确管理欲望的隐喻时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主导的西方宗教和哲学传统中，管理自我的能力一直毫无争议地归男性所有。相反，被认为需要约束和控制的所有的身体自发性——饥饿、性欲、情感——都在文化层面上被打上女性的烙印。[26]因此，在菲勒斯中心主义文化中，管理女性特有的欲望是一种具有双重结构的问题。女性欲望在最本质上是没有节制、缺少理性的，有时刻爆发的危险，挑战父权社会的秩序。



图 35 这是一则意大利腊肠的广告，广告主要说明意大利腊肠的脂肪含量非常低，低于身材一流的女人体内的脂肪含量。

一些作者认为，女性的饥饿（作为女性欲望的代码）在既有的性属关系和妇女地位发生动荡和变化时期尤其成问题。在这些时期（我们的时代可以算一个），布拉姆·迪克斯特拉（Bram Dijkstra）所称的“占有欲强的女人”（consuming women）梦魇般的形象大量出现在艺术和文学中（这些形象代表宣泄出来的女性欲望），

但女性身体在人们的想象中却越来越窈窕——不像一个充分发育的女人的身体，更像一个青少年或男孩的身体（这些形象可以被称作孕育中的欲望）。迪克斯特拉以贪婪的斯芬克斯和“世纪末”艺术中的吸血鬼，还有与其相应的推崇修长的、“消瘦但高贵的”女性身体的时尚为例，说明了19世纪晚期的出现的这种情况。[27]这个时期的一位评论家形象地描述了一种新的身体样式的出现，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样式有些相似：

> 女人可以随意改变她们服装的样式，但怎么能改变她们身体的构造呢？可她们还真能做到这点。她们的肩越来越窄，而且有点斜；她们的颈部越来越细；臀部越来越小；胳膊和腿越来越修长，不禁让人想起以前强盗们，普洛克路斯忒斯们拉扯他们受害者的四肢所用的床。[28]

我们的时代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从50年代的沙漏体形到过去10年间逐渐出现的双性同体的，越来越修长、苗条的外表），这个事实本身亟须阐释。然而，这种转变不仅需要从男性对女性欲望的焦虑（迪克斯特拉的分析虽然重要，却仅涉及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种角度阐释，还需从接受这种“新外表”的女性的立场去理解。因为对她们而言，这种转变可能会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与其说它象征的是对女性欲望的约束，不如说是女性欲望从操持家务、繁衍后代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苗条的女性身体能同时容纳这些看似矛盾的含义，我认为这个事实能解释为什么这种身体在性属方面发生改变的时期具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29]

让我进一步解释这种观点：之前，我曾引用过一些患饮食失调

妇女的采访片段，她们描述了对自己的胸部、腹部和其他身体肿胀部位的反感。我当时对这些片段的解读在性属方面是中性的。虽然不否定这种阐释，我还是想从另一种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方式在《神经性厌食症：作为文化具体化表现的精神病理学》中已经出现过。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厌食症患者特有的对臀部、腹部和胸部的反感（通常伴有对月经的厌恶和对闭经的欣慰）可以被视为表达了对母性的、居家的女性特质的反抗——这种女性特质代表了厌食症患者所体验的母亲对她的高压控制，和母亲在家庭之外实际缺乏的地位和权威[一则耐克的广告（图36）体现了所



图 36 这是一则耐克广告，广告右侧是一段较长的广告词，大意是："你不一定要走你前辈走过的路，而要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这段广告词表达了年轻一代对传统的抗拒。

有这些要素，这位母亲的一条胳膊搂住幼小的女儿，体现了她的"力量"；但当年轻女子看到这则广告时，她们相信可以通过其他的、非母性的方式运用她们的力量]。这里我们遇到了另一种造成对柔软、凸

起的身体部位感到焦虑的原因。这些部位让人想起无助的婴儿期，象征着西方在过去一百年间建构的母性的女性特质。这种女性特质，如多萝西·丁纳斯坦所认为的，被视为具有骇人的力量，同时，随着孩子逐渐认识到劳动力性别分工的等级本质，也是完全无能的。[30]

19 世纪的沙漏体形强调胸部和臀部——体现生育力的女子特性的标志——贬低脆弱、纤细的腰部，这是母性女性特质最包容的象征形式。[31]二战后，中产阶级妇女从工厂回到家里，出现了对快乐的、持家的母亲和有责任心的、养家的父亲的强制性资产阶级划分，直到此时，代表“男性”和“女性”如此清晰的身体界线才再次显现。就身体而言，流行系肚带、托高胸罩和玛丽莲·梦露的时代可以被视为一种“复兴的维多利亚风格”。[32]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男孩化的苗条风格出现之前，它也是最后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强制标准化的身体理想。

人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推测，对肥胖的女性部位感到厌恶和焦虑的男孩是在回应被唤起的母性力量，当妇女正在进入如法律、商业、高等教育、政治等传统的男性领域时，这种力量成为一种新的威胁。[33]女性被鼓励通过为家人、丈夫和家庭服务表达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在那个时代，丰满的索菲亚·罗兰是一位性感女神。现在，在男性世界中处于散漫状态的女性欲望需要根据这个世界中的职业（和男性）标准被标准化；因此，女性身体也必须与所有心理上和母性力量产生的共鸣划清界限。从男性的焦虑这个角度看，目前职业女商人纤细的身材或许是这种中性化的象征。借助自己的身体和穿着，她与职业的、白人的、男性的世界建立了象征性联系，却不想用可供选择的“女性价值”颠覆那种领域。与此同时，只要她在明显地“打扮自己”，扮演男性（几乎总是通过一种“柔弱的”时尚，体现传统的女性装饰风格，并不断提醒自己，当成功盖过长

相时会有怎样的恐怖后果），她就不会对现实中的职业男性提出（象征性的）真正挑战（图 37、38）。



图 37 这幅图表现了一位衣着传统的职业女性，图上方的文字似乎是这位女性的内心独白："你的脸在为你的成功还债吗？"

但对许多妇女而言，切断与母性身体的联系并非意味着权力的减少，而是象征着（正如 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 20 年代那样）从一种繁衍后代的角色，和一种被视为具有约束性和压迫性的女性特质建构中解放出来。同样，穿戴白人的、男性世界的服饰会让女人感觉赋予了自己权力，并且有机会展现在我们文化中备受重视的品质：超然、自我抑制、自我掌控、控制。如我前面所论述的，苗条的身体是这些品质的象征。金·摩根在纪录片《腰部地带》中谈到引发厌食症的对苗条的痴迷时说："它是关于权力这种重要的

东西的……它是我可以在人们面前直接展示的东西。他们看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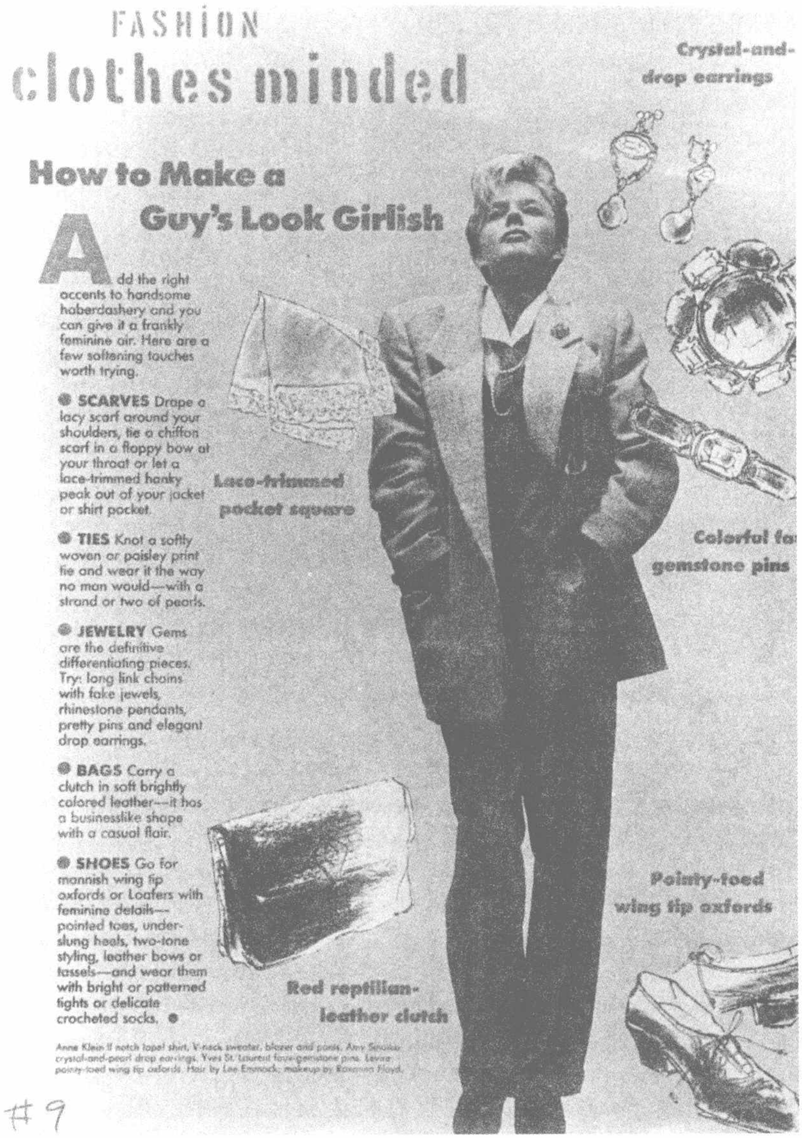


图 38　这幅图表现了一位衣着中性的女性形象。图的左上方有一行文字，意为“如何让一个男人看上去像女人”。

我就这么重，但我很强壮，而且控制着局面。嘿，看看你，你这个胖子。”[34] 通过获得“男性”权力实现对自我的掌控，是摆脱体重和锻炼肌肉两种行为的另一处交汇点，尽管两者表面上不同。一则广告无耻地将女性健身与从传统、居家的角色中的解脱联系起来（图39），在这则广告中，新式的“烹饪乐趣”恰当地出现在健身房中。



图 39 这是一则家用健身器材的广告。图的下方一位女子正在健身，上方的文字意为“烹饪的乐趣”，暗示女性健身与居家角色之间的联系。

在这些性属问题的交汇处，和有关欲望管理的更为宽泛的文化困境中，我们看到管理严格的身体——不论是通过圆滑、极简的线条，还是结实的肌肉展现出来——如何被超定为体现女性特有

魅力的当代理想。如我所论证的，消费/生产的坐标轴因为一种等级的二元对立而具有性属含义，这种二元对立建构了一种和专横的“男性”意志相对的危险的、有欲求的、身体的“女性原则”。

我们因此可以预见，当管理欲望特别成问题的时候(正如在发达的消费文化中那样)，女人和她们的身体将会付出沉重的象征和物质上的代价。当这种情况因为在传统的性属组织受到挑战的时期，女人欲望引起的焦虑而恶化时，这种代价则会翻番。但如果认为这是由对女性饥饿的简单压抑引起的话，那就错了。相反，就像在其他场合一样，权力在此也是“从下往上”起作用的，因为通过体验在公共领域新获得的自由(摆脱家庭的羁绊)和权力，女人把苗条和自我管理联系起来。在这层关系中，我们或许会注意到当代的苗条理想和维多利亚中期的女性苗条理想之间的区别，前者暗示对自我的掌控，并在传统的“男性”身体的象征主义中得到表达，后者象征性地强调被紧紧限制在“外部”约束内的生育性女性特质。但不论受外部的束缚，还是内部的管理，没有身体可以摆脱文化的印记和它所具有的性属化含义。

第三部分

后现代身体

○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性属怀疑论

○“物质女孩”——消除后现代文化

○后现代主体、后现代身体、后现代抗拒

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性属怀疑论

1987年，我听一位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断言，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种植园主的妻子和她丈夫的女性奴隶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她认为，性别被种族、阶级、历史特性和个体差异彻底分解，以至无法再作为一种分析范畴使用。她坚持认为，“妇女之间的种种联系”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幻想，出自白人、中产阶级大学教师的民族优越感。

哲学的历史显示了看待现实“男性”所特有的视角，驳斥所有表达这种意义的女性主义尝试，是一位女性主义哲学家著作的中心思想。这位作者认为，所有这些尝试是对哲学史“施暴”，对“本质上极为多样化的”男性经历也是“不公的”。的确，任何以性属为线“裁剪”现实和视角的做法在方法论上都是有缺陷，并且是本质主义的。①

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家看来，性属已经成为一种话语型构(discursive formation)，本质上易变，不断自我解构。性属的含义不断被延宕，永远是多重的。我们必须“超越数字2”，一位作者

写道，发展一种“让人目眩的叙述的累积”[②]。（一本新杂志的名称是《多样的性属》。）如果不这样做，就是要延续一种等级的、双重的现实建构。

一篇关于乔治娅·奥吉弗（Georgia O'Keeffe）绘画艺术的文章出现在1987年11月的《女士》杂志中。它包含一封奥吉弗写给梅伯尔·卢汉（Mabel Luhan）的信：

> 我认为你可以写一些男人写不出来的关于我的事情——我想要你写的东西——我不知道对于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没有明确的想法——但一位经历了很多、一位将线条和色彩视为对生存的表达的女人或许可以说一些男人无法说的事——我觉得，关于女人还有一些尚未开发，但只能由女人开发的东西——男人已经倾尽全力了。你对此有何想法？

这篇文章本身出自本刊记者，开头是：“乔治娅·奥吉弗，一位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纪的女人一次性表明，绘画是没有性属的。”

当代女性主义与性属怀疑论

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想象的动力来自一种认识，即性属的模板能够揭示文化和历史中一些之前处于隐蔽状态的方面。女性主义者认为，以男性为标准的世界观，通过虚构的整体（历史、理性、文化、传统……）遮蔽自己的偏见。这些整体中的每一种都被证明有一个受压制的影子，一个“他者”，其具体历史、价值和视角都有待书写。

如今，许多女性主义者批判她们现在所认为的这段女性主义发展史上过于简化和过分概括的时期。质疑声随之出现——有时带有感情色彩——矛头指向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和它们对文化和历史的性属化解读。之前，学院派女性主义批判的首要对象是我们的男性主导原则中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叙述，现在，女性主义将批评的目光转向它自身的各种叙述，发现它们有简单化和整体化的倾向，之间的区分不够细致，强调性属差异，带有无意识的种族偏见和精英主义色彩。女性主义也许在朝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发展一种质疑作为分析范畴使用的性属的新怀疑论。

这种怀疑论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当代的女性主义仍然是一种多样和多元的事业。性属怀疑论也没有一种单一的标志性形式。相反（正如这篇文章蒙太奇般的开场白所展示的），它的出现是跨学科的，涉及各种理论关联，用不同的声音讲述，并在不同的关注中得到体现。命名和批判这样一种现象是一件没有把握和危险的事。但我认为我们正在此目睹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而对其进行分析则是女性主义者的当务之急。

和所有的文化形态一样，女性主义的性属怀疑论也是复杂地从多种要素中生成的，包括智力的、心理的、体制的和社会的。因为不是一种整体设计，而是各种因素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理解它的最佳方式不是把它看做一种可被采用和反对的非连续的、确定的立场，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受各种思潮推动的新兴的连贯体，这些思潮有时互相重叠、有时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在这篇文章中，我批判地考察了四类这样的思潮，和它们（有时是无心的）演变成性属怀疑论所遵循的路径。

第一类思潮是一种学术联姻的结果，这种联姻从理论上将女性

主义对性属理论中民族中心主义和无意识的种族偏见有根据的关注，与更具历史和政治诉求的后结构主义思想（比如，福柯和利奥塔的理论）联系起来（也是一种高度计划性的挪用）。我认为，这种联合发展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方法论主义（feminist methodologism），它相信自己具备一种权威的批评框架，能确定将身份、历史和文化理论化所用的“正确”和“错误”的方式。虽然这种方法论主义避免在理论层面上概括先天的性属，却有可能让一些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失去可信度和批评锋芒；它还经常含蓄地（并且错误地）假设，只要采用一种“正确的”理论方法，就有可能避免民族中心主义。

我在这一章中讨论的第二类思潮是女性主义挪用解构主义的结果。在此，一种对可阐释的多重性、文化含义的不确定性、异质性，和意义生产的后现代主义认识被视为对新的叙述方式提出要求，这种方式以充分表现文本“差异”为目的。这样，性属的模板就因其对现实刻板、双重的建构而受到批评，并被一种表现不断的文本游戏的叙述理想取代。现代主义认识论自认为可以通过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所称的“不知来自何处的视角”（view form nowhere），充分地再现现实，我认为，这种理想虽然对此持批评态度，但仍受惠于它自身的幻想：获得一种不受具体存在的固定性和局限性限制的认识视角——我称其为“想无处不在的梦想”（dream of everywhere）。

通过这些批评性关注，我希望能够引起这些准备尽情欢庆后现代女性主义出现的人的警惕。我认为，计划性挪用后结构主义思想，将女性主义对文化多样性再现的重要关注的焦点从实际语境转移至有关充分理论的问题上去，这对女性主义而言是非常成问题的。我们不仅因此无法关注“排斥”的政治在知识界兴风作浪

所依赖的职业和体制上的机制，还让我们自己失去了批判这些团体和维系它们的等级的、二元的力量结构时依然有效的分析工具。[③]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让女性主义者参与到其中呢？知识和权力的体制依然统治着男权主义的公共领域，而且，我认为，威胁着要利用和驯化作为一种文化抗拒和转化运动的女性主义的想象和批判力量，通过发掘这些体制，我考察的后两种思潮为分析这种问题提供了立足点。

从“不知来自何处的视角”到女性主义方法论主义

首先让我从一名女性主义哲学家的立场讲一个故事，是关于性属分析学的兴起和后来它所遇到的困难。[④]

1979 年，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在美国哲学界掀起了一阵波澜。这本书的作者恰恰在他准备要解构的传统中受到认可和尊重，因此对于证明一种简单却具有颠覆性的论点而言，他处于一种独特的位置上。这种论点已经被马克思、尼采和杜威以不同方式阐述过，并且在这片大陆上正通过德里达和福柯的著作得到发展；这种论点认为，观念是社会存在的创造物，不是对自然（几乎是充分的）的再现，也非其“镜子”。

罗蒂提出这个论点，在哲学层面上是精妙、有力和有影响的。但最终暴露认识的客观性、理性的普遍基础，和中性的判断这些理想的自负和虚幻的不是罗蒂，尽管他是这个群体中叛逆的一员（或者，甚至不是任何职业知识分子的声音）。这种揭露没有最先发生

在哲学交流中，而是在政治实践中，其动力是六七十年代的解放运动，这些运动的兴起不仅是为了证明各种边缘文化的合法性、发掘被压制的观点，还要揭露官方记录中的偏见。如今，这些记录再也无法称自己来自纯粹合理性的天堂，或反映智力或科学发现的必然和进步的逻辑。相反，它们必须被视为历史中具有特定阶级、种族和性属利益的个体的产物。曾经为这些记录提供辩护的种种崇高的范畴——理性、真理、人性、历史、传统——如今被如下（历史的、社会的）问题取代：谁的真理？谁的天性？谁的理性？谁的历史？谁的传统？

揭示并表述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性属本质，这项文化工作是由女性主义发起的，这毋庸置疑。那是一种具有启发性、让人欣慰的文化时刻。“人类”这种范畴——所有的差异用这种标准衡量时，都显示出缺陷和不足——落入凡尘，穿上裤子，并被提醒它不是城里唯一的游戏者。当我们的学生从吉莉根和其他人那里了解到，“权利”的语言不是上帝或自然的伦理话语，而是男性气质一种特殊建构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时，他们仍然能体验到这种带来批判性和给人力量的认识时刻。[5]

丁纳斯坦、乔多罗、吉莉根[6]和许多其他性属理论家发现了与经验产生共鸣，并在文化上有启发意义的模式。他们开辟了一个领域，描述了一种新的版图，从根本上改变了讨论现实和经验时以男性为标准的言说方式；她们强迫人们认识到性属造成的差异。有时，一些学科最基本的自我概念和范畴受到质疑——比如在哲学中，一种不受种族、阶级、性属，或推理者的历史（内格尔的“不知来自何处的视角”）影响的抽象、普遍的理性的理想状态被顶礼膜拜。[7]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不知来自何处的视角根本不存在；实际

上，“不知来自何处的视角”或许本身就是对知识可能性的一种男性阐释。

但“性属化的人”这一整体性概念通常被证明和抽象、普遍的“人”这种整体性概念一样，是一种虚构。在回应要求描述性属造成的差异的文化命令时，性属理论家（还有这些尝试为一种不受性属或阶级影响的“黑人经验”代言的人）往往掩饰社会身份和定位的其他方面，但当我们考虑这些方面的时候，它们会质疑已经提出的对性属（或种族）的种种概括。例如，乔多罗会将至多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和家庭组织形式所特有的男女之间一种差别模式，提升到一种本质的“性属现实”的高度，她因此经常受到批评。既然性属分析中描述的模式通常以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的经历为依据，这些描述，女性主义者频繁指出，会维持同一种类型的潜意识中对特权的享有和对他者的排斥，而这是她们批判的以男性为标准的理论所特有的。

对性属理论中的偏见提出批判性认识的是这些受到排斥的人：有色妇女、女同性恋，和其他发现她们的历史和文化在流行的性属讨论中被忽视的人，这就是菲勒斯中心主义世界观中崇高的整体性概念第一次受到挑战时的情况。我想在此强调的是，这些挑战来源于遭受排斥的具体经历，它们不是以一种充分理论的概念为依据，也不需要理论上的回应。相反，随着新叙述的出现，要讲述妇女经历的多样性，思想上需要做的是去**倾听**，意识到自己的偏见、歧视和无知，开始拓展敏妮·布鲁斯·普拉特所称的“自我狭隘的圈子”的情感和智力界限。[8]需要一种新的个人态度，需要更加谦逊、更加关注自己不了解，和只有向具有不同经验和视野的人学习才能了解的事情。相应地，对大学教师而言，体制上需要做的

是去延伸确定的、文化上狭隘的必修课程内容、课程阅读书目、系列讲座、研究计划、学生和员工的引进，等等。

我们也本应该知道，尽管必须不断地和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作斗争，要实现“政治上的正确”是不可能的。因为吸纳和排斥的动力（如历史所教导的）发挥作用的环境是多重和变化的，而且所有的观点（不论在某些语境中或对某些目的而言，多么具有解放性）注定要被一种来自边缘的声音折磨；不管是已经发出来，还是虽然暂时沉默，却在等待发言条件的声音，都让我们醒悟，让我们注意到那些遭到排斥、抹杀和破坏的种种。[9]然而，应该注意到，女性主义对性属理论的早期批评中没有指出，在不同群体的人中间寻找共同点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坚持认为，跨越文化差异，将性属的一致性抽象化这种做法注定要陷入一种恶性的普遍化。只是当女性主义已经被拖入芭芭拉·克里斯蒂安所称的“理论竞赛”时[10]，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问题才与方法论上对性属概括和抽象的合法性的普遍关注联系起来。

后现代思想家经常（尽管并非全部）[11]表达这些关注。例如，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就鼓励女性主义者采用一种关于身份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回避了对于“男性”和“女性”现实的一般性说法，代之以“构造复杂的概念……视性属为多种要素中的一种相关成分，同时考虑到阶级、种族、族性、年龄和性取向”[12]。没有按照这种方式构思的性属概念（可能还有关于种族、阶级、性取向等方面的概念）是总体性的，即是说，它们从不同种类的要素中创造出一个虚假的统一体，把处于底层的要素推向边缘。弗雷泽和尼科尔森认为，许多以前的女性主义理论就是这么做的。同被利奥塔和其他人所批判

的（为白人、男性、西方的知识传统所有的）“合法性的宏大叙事”一样，性属分析的叙事也包含，不管以完整的形式（如乔多罗），还是通过“形迹”展现（如吉莉根），“一种过于宏大和总体性的理论概念”[13]。后现代主义者批判菲勒斯中心主义文化，认为它是挪用、总体化、合并、压制，多娜·哈拉维也用同样的术语描述性属。[14]

这些用更为恰当的方式对待身份的提议始于一种十分宝贵的洞见，即性属只是一个复杂、异质的建构中的一种轴线，通过历史的具体方式，不断地与大量其他身份轴线互相渗透。但我不太认同将这种洞见转化成那种权威的认识，继而转变为一种特殊批评架构的做法，最终结果是一种“中性的矩阵”（借用罗蒂的说法），为所有的智力活动规定恰当的术语，并被认为能够决定谁误入歧途，谁的想法是对的。考虑到弗雷泽和尼科尔森对多元化女性主义的公开支持，这也是她们竭力反对的结果；她们心中的理想状态是一块“用不同色调的线织就的毛毯”[15]。这也是我心中的理想状态，但我怀疑它是否能在一种新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中得到最佳诠释。

当然，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将会从更具地方性、更有历史针对性的研究，和分析不同身份轴线之间关系的理论计划中获益。然而（例如，在受资助的计划中，在会议指南和说明中），这种设想经常变成强制性的、机械的要求：所有开明的女性主义计划必须考虑到“种族、阶级和性属的交叉”。族性、年龄、性取向到哪里去了？不管怎样，要考虑尽可能多的因素，还能保持分析的焦点或论点，这并非易事。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通常是含蓄的，但有时也是明确的）教条：肯定差异是看待种族、阶级和性属唯一“正确的”方式；这种教条在抨击性属概括原则上是本质主义的或总体性的批评中

得到体现。当然，这些指责需要具体的例子，证明正在被谈到的任何一种总体性所掩盖的实际差异。

我们同样需要警惕"不知来自何处的视角"这种假设：只要我们采用正确的方法，我们就能避免民族中心主义、总体性的建构，和错误的普遍化。不论研究对象有多么强的地域性、受多大的限制，或者学者本人对构成社会身份的轴线多么关注，这些轴线中的一部分将会被忽略，而另一些则会被选中。这是人类经验中不可避免的事实，正如第一次由尼采指出的："不需要积极的和阐释性力量，只要通过眼睛，看就变成看见，这是谬论和废话。我们只能从某个角度去观察，只能从某个角度去了解。"[16]此外，这种选择性从来不是单纯的。我们总是从沾染了我们的社会、政治和个人兴趣的角度去"看"，总会形成某个中心，即使想尊重异质性，也无法避免。

关注差异也无法保证充分地再现差异。不用说，我们在取舍的时候经常犯错，因此埋没了大面积的人类历史和经验。但对差异过于敏感也会创造出一个"他者"，一个外来的异类、陌生的种类，同样成问题。正如福柯提醒我们注意的，"一切都是危险的"——而且每一种新的语境都要求我们重估"主要的危险"。这需要一种"高度的并且悲观的能动论"，而不是与某一种或真正理论之间的结盟。[17]没有理论可以，换句话说——即便按照对异质性、地域性、复杂性的关注度衡量自己合适性的理论也无法——置身于危险之外。

没错，有可能发展出最高调的反总体性理论，这我们都知道，但要在一个知识话语和职业实践（控制着雇佣、任期、晋升、出版）的语境中实现此目标谈何容易，因为它们的语言只有业内人士才

能理解，而且从根本上抵制差异（认为它“政治上是错误的”、“没有理论深度”、“不严谨”）。如果我们认为后结构主义理论正关注“差异的问题”，那我们就是自欺欺人，因为还有这么多具体的他者被排除在会话之外。此外，在一种关注排外问题，致力于创造条件，让许多声音能够发言并被倾听，变得清晰、容易接近的实践的语境中，激发（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回避的）宽泛的假设在促进对话方面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些观点重构了我们从不怀疑的现实；它们让我们从全新的视角审视我们的生活；它们为历史和文化带来新生，并邀请我们的监督。它们有勇气能让差异很好地呈现自己。

就这些实际标准而言，女性主义性别理论似乎需要一种与目前正在书写的不同的历史评价。[18]当然，不可否认，如弗雷泽和尼科尔森令人信服的观点所认为的，这种理论太过一般化（例如，乔多罗的工作需要我们仔细地从历史角度加以限定和语境化；这样，对某些目的而言，它就会非常有启发性）。这种过度概括，如我之前提到的，反映了为当代女性主义思想的出现提供条件的历史逻辑，而且不仅表现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我们——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都受惠于这种工作（和那些通常从同样片面的角度为黑人经验和文化辩护的人）。如果之前性属和种族没有被证明哪一个应该区别对待，我们现在能够谈论反映它们（并让对它们的概括变得复杂、零散）的差异吗？

在理论中，也许所有的总体性叙述都是相同的，但在西方历史和那段历史所特有的实际权力关系的语境中，性别理论的一般化，与产生自有产的、白人的、男性的西方知识传统的元叙述有关键的区别。我们不应忘记，这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它的统治因巨

大的抗议瓦解之前，它造就了有强大生命力的哲学、文学、艺术和宗教作品。因为这个传统处于权力的中心，和三种代表特权的独立轴线——种族、阶级和性属——的交汇处，所以它不太会认识到差异(除了将它想象为低级的或有威胁的“他者”)，但这并不是说这个传统是单义的。事实上，我在别处也谈到过，它产生了许多“隐性的”和颠覆性的哲学思维。[19]我想说的是，它没有产生审视自我，和批判自己的种族、阶级和性属偏见的实践——因为它基本看不到这些偏见。

女性主义理论——即便是白人、上层社会、异性恋妇女的著作也——不处在文化权力的中心。当然，这些轴线赋予我们中的一些人以特殊位置，它们的交汇形成了女性主义作家的文化定位；但所有的女人，作为女人，在某些方面还是处在底层，感觉自己被忽视或诋毁。当代女性主义来源于这种认识，它从一开始就对恢复那些被边缘化和受鄙视事物的合法地位产生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极大地影响了它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局外人”话语，就是说，作为一种产生自边缘化经历的运动，当代女性主义向来对排斥和不可见性的问题有异乎寻常的适应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者的工作没有深受阶级、种族和其他偏见的折磨。多娜·哈拉维指责说“白人女性主义者……迫于无奈，很不情愿地注意到”这些偏见，我认为这个指责是值得注意的。[20]它是一种奇怪的(或许是后现代的)关于思维和政治响应性的概念，认为白人女性主义“不愿”承认自己对整体的虚构；白人女性主义提出对女性现实和道德的构想，对文化进行性属化解读后仅仅过了10年，如今已经开始批判地审视(还经常完全否定)它们了。

在评定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女性主义

面临的危险不是女性主义者的总体化倾向，而是一种越来越让人麻痹的对于（从怎样的高度？）陷入民族中心主义或“本质主义”的焦虑（当然，那种经常存在的认为这种堕落显示了强烈的保守和种族主义倾向的暗示，强化了这种焦虑）。我们想凭经验否定对女人之间经验的连续性和结构共同点的探究吗？对方法的无休止的争论，对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应该如何继续、错在哪里进行的反思充斥着杂志和会议。我们需要思考这种现象在多大程度上确立了超然的、元理论话语的学术霸权（尤其在哲学和文学研究中），而没有促成多样的文化声音和风格。[21] 如果我们想让不同的声音有发言权，那么调整策略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放弃坚决不谈论“男性”和“女性”现实（我将证明，这种做法仍然有用和有启发性）的方法论信条，转而从事更加麻烦、更难应对、也更实用的斗争，去创造一些机构和社团，某些群体的人为所有人决定现实是怎样的。

“不知来自何处的视角”与想无处不在的梦想

理论上，解构派后现代主义反对非实体知识的理想状态，认为这是故弄玄虚，是不可能实现的。阿基米德式的视角是不存在的；相反，历史和文化都是文本，可以被不断地解读，而且每一种解读本身都是不确定的。对于这种认识论批判，或者说将世界视为文本，和一种否认能权威、超验地认识现实本质的各种断言的方式的隐喻，我没有异议。但人类认知者应该如何对待这种无限视角化、永不稳定的世界，这仍然是个问题。不断机警地怀疑对文化的所有确定解读，并采用一种相应的关于无休止文本游戏的美学，这是

解构主义的回答,实际上是一种替代性的理想状态。这样,解构可能会不知不觉地产生摆脱人类固定性的幻想——通过假设批评者是完全多变的,处于各种不断变化、看似无法穷尽的有利位置,但不论是批评者还是考察中的文本的作者,都不"拥有"这种位置。

解构主义深深地影响了某些将性属作为解读文化的一种坐标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这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解读只是复制了牢牢控制西方想象的二元逻辑。当代女性主义,用苏珊·苏利曼的话说:"不仅要超越数字 1——这个数字决定了身体或自我的整体性——还要超越决定差异、对抗和交流的数字 2"[22]。"1 太少,"多娜·哈拉维说,"但 2 又太多了。"[23]在苏利曼看来,"数字 1"明确代表了菲勒斯中心主义世界观所特有的对整体、稳定和身份的虚构。"数字 2"代表性属的坐标,女性主义者用它来暴露那种世界观等级的、对抗性结构。"数字 2 之外"不是其他数字,而是"不断的复杂化"和一种"让人目眩的叙述的累积"。苏利曼这里指的是经常被引用的克里斯蒂·麦克唐纳对德里达的采访,德里达在其中谈到"一种对于数不清的状态的'梦想'……一种摆脱组合状态……创造无法预测的舞艺的渴望"[24]。

女性主义者以不同方式运用来自德里达的这种意象。在杜希拉·康奈尔和亚当·什西威尔看来,德里达提供了一种不受性属二元性和等级制约的乌托邦式的人类生活。[25]但苏利曼认为他提出了一种**认识论**或叙事的理想状态。这样,与传统(尤其是笛卡尔式的)认知意象的关键差异立刻显现。舞蹈和运动的隐喻代替了静止的旁观者本体论上的凝视;对完结性的强烈欲望被抛弃。梦想变成了对"无法预测的舞艺"的向往,而非"不知从何处"看到的自然界清晰的"镜中之像"。但我认为,哲学家对于超越的幻想仍然

存在。取代现代主义的、笛卡尔版本历史特性的只不过是一种新的、具有后现代主义外形的超然，一种新的对非实体的想象：一种想无处不在的梦想。

考察身体，或者说身体隐喻在这些（看似不同的）关于“不知何处”和“无处不在”的认识论中的角色，能最好地体现我的观点。对笛卡尔的认识论而言，如果人们想获得不知来自何处的视角，即上帝的视角，就需要超越身体——它被构思为认识的局限所在，将认知者固定在时间和空间中，并因此将感知和思想定位和相对化。一旦人们具备了这种视角（变得客观），就可以按自然的本来面目观察它，不受人类视野的影响。相反，在后现代主义者苏利曼看来，我们无法超越人类视野和人类对世界的建构和重建过程。身体也相应地被重新构思。身体不再是获取知识的障碍（笛卡尔意义上的知识是无法获得的，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身体也是无法被超越的），而是人类建构和重建世界的工具，不断改变位置，展现无穷无尽的新观点。

在这个活动的（但仍然是一体的）身体的意象下面是一个深层的后现代主义身体意象，它的整体性已经被多样性的模式粉碎。因为人类阐释这种（用苏利曼的话说）“有创造性的活动”自然会“创造”（和再创造）身体本身。[26] 多娜·哈拉维通过赛博格（cyborg）* 的形象富有想象力和感召力地描述了这种碎片化的后现代身体，这种形象成为一种隐喻，象征“女性主义者必须编码的分解后重新组装的、后现代的集体和个人自我”。这种赛博格不仅仅具有文化“多语性”；她（?）还“言语含混”。[27] 不从科幻的角度，而是借

* 赛博格，又译改造人、生化人，字面意思指一种混合了有机体与机械体的人类。在哈拉维的理论里，赛博格是一种隐喻，象征自然与文化之间显线的模糊。——译者

助原型类型学的意象来看的话，后现代主义身体就是神话中骗子(Trickster)的身体，一个外形改变者："具有不确定的性别和可改变的性属……不断改变她或他的身体，对个性进行创造和再创造……(并且)在时间中漂浮"，浮过不同的时期和地点。[28]

这种原型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笛卡尔权威的、世界性认知者的理想体现了男权主义的傲气，这种认知者的特殊认识论位置能够还自然以本来面目，(如哈拉维所称的)叙事"杂语性"(heteroglossia)的后现代理想与此相对，它颂扬融入他人的视野，接受流动性为现实特点的"女性"能力。当清晰的笛卡尔世界的严格界限不复存在，一元化主体的概念不再可靠的时候，骗子和赛博格让我们在"边界的模糊"中，在已经开始的(如哈拉维所称的)自我边缘的分裂和磨损中"感受快乐"。[29]

然而，赛博格和骗子的形象、舞蹈的隐喻等所暗示的认识论*快感** 模糊了人类"讲述故事"的确定性、局限性、无法避免的片面性和个人色彩。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造成这种易变幻想的解构主义解读正不断"消逝"**；通过似非而是的说法、倒置、轻快和复杂的文本跳跃，它们常常(疯狂地向想和它们建立批评对话的人)将自己表现得无所不能。它们拒绝呈现一种它们必须为之承担责任的外形。

但要认识到这种责任，人们必须采取一种更加低调的方式对

---

* 原文为 jouissance，是法语，和英文中的 pleasure 有相近的字面含义，但内涵不同。罗兰·巴特认为，与 pleasure 相比，jouissance 是"令人震惊的、自我分裂的，并和文化的诸多标准发生着冲突"。参见简·盖洛普：《通过身体思考》(*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杨莉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第 191 页。以下斜体的"快感"都取此意，不再另注。——译者

** 原文为 slip-slidin' away，取自美国著名流行歌手保罗·西蒙的名曲"slip-slidin' Away"。作者的用意在于说明解构主义的过时是大势所趋。——译者

待接受异质性这项计划。这种计划是自我解构的，因为它不被当作一种社会过程的理想状态。如果将公平对待异质性作为一种认识论（或叙事）目标，那么任何这种尝试都将无果而终。因为领会差异需要承认舞者无法越过的某些临界点；如果她什么地方都能去，那就没有差异，没有困惑了。否认身份的整体性和稳定性是一回事，变成多样性的认识论幻想——梦想无限多样的化身，可以让人们在不同的地点和自我之间跳跃——是另外一回事。可以自由、任意地改变自己的外形和位置，可以成为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去，这样的身体是一种怎样的身体呢？如果身体是一种象征我们在时空中的固定性、人类感知和知识有限性的隐喻，那么后现代的身体根本就不是身体。

与笛卡尔的看法不同，实现对身体解构主义抹杀的不是一次"不知到何处"的旅行，而是一种对人们总是在某地，总受限制这种认识的抗拒。因此，显然，要克服笛卡尔式的自恃，用舞蹈的隐喻代替观看行为（spectatorship）的隐喻是不够的；需要放弃所有认识论征服的幻想，不仅是那些清醒地关注必要性和整体性的幻想，还有沉醉在可能性和多元化中的幻想。解构主义明确地拒绝将思想视为"自然之镜"的知识概念，但即便如此，对于充分地再现——不同于笛卡尔的构想，但同样有抱负——一个不断异质化的现实，它还是流露出了渴望。[30]

从女性他者性回撤

之前将身体作为象征固定性的认识论隐喻的讨论集中于解构主义对固定性的理论解构。在接下来的两部分中，我将转移注意

力，从更具体的角度关注固定性——或者说，对固定性的否认——的问题。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对以性属为基础的身份理论的当代女性主义评论中，经常存在一种奇怪的选择性。种族和阶级的分析论——现代主义社会批判的另外两股强大力量——似乎没有经历同样的解构。有色妇女将“白人女性主义者”建构为一个整体，忽略将我们定位和划分的阶级、种族和宗教差异，而白人女性主义者（如我认为她们所应该的）也倾向于接受这种做法，认为这有助于产生决定性的评论。人们也经常承认，在种族主义文化中做一名有色人的经历会跨越阶级和性属，产生一些地位上的相似之处。至少，种族意识所产生的各种身份概念被认为是尼采所称的“强化生命的虚构”。[31]例如，多娜·哈拉维称赞“有色妇女”这一均质化整体为“一个赛博格的身份，一个从局外人身份的熔合中合成的有力的主体性”[32]。

我同样听见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种族和阶级都有性属所缺乏的物质基础。对性属而言，或许这样一种物质基础存在于女人的生育角色中，当这种看法被提出的时候，文化多样性和多重阐释的起因就会突然显现。如琼·格利姆肖所指出的，生育在女人看来既是“她们最大快乐的源泉，也是她们最大痛苦的根源”[33]。她总结说，生育可以被富有深意地阐释为一种能洞察性属所起作用的认识来源，但对生育的各种社会建构中的差别，女人生育经历的巨大差异等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值得注意的。当然，女人的生育经历千差万别，但肯定没有男人的差异大，因为没有一个男人可能在任何情况下怀孩子（到目前为止——技术可能会改变这种现状）。[34]为什么我们可以随时解构历史上一直是性属

轴线的最普遍的元素，而又如此顺从于种族和阶级轴线的权威和完整性，奉它们为一切的基础呢？这是一个必须提出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将不再专注于后现代理论，因为我现在分析的性属怀疑论并非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所特有。相反，它贯穿于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流派，以不同的方式展现自己。作为之前对后现代主义关注的替代，我的讨论将围绕女性主义思想的两种历史时刻之间富有启发的区别，这两种时刻代表了两类看待“女性他者性”的不同观点。

前代的女性主义思想（当然，许多女性主义者今天还继续着她们前辈的事业）开始将历史上女人已经完成的工作（被典型地认为属于物质和实践的领域，因此没有认识论或知识上的价值）与体验和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联系起来。这样，对女性他异性（female alterity）的想象就是一种“强化生命的虚构”，让人们对乌托邦式改变和文化转变有一个连贯的认识。同样，在这一时刻，对婴儿性属身份（和文化）的建构中母性作用不断成熟的关注，是发展中的对菲勒斯中心主义世界观女性主义解构的关键因素（这种世界观认为，道德、逻辑、语言的唯一来源是父亲/神学家/哲学家）。

从文化边缘对女性他者性实施的女性主义拯救包含唯物主义（鲁迪克、哈索克、里奇和其他人）和精神分析（丁纳斯坦、乔多罗、克里斯蒂娃、西苏、伊利格瑞）两个流派，后者尝试围绕前俄狄浦斯时期的母亲，而非阳物父亲（phallic father）重构发展理论（developmental theory）。女性主义者曾经怎样描述这项工作，如今它经常如何被描述，我认为注意到这两者的差别是有指导意义的。在1982年《变音符》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考比里亚·库恩描述了丁纳斯坦、里奇和乔多罗的共同点：

> 首先，她们都认为性属是一种社会产物，而非生物事实，是一种通过文化获得并由其维系的惯例。而且在她们看来，这种性属体系不是一种互惠和合理的角色分配，而是一种恶性的共生对立，让两性都得不到充分的人性发展，反而加剧——并且产生——他们的神经症。其次，她们认为，母亲在场、父亲缺席的核心家庭产生了让父权制和对妇女的诋毁得以永存的性属身份……她们质疑这种假设，即劳动的性别分工、性属人格和异性恋建立在生物学和本能的基础上……为了在公共世界扶持父权力量，母性力量如何在托儿所定义性属，她们事实上对此提出了一种共同的认识。[35]

在1987年的一次谈话中，琼·格利姆肖认为这些相同的文本将做母亲的经历描述为“一种衰退的状态”，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在其共生的非区分(nondifferentiation)中被“理想化”。[36]乔多罗的民族中心主义或对历史特殊性所缺乏的关注都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如格利姆肖所认为的，乔多罗将一个压抑的现实表现为一种舒适和快乐的状态，并且含蓄地批评了没有以这种方式体验母性的女人。同样，陶丽·莫依在一次谈话中通过唤醒弗洛伊德的理性观，对抗女性主义客体关系理论的修正，她认为这种理论包含了“一种对前俄狄浦斯时期母亲和孩子之间关系的理想化”，一种看待成长的“生物学”观点，和“对母性的一种浪漫化”。[37]格利姆肖和莫依与库恩谈论的是同样的著作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语境已经发生变化，批评家正根据具体的情况解读这些文本，和库恩解读乔多罗、丁纳斯坦和里奇时的环境相比，这种情况是不同的。我不是说库恩的解读是“正确

的”;以一个永恒的文本为参照去评价历史阐释,这种文本是不存在的。我倒是希望能激励我们面对当下的语境,因为为“生物学主义”、“浪漫化”和“理想化”的幽灵提供生存环境正是当下的语境。我们正在回应的危险不在文本中,而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和我们自己身上。

男性和女性的现实或前景进入到一个保守的时期,将为重新确立传统的性属角色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这是女性主义的看法。谈到社会现实,我指的不仅是这种看法所带来的危险,尽管在性属权力关系的变化受到巨大阻力的背景下,这种危险无疑是足够真实的。我们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数量,在仍然由男权主义主导的公共机构中尝试生存,此刻女性“他者性”对于女人来说正在改变的意义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学院女性主义者的职业环境变化或许能说明问题。10 年前,许多学科的学院女性主义者开始对已经在文化上被建构为女性的进行考察和再评价,而此时女性主义刚刚进入(白人、男性的)学术领域。我们是局外人,具有可疑的政治背景(受到职业训练之前或在此过程中,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经是“政治”女性主义者)和不合适的性别(一个女哲学家?)。那时,我们中没有几个不具有欧洲血统。尽管如此,做一名女性主义学者会让人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他者性”;我们每天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人。为女性主义想象提供动力的恰恰是它永远要记住的:分析男性权力和女性“他者性”的历史建构成为我们的理论任务。

现在,女人已经“被接受了”。更确切地说,人们(似乎)已经承认女人的确可以“和男人一样思考”,而且,能够接受职业“平衡”、批评的超然、严厉的作风,和恰当的局内人心态这些普遍标准的女

人的付出已经得到回报。不能或不愿这样做的人(还有这些同样不能或不愿做的男人)继续得不到认可,无法出版作品,得不到任用和晋升。在这个关键时刻,女人可能会发现与由性属定位和设限的观念做斗争是一种新的投资。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某些人也许会认为,任何对"女性"的认识或思考方式的颂扬在专业方面是危险的,而且或许也是一种个人的倒退。因为在我们进入的这些男权主义机构中,联系的、整体的和同情的态度仍然是优柔、女子气和软弱的象征。女性"他者性"的范畴向许多女性主义者表明机构和文化变迁的可能性,价值、形而上学假设和我们文化的社会实践的根本转变,但在这种机构性语境中,因为我们被允许"融入"专业领域,所以这种范畴可能会成为我们想摆脱的东西。而我们需要做的是精炼自己,能够尖锐地批评,熟练地进行精确的分析。

在 1987 年的一次会议上,一次关于"女性美德"的谈话引发了许多不加掩饰的敌对反应,这让我震惊;对于吉莉根和乔多罗的工作,(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表现出的愤怒经常让我感到沮丧。对性属差异理论家的这种本能反应(不同于这一章的第一部分中讨论的批评)不是由她们的民族中心主义或非历史主义引起的;它的特定对象是人们认为的她们对如共感和抚育这些女性价值的浪漫化。这种严厉的批评姿态或许是一种保护,以防沾染女性"他者性",被"女性的"事物玷污。当然,任何严谨的学者最不愿做的事情是把问题浪漫化。在此,对女性"多愁善感"的鄙视和我们文化中追求镇定自若的现代时尚和对职业精神的极度崇拜交汇在一起。

多元世界中二元性的位置

对性属一概而论当然会起模糊和排斥的作用，但我认为，这种判定不是根据方法论准则做出的，而必须由语境决定。对异质性和复杂性的再现同样如此。不论采用二元的还是多重的视角，太笼统的态度都会带来危险。只有特定的语境能够决定一般的批评范畴——种族、阶级、性属——何时具有恶性的均质化作用、何时对社会批判又是不可或缺的。

例如，太过关注历史异质性会模糊白人、男性特权超越历史的等级模式，这些模式影响了西方的知识、法律和政治传统的发展。[38]更广泛地讲，解构二元结构会遮蔽西方文化中权力现实的二元和等级本质。生活在我们的文化中并不意味着(除了意义相反的强大的社会神话)能平等地参与到个体多样性的自由发挥中，和许多其他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一样，当代女性主义也来源于这样一种认识。相反，人们总是发现自己处于支配和从属的结构中——以性属为中心的结构是比较重要的一种。当然，男性/女性二元对立是一种话语型构，一种社会建构。黑人/白人的种族二元对立同样如此。但即便如此，对于这些经历它们的人来讲，这些二元对立的每一种都对他们的经验建构产生深远影响。

这些二元对立影响人们生活的方式之一是通过调解人们彼此的看法和关系(通常是无意识的)的意识形态、意象和联想起作用。让我举一个具体的、当代的例子。1991至1992年的秋、冬两季，数起富有戏剧性和争议性的强奸案和性骚扰案完全吸引了几百万美国人的注意力：法律教授安妮塔・希尔声称当时有望成为最高法

院大法官的克拉伦斯·托马斯对其进行性骚扰;德西蕾·华盛顿指控拳击手迈克尔·泰森实施熟人强奸;还有帕特丽夏·鲍曼指控威廉·肯尼迪·史密斯的熟人强奸案。每一起案件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需要具体分析。公众对每起案件的反应是不同的,而且还经常因为种族原因产生分歧(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导论中谈到的,黑人和白人女性在看待和评价安妮塔·希尔的行为方面具有重大差异)。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更加笼统地看待这三起事件,将1991至1992年的秋、冬两季视为一种文化时刻是有好处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刻以确定无疑的方式露出了它们的狰容。

在这些诉讼的过程中,受到指控的男人自始至终被——律师、参议员和媒体——赋予个体和社会历史,享受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而涉及到的女人则不断被简单地描述为(用波伏娃的话说)"这种性别"、"女人",并伴随着当女人对男性的安全和健康造成威胁时,附着于"女人"的厌女意识形态:她的精神不稳定,是一个具有报复心理的骗子、一个幻想家、一个受到鄙视的神经症患者,策划了男人的堕落。德西蕾·华盛顿的律师们聪明地将她表现为一个孩子,而不是女人,她因此摆脱了这些影射;但帕特丽夏·鲍曼却不断被影射,那一年,女性"原告"最可疑的过去在我们面前受到质问。当然,就非裔美国妇女而言,这些意义还经常被放荡女人的形象,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特有的其他模式化形象所笼罩和超定。但这位极其自信和专业的安妮塔·希尔却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她没有被笼统地描述为一种贪婪的动物(即便对阿伦·斯派克特*

* 阿伦·斯派克特(Arlen Specter):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2006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美十佳参议员。——译者

来说，这也太夸张了）。但她却被不断地（矛盾地）描述为我们的厌女历史基调中不平衡的、恶意的、可操纵的、欺骗性的、复仇心切的、不理智的、暴躁的、歇斯底里的、冷酷的标准和弦。帕特里夏·威廉姆斯暗示的主要形象不是放荡的女人，而是女巫：

> 她触碰到的一切都会自己颠倒过来。她虽野心勃勃，却"超然的"克制，幻想事实的同时又有意识地说谎。测谎仪失去了作用，"不可能的真相"从她的口中喷涌而出。她既有控制力又不理智、既天真又世故、既循规蹈矩又复仇心切——一个冷静、鲁莽、理智的歇斯底里症患者。[39]

非裔美国男性与将男性黑人表现为天生性欲过剩，并可能成为强奸犯的有害的模式化形象抗争，而希尔和华盛顿的行为被纯粹和简单地构想为对这种抗争的背叛，想一想她们的种族——甚至人性——如何在这种构想中（通常被非裔美国男性，也有一些非裔美国女性）抹杀。如今，不可否认，在这些事件，尤其是审判泰森的过程中，这种神话得到文化上的激活和发掘（威廉·肯尼迪·史密斯曾被公开描述——即便在起诉中——为一种本能的动物吗？迈克尔·泰森在起诉和辩护中都被这样描述过）。我正在讨论的形象建构的问题不在于它对种族主义的关注，而在于它对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进行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缩减，简化为为黑人男性的斗争。种族正义只要并且只有通过赦免被"指控"的非裔美国男性才能得到维护，这种建议将"原告"非裔美国女性置于种族主义的网络"之外"。在这种建构面前，希尔和华盛顿或许本应该和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一样问："难道我不是一个黑人吗？"

她们也本应问："难道我一点也不重要吗?"因为当"为迈克尔求情的全国委员会"将泰森说成是"非裔美国人的英雄"、"年轻黑人的行为榜样"时，他们绘制了一幅现实图画，但上面却没有对德西蕾·华盛顿的苦难感同身受的非裔美国妇女的身影。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让非裔美国女性和非裔美国男性兽性大发，而且过分情欲化，历史上，这种意识形态在建构黑人女性与强奸的关系时始终发挥作用，他们也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在人们的想象中，黑人女性是无法被强奸的，就像一只动物不能被强奸一样（当克拉伦斯·托马斯将他的听证会描述为一种"高科技私刑"时，他嘲讽地利用一个了类比，在安妮塔·希尔控告的背景下，这个类比埋没了非裔美国妇女生活的历史现实；黑人男性从未因为虐待或强奸黑人女性而被处以私刑）。

这里发生了什么？突然公开揭露和谴责许多男人（不论黑人还是白人）认为文化上被认可（甚至被期待）的性行为，他们会因此采取防御措施，并感到困惑和愤怒，我相信对他们而言，原型的厌女形象（例如，冷酷的、说谎的、和让男人丧失精力的泼妇）开始左右他们对女人的感觉，在他们看来，除了"这种性别"和"女人"之外，女人没有其他身份。如当代理论家所指出的，人类身份的实际情况其实是多元、复杂，并且通常是含混的。但当自我的一个重要方面处于危险中时，受到威胁的想象可能会受制于更加粗俗的准则，其背后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意识形态昭然的二元对立。一些德国人认为有可能致命的犹太污染危及他们的种族身份，对这些人而言，世界就仅仅由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组成。没有富有和贫穷的犹太人、德裔犹太人和波兰裔犹太人，只有犹太人的威胁。认为"男子气"受到攻击的观点可能会激发类似的关于性属的二元

对立意识形态，还有它们将女人视为敌人的神话。

因此，性属只不过是女人和男人身份（无可争议的）异质性构造中的一条线索，这在某些语境中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准确体现，在这些语境中，我们文化中仍然普遍的性别歧视意识形态沿着性属的界线将这种异质性分为两支。在这种时刻，女人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尽管她们之间存在差异，但生活在性别歧视的文化中也让她们有许多共同之处。这正是托马斯/希尔听证会上发生的一幕。一些非裔美国女性因为安妮塔·希尔公开揭发一位非裔美国男子而被激怒——这是白人妇女想都不会想的问题。但当讨论从案件的细节转移到性骚扰和性虐待的一般动力时，经历上显著和痛苦的共性就会不断出现，超越了种族、年龄和阶级的限制。我不是说托马斯/希尔听证会不“只是关于性属”的，相反，我认为性属的重要性足以需要对它的动力学进行单独分析，种族同样如此。不论分析哪一种，我们都需要对“差异”进行抽象和概括，强调共性和联系而不是身份和体验的分裂。

我不认为这种概括在方法论上是行不通的，就像琼·格利姆肖所认为的：

> 性属的、作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经历即使没有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也让多数人的生活发生改变……但即便一个人永远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他也不*仅仅*是个男人*或*女人。一个人可能是年轻或是年老的、已婚或未婚、家长或不是家长、有工作或失业、中产阶级或劳动阶级、富有或贫穷、黑人或白人等等。性属当然会改变一个人对这些情况的体验，相应地，对它们中每一种的体验也会因一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而

> 存在根本差异。但它也会因为一个人是，比方说，黑人还是白人、劳动阶级还是中产阶级而大为不同。男性和女性经历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此，在某些方面，一个劳动阶级妇女和一个劳动阶级男子的经历——比如，在工厂做劳工，或者受穷和失业的经历——之间的共同点，比一个劳动阶级妇女和一个中产阶级妇女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但在其他方面，中产阶级妇女和劳动阶级妇女之间可能会有更多的共同点，比如说家务劳动、照顾孩子，要“长相诱人”、“有女人气”。
>
> 经历不是按片段整齐排列的，所以总是有可能把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所经历的，从“已婚的”和“作为中产阶级”等经历中抽象出来。[40]

格利姆肖强调性属从来不以纯粹的形式，而总是在由一种影响的多样性塑造的生活的语境中展示自己，这些影响不可能被清晰地分类，并在很少情况下是分离和可以孤立的，这种观点绝对有针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像格利姆肖接下来认为的那样，对性属进行抽象或概括在方法论上行不通或者是将差异恶性地均质化。诚然，我们再也找不到为了进行这种抽象，格利姆肖所需要的笛卡尔式的整齐划一，一个由清晰的片段组成的世界。此外，我们可以调整方法论工具，让超越差异的性属共性在由各种阐释和变化构成的精细的织网（或者在总是可以产生的大量反例）中变得无法辨认。但社会批判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格利姆肖的理论在衡量各种再现的充分性时，以它们对待人类经历“极其斑驳的本质”的“公正性”为标准[41]，如果以这种标准为参照，那么几乎所有的社会批评都有方法论问题，并且进行扭曲事实的抽象。格利姆肖的“变

化”论虽然以展示性属的碎片性为目的，但事实上也解构了种族、阶级和历史的连贯性。因为尽管现行的知识惯例赋予种族、阶级和性属特殊地位，但改变经历的因素在现实中是没有穷尽的，而且总会产生某些能够动摇任何已经提出的一般化的差异。如果一般化仅在没有多重变化或阐释可能性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的，那么任何种类的——种族的、阶级的、历史时期的——文化一般化都将无法实现。剩下的是一个完全由反例构成的世界，男人和女人在其中看世界的方式纯粹是特定个体的方式，并受形成这种特性的独特构造的影响。[42]

相反，托马斯/希尔听证会证明，概括男性视野的局限和女性经历的共性在某些语境中是有用的。“他们就是不理解”，我不记得第一次这样讲的人是谁，但媒体很快捕捉到这句话，认为它表明和象征女人中不断成长的观点：没有几个男人能理解性骚扰的道德严肃性，或者其羞辱性和通常具有麻痹性的个人动机。当然，有些男人是“理解”的。“不理解”没有写在Y染色体上，也不是来自某些具有明显男性特征的认知或性格缺陷。这是由接受并认同在一种父权制文化中作为男性所拥有的地位和特权（和不安）而产生的盲目（我之所以说“接受”和“认同”，而不是“享受”，是因为这些希求、渴望他们历史上一直无法享受的男性特权的人同样是盲目的）[43]。与男性的地位、特权和不安带来的视野上的局限抗争——用玛丽亚·卢贡内斯的话说，断然“驶向”女性经历的“世界”[44]——的男人，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看问题。

我们承认，种族和阶级的视角——更不必说政党政治——在参议院委员会对安妮塔·希尔和克拉伦斯·托马斯的提问中起到调解作用，但我们能否认纯粹的男性经历的局限没有塑造听证会

的话语吗？这些局限在托马斯的诋毁者中甚至比在他的支持者中还要明显，因为同情地表现希尔的观点事关他的诋毁者们的利益，虽然他们基本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的问题从来问不到点子上，而且通常他们对性骚扰严肃性的武断看法也似乎无法让自己信服。此后，媒体——还有“这个民族”——突然意识到这个（对女性主义者自始至终都很明确的）事实：美国参议院实际上是一个全部由男性组成的俱乐部。1992 年的竞选让四位新的女性议员（其中一位是非裔美国人）进入到国会中。她们没有回避谈论将“女人的观点”带到她们的职务，并以此带到她们希望帮助创造的不同的参议院“文化”中的重要性。

学院女性主义必须仍以转变文化，而不只是对女人进行更具统计性的再现为目标。学院女性主义者在这个语境中质疑“女性现实”这种观念的完整性是让人不安的，因为我们（历史上形成的）“他者性”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上一直没有与“他者性”发生接触的学科，而我们刚刚开始在其中找到立足点。福柯不断提醒我们，个人的利益和欲望不总是把我们带向想象中的地方，还常常维持无意和多余的权力构造。女性主义的性属怀疑论会不会为复制白人的、男性的“知识/权力”（借用福柯的术语，它强调知识从来不是中性的，而是维持着一定的权力关系）服务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它也不是阴谋的结果，而是——用福柯的话说——一种“没有战略家”的“策略”，通过大量的非集中过程发挥作用：通过加入一个知识集团的快感和会员身份带来的社会和物质回报；通过参与一项具有文化力度和主导性的理论计划的兴奋；通过在我们工作的机构中维持一种不可知论立场的艰难；通过智力上对男性主导和女性附属的老生常谈的厌烦；通过接受新

鲜和新奇事物的后现代主义倾向；通过新的理论视角提供的纯正的深刻见解；通过我们再现差异的女性主义承诺；甚至（最具讽刺地）通过我们治疗由排斥和异化造成的伤害的“女性”欲望。

更具强迫性的是，“职业精神”的要求，还有它对严厉作风和学问的苛刻、“中性”的标准都可能需要我们放弃自己的“女性”认知和处事方式。对于一名专业学者而言，职业精神的召唤是特别有力的——几乎不可抗拒。在我们文化的古典传统中，“理性的男子”为这种“中性”提供了典范。女性主义者已经揭示出，这种中性是其男权主义偏见的幻想和神秘化。而如今，代表“职业”事物的范畴几乎起相同的作用；这或许是具有 20 世纪鲜明特色的对“不知来自何处的视角”的翻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的社会效果正得到体现，而许多职业女性今天面临的问题在当时的争论中事实上以同样的方式被建构，这让人感到震惊和沮丧。和现在一样，当时对女性主义谈论性属差异也有一种强烈的抵触，职业女性尤其如此。“我们现在对人感兴趣——不是男人和女人”，一个格林威治村的女性文学团体宣称，声称自己是——在 1919 年！——“后女性主义的”[45]。和她现在的对应者一样，20 年代的“新女性”也因为具备和男人相当的多样性而受到赞美。“新女性的实质是，她们之间互不相同，就像男人一样，在工作和娱乐中、在优点上、在抱负和得到的回报方面互相区分。她们是不同的女人，不是女人的总称，”利塔·霍林沃斯写道。[46]米利亚姆·福特断言：“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片广阔的单性活动舞台。”[47]

回避和轻视早期的女性活动家在职业女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对通行的制度而言，这些活动家是一个“陌生的、让人不快的”

团体，试图证明一套可供选择的特殊的、互相关联的“女性”价值。[48]但是，女人被鼓励接受她们所从事的职业中的理性的、客观主义标准，渴望“卓越”和“对自我的遗忘”而非性属意识，发展一种“她们和职业男性，（而不是）和非职业女性之间共有的利益”[49]。在客观性和卓越性的“中性”标准中，职业女性发现了作为人，而不是女人被接受的方式。无论如何，如南希·科特指出的，用计对抗这些标准（将它们揭露为神话、提供其他方案）的做法肯定会“将她们标注为局外人”[50]。

但在一个实际上由性属二元性构成的世界中，任何人都无法仅仅做“人”。这是不可能的，就像在一个种族主义文化中，我们不可能“只是一般的人”一样（同样让人吃惊的是，只有当黑人意识维护自己的时候，人们才听到白人抱怨——“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一般的人；为什么总是要‘黑人’这样、‘白人’那样……”）。我们的语言、知识历史和社会形式是性属化的，这个事实和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都是无法回避的。其中一些影响可能是无意的，甚至受到强烈抵抗；我们最强烈的愿望可能是要超越性属二元性，按优点衡量我们的行为，而不是将其归为男性或女性。但不论喜欢与否，在当前的文化中，我们的活动是被编码为男性或女性的，而且在性属/权力关系的主导体系中将会以这种方式运作。采用学术界的“职业”标准不是一种缺乏性属政治的活动，就像当下流行的女式西服和宽肩夹克不是没有性属含义一样。在这种文化中任何人在性属上都不可能中性的。

人们可能会认为，批判并将抽象的“人”这种自由主义观念历史化的后结构主义与我的论述相契合。不完全是这样的，但后结构主义对自由人文主义的批判力度，被它坚持“正确地”[51]让种族、

阶级和性属这样的总体性范畴失去稳定性的倾向所弱化。实际上——也就是说，在我们尝试去改变的体制的语境中——对抗自由人文主义最有力的策略，是这些通过充实社会利益、历史定位和文化视角这些概念的社会身份的总体范畴而将“人”（和它声称具有的一种“中性”视角）祛魅的策略。如今，我们正得到建议，作为理解历史和文化的资源，沿这些方向进行的最有力的分析——例如，女性主义对女性主导婴儿护理所造成的后果，或对我们的学科和职业的经典探索——应该受到驳斥。我们的大多数体制还没有开始吸收现代主义社会批判的信息；通过后现代的异质性和不稳定性让它们摆脱困境自然为时尚早。这并不是说体制的改变将通过社会身份和定位的单义和固定的概念实现。相反，为了进行总体批评（当需要进行总体评价时，这种批评是合适的），同时关注复杂性和细微的差别，我们需要保留实用的空间。如果想有效地与体制保护自己不受深刻变革影响的倾向抗争，我们需要采取务实的态度，而不是追求理论上的纯粹。

当然，要预测一个人的姿态将会呈现怎样的文化意义，他自己的活动将会处于怎样的大环境中，这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历史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见证了女性主义意识和女权激进主义的分裂和消散，此时妇女们正挣扎在南希·科特所称的“20世纪女性主义的困境”中：保持性属意识和身份（作为一种政治统一体和可选方案的来源），与破坏限制人类选择和可能性的“性属疗法”之间的张力。[32] 在追求一个被性属二元性削弱的理想世界的过程中，二三十年代的“后女性主义”意识逐渐远离了性属身份。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我们也因此让我们自己远离了女性主义的转变可能性的来源——

在那时看来必须在40年之后被重新唤起和想象的可能性。我担心，对性属分析论的解构将会迎来一个周而复始的类似的女性主义分裂的文化时刻。

“物质女孩”

——消除后现代文化

作为后现代范例的可塑性

器官移植、生命延长系统、显微外科和人造器官已经成为普遍的医疗手段，在这种文化中，我们似乎马上就要真正实现视身体为机器的17世纪想象。如果说我们已经在专业和技术层面上实现了这个概念，那么也可以说我们已经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将其解构。在现代社会初期，机器的意象有助于清晰地传达一个完全受控的人类身体的形象，人类无法改变这个身体的基本机能。当时象征这种身体的主要隐喻——钟、表、发条——想象了一个不论是造表人自然还是上帝设置并上了发条的系统，以可预知和有序的方式运转，受控于人类无法控制的规则。一旦理解了这个系统，我们就可以帮助它更有效地运转，并且当它出故障的时候，我们可以介入，但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构造。

追求这种现代的、决定论的幻想至其极限，受消费资本主义潮流、自我的现代意识形态，和它们在美国大众文化主导中的具体化表现的支持，西方科学和技术现在已经产生了矛盾，但却可以预见（因为它始终是机械论概念中的一个要素，尽管被埋没并且没有合法地位）一个关于人类从身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新的、后现代想象。一开始以替换出现故障的部分为目的的技术已经引发了一种受重置、转变和修正的幻想刺激的产业和意识形态，一种追求无限改进和改变的意识形态，对抗历史性、必死性，甚至身体的物质性，这个过程是渐变和确定的。取代这种物质性的是我所称的文化塑料；取代造物主上帝的是我们自己，这种塑料的主要雕塑家。对物质局限的蔑视，和随之而来的对自由、改变和自我决定的陶醉不仅发生在有关身体的当代技术中，而且体现在广泛的语境中，包括多数的当代身体话语，既有通俗的也有学术的。在这篇文章中，通过考察多种此类散漫的语境，我将尝试描述这种可塑性范例的某些要素，揭露它对某些事物的抹杀——它拒绝相信或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除的物质和社会现实。

塑料身体

《健康》杂志力劝："创造一件杰作，把你的身体雕刻成一件艺术品。""你想象出了你想变成的样子……然后变成那个样子。""挑战很明确：需要重新安排。"[1]塑造身体的精密技术曾经是职业健身圈里的阿诺·施瓦辛格和雷切尔·麦克利希思的秘密，如今只要付得起健身馆的会员费，谁都可以享受这项技术（图 40）。"现在身体在我眼中。"为影片《周末狂热》训练完之后，约翰·特拉沃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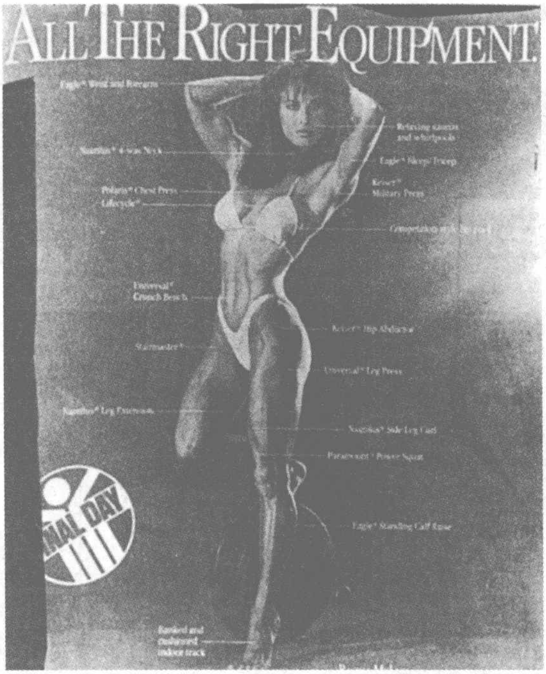


图 40

“几乎就像可以被捏成各种形状的泥土。”[②] 在医学领域，整形手术的反复和作为纯粹化妆手段的使用因为迈克尔·杰克逊、雪儿和其他人而被接受，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规模惊人的产业，涉及范围从鼻子整形术、整容术、紧腹手术和隆胸术，一直延伸到胶原丰唇，脚脖子、腿肚子和臀部抽脂（图 41）。1989 年共实施了 681000 例手术，比 1981 年增长了 80％；超过一半的手术对象是 18 到 35 岁之间的病人。[③] 前卫的《细节》杂志将“外科手术的拉伸、填塞和抽取”描述为“另一种美妙的（时装）配件”，并邀请读者在其月度短评专栏“富人和名人的刀片尺寸”中分享他们的整形经历。在这个专栏中，把脂肪从身体的一处移到另一处被描述得像换帽子一样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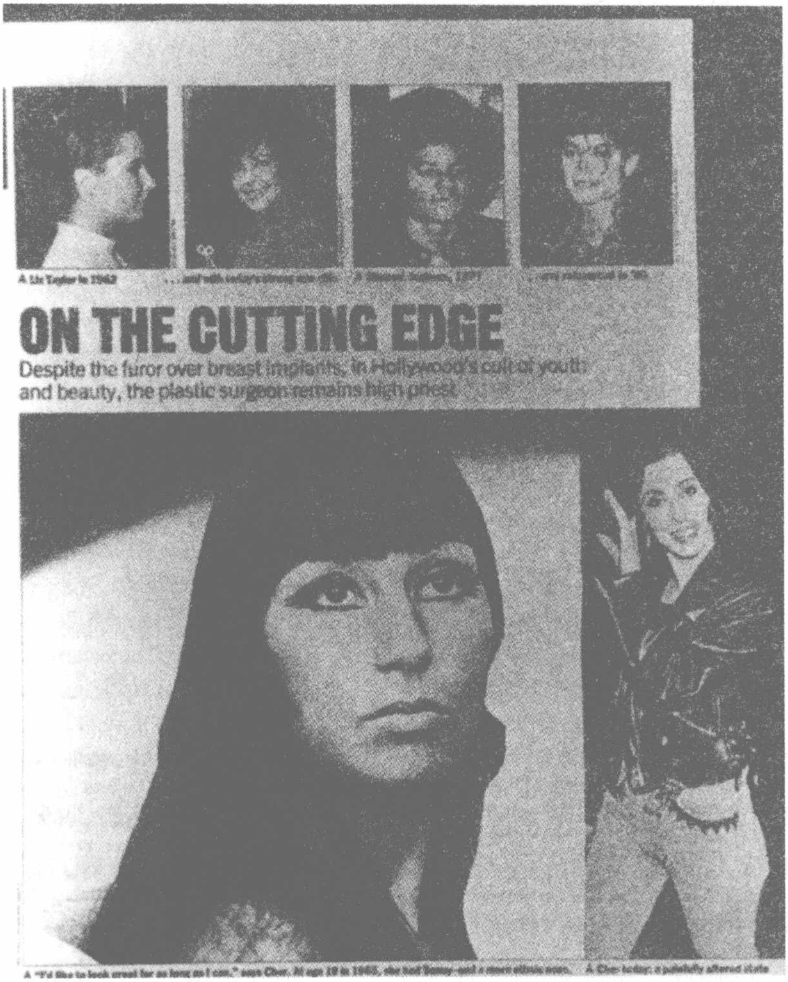


图 41 这幅图表现了几位明星整容前后的对比，包括伊丽莎白·泰勒、迈克尔·杰克逊、雪儿。

布朗医生是一位艺术家。他不会在做了拉伸和填塞后把你忘掉……他为我的脖子抽脂，为我的鼻子整形，拉紧我的额头让它有更好的线条。然后他从我腰部的一侧抽取了一些脂肪，注射到我的手中。刚注射进来的时候是一个肿块，然后他

用手将它抚平，让它变得好看。告诉你，鼻子和脖子已经让我大有改观，但还是无法和我难以置信的双手相比。每一处脂肪都被抹平，血管再也不凸起，皮肤看上去柔软、棒极了。（但是）你必须小心不要撞到你的手。[4]

通俗文化并没有限制这些关于重置和自我转变的幻想。相反，我们不断被告知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体。“只要合理饮食，适当锻炼，你就几乎可以拥有任何你想要的身体。”“依云”* 广告断言。当然，对选择和自主的渲染，和轻松地将整形手术比作为时装配件的类比具有很强的蒙蔽性。它们抹杀的不仅是让多数人无法享受这些实践的地位、金钱和时间的不平等，还有这些能够享受的人所特有的绝望。“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长相和感觉，不管怎样，不管怎样我都愿意。”蒂娜·利扎蒂说（我在前面提到了她的“刀片尺寸”的经历）。医学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名为“外科治疗癖患者”（或者更随意的说法，“手术刀奴隶”）的范畴，这些人不停地做手术，为了不断追求那个晦涩却极其标准化的目标，那个“完美的”身体。[5]改变和重置身体的做法有它的阴暗面，会造成拙劣、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手术，还有运动癖、饮食失调。而且，尽管“依云”的广告作出了上述断言，一个人还是不可能拥有任何他想要的身体——因为不是每一种身体都是合适的。一则广告的副本表现了选择和自主，但也正是这则广告从视觉上抹杀了个体和文化差异，并由此限制了我们的选择（图 42）。

均质化和标准化的形象——这些形象的内容绝对不是任意的，而是充斥着性属化的、种族的、阶级的，和其他形式的文化图

---

* 一种著名的矿泉水品牌。——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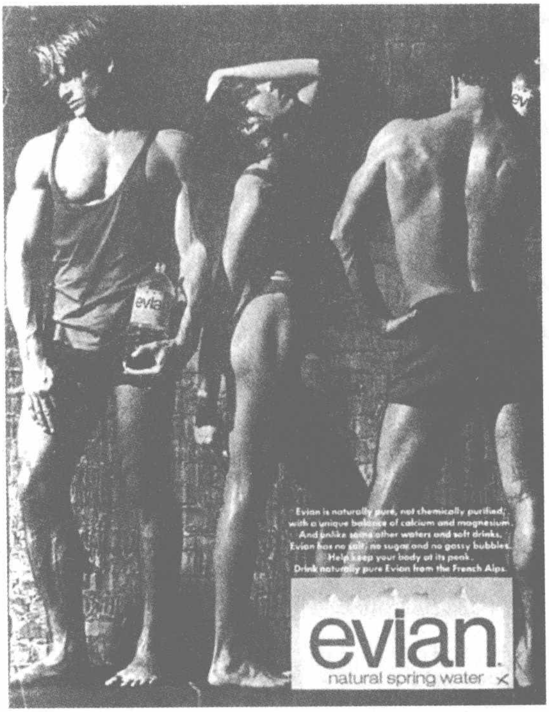


图 42 这是依云矿泉水广告。

解——将我们包围，这个事实太过明显，如果再说明似乎都有些难为情了。但对于我所描述的行为，当代的各种理解不仅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构思，而且在构思过程中使用的术语恰恰抢占了这种对文化意象的批判。此外，在话语和阐释的层面上，它们再现了后现代身体在文化实践层面上生成的相同条件：将生命建构为塑料的可能性和无关紧要的选择，不受历史、社会地位，甚至个体发展史的影响。1988 年的一次《唐纳休》脱口秀可以作为我的第一种解释。

这次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为视康彩色隐形眼镜做的一系列电视广告。正如它们最初播出的那样，在这些广告中，一个女人出现在一种梦幻、浪漫的幻想中——比如，缓慢、优雅地从天堂降落。然后一个男性画外音用轻柔、有感染力的语言描述她：“如果我相信

天使的存在，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像祈祷的答案一样从天而降的天使，眼睛有着树皮一样的褐色。”（长时间的停顿）“不……我不这么认为。”（此时，磁带倒放，把我们带回：）“眼睛有着和一个孩子的想象的颜色一样的紫罗兰色。”广告的结束语是：“视康彩色隐形眼镜，关注褐色的眼睛。”（图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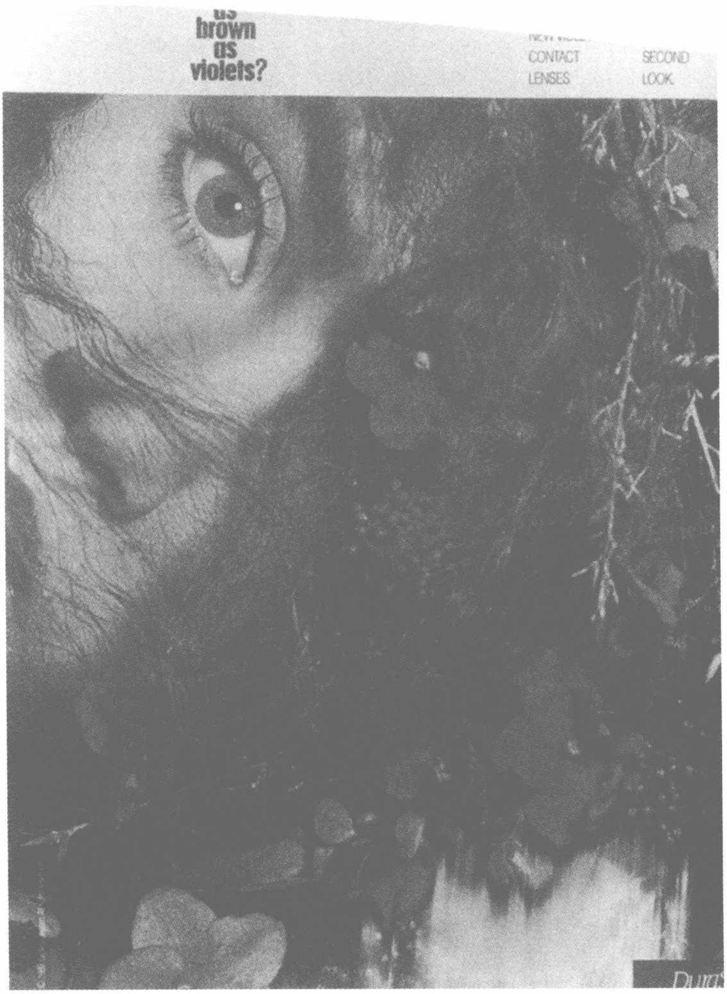


图 43　这是视康彩色隐形眼镜的广告。

菲尔·唐纳休的问题是：这则广告涉及种族主义吗？唐纳休显然认为此处可以引发争议，因为他为这个节目邀请的听众全部是有色妇女和白人妇女，让她们讨论这则广告的含义。但唐纳休显然和他的大部分听众不是同时代的人，他的听众不断强调这则广告没有“不妥”的地方，“成问题的”是任何“将其政治化”的倾向。下面是一些摘自这个节目的文字记录的评论：

“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政治化呢？事实上，如果人们烫发，那只是人们喜欢烫发的样子，不是什么社会学问题。或许黑人妇女喜欢戴绿色隐形眼镜的样子，因为这样更有吸引力。这不是让她们——我是说，为什么朋克摇滚乐手喜欢紫色的头发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会让他们有更好的感觉。”(白人妇女)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当我戴上蓝色隐形眼镜的时候，我感觉很好。它让我觉得性感、与众不同，可以说是另外一个女人，这很有意思。”(黑人妇女)

“我烫我的发，你化你的妆，有什么不同吗？”(白人妇女)

“我想成为一个多面手……具备不同的长相，能从一种变到另一种。”(黑人女模特)

“当我们感觉好的时候我们用新化妆品、剪新发型、买新衣服，我们都是一样的。现在轮到隐形眼镜了，有什么不同吗？”(白人妇女)

“这不是绝对的……伯·德里克把她的头发弄成玉米秆的样子，或玉米的样子……不管那种东西叫什么。白人妇女喜欢棕褐色的头发。”(白人妇女)

“她不是想成为白人，她想与众不同。”(关于一位戴隐形

眼镜的黑人妇女)

"女人永远对自己不满,这是时尚。"

"我把它们当玩具放进去,纯粹为了好玩,想寻点变化。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我真的很享受。"(黑人妇女)[6]

需要做几点说明:首先,用化妆品、设计发型等仅仅被构想为自由的游戏、乐趣、一种创造性表现的问题。它们确实如此,但许多女人向世界展现她们自己之前就认为它们是必要的,连迅速地去一趟角落里的信箱也不例外。暗示了女人对她们的外表不满的那条评论(现在已经被很好地记录下来,令人沮丧)淡化了这种不满,并将其置于文化批判的范围之外:"这是时尚。"她的意思是,"这仅仅是时尚",其异想天开的、政治上中立的变迁为女人永远肤浅的价值观提供无穷的乐趣("女人永远对自己不满意")。如果我们永远对自己不满,那么暗示是,这是由我们的女性本性造成的,不应该太把它当回事或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其次,时尚的内容,即女人热衷于表现的各种具体理想(这些理想在历史、种族、阶级和其他方面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被看做是随意的,没有意义;阐释既不需要,甚至也是不合适的。相反,所有的动机和价值都来自变化和差异本身的兴趣和诱惑——那种"性感"。那个女人承认蓝色的隐形眼镜让她成了"他者"("另外一个女人")。但这种"他者"不是种族或文化的"他者";她性感是因为刺激、新奇和呈现一个不同的自我所引起的情欲。意思是,任何不同的自我都行。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平等地看待所有的容貌变化:白人妇女的烫发、伯·德里克玉米条状的发型、晒黑皮肤、化妆、变换发型、黑人妇女戴的蓝色隐形眼镜——在这种"所有"女人"为了更具吸引力"而做

的事情的异质但非区分化的语境中，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具有同样的政治含义（也就是没有政治含义）和同样的文化意义（也就是没有文化意义）。听众中的一位妇女对这种行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她认为我们渴望的风格不只反映了时尚或女性本性的自由游戏——她甚至声称我们“是被强迫认为金发碧眼是最漂亮的”，但她发言过后是一阵敌意的沉默。过了一会儿，某人提出质疑：“金发碧眼有什么不对吗？”听众对这位民主价值观的守护者报以热烈掌声。

这种“对话”——如我将要论证的，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对话——抹杀了同样的一般性要素，即前面讨论的改变身体时使用的修辞。首先，比方说，它抹杀了，让伯·德里克玉米条状的发型和黑人妇女拉直的头发完全不相称的社会地位和历史渊源。一方面，伯·德里克的地位是特殊的，不仅因为她白皙得如此完美，以至可以传递出异域风情的“他者性”，同时又不受种族的玷污，还因为她是一个引领潮流的著名影星。与此相对，并促成黑人妇女“选择”拉直头发的是一种种族主义身体歧视的文化历史，比如19世纪的梳子试验（comb-test），要求黑人在进入教堂和俱乐部前用挂在门外的一把细齿梳子梳头，只有顺利梳过的人才可以进入（还有许多类似的试验——松板试验、褐色袋子试验——决定一个人的肤色是否够淡，符合要求）[7]。

其次，伴随这些历史实践的是一种规训的现实，但这种现实在认为所有的自我改变都是随意的，都是没有价值的游戏的变体，具有相同文化含义的阐释中被抹杀。我在福柯的意义上使用规训这个词，用来指不仅改变主体而且将其标准化的实践。也就是说，重复前面讲过的一点，不是每种身体都可以的。《本质》杂志1989年对它的读者做的一次调查显示，68%的反馈者用化学方法或直板

夹将头发拉直。[8]“只是为了好玩”？为了“与众不同”带来的刺激？当我们把追求美丽看作一种标准化规训时，就会明白并非所有的自我改变都是相同的。为了在这种文化中对所有女人实现标准化，时尚的普遍暴政——这种暴政是永久的、晦涩的，教导女性身体，指出个体缺陷和不足——是一种强有力的规训。但即便我们被标准化都是为了具备适当的女性危机感和对外表的专注，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中，对不同的群体，还是会出现更多的具体要求。当伯·德里克把自己的头发梳成玉米条状的时候，她参与了标准化的女性实践。但当奥普拉·温弗瑞在她的节目中承认自己一直想拼命拥有摇头时“左右摆动的头发”时（图44），她表明了种



图44 这是一则直发膏的广告。

族和性属标准化的力量，这种标准化不仅符合“女性特质”的要求，还符合仍然主导着荧屏、电影、通俗杂志的高加索人的审美观（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对自己厚的、当时还是卷的“犹太”发型，我和奥普拉有同感）。不管是奥普拉，还是《本质》杂志的读者，抑或是许多在 20 世纪 60 年代烫直自己头发的犹太妇女（包括我自己）都没有在此创造性或戏谑地杜撰自己。

视康知道这点，即使唐纳休的听众不明白。自从这项活动首次出现后，视康公司就用一个更加委婉的版本替换了最初的杂志广告扉页，得体地去掉了之前的“褐色”一词[因为变化太细微，所以为了照顾一般读者，模特成了黑人——尽管应该注意到，视康不欣赏褐色眼睛的同时也让世界上的大多数眼睛不值得“关注”（图 45）]。在电视广告中，出现了一个类似的“褐色液体”；保留了“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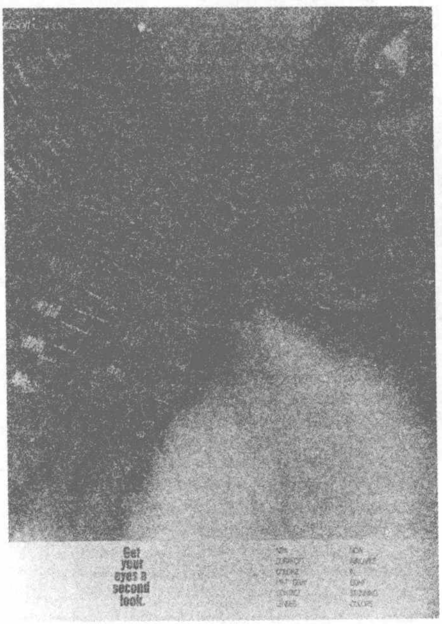


图 45 这是另外一则视康隐形眼镜的广告，模特由白人变成了黑人。

睛有着和……一样的褐色”，去掉了“靴子一样的褐色”和“树皮一样的褐色”这些带有贬义的词。画外音播音员整个说不出话：“眼睛有着和……和……一样的褐色”，然后，大概因为无法诱人地笑，就直接切换到了“紫罗兰色”。就像那则修订过的杂志广告，这个电视广告的结尾是：“关注你的眼睛。”

当我给我的学生看这些广告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像《唐纳休》的听众一样不屑一顾，认定我又将单纯的形象和做法变成政治问题。我坚持认为：如果关于美丽的种族标准在此不起作用的话，那么为什么蓝眼睛的人不带褐色隐形眼镜呢？一个月后，我的两位学生成功地制作了一幅宣传褐色隐形眼镜的视康广告（图46），刊登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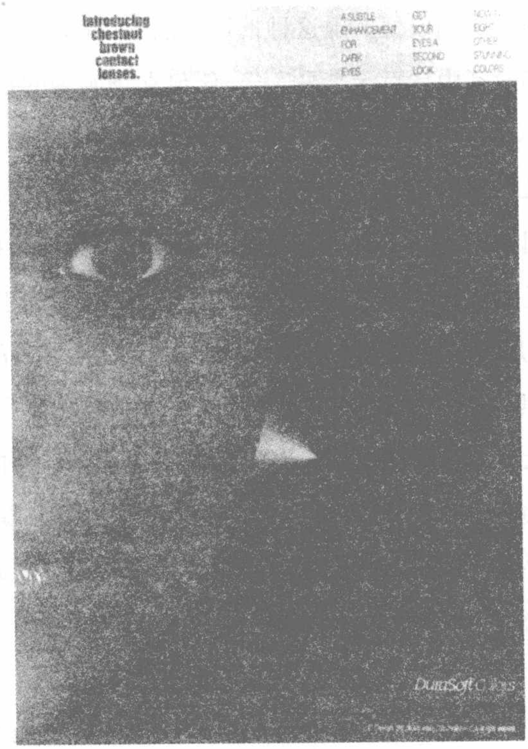


图 46　这是鲍尔多的学生制作的一则宣传褐色隐形眼镜的视康广告。

质》杂志上，并发起了一项广告活动，只面向已经有褐色眼睛的消费者，对他们承诺不是通过刺激地变得更黑而“注意到蓝色的眼睛”，而是通过让眼睛的褐色变浅而“细微地增强”黑色的眼睛。视康广告活动的创造者显然知道我们文化中的差异并非都是一样的，而且他们还继续利用和维系这个事实，尽管形式越来越神秘化。[9]

塑料话语

这档《唐纳休》视康节目（实际上，任何脱口秀）完美地展现了我们所称的后现代对话。所有的历史感和所有保持文化批评，以及进行区分和辨别以便实现这种批评的能力（和倾向）都已消失殆尽。在这场对话中，“百无禁忌”——任何立场明确的社会批评（例如，那位妇女明显意识到种族压迫，认为金发碧眼的诱惑力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与紫色头发的吸引力所具备的文化意义大不相同）的稳定性立刻被破坏。到处都是无穷的差异，没有任何区分——是对差异的无差别拼凑，对具有类似重要性或中心性的事物的混杂。当然，电视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是我们塑料多元主义的主要塑造者：如果一期《唐纳休》节目是关于女性主义对被殴妻子的看法，那么下一期就会谈受虐待的丈夫。爱得太深的女人、牧师的性习惯、精神病医生的心理不正常的孩子、不懂规矩的女儿、脱衣舞男、十年不说话的亲戚，所有这些与乱伦、强奸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一道广受欢迎。这位伟大的平均主义者——电视的荧屏框——让一切变得平等。

这种差异的景象损害了保持连贯的政治批判的能力。在没有限制的差异中，所有都一样（“我烫我的发，你化你的妆，有什么不

同吗?")。细节决定一切,概括性——这种概况性的作用是收集、组织、区分优先次序,为了强调和批评暂时不关注特性——受到怀疑。因此,每当《唐纳休》的视康节目被指责过于笼统化,另外的人总会提出一个反例——我的眼睛是蓝色的,而且我是黑人妇女;伯·德里克的玉米条状发型——来分裂这种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认为这些例子是对社会批判的驳斥。他们几乎总是退让,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在不稳定的事例面前进行批评性归纳。他们有时把范围缩小,说自己指的是某些人,不是所有人。当然他们指的既不是所有,也非某些,他们指的是大多数——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对社会或文化模式作出一种断言——而在后现代语境中,这是一个越来越难维持的立场,因为我们被替换过的形象包围,而且没有可以在其中做出辨别的定向语境(orienting context)。

强调定向语境(因此不认可细节在其绝对"差异"中的主导地位)的人被认为在进行"总体化",即,他们建构了一种具有错误的连贯性和道德强迫性的体系,抹杀和边缘化了其他人的经历和价值("金发碧眼有什么不对吗?")。作为一个频繁受地方电台和报纸记者采访的人,我经常发现自己的女性主义论点被如此认定,就像一篇关于隆胸手术的文章所认定的那样。在几页关于整形外科医生的"专家"建议之后,记者简要地引用了我对女性身体转变的政治提出的警告(没有一条针对打算做整形手术的人,都是文化性质的),然后以一则评论结束,评论对象是我的批评,来自美国整形和重整手术社团的文电主管:

> 这些不考虑外科整形的人不应该对考虑的人说三道四。这是人们最难理解的。重要的是外形对那个人来说是不是个

问题。我们虽不相同，但我们都想好看，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但没人敢说我们不想拥有可以拥有的最好长相。[10]

通过这种包容的、平等主义的语调，这个国家中最强大的外科整形团体的媒体联络人将自己表现为“差异”的保护者，对抗女性主义独裁者的均质化和压抑的政权。

专业学者们通常不愿认为自己在理论或知识话语的层面上体现通俗文化的价值和关注。我们更愿将自己视为通俗话语的祛魅者，帮助人们意识到文化并澄清文化中的问题，而不是无意识地复制文化。虽然我们对自己有信念，但我们总是处在我们批判的社会中，而且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后现代时刻这样明显。我所称的后现代对话的所有要素——沉醉于个体选择和创造性快感；享受特性的刺激，不信任模式和表面的连贯性；颂扬“差异”但又不具备辨别和权衡“差异”的批评视角；怀疑归纳的总体性本质，同时又迫不及待地保护差异，免受均质化滥用——在当代的大多数知识话语中已经可辨认并且不陌生了。此外，在这个理论自觉的世界里，这些要素不仅被体现（就像《唐纳休》脱口秀中围绕视康进行的对话），而且被明确地主题化和颂扬，被认为带来了各种新的自我建构，不再迷信一元化主体的神话，接受多样性，挑战自由和左翼人文主义如此钟情的对性属、种族等等的枯燥和说教性的归纳。

对于这种快乐和学术的后现代主义而言，谈论文化对身体的掌控已经变得很不时尚——并且是“总体性的”。这样一种视角，人们认为，将主动和具有创造力的主体塑造为被动的意识形态受骗者；它太过关注主导意识形态，认为它是完美和单义的，忽视了为“差异”的爆发创造条件的缺口和所有文化文本的多义、易变和

开放的性质。谈论文化对身体的掌控(例如,在关于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和性化的"旧"女性主义话语中)就等于没有认识到,如一位理论家所言,"游离的、分裂的、活跃的主体挫败主导话语时所做的文化工作"[11]。

所以,比如说,当代文化批评家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严厉批评了他所描述的认为电视是对观众的看法具有"均质化影响"的"蛮横的怪物"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将观众想象为"没有力量和辨别能力",忽视了以下事实:

> 快感源自意义和力量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做一个"文化傀儡"毫无乐趣可言……快感源自生产世界和自我的意义,能感觉到这些意义是为读者而不是这些处于主导地位的人服务的。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可能会被剥夺力量,但他们并非没有力量。抗拒权力是权力的体现;维持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对抗主导意识形态规定的身份也是权力的体现;维护自己的亚文化价值,对抗主导文化价值同样是权力的体现。总之,能够与众不同就是一种权力。[12]

费斯克然后又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或者说论证)各种亚文化为了从"电视提供的符号资源"中得出它们自己的"具有恰当的社会性"和能够赋予它们权力的意义,如何解读《达拉斯,哈特到哈特》(*Dallas*, *Hart to Hart*)等节目。

请注意,费斯克对权力这个范畴的执著和反复调用以一种后现代特有的方式抹平了权力关系域,而且没有区分,比如说,在自己家里进行的与世隔绝的创造性解读中包含的权力,和这些控制

电视节目物质生产的人具有的权力，或者是对抗这种生产的条件和主导意义——比如，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形象和信息——的力量中包含的权力。对费斯克而言，这种主导意义自然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没有一种要素控制观众想象力的能力，会强于观众对文本进行抗拒性阅读时“说不”的能力。可以从《达拉斯，哈特到哈特》勉强获得种族和亚文化意义，这对费斯克来说证明了主导形象和信息只存在于极权主义批评家的脑子里，他们会屈尊从实际上是他们的创造性自由和抗拒的媒介中（“电视的符号资源”）“拯救”那些被剥夺权力的人。

费斯克的权力观——是一片没有山谷的地域，所有的力量在那里都成为“资源”——反映了一种很常见的对福柯的错误挪用。费斯克构想权力被个体或群体占有，是他们“拥有”的东西——福柯不遗余力地批判这个观点——而不是（如在福柯的重建中）非中心化力量的一种动能，它的主导历史形式不是通过权威的计划或法令获得霸权，而是通过多重的“起源不同、位置分散的过程”，调节和标准化时间、空间、欲望和表现的建构中最内部和最细微的要素。[13]这种权力观不需要承认力量的游戏中不会出现主导的地位、社会结构，或意识形态；权力不在任何个人手里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平等拥有它。实际上，它完全不“被拥有”；相反，它将具有不同位置的人和团体包含在内。这种模式对分析男性的主导和女性的附庸是特别有用的，大多数这种分析都是通过我们将自我标准化，去适应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日常习惯而被“自发地”复制。在这种模式中，人们可以承认女人或许真的促成了女性附庸地位的永存（例如，接受、喜欢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和性化，甚至感觉从中获得力量），而不必同时承认她们在性别歧视文化的生产和再造

中具有一定影响力。

福柯的确认为现代权力关系具有不稳定性，换句话说，他强调抗拒是永恒并且不可预知的，而霸权是不确定的。费斯克将这种观点转化为另一种观点（或许受更具解构主义风格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认为抗拒是一种快感，是文化"差异"经由文本"缝隙"的一次创造性和愉快的喷发。这种将创造性阅读称赞为抗拒的做法所抹杀的是，处于附庸地位的人在主导意义——这些意义经常提供一种教育，目的是为了强化自卑感、边缘感、丑陋感——面前表达和维护他们"差异"的价值时，需要进行的艰苦并通常是失败的历史斗争。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在各个法庭出现时，为了证明隔离的毁灭性心理作用，人们给一些黑人孩子看两个除了颜色其他方面都完全一致的布娃娃。然后问他们一系列问题：哪个是好布娃娃？哪个是坏布娃娃？你想和哪个布娃娃一起玩？据肯尼思·克拉克报道，大多数孩子都说白色布娃娃的好话，不喜欢黑色布娃娃。克拉克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哪个布娃娃像你？"此时他们都看着他，他说，"好像他就是魔鬼"，让他们经历这种窘境，强迫他们面对他们的处境中无情和可怕的逻辑暗示。北方的孩子经常跑出房间；南方的孩子会在羞愧和尴尬中回答这个问题。克拉克回想起一个小男孩笑着说，"我像谁？那个布娃娃！它是黑人我也是黑人！"[14]

认识不到标准化意象的心理和文化威力，和缺乏对文化和民族差异的关注一样会有效地抹杀人们的种族压迫经历——这是一个后现代评论家有时似乎忘记的事实。这不是否认费斯克所称的"与众不同的权力"；相反，它坚持认为，这种权力是通过不断的政治斗争，而不是创造性的阐释行为获得的。在此，尽管许多后现代

学者称福柯是他们的指路人，他们和他之间还是存在重大和有启发性的差别。对福柯而言，抗拒的形而上学场所是明确的“战斗”场所；可能会有“无数”和“不稳定”的“对抗点”，但它们包含一种具体力量(即具有历史定位和形态)的严肃并通常是致命的斗争。[15]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用一张海报例证了这种抗拒的概念，这张海报表现了当代社会通过将身体比作战场争夺生育控制(图47)。一些儿童玩具的先进开发者已经自觉开始与种族和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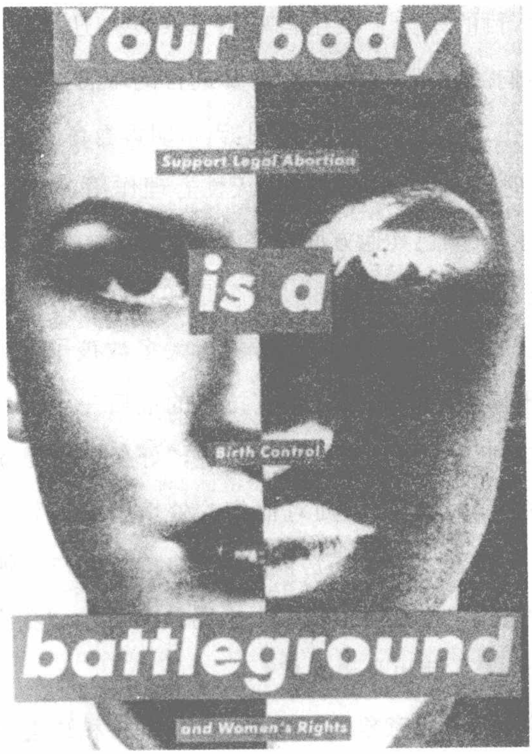


图 47 这是一张很有创意的海报，大标题意思是“你的身体是一个战场”，在大标题之间还有小标题，意为“支持合法堕胎、生育控制和妇女权利”。

形式的标准化进行斗争。肯尼亚娃娃(图48)具有三种不同的肤色(“因此你的女儿一定会满意并感到骄傲”)，并且尝试将来让头发

拉直成为多种装饰方法中的一种。在我看来，这些产品是潜在的有效“抗拒场所”，正因为它们认识到身体是一个战场，需要通过战斗获得自主权。



图 48　这是一则肯尼亚娃娃的广告。

将身体比作战场而非后现代游乐场的隐喻还注意到为“差异”授权的政治斗争中包含的实际困难。《本质》杂志一直有意识并且努力地推广黑人的力量、美丽和自我接纳的形象。“美人”专栏称赞黑色皮肤和丰满嘴唇的魅力；其他版块讲述成就斐然的黑人女作家、活动家、教师，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展示了挑战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标准的身体和衣着风格。但这本杂志的广告却不断利用并维持消费者因为她们身体的种族特征而感到的不足和不安。它们坚持认为，想要美就必须拉直头发，点亮眼睛；它们几乎总是雇用

皮肤白皙、有盎格鲁-撒克逊风格，和“头发飘逸的”模特，确保它们的产品与成为白人文化最看重和赏识的事物的幻想连在一起。

为黑人女性的身体和其“差异”（当然，现实中的黑人女性在非常不同的程度上体现这些“差异”）的权力所进行的持续战斗在《本质》20 周年纪念刊中得到清晰展现。“黑色之美”对面的这则广告实际上在视觉方面肯定了相反的说法（并且意味深长地提出了“逃避”）（图49、50）。这种造成认识上不一致的现象揭示了《本质》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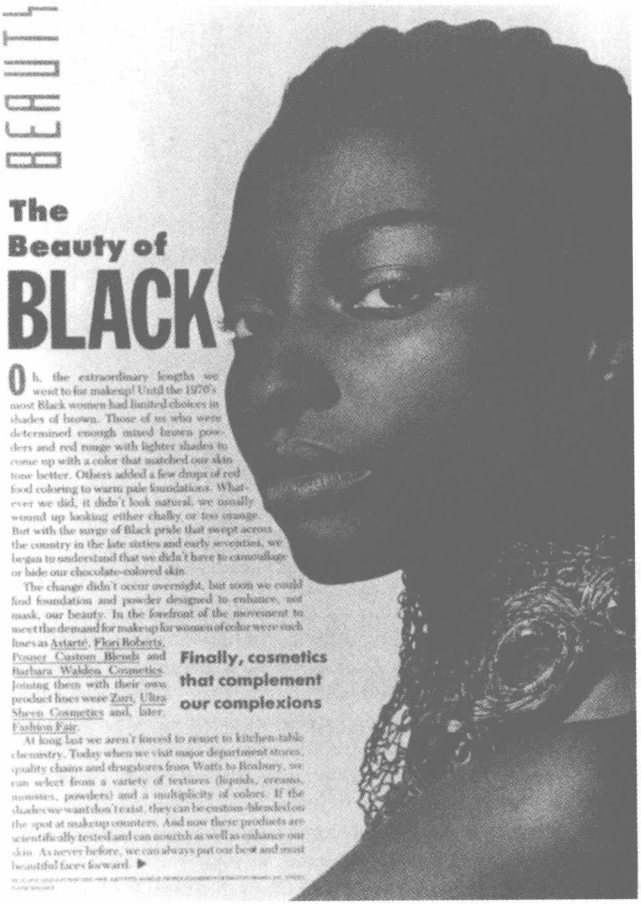


图 49　这是一则化妆品的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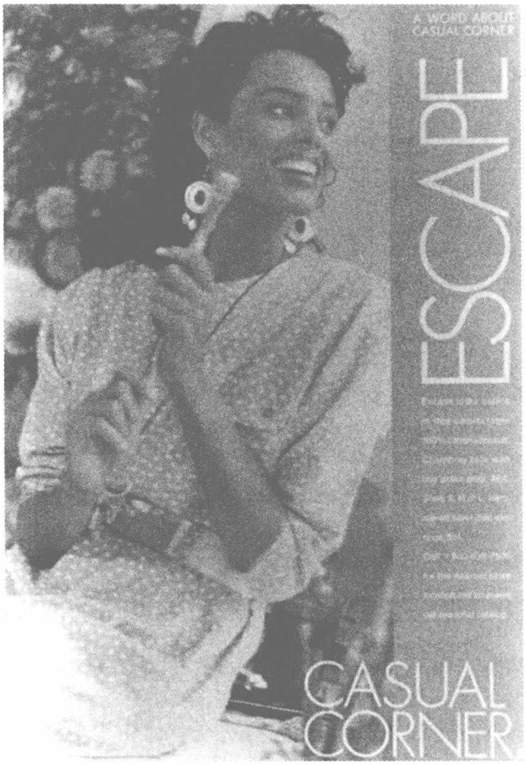


图 50 这是一则宣传女性休闲服饰的广告，广告的右侧有一个醒目英文单词，意为"逃避"，与图 49 中的"黑色之美"形成鲜明对比。

每一期中必须做的抗争，因为它虽然努力让表现非裔美国人自我接纳的信息清晰可见，并处于主导地位，但同时又要屈从于决定其生存的经济条件。让我把话说清楚，在一种处处否认"黑色之美"的文化背景中，《本质》所要传递的信息就是这种自我接纳，而不是相反的认为皮肤光滑、盎格鲁味十足的非裔美国人"不够黑"的暴政。显然，这种场所不是一个游乐场，而是一个布雷区，不断威胁要真正地、而不仅仅从文学上解构"差异"。

“物质女孩”：作为后现代女杰的麦当娜

约翰·费斯克对“差异”的构想，在上面引用的那段话里，至少认为抗拒挑战了支配权的可区分的历史形式。他认为，女人与从肥皂剧的父权情节中渗漏出的颠覆性“女性”价值相连；面对《达拉斯》的浮夸、物质享乐主义的牛仔文化，黑人付之一笑。这些例子说明了一种对权力和主体性的特定历史形式的抗拒。但对某些后现代理论家而言，抗拒是拒绝体现任何固定的主体性；被肯定的是不断有创造性地逃离定位、抑制和定义。所以，根据苏珊·罗宾·苏利曼的建议，我们必须超越历史上受压制的价值（例如，这些文化上被建构为属于低级的、女性的领域，并总体上被排除在西方科学、哲学和宗教之外的价值）的定价，向“不断的复杂化”和一种“令人目眩的叙述的累积”发展。[16] 她颇有见地地（或许也是错误地）援用了德里达的“无法预测的舞艺”[17] 这个隐喻，为了捕捉她所想象的那个舞动的、晦涩的、不断变换的主体性，一个没有性属、没有历史、没有定位的主体性。从这个角度看，真正具有抗拒性的女性身体不是与女性的性化和客体化作战的身体，而是用凯茜·施韦登博格的话说，“（在）女性身体可以在具有多元风格身份的不断变化中被重新塑造的情色政治中，以挑战认为性属是性别差异的基石的固定观念的方式，采取战略模仿……”的身体。[18] 对这种情色政治而言，麦当娜是一位新的后现代女杰。

自从麦当娜被描述为一个颠覆性的文化人物以来，这种将她赞为后现代女杰的做法不是第一次出现。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人们一直从“作为战场的身体”这一角度来阐释麦当娜的抗拒

姿态，因为她拒绝被想象为被动的父权欲望对象。例如，约翰·费斯克认为，对麦当娜的“崇拜者”——成群的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不满13岁的孩子模仿麦当娜的动作和服装——来说，这是她的主要魅力所在。在“崇拜者”眼中，麦当娜证明了独立于父权控制的女性异性恋的可能性，这种性反抗而不是拒绝男性注视，用她自己故作无用和庸俗的注视戏弄它，挑战任何称她为妓女的人，并且最终不去理会她将被如何评价。在这种解读中，麦当娜叛逆的性将自己表现为不是通过“别人”的看而存在，而是具有自我定义的能力，喜爱并满意自己——女人在这种文化中很难具备这个态度，因此这有助于说明，如费斯克认为的，她对不满13岁的女孩的巨大吸引力。[19]“我喜欢她对待自己的方式，像是一种要不要由你的姿态；她性感但她不需要男人……她有几分完全靠她自己的味道。”一个人说。“她给我们想法，这的确是女人的解放，不再害怕男人的看法。”另外一个人说。[20]

值得注意的是，和多数性感明星不同，麦当娜从未将自己宣传为一个鄙视女性主义的人，也从未把女性主义者看作仇恨男人的人。相反，在1985年《时代》周刊的一次采访中，她指出，她在“做自己”时缺少顾虑，并“华丽地”表现“强烈的”性欲，这构成了她赞扬女性主义的姿态。[21]某些女性主义者会赞同她的看法。例如，莫莉·海特认为，“在一个女性性欲被视为如此紧密地与被动性结合在一起的文化中，维护女性欲望”是“越界的行为”：

> 这个策略中隐含了那个旧的似非而是，关于那个会说话的雕像，那个被创造出来，却又开始神奇创造的东西，因为当一个女人——自觉地从一个女人无声的立场，而不是作为一

> 个名义上的男人——写作女性欲望、女性性欲和一般的感官体验时，她的行为能赋予纯粹的肉体存在以声音，能将主导意义体系的产物变为意义的生产者。如果一个习惯认同自己身体的女人书写这种认同感，那么女性特质——根据定义是沉默和迟钝的——会突然变成父权制，一种棘手的话语。[22]

当然，并非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会同意这种看法。但为了照顾我想在此做的一个对比，我们不妨先同意，同时还要注意，关于麦当娜拒绝服从主导和标准化的女性美丽标准，我们可以做一个类似于费斯克的论述。当然，我正在谈论的是更加丰满的麦当娜。那时，麦当娜认为自己故意想与时代脱节。她在《时代》周刊的采访中说，"50 年代，女人不以她们的身体为耻"(这种看法完全错误，但与目前的论述无关)。因为麦当娜认同自己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和她所称的那个时代所缺乏的对女性特质的"压制"，所以她看不起我们这个时代"双性同体的"衣着，同时欣赏自己的腹部，认为它"不是胖"而是"丰满，而且皮肤光滑，我喜欢"。麦当娜认为厌食症患者是一些否定自己和怨恨自己的人，完全受制于从外部强加的价值标准，把自己与这些人相比，麦当娜(如在她看来的)通过维护她自己的(传统上是"女性的"但如今已经过时的)体型表达了自我定义的精神。(图 51)

当然，这不再是麦当娜的体型了。1987 年嫁给肖恩·潘后不多久，她就开始了艰辛的减肥和锻炼计划，她现在每天跑数英里、举重，并且按照当代的主导标准，练就了一副紧凑、苗条、肌肉发达的身材(图52)。她为什么决定改进自己的体型呢?"我的腹部不再肥胖，"她说，"我现在有很好的线条。"请注意这种态度上的彻底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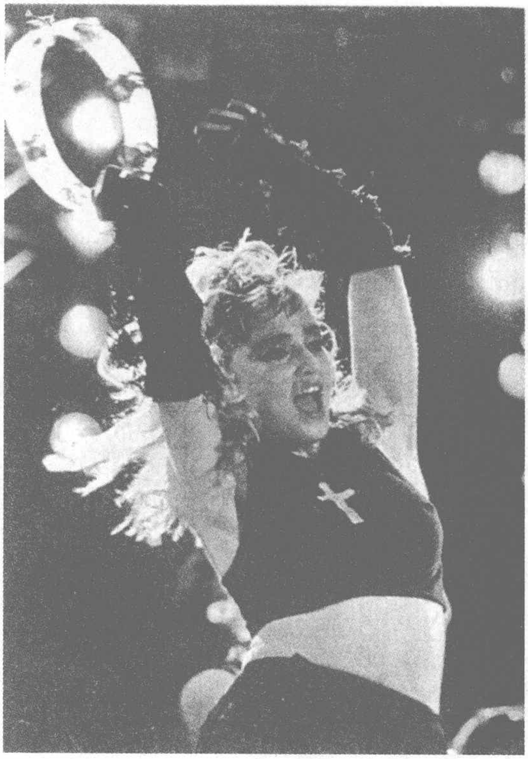


图 51

变:从骄傲到尴尬。但我的目的不是想说明麦当娜之前丰满的身体是一个非异化、随意表现的身体,一个"自然的"身体。苗条的身体是当前的文化理想,丰满的女性身体(和所有的身体一样)同样是一种文化形式,而且是 50 年代的一种强迫性理想。我的意思是,就麦当娜之前的意义词典而言——在这本词典里,女人的妖娆和在一个追求消瘦的文化中选择丰满,都明显和自发性、自我定义和反抗文化的注视连在一起——那种注视的要求现在已经实现了。麦当娜已经被标准化,更准确地说,她已经自我标准化了。她的"崇拜者"紧随其后。研究显示,多达 80%的 9 岁城郊女孩(她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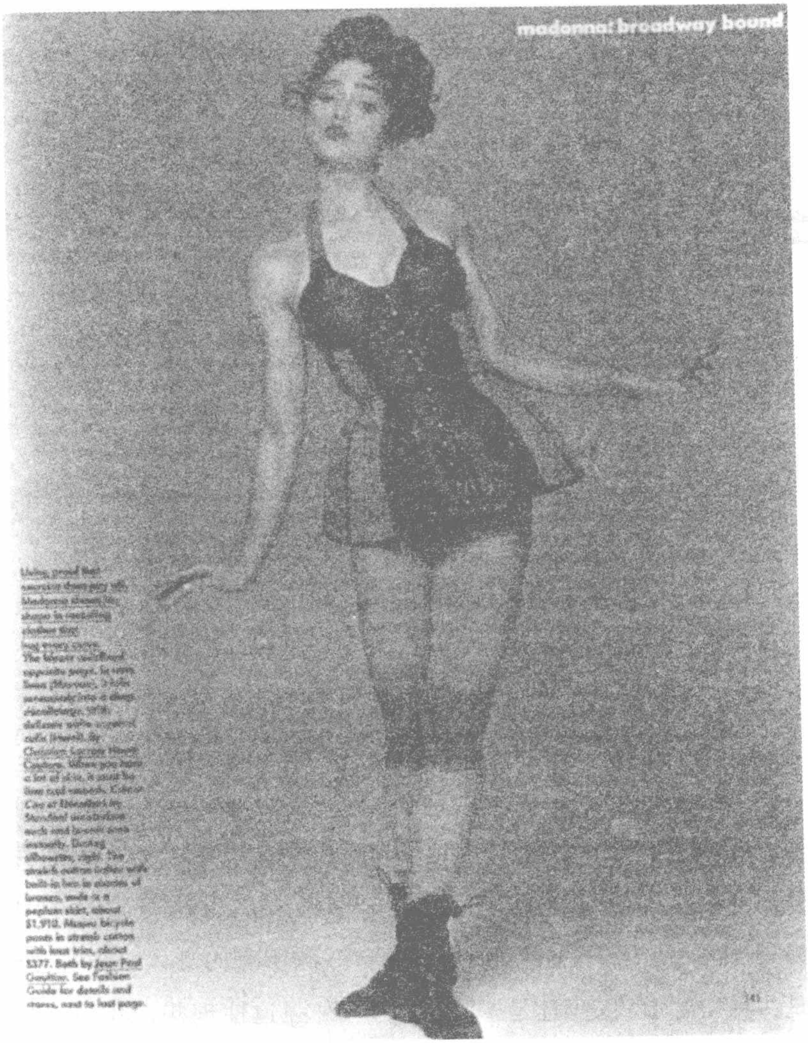


图 52

中的大部分远达不到超重的程度）正把严格的饮食和锻炼当作她们生活的组织原则。[23]当然，她们不需要从麦当娜身上了解只有长得瘦才会被接受，但麦当娜对她们来说再也不是抗拒或“差异”的典范。

这种"物质性"——即让人痴迷的身体实践，控制和规训麦当娜的生活和这些效仿她的年轻（和不是太年轻的）女子的生活——并没有参与将麦当娜表现为后现代女杰。在这种表现中（在其通俗和学术的实例中）麦当娜"控制着，而不是受困于她的形象"；她以讽刺和变色龙般的方式对待她的身份建构，她能在"性格中随意进出"，挑战定义，让他们永远处于猜测中。[24]在这种编码中，就像在外科治疗癖患者的幻想中一样（而且，如我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所论述的，在患饮食失调的女人中），控制和权力，这两个在讨论麦当娜时被反复援引的词已经相当于自我创造。麦当娜新的身体没有物质历史，它隐藏了为了维护自己所进行的不断争斗，没有暴露它的痛苦（颇具意味的是，麦当娜的"自我暴露"《与麦当娜同床》没有包含任何麦当娜日常训练的场景），它只是另一种对永远晦涩的主体性的创造性转变。"更令人目眩、更下定决心永不停止改变，"这是《大都会》对她的评价："……不论在外表还是在事业上，这位多才多艺的迷人女子永远不会拘泥于任何模式！"[25]通俗报刊，尤其是麦当娜自己，一再强调她主体性的可塑性。她用这种方式讲述她在这个产业中的"权力"："一般来说，在流行音乐中人们会盯住一个形象。你会被分类。我有幸可以改变自己，同时还可以被接受……扮演一个角色，改变性格、外表、态度。"[26]

麦当娜称她的创造性工作同样是要摆脱定义。"我做的每件事都要具备几种含义，都要想模棱两可。"她说，但她（以真正的后现代方式）拒绝承认有严肃的艺术目的；相反（如她对《大都会》所说的），她喜欢用讽刺和含混"自娱自乐"，也出于（如她对《名利场》所说的）"叛逆的性格和想和人瞎搞的欲望"。[27]学术性评论家最感兴趣的是她的音乐和录影带的后现代性质，他们用高度理论化的

语言赞美她，再现了通俗报刊中强调的看法。苏珊·麦克拉里写道：

> 麦当娜的艺术本身不断解构认为存在具有明确自我边界的统一主体的传统观念。她的作品探索……建构没有稳定性的、处于流动中的、拒绝被定义的身份的不同方式。这种倾向在她的作品中愈发明显。例如，在她最近一部引发争议的录影带《表现你自己》中……她自由地进出这个影带的叙事语境提供的每一个主体身份……比任何时候都不愿传递一种清晰、明确的信息或者“真正的”自我所带来的安全感。[28]

之后，同样在这篇文章中，麦克拉里将把麦当娜表现为西洋镜中的一个色情明星的《向我敞开你的心扉》描述为创造了“一个开放的快感的形象——一种不断摆脱抑制的色情力量”[29]。现在，出于多种原因，许多女性主义者会发现这盘影带是非常令人不安的。首先，与麦当娜之前的许多影带不同，《向我敞开你的心扉》没有从视觉上强调麦当娜的主体性或欲望——比如像《幸运明显》一样，通过频繁捕捉麦当娜的脸部和眼睛，戏弄和控制观众的反应。相反，《向我敞开你的心扉》通过将麦当娜为了展示而严格控制的身体表现为客体，而将观众置于偷窥者的位置。我们不会与影带中那些大献殷勤，对麦当娜的表演垂涎三尺，并最终被骗的男人产生认同，这毫无疑问；但如伊·安·卡普兰所指出的，男人在电影世界中看女人的方式只是客体化注视的一种类型。还有观众的注视，导演可能会让它或多或少变得客体化。[30]在《向我敞开你的心扉》中，实际上在所有的摇滚录影带中，观众看到的女性身体纯粹

是一种景象、一种视野的对象、一种要被消费的视觉商品。麦当娜的减肥行为和眼花缭乱的改进工作让她的身体景象更具吸引力；我们被牢牢地钉在了她的身体上，为它着迷。许多男人和女人可能感觉这个影带的基本现实引起了想拥有那个完美身体的欲望；但女人也会有（几乎很难实现的）强烈的欲望想成为那种完美的身体。

对女性身体不断地进行抑制、性化和客体化，这是这个影带历史上所根植于的文化语境，而且观众也被牵连进其中，将影带当作一个纯粹的形式文本处理。当然，如果故意将影带从这种语境中抽取出来，那么上文提到的那些要素就不存在了。如此看来，《向我敞开你的心扉》将自己表现为伊・安・卡普兰所称的一盘“后现代录像带”：它拒绝“面对其影像时呈现一种清晰的位置”，也同样拒绝“为电影世界里的观众提供一个清晰的角度……让他/她失去中心感、感到困惑”[31]。麦克拉里对《向我敞开你的心扉》的解读强调的正是这些后现代要素，强调影带的叙事所描述的关系，和频繁出现的戏仿和游戏元素的含混和易变的性质。她认为，将妓院的男性主顾表现得既猥亵又可怜“动摇”了“男性的偷窥和客体之间通常存在的权力关系”。麦当娜在影带结尾处换上小男孩的衣服，活泼地跳着轻快的舞蹈离开，妓院的老板在背后骂骂咧咧，麦克拉里认为这解构了麦当娜女王般色情客体的形象。麦克拉里认为这是“逃向双性同体”，它“拒绝本质主义的性属范畴，并将性别身份转化成一种游戏”。对观众的注视而言，她承认“为了解构色情女王的形象而将其唤起”是“危险的”，但又下结论说这种解构是成功的：“在这个影带中，麦当娜勇敢面对她最有害的模式化形象，并尝试将其引入不同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女性客体无需成为家长式注

视的客体，而且它的能量可以激发游戏和与性无关的快感。”[32]

但我认为尽管这个影带回避清晰或固定的意义，其中还是存在一个主导位置：即客体化注视。即使影带形式上具有“含混性”，它也不能真正让一个人失去中心，感到困惑。事实上，我认为这个影带的后现代奇想有助于将麦当娜的身体表现为展览对象，而不是解构这种表现。因为既然没有一个连贯的批评位置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些形象，那么个体形象本身就会突显自己，起催眠、固定的作用。的确，我认为这个影带从根本上讲是完全关于麦当娜的身体的，叙事语境实际上不起作用，只是一个展示明星的身体成就的借口，一个影像的折叠插页。在这层意义上，任何模仿或非稳定性要素都是被心怀叵测地以挖苦和机械的方式添加上去的，是一种为实际上只是奶酪蛋糕——或者，也许是隐晦的色情描写——的东西争取时髦身份的手段。

事实上情况可能还要糟。如果《向我敞开你的心扉》戏谑式的“附加”结局成功地解构了认为将女人的身体客体化和性化是个严肃问题的观点，那么麦当娜的快感可能是以危险的方式“瞎搞”她的年轻观众的感知力。这种精神正在被领会，因为美化强奸、虐待和羞辱女人的摇滚和打击乐大量增加——这当然不是麦当娜一个人的责任，肯定还有其他人。表演这些厌女歌曲的艺术家称自己在闹着玩、半开玩笑，还说要做无畏的和具有反抗精神的越界者，超越起抑制和界定作用的文化结构。说唱歌手艾斯的打击乐欢快地表现了对几个男人一个女人的轮奸——为了“照亮她的乳头”，他们还用到了手电筒——他称自己只是和街头黑人青年一样“实话实说”（他将自己比作理查德·怀特），而且他还嘲笑女性主义缺乏幽默感，暗示白人女性主义者试图否认他的本土“风格”是种族

主义的表现，无异于镇压。理查德·怀特把对别格·托马斯的刻画深深地植入对塑造他的种族主义文化的批判中，而且作者是想把《土生子》写成一部悲剧。显然，艾斯对这本书的后现代解读没有注意到这些事实，也完全忽略了小说的批判性视角。他也似乎不关心正在形成的——不仅存在于街头黑帮，还发生在联谊会会堂里的——轮奸热，通常几位男性旁观者围着一个失去知觉的女人（普遍用来描述这些强奸的词包括“搁浅”——女人被比作一条“搁浅的鲸鱼”——和“监视”，用于强调旁观者扮演了一个多么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的论点是一个请求，不是请求审查，而是希望我们认识到来自通俗文化的形象的社会语境的重要性，它们经常在对这些形象中的“抗拒性”要素的后现代和其他形式的赞扬中被抹杀。回到麦当娜和麦克拉里还有其他人认为她所提供的那种解放性的后现代主体性：在我看来，认为一个人可以在夜间饰演妓女而在白天重获双性同体的单纯的观点，似乎没有否认关于性属的本质主义范畴，而是一种对精神/身体二元对立的全新刻写。只要可以自由想象，那么身体做什么是不重要的。我在这篇文章中已经谈过，这种抽象的、没有定位的、没有得到体现的自由美化自己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对人们生活的物质现实的抹杀，文化形象的标准化力量，和社会现实中主导和从属的持续存在。

后现代主体、后现代身体、后现代抗拒

在描述和重新描述后现代的过程中出现了太多不同的起点，现在整个讨论本身就是它自己最典型的定义。每一种学科都有它自己的理论、关键人物和转折点。在建筑学中——这是最具体和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例子之一——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对现代主义的回应，现代主义相信可以通过技术革新和系统性设计改善社会。产生于这种思想意识的建筑通常色调阴冷、不适于居住，而且有时还不够结实；随着它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的恶化和倒塌，人们宣布了现代主义建筑的“死亡”。[1]在哲学和文学理论中，与此相反，我们判断具有“后”这种特点往往是现代性，还有它相应的更加抽象的（而且非常成问题的）——人的、主体的、作者的——“死亡”，我们认为这宣布了一个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次艺术运动。

正如现代性被描述为始于（在某些人看来，是终于）非常不同的历史时刻，而且出于非常不同的原因，后现代的万花筒也在学科间不断地转换（有时创造性地显示出后现代的轮廓）。我的一个同

事从大屠杀开始讲解后现代主义，因为它给相信人类的可完善性和合理性的启蒙观点造成了无法愈合的创伤。其他更具认识论导向的哲学家主要将后现代描述为丧失对科学真理和客观性的信念。许多人将这种认识论上的分裂和西方文化霸权的瓦解联系起来；还有人认为“信息爆炸”是关键因素。如果你（就像我一样）将消费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首要因素，那么产品和形象的不道德和无休止的增长就会在你讲述后现代的故事中占据重要位置。文学和哲学领域里的一些学者将理论和文化混为一谈，完全从后结构主义作家和他们催生的大量思想流派这个角度认识后现代。而且，在这些关于后现代状况的不同观念之上，对于应该为这种状况欢呼还是消沉，存在巨大分歧。

“后”也是一个不好把握的概念。不管现代性还有其他什么身份，只要它认为自己与过去决裂，迎来“新”事物，那么任何将自己描述为“后现代”的运动或状况似乎都是多余的。在对现代性的某些理解中，宣告“后现代时代”的来临是现代性无休止地迷恋创新，迷恋忘记过去、重新开始的表现。对现代的事物而言，成为“后”是必要的，而且这如今也是一种学术时尚，因为它能唤起前沿的、先锋的深度，并有吸引力地暗示了富有政治内涵的对立状态。而且，有时后现代的这种称号似乎仅仅用于宣传或说明被认为体现了这些特性的工作或态度，表明在一个属于精英和颠覆分子的排他俱乐部中的会员身份。这样，成为“后”这种精神完全压倒了对现代性的任何实质性理解，而用查尔斯·詹克斯的话说，后现代的则成了指“任何抗拒或解构一般的文化假定的东西”[②]。这种对抗性精神在福柯式的行话中得到体现，这些术语把我们的职业行为比作勇敢的认识论游击战：干涉、竞争、抗拒、颠覆、讯问等等。

如商业广告中所说的，会员身份是有其特权的。它可以用表现纯洁的错觉——当这些错觉声称自己是“后”等级思想时，尤其让人伤脑筋（而且自相矛盾）——代替不断进行批判性自我审视的需要。我曾经听过一位著名的演讲者详细说明对抗性概念的危险和曲解，祝贺当代学者已经对其进行了“超越”，但又提醒（学者）听众注意“外面”那个继续用二元论方式思考，并已退化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的世界。只要“他们”仍然呆在洞穴里，“我们”就无法自鸣得意。显然，在理论中“超越”二元论要比在实践中容易。这种理论自恃的恶意在多数学术作品中同样明显，在这些作品中，启蒙的（不用说，肯定咬定是彻底的“后启蒙”）和“他者”之间的界限被含混、排外的权力语言强化，这些语言在多数后结构主义写作中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必要的俱乐部制服。

后现代只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时髦的、推销自我的、“怎么样都行”的幻想吗？虽然我在前面说的话有这种意思，但我还不是这么认为。学术后现代主义的很多语言行头虽然表现得自命不凡，却来源于不应该从对精英主义和狭隘性的厌恶中排除掉的重要领悟和想法，而学术界对这种厌恶并不陌生。异质、断裂、移置、去稳定：这些词也许是后现代的学术装点，但它们也表明了当代经验中的一些真实要素。“某些事情正在发生”（借用简·弗拉克斯的说法）；一系列的文化变更已经让生活状况发生重大改变，这些改变需要被命名、描述和理解。

三本女性主义作家的著作可以帮我们对后现代做一番勾画。但这三本书都不是完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在《思想碎片：当代西方中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Thinking Fragments: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Postmodernismin the Contemporary*

West)中，简·弗拉克斯认为后现代哲学是"当代西方思想"的三种模式之一，并将它纳入与其他思潮的对话中(其他思潮指的是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贝尔·胡克斯在《向往：种族、性属和文化政治》(*Yearning: Race, Gender andCultural Politics*)中用一篇文章的篇幅明确说明"后现代的黑度"，而且在一部涉及广泛的文化批评集的其他几篇文章中，评价了后现代主义的各个不同方面。在《性属困惑：女性主义和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中，朱迪思·巴特勒批判了几位通常被定位为后现代的理论家，但与其说这本书是对后现代主义的评论，不如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对待性属的后现代方式。这几本书在风格、内容、关注、语言和它们与后现代的关系上都很不相同，但似乎都(以不同的方式)像大多数学术作品所没有的那样，将自已置于当代状况"之中"，体现它、评论它。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把简·弗拉克斯这本书的开始部分(有感召力地用"某些事情正在发生"做标题)的语气和几句话做一个对比，这几句话来自我收到的一封为一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集征稿的信。"当历史时期的框架和批评家/知识分子的信心被破坏之后，"我的这些未来编辑问道，"我们的历史考察和批评性判断以什么为落脚点呢？我们不想承认后现代性在学术中的地位；我们知道学术是一项现代主义计划。"这些编辑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恶意，他们赶时髦地援引了稳定历史框架的丧失和权威所陷入的危机，而在下面一句话中却要设法完好地保留他们自己的权威，并毫不含糊地将学术定位为一项"现代主义"计划！

这种态度并非独一无二；许多学术性作家严肃地宣称后现代是"没有根据的"，但又拿不出证据，证明从个人或专业的角度那种

根据在他们看来已经受到动摇。相反，尝试在认识论产生分裂和没有依据的条件下“做学问”，这种前景让简·弗拉克斯感到不安、困惑，并且是对她个人的一种挑战。“当每种假设和理论似乎都是可疑的，个人的身份变得不确定时，当知识分子的状况也可以被构想为绝望地陷入一种压迫性的知识/权力关系，或者与技术理性的官僚主义国家的运作完全不相关时，”她问道，“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④]我认为弗拉克斯是完全怀着诚意提出这个问题的。在她的著作中，她不仅一直要努力从别人理论的片面性中建构出新的意义来源（她精通这项工作，对弗洛伊德、拉康和温尼科特做了细致考察，并且同样深刻地从总体上评价了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还要和她自己的“权威”斗争。弗拉克斯以严谨的态度监视任何从权威的高度发表见解的冲动，她赢得了我的赞赏和喜爱，间或还让我感到沮丧。因为这本书里蕴藏着重要的深刻见解，值得被更多地展示，揭示弗拉克斯的“没有结论”（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的标题）这种受限制的方法所看不到的方面。

比方说，作为一名具有执业资格的精神治疗医师，弗拉克斯出色地领会了为哲学提供动力的对万能和控制的幻想，和由此产生的典型“盲点”。约翰·杜威之前，从来没有人如此深刻地批判过哲学家对“思考的力量和对人类生活重要性的高估”，和自我陶醉地将历史简化为哲学故事的做法。弗拉克斯将这种批判延伸至德里达、罗蒂、利奥塔和（我认为不够准确地）福柯：“在‘移置’哲学的掩护下，一种传统的活动还在继续：即通过批判理性和哲学，调查可能性、意义的状况和我们的知识局限。”[⑤]她强调这种“心灵主义的、非色情化的”，认为历史的主体是哲学的概念是性属化的（她早些时候对拉康的精神分析做了类似的批判）。如果故事从女人的

经历这个角度来书写，“那么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也许就不是（人、历史、形而上学的）死亡，而是一系列持续的斗争：生育和避免生育；被表现或避免被错误地表现；严格遵照时间与让自己的行为规定时间和历史的概念；不再作为永恒的、‘女子气的’、‘其他的’、或‘神秘的’生命来源而存在”⑥。其他女性主义者当然也批判过西方哲学对理性的偏爱。弗拉克斯的讨论中最令人佩服，也是最合时宜的是，她十分巧妙地将后结构主义思想——宣传自己对抗以前哲学中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纳入到这种批判中。这样，后结构主义思想不仅表现为正在与弗拉克斯“交谈”（这是她选择的隐喻）的局部真理的一个“片段”，而且还是弗拉克斯正在做的（非常有说服力，或许对她自己并非如此）论述，一个关于西方文化中持久和有韧性的连续性的论证中一个重要例证。即便在后现代文化表面上的破裂中，这位伟大的白人父亲*（如杜威首次指出的，他同样有阶级身份）还是在继续选举国会议员。

弗拉克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愿将自己的书表现为一种论述，对于她的这种不情愿我的反应是不一致的，这或许能说明我们大多数人和知识的后现代分裂之间的爱恨关系，因为我们都努力从边缘化的经历中获得领悟和视角。当我在大学和哲学研究所的时候，女性主义者是挑战有关真理和理性的脱离历史和不朽化观念的先锋，而这些观念一直是我们的学科所珍视的。我们的偶像破坏运动不仅是一种智力诱惑（而且当时它还肯定不具备学术规范），还痛苦地植根于我们认识哲学家的永恒真理之外的真理，并不断摒弃哲学家真理的历史经历中。我不记得曾“皈依”过历史主

---

* 原文是“The Great White Father”，指美国总统，这种说法意在戏谑。——译者

义、情境主义、多元主义，或者“对现实的社会建构”，因为这一直是我（和许多其他学院女性主义者）看问题的方式。女性主义对文化意识更具政治诉求的质疑始于20世纪60年代，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知识视角，让我们中的大多数惊讶地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对性属的组织和调度（更不用说“男人”和“女人”）是人类的理解而非永恒的形式。

当历史主义和语境化思考开始被认为具有哲学合法性时（而不是一种含糊的思考，许多哲学家仍然持这种看法），我们不仅感觉自己的智力得到肯定，而且似乎觉得这些（在非欧文化传统、性属化的经历、被统治的历史中得到体现的）“其他真理”的重要性和活力在文化上被认可的时刻就在眼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新兴知识中的任何一种会成为继承永恒真理王位的新候选人，但我也不认为在帝国君主制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状态之间选择是唯一的选择。在我看来，历史主义是一个盟友，一个对抗傲慢的观念和褊狭的思考，可以培养对我们现实“既定性”的一种健康的怀疑，而不是排斥意义、判断或区分。这个关系中“爱”的部分就先说到这里。

从西方思想永恒真理的颠覆到文化的后现代分裂，和伴随后现代而来的（如贝尔·胡克斯尖刻地评价影片《萨米和罗西被冷落》时所指出的）[7]“新潮的不可知论”，还有形象和选择的无休止扩散，这种转化速度令人不安，这是我们的“恨”之所在。在这种环境中，女性主义知识和来自种族经历和意识的知识，在它们——不仅在学术理论，而且在通俗和美学想象中——的解构过程开始之前，从历史的角度看就等于只有大约10分钟的时间要求得到我们文化的良知。我们刚刚准备开始书写学术的时候，作者突然在学术中死去；我们刚刚准备开始定位和描述我们文化的体系化种族主

义和性别歧视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讲述只不过被简化为脱口秀的话题，无异于这个时刻的每一种其他的抱怨和混乱。此外，发生这种后现代解构的同时，其他领域里出现了左翼极权主义的指控，以更加怀旧的方式分裂了我们的艰难尝试。

弗拉克斯和胡克斯虽然回避种族和性属的本质主义观念，但在我们可能会开始“重新一记起(re-member)我们自己”并“让自己成为主体”(分别是弗拉克斯和胡克斯的说法)的文化时刻，对于恰恰发生在此时的任何破坏我们经历权威性的行为，他们还是持怀疑态度。“批判认为存在一个黑人‘本质’的想法，和认识到黑人身份已经明确存在于流放和挣扎的经历中，”胡克斯指出，“这两者间存在根本差别。”⑧ 同样，弗拉克斯批判了主体性的后现代解构，并敦促女性主义者在重述和重建女人“互相区分却共有的经历”中继续寻求“定位和参与”。“如果我们不想办法谈论并实践(‘我们’的意义)，”她问道，“那么我们的女儿对于历史还会有什么记忆呢？”⑨

同时，弗拉克斯和胡克斯都严肃地看待后结构主义作家所称的主体的“去中心化”——但*不是*作为一种方法论或理论教条(根据这种教条，任何对身份、对“我们”的明确表述都是一种总体化的虚构)，而是作为在分裂性时代中行动、思考、写作的生活体验的一部分。这种去中心化对她们任何人而言都不完全具有积极作用(这些“在理论中”抽象地将它扩展的人可能会这样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它通常指无家可归、脱离历史、政治和智力上的眩晕和麻痹的感觉、用个体对刺激和物质满足的寻求代替人类连结的丧失。胡克斯在《向往》中的文章(特别参见《后现代的黑度》、《根本的黑人主体性的政治》、《黑人娱乐剧场》和《出生地》)探讨了后现代分裂对非裔美国人的身份和文化的影响，特别有指导性。

但在胡克斯看来，自我的去中心化却为人们之间“新的、不同形式的连结”、为从艺术和知识上参与通俗文化、为创造能表达和展示身份的多重方面，和我们观察和思考的不同立场的变换性主体性提供了新的契机。[10]她鼓励非裔美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和存在中体现塑造他们的文化传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只有通过这种体现——以此将“在边缘上”形成的要素带回“中心”——现有主体性文化风格的霸权才能得到挑战。她出色地用康奈尔·韦斯特的一次谈话为例说明问题：

> 尽管内容上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理论性，他的演说方式却类似于一种在黑人社区中流行的布道模式，这种风格在那里代表了深度和严肃性。但恰恰因为这种演讲方式能感染人，所以在白人机构，特别在大学的环境中是成问题的。在这种背景下风格等于缺乏内容。韦斯特不仅转化了社会空间，在一个难得认可黑人文化价值的语境中肯定了黑人经验的一个方面，还能吸引没有学术背景的听众。他的演讲风格需要听众改变他们的认识范式；黑人文化身份的一个边缘被中心化。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文学立场。[11]

我对胡克斯的论述深有感触。我曾经丢掉一份很受尊敬的工作，因为(后来一位委员会成员告诉我)我在讲课时“过多地转动身体”。我知道我富有表现力的风格——有犹太成分、还有“女子气”——不只这一次让我无法做一名严肃的哲学家；但我是通过这一次知道这点的。正如胡克斯指出的，重建主体性是危险的。当

我们在学术背景下表达我们的身份在边缘中形成的那些方面时，我们可能会被认为在“出洋相”。但正如她认为的（我也完全赞同），我们必须冒这个险，不仅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主体性权利”，还是文化得以转变，而不仅仅是在包含不同玩家的同一场游戏中被复制的手段。每当我们被严肃对待的时候，就意味着一种牢固的范式已经被动摇；每当我，比方说，被我的同行或学生严肃对待时，就意味着这种根深蒂固的“哲学家”的形象——不仅作为白人和男性，而且通过超然性、优越性、“冷漠的理性”展现严谨——已经被破坏。

胡克斯和弗拉克斯在她们的著作中都自觉和故意从多方面对自己进行定位——这些定位的采用不是为了文本游戏，而是植根于她们自己的历史、职业、政治的某些方面中。她们不去试着调解这些定位，而只是让它们轮流发言，每一种都是一个不同的“权威”中心。这种“复调的声音”中（胡克斯的描述）[12]让这些书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感。但因为书中的深刻见解以经历为基础，所以效果既非振聋发聩，也不会让人浮想联翩；理论统一性给人的安全感和典雅的感觉被不同的满足感取代：有时可以精确、智慧和诚实地描述不可通约的现实（即现实生活）。

例如，作为一名治疗医师，弗拉克斯清醒地意识到真正被去中心的自我所忍受的恐惧，和后现代“文本不确定性”作为一条帮助现实人类的原则所具有的种种局限；但作为一名哲学家，她又因为这些观念能将“矛盾、含混和多样性”引入我们的推理而欣赏它们。[13]胡克斯批判后结构主义对“差异”的论述，她出色地找对了目标，因为白人理论家总是仅仅为了种族问题（代表对“他者性”的断言）而阅读黑人作家，却不考察白人性，将其问题化，反而完全不把

它当种族看。但转换角度后她又对未来充满希望："当代对'他者性和差异'的关注……表明，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能够提供并推动跨越阶级、种族和性属界线的批评对话和争论。"[14]这种评价只有在理论中才是矛盾的；在学术团体的语境中，对"差异"的关注已经通过多种复杂的方式起作用，有些是压抑性的，有些是解放性的。胡克斯的《向往》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一种对文化现象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感触——从后结构主义理论到白人和黑人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到对种族和性属的电影再现，再到广为人知的发生在中央公园的对一名慢跑者的强奸——这种感触是我在任何其他当代的批评著作中不曾见到的：

> 要充分理解（中央公园强奸案）的多重含义，就必须采用一种分析的方法，考虑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影响。以此为起点可以让我们从受害者和犯罪者的立场上去看这个问题。如果人们读了《魔鬼情人》（*The Demon Lover*）再来考虑这个案子，就会认为它与男人对女人的暴力，和作为男性统治武器的强奸和恐吓一脉相承——还是对父权制社会化的又一次恐怖和无情的表现。如果人们结合女性主义对种族和男性气质的分析来考察这个案子，就会发现既然男性权力在父权制中是相对的，那么来自贫困阶层的男人和有色男人就无法获得因为参与父权制而应得的物质和社会奖赏。事实上，他们常常因为盲目和被动地表现威胁生命的男性气质神话而受苦。性别歧视思维让他们看不到这个现实；他们成为父权制的受害者。没有人会真正相信，中央公园事件中涉及的黑人男青年们没有参与一种自杀性仪式，表现一种最终将威胁他们生

命和安康的危险的男性气质。

> 如果人们再读一遍迈克尔·戴森(Michael Dyson)的《黑人的困境》……就容易理解为什么黑人男青年会感到绝望和虚无。即使他们不看重自己的生命,他们也会重视别人的,这种想法是幼稚的。在文化中和在中央公园罪行中,男人对女人施暴的色情渲染每天都在被展现、演示和容忍,难道大家真的看不出这两者间的联系吗?是种族主义创造并维持这种盲点,还是它让黑人,特别是黑人男性来做替罪羊,体现社会的罪恶呢?[15]

我非常详细地引用了这段话,因为就在我写到胡克斯对多样性的欣赏时,我意识到这个词——在当代作品中一再被虔诚地吟咏——现在听上去是多么空洞。尽管口头上不断支持多样性,但没有几个思想家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如玛丽亚·卢贡内斯所称的)"'世界'旅行家"。[16]许多人为多样性创建理论,而解构主义的阅读则从文本中找寻它——通常只出于快感,而非对认识的渴望。但在我看来,想成为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靠观光是不行的,不管这种观光是文本的还是文化的,当然这也不需要广阅"外国的"领域。用卢贡内斯的话说,这根本上取决于"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探究现实的愿望和能力。这意味着不管一个人到什么地方都要认识到,别人的观点已经充分实现,无法再将丝毫异域的"差异"并入到自己的世界中。因此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必须准备好,不仅去"欣赏"异域事物,而且要认清并灌溉这些不同的世界相会的地方。而且当人类的认识和交流需要的时候,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要永远准备放弃熟悉的领域。正是在这些意义上,《向往》以其

对种族和性属政治的复杂和广博的理解，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知识实践上超越了二元论，并因此为我们树立了最佳后现代多样性的典范。

弗拉克斯和胡克斯关注知识、发言权，具备知识分子和政治视野，他们没有过多讨论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身体，不论这种文化载体是不是后现代的。但在许多人看来，身体——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化形式和学术推理的主体——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表明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分裂的时代。我们对待身体的文化态度充满了不和谐音符，表现了我们社会中存在的矛盾。一方面，性已经变得死气沉沉，但同时却被继续宣传为狂喜、权力和实现个人抱负的重要源泉。在音乐电视和白天的肥皂剧中，发人深省的艾滋病信息紧挨着表现盲目放纵的影像形象播出；这种放纵——按照定义，是不在乎像避孕套这种“实用”措施的——被描述为色情指控的实质和证据。一方面，我们的文化最近似乎又开始迷恋生物决定论。虽然人类基因工程已经受到批评，但它在研究人类基因蓝图的整体性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于 1992 年重燃了人们的兴奋之情。甚至就在我写这些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还来到我房间，给我看《纽约时报》一篇题为“人类的蓝图”的整版文章，配有一张新生儿的照片，还有这项计划完成的最新、最完整的染色体组。报纸上每天都有文章称所有身体和心理失调的起因都是基因和化学方面的，其中还包括——像神经性厌食症和贪食症——这些似乎有大量证据证明它们是由文化引起的失调。另一方面，人们也正毫不含糊地宣称，“身体不是人生出来的，它们实际上是文化的产物”[17]。

对许多学者来说，这种文化建构主义信念已经远远超出认为生物的身体永远不会以纯粹或“自然的”形式向我们展示自己，而

总是受历史和政治的“刻写”和塑造(这是我的立场)的观念,转化为一种更加激进的立场,认为生物的身体这种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虚构。通俗文化用它自己的方式体现了这种论点,因为我们在不考虑生物学后果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身体,轻率地通过悠悠节食和外科整形改造它们,并急切地接受任何考验我们各种生物钟的技术。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我们的身体,但同时它们又成为异化的产品,成为我们的创造性制造所生产的文本,与我们保持一种奇怪和讽刺的距离。

回到更具学术性的语境中,可以说(如我在这本书的导论中指出的)在过去几百年里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认识模式上的转变。以前,身体被普遍概念化为一种固定、一元,和主要是生理的现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身体看做一种历史、多元,和文化在其中起调节作用的形式。就这种转变的发生而言,女性主义(如我所论证的)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带来了从“政治的”角度认识身体的必然结果,以及对“自然”这种范畴和与其相伴的关于女人“物种角色”的意识形态的全新怀疑。后结构主义思想还从另外两个方面让女性主义认识到身体是一种文化形式和“规训力量”的“场所”。首先,在其更为福柯式的表现中,后结构主义促使我们认识到普遍的权力构造不论多么具有统治性,从来不是密封的,而总是产生大量主体性的形式,和抗拒并改变现存关系的新文本。其次,在其更为德里达式的表现中,后结构主义让我们认识到身体不仅物质上因为文化而改变(例如,因为它要符合社会规范,习惯性地表现“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18],还受到语言的调节:受组织和激活我们的感知和经历的隐喻(比如,用“入侵”说明微生物,用“等待”精子描绘卵子)和语义结构(像男性/女性、内部/外部这种二元对立)

的影响。因此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没有直接、单纯，或没有经过建构的知识；相反，我们总是根据不同的阐释方案解读自己的身体。

这些重要见解让当代女性主义对身体的政治的认识变得深刻、丰富和复杂；朱迪思·巴特勒的《性属困惑》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巴特勒的目的是——通过让性属的范畴和“自然的”范畴本身“非自然化”——激发读者对“性属困惑”的关注，并且说明“性属困惑”在文化上是如何通过展示性属人为性的“颠覆性身体行为”被激起的。尽管后者对我而言是巴特勒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但当问题涉及具体的阐述和说明时，它实际上是最受冷遇的。巴特勒将自己大量的哲学能量和技能中的大部分用于考察弗洛伊德、拉康、伊利格瑞、克里斯蒂娃和维蒂格的作品，以此对性属进行“谱系”批判（对巴特勒而言这意味着将性属的范畴作为话语的结果，而非身份的“自然”基础来探讨）。她的策略是揭露他们将异性恋和/或母性自然化的隐藏假定，同时还要弄清他们的作品中让这些假定问题化的要素。

谱系批判体现了巴特勒作品的解构性。体现“建构”的则是她的性属理论，它包含两个方面：将性属作为一种“行为”来分析；证明戏仿是颠覆固定的性属“二元框架”的最有效策略。社会学家可能会在巴特勒的“行为性理论”（performative theory）中认出对艾尔文·戈夫曼的革新性和有说服力的行为性身份理论的一种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再造。[19]如同对戈夫曼一样，对于巴特勒而言，我们的性属化和非性属化身份没有表达某种真正的“核心”自我，而是我们行为的戏剧性结果（而非起因）。和我们学会如何运用一门语言一样，我们也学会如何“虚构”这些：通过模仿和不断掌握公共、文化习语（比如表示性属的身体姿势）。在这个框架中，一种对

于“内部和有机的性属核心”的幻觉本身就是一种通过我们的行为“建立和刻写在身体表面上的幻想”。[20]此外，这种幻觉（巴特勒在此提出了一个戈夫曼没有注意到的重要方面）还有效地保护生殖异性恋的体制免受将其作为体制进行审查和批判，不断调节而非仅仅反映我们的性。

不论一个人是否愿意后现代到否认身份的所有内部决定因素的程度，作为一种框架，用于探索建构自我、性属（我要把种族也算进来）和它们的真实性幻觉的持续、互动、模仿的过程，行为理论这种方法还是非常有见地的（作为教学法也是有用的）。男性特质、女性特质、异性恋、同性恋、母性、父权、白人性、黑人性的表现中含有怎样的文化姿态？真实性是如何被“虚构”和表达的？（种族和性属的）“二元框架”是如何被确立和控制的？通过考察如广告和商业这些日常的文化制品，批判地反思它们之间的互动，学生们可以具体地探究这些问题。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文化是由一些可公开利用的特定词汇中杜撰而来的，通过体验这种考察结果带来的“古怪”感觉，并通过认识到他们的自我在何种程度上来自公共互动，他们发现既定的事物重新得到批判性凸显，意识到生成性的“困惑”来自关于什么是“自然”和“不自然”的根深蒂固的假设。

巴特勒复杂并巧妙地揭示了不同理论家对于“异性恋母式”（heterosexual matrices）和母性本质暗藏的信念，我认为这种揭示同样精彩——尤其是她对克里斯蒂娃的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m）的尖锐批判。巴特勒精于发现和解构自然主义假设；即使福柯在她的解读中也暗中信奉“超越法则的真正身体”这种概念。她自己的反生物主义的确比福柯的要彻底得多，并更具纲领性。福柯的首要身份是文化历史学家，出了名地拒绝将自己归于任何理

论立场。相反，对巴特勒而言却存在一种正确的、毋庸置疑的立场：即任何关于“自然的”概念都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必须从我们身上“消除”。[21]“对策”是在视话语为基础、身体为彻底的“文本”的“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中“重塑”所有的生物学断言。因此，克里斯蒂娃对于“先于话语的母亲身体”的假定被描述为“根本上是倒置的”，必须被“倒过来”[22]——换句话说，就是必须被证明是语言的产物：“（克里斯蒂娃的）论述证明了母性动力构成了这些总是被语言压制或升华的最初过程。但或许可以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中重塑她的论述：语言的，其实是话语的何种文化构造生成了前话语欲望多样性的比喻？又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呢？”[23]

在我看来，巴特勒从对根深蒂固的假设进行启发性的谱系治疗，转到提出话语或语言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作为最高的批判法庭，即具有澄清性、祛魅性和解放性的真理。视话语基础主义为“对策”的观念说明身体的文本化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理论转向，不受文化的怀疑和批判。我的看法与此相反，我认为身体的自然主义和文本化观念都具有文化定位（后者处于后现代文化中），并因此都同样容易在历史上被作为强迫性的权力工具使用。某些历史时期显然受生物范式的支配，这些范式已经并将继续为异性恋主义和性别歧视意识形态服务。但这意味着“生物学”就因此在所有的语境中仅仅是异性恋主义和性别歧视体系的话语“产物”吗？还是说看待身体的文本主义观点一定能摆脱这些体系？

请注意，与其说巴特勒不赞成克里斯蒂娃的生物母性观，不如说她在“更具包容性框架”的话语中将其吸收。在巴特勒的世界中语言贪婪地吞噬一切，她的世界是一个《理论面条机》，把互相竞争的框架范畴压缩和再加工为“比喻”。在这种语言基础主义方面，

巴特勒更接近于德里达而不是福柯，尽管福柯式的语言和观点主导了这本书。在福柯理解身体通过具体历史实践被“生产”的方式中，“话语”不是基础，而是彰显权力的许多相互关联的模式之一。对他而言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为重要的是组织我们体验身体的体制和日常实践：体制化的监视、“标准化”考试、学校和监狱的空间和时间组织、医生和病人、老师和学生等之间的“忏悔”模式。与此相关，要决定一种特定行为或立场是抗拒式的还是颠覆性的，需要考察其实践、历史和体制上的共鸣。对福柯而言，这种决定永远不能被简单地从身体的文本表面读出。相反，巴特勒对性属如何被构成和颠覆的分析正式把身体当作这样一种文本，它可以在脱离经历、历史、物质实践和语境的情况下分析其意义。

巴特勒将戏仿视为颠覆的理论是个明显的例子。这种理论非常有趣地说明了对于一种抗拒性理论，她所描述的性属化身体完全的语言和行为本性的重要性。正如在前面讨论过的，在巴特勒看来，没有“自然”资源（比如，没有先于我们的性属化之前存在的多态的性或双性同体）可以激发对抗性属体系的斗争。可能发生（并在巴特勒看来的确经常发生）的是，性属的“自然”或“本质”性质从这种体系的资源内部，通过对它的戏仿受到挑战（这种体系的稳定性也因此受到破坏）——比如变装：“通过模仿性属，变装含蓄地揭示了性属本身的模仿性结构——还有它的偶然性。”[24]巴特勒因此提供了一种关于颠覆的理论，它同样尊重边缘化的性的角色，和在许多思想家看来是后现代艺术特征的事物：使用明显的策略、引号、反讽，和颠覆既定传统的戏仿。

在理论中这是巧妙和令人激动的，并且听上去是正确的。而且只要我们把穿异性服装的身体看做一种抽象的、没有定位的语

言结构，一种纯粹的文本，我们可能会相信巴特勒的断言，即性属体系不断被从内部戏谑地动摇和颠覆。但对文化假设的颠覆不是发生在一个文本中或文本身上的事情(尽管某些解构主义者这样认为)，它是一起发生(或没有发生)在文本阅读中的事件，但巴特勒没有对此进行探究。她没有将讨论中的文本(穿异性服装的身体)置于文化语境中(我们是在看同性恋俱乐部中还是上《唐纳休》节目的人?)；没有考虑可能会有差异的不同读者的反应(男性还是女性、年轻还是年长、同性恋还是非同性恋者?)，还有或许会让他们的阅读复杂化的各种焦虑；没有区分穿男性盛装的女人和穿女性服饰的男人(我认为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形式)；没有考虑过(或者至少没有就此做出报道)一个人看到或展现异性服装的实际反应。那么她是根据什么断定异性服装"有效地……嘲弄了认为存在一个真正的性属身份的观念"，并"将对性属含义的全部展现从关于真实和虚假的话语中移开"?[25]

穿异性服装的行为(还有巴特勒同样提到的变装和"充当男性角色的女同性恋/充当女性角色的女同性恋的身份在性方面的风格化"[26])试图通过我自己(的确有限的)直觉赋予这种抽象的文本某种"身体"，就动摇性属的"二元框架"而言，它们似乎远不如那些不将自己表现为戏仿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而是在性属方面完全含混的身份(我们很少将身体理解为在性别上是含混的，因为如苏珊娜·凯斯勒和温迪·麦克纳所认为的，和霍利·戴沃对女性"性属混合者"的采访所显示的，我们的阅读被超定为具有男性特征，就是说，不需要太多男性暗示就可以把身体理解为男性的)[27]。含混是令人不安和富有挑战性的。不知为什么，我在看《蝴蝶君》(*M. Butterfly*)的时候成功摆脱了蝴蝶由男人扮演这种先入之见。当

那位男演员慢慢脱掉衣服，渐渐从他女性的“自我展现”中褪去时，我深受触动。但——这一点就巴特勒的论证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我不安的原因不是因为这已经让我戏仿式地意识到错觉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而恰恰因为在这种意识的缺席中，我看着“女性特质”过渡到“男性特质”，中间没有一种表明这种转变的明显和清晰的界线。在这种过渡的空间里，性属现实对我而言已经被动摇，不是因为我意识到性属是一种策略（我去看这场演出之前就知道这点），而是因为熟悉的二元对立（那种“二元框架”）已经被迫陷入一种含糊和未知的连续体中。

现在转向文本的“作者”，那么巴特勒又是如何理解高度二元化的性属本体论常常支配变装表演者的世界观这个事实的呢？变装明星奇利·佩珀(Chili Pepper)在《唐纳休》脱口秀中说他觉得变装皇后(drag queens)可以帮助教女人如何做“真正的女人”，而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没有讽刺的意思。在埃斯特·纽曼看来，这种态度太平常了，许多女性模仿者“将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视为存在的对立模式”[28]，许多换性者也这样认为。珍·莫里斯(Jan Morris)最终实施了变性手术，她把他（当在身体上还是男性时）在自己身上认出的“那种内部因素”描写为“女性特征”，而性属则是“自己的本质”；她认可C. S. 刘易斯把性属描述为“现实，一种比性更为基本的现实”并引用了这种观点。[29]同样，充当男性角色的女同性恋和充当女性角色的女同性恋的身份也被异性恋者解读为一种证据，证明男性和女性角色是多么不可抗拒——他们然后将这种不可抗拒性归因于异性恋的“自然”。如果这些形式如此容易就被阐释为证明性属基础性的证据，和“二元框架”的本质现实的话，那么它们在文化上会具有怎样的颠覆性？

我想说明，我批判巴特勒的论证的抽象性并不一定要否认颠覆性要素在我们的文化中不断起作用（或者在游戏）这个事实。我的意思是，颠覆是语境的、历史的，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是社会的。不论各种文本有多么令人激动地去稳定潜力，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要决定这些文本是颠覆性的还是恢复性的，是两者都是还是两者都不是，就不能脱离实际的社会实践。在《物质女孩》中，我批判了苏珊·麦克拉里对麦当娜的音乐录影带《向我敞开你的心扉》的解读，因为这种解读将麦克拉里所认为的那种文本的戏谑、戏仿和颠覆的方面浪漫化，以抹杀更为严酷的社会现实为代价，无视青年男性和女性如何实际回应音乐录影带的形象。评价巴特勒的作品更加复杂，因为它有双重身份。因为巴特勒深刻地理解菲勒斯中心主义和异性恋主义的体制在历史上有怎样的标准化和限定作用，所以她和她的戏仿的身体“文本”（他们毕竟是人，不是文献）生活的社会现实高度协调。但《性属困惑》中的德里达/福柯式的理论方案则是另一番景象。巴特勒的文本成了没有语境的能指，而且和麦克拉里的一样，她的分析也开始显示出一种后现代特有的倾向：强调和称赞抗拒、个体创造力，和当前权力关系的不稳定性，而非它们的恢复性趋势。

这种称赞有什么不妥吗？我想在此指出几个问题。但我首先要承认没有一种文化是静止或密封的；抗拒和转变的确是不断发生并且是有创造力的，而且即便在最具压迫性的环境中也会有颠覆性的回应。这些在历史上都有明显表现。抗拒和转变都是历史过程，这是福柯本人认识到的，但有时会被他更为后现代的追随者遗忘。他们醉心于文化分析的阐释和创造潜力，忘记问他们自己在文化中和他们周围实际发生着什么。解构主义对此的影响是显

而易见的。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我同意福柯的这种观点。对福柯而言，这是一种关于社会动力学的陈述，而不是一种阅读文本的程式。就激发读者的思维和想象而言，与对文学的主导性解读格格不入的分析和阐释是强大的；但社会抗拒的现状和效力却只能通过考察历史形势来决定。这些形势是变化的，而抗拒可以在文化分析中被合理强调的程度同样如此。认识不到这一点会将虽然具有颠覆潜力，但仍然高度依赖文化的主体性形式理论化，似乎它们和历史上的主导形式有平等的立足点，同时将正在发生的文化挑战的程度浪漫化，并因此把关注焦点从继续存在的排斥、附属和标准化的模式上转移开。

我将把注意力从《性属困惑》上移开，转而在这本书提出的其他问题的语境中考虑抗拒。比如，在描述女人和她们的身体与后工业资本主义形象产业之间的关系，一种上瘾的暴食和通便、强迫性锻炼和“外科治疗癖”泛滥的语境时强调创造力，该会有怎样的帮助？我们在矫正外科手术方面拥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产业，这是因为人们正为了对抗普遍标准而维护他们的种族和民族身份，还是因为他们在这些标准的力量面前太脆弱呢？我自己反对被一种赞扬性的后现代主义囊括进去的部分原因是，我在这本书中一直考察的特定权力场域没有提供太多可以赞扬的理由。

诚然，无休止地关注文化标准化会令人沮丧；相信“抵抗无处不在”才会使人兴奋并能激发希望。关于我们当代社会对苗条、年轻和完美身体的迷恋，我做过许多报告，从中发现，当人们的行为被定位于标准化文化中时，他们可能会感觉受到严重威胁。他们希望能追求幸福，同时又不违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规定（在我们生活的不同领域中，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服从这些规定），这

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也想感觉自己是有自主权的个体，还有一些人想得到保证，说他们的选择“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因此，相信自己的选择是个人的，被自由激发的，并且是“为自己的”，这对他们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电视中扮演她母亲的罗斯安妮·阿诺德做了鼻子整形(因为太宽了，她是这么跟奥普拉·温弗瑞说的!)后不久，17 岁的女演员萨拉·吉尔伯特就决定“修理”自己的鼻子，不妨看看她如何描述自己的决定：“我觉得自己看自己顺眼是重要的。你想努力完成一件事，但你的身体似乎有点碍事。所以如果你正花费太多精力关注你自己的身体，那么就改变它，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前进，去干智力活了。”[30]

吉尔伯特的观点实际上是非常有道理的。让吉尔伯特感觉原来的鼻子让自己没有吸引力的文化标准，和让她一直“关注”自己身体的文化对外表的过分重视，对这些要素的认识却隐藏在背后没有得到表达。商业上将改变身体的做法建构为自我决定和有创造力的自我时尚化，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的，这些要素在这些建构中不断被神秘化(“你拥有的身体是通过遗传得来的身体，但你必须决定如何对待它。”耐克命令说，并提供刻画精瘦的、肌肉发达的运动员的迷人照片帮助我们“决定”)。这些广告中的一些甚至将标准化的身体表现为文化抗拒的身体。“我相信”是锐步最近一系列广告的主题，每一种广告都表现了肌肉发达、精力充沛的女人，在锻炼的时候宣布她们的女性主义反抗：“我相信婴儿是一个四个字母的单词”，“我相信对着月亮喊是有好处的”，“我相信汗水是性感的”。最后这条宣言——“回应”了秘密牌除臭剂广告中的那位男子，他称“女人流汗的时候是不性感的”——不仅反抗了性属意识形态，还向广告界本身提出抗议(对一则广告而言是个不错

的把戏!)

图53和54是来自“我相信”系列的杂志广告。每则广告中都



图 53　这是一则锐步运动鞋的广告,广告语是“我相信”。

有一位精瘦、高调和时髦的年轻健身者,称自己不会受制于女人一贯的危机感,要反抗性属造成的期待,相信自己的自主力量。“如果一个男人想要抱柔软和可爱的东西,那么我认为应该他买一个泰迪熊,”图 53 中的文字写道,意思是,这个女人自己想要变得结实和健硕的欲望,而不是她吸引男人的需要,决定了她通过锻炼想要拥有的体型。她暗示,如果这个男人不喜欢,那么他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抱别人。但在 1992 年——至少在这位年轻女子那一代中——有多少男人会认为“柔软和可爱”是一种情欲或审美理想呢? 我的男学生(和女学生)看到《终结者 II》中琳达·汉密尔顿凶狠的表情和结实的身体时几乎真的晕过去。通过创造一种印象表明桑德拉·迪伊(Sandra Dee)仍然是男人想要的[31],锐步能够让它的产品表现女性抗拒有关美丽的文化标准的同时,实际强化这些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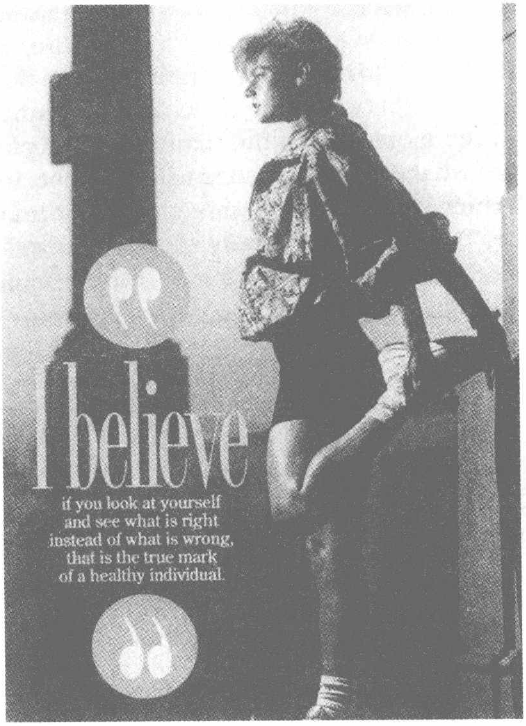


图 54 这是另外一则锐步的广告。

图 54 中的文字写道:“我相信如果你看自己时看到的是令人满意而不是有问题的地方,那么这就是一位健康个体的真正标志。”这些相信“抗拒无处不在”的人会认为这则广告(还有前面讨论的那则)提供了一种越界的、颠覆性的女性特质模式:一位强壮、健康和(不同于大多数女人)没有感觉自己的身体受到威胁的女人。这种解读所忽视的是,我们在此还有一种视觉信息:这位模特的身体本身——或许是这则广告中最有说服力的“表现”——恰恰是女人把自己与之相比,并且肯定发现“问题”的那种完美化的偶像。它一方面鼓励她们把自己看作是有瑕疵的,又因为她们的危机感指责她们。当然,要解开这个结就得买锐步并且成为广告中

的那个女人。

人们也许会说，要充分分析我一直在讨论的这些广告，就要考虑它们的抗拒元素和传递的标准化信息。这是一种有感染力的后现代解决方案，它承认文本的异质性和不稳定的意义（毕竟，如在这本书的导论中讨论的，重量训练和锻炼的确经常在社会方面为女人带来权力）。我完全可以假定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只要这些广告的标准化推力与外表的政治是明确的。与此相关，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些广告中最明显的抗拒象征表现了广告商们最玩世不恭的欺诈；他们假装反对将女人性化（“我相信婴儿是一个四个字母的单词”），重视女性的自信（“用伊卡璐染发让我感觉更有力量！”），同时又试图让那些没能体现主导（苗条的、年轻的）美丽理想的女人相信，她们应该紧跟潮流。反对这种标准化指令的确等于对抗我们文化的本质，不仅在文本“游戏”中，而且还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许多女人因为“太胖”而在性方面被拒绝，因为看上去“太老”被解雇，她们太明白这点了。颠覆主导的文化形式，用贝尔·胡克斯的话说，“在‘文本’领域比在人类互动中要容易实现得多……因为在后者的世界中这些尝试会挑战、破坏和威胁，而且压迫也是真实的”[32]。

我再次坚持和后现代理论家不同的观点，“差异”的快感和权力是来之不易的，它不是随意发展起来的，而是不懈地在主导形式的裂缝中求生存。性别歧视、异性恋主义、种族主义和年龄歧视虽然不能决定人类的价值和选择，虽然没有剥夺我们的力量，但在我们文化中仍然具有强大的标准化作用。相反，我一直考察的这些商业文本参与到这种错觉中（它们和其他后现代文本分享这种错觉），让我们感觉我们的“差异”事实上已经在我们的文化中大量出

现，我们已经拥有自主权，已经被授权在照镜子的时候看到令人满意而不是有问题的地方。事实是，我们的文化不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获得权力；我们不断被教导去看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反馈给我们的身体——错误的、有缺陷的，“一幅漫画、一个肿胀的影子、一个愚蠢的小丑”（援引我用于开始这本书的诗中的几句话）。要想以不同的方式看，需要人们走到一起，探究作为他们的个人选择（或者——如在厌食症和贪食症中——他们的“病态”）文化不断向他们提供的，将其视为具有文化定位并在文化上共享，这在90年代甚至比在60年更为重要。这种认识在我看来必须仍然处于一种身体的女性主义政治的中心。

注释

十周年版序言

1. 公共电视 Frontline 的节目《肥胖》。

2. Norimitsu Onishi,"Globalization of Beauty Makes Slimness Trendy", in *New York Times*,2002. 10. 3. 更多关于饮食和身体形象紊乱在非洲传播的讨论,见 Suzan Chala,"Dying to Stay Thin",in *The Teacher*; Mark Stuart Ellison, "Anorexia and Women of Color",*Suite*101. *com*; "Eating Disorders Rise in Zulu Women",BBC News,2002. 11. 4;"Anorexia Found in Rural Africa", BBC News,2000. 7. 5。

3. Brenda Lane Richardson, Elane Rehr,*101 Ways to Help Your Daughter Love Her Body*,New York: Harper and Row, 2001,p. XX.

4. 更多关于移民中饮食和身体形象紊乱的讨论见 Emily Wax,"Immigrant Girls Suffer from Anorexia",in *Wanshington Post*,2000. 3. 12; "Immigrant Girls Are Starving to Be American", *Tulsa World*,2002. 9. 16;"Immigrant Women and Eating Disorders",Colours of Ana 网站。这个网站可以提供有关饮食失调的大量信息,和不同种族和民族,以及引人关注和给人启发的个人故事。

5. Elizabeth Rosenthal," China's Chic Waistline: Convex to Concave",in

New York Times,1999.12.9.更多关于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中饮食和身体形象紊乱的讨论,见 Eunice Park,"Starving in Silence",*Asian Week*,2000.6.15—21;"Anorexia, Bulimia Rates Have Soared in Japan",*Reuters Health*,2001.9.25;"Asian Women and Eating Disorders",Colours of Ana 网站;Ellen Kim,"Asian Americans and Eating Disorders: A Silent Struggle",*Seattle Post-lntelligencer*,2003.1.28;Sing Lee,Y. Y. Lydia Chan,L. K. George Hsu,"The Intermediate-Term Outcome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Anorexia Nervosa in Hong Kong",*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60(2003.5):967—972。

6. Nancy Snyderman, *The Girl in the Mirror*, New York: Hyperion, 2002,p.84.

7. "Women and Cosmetic Surgery", Women's Health Project(http://www.nowfoundation.org/issues/health/whp/whpfact.html).

8 Brenda Lane Richardson, Elane Rehr, *101 Ways to Help Your Daughter Love Her Bod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2001,. p.223.

9. Galina Espinoza, Mike Neil, "About Face", *People Magazine*, 2002.10.28,p.53.

10. Sarah Brown,"Addicted to Lipo", *Vogue*,2002.10,p.368,370.

11. 对于这些观点的详细阐述,见"Braveheart, Babe, and the Contemporary Body",载 Susan Bordo,*Twilight Zones: The Hidden Life of Culturnl lmages from Plato to O. J.*,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2. 同上书,第45页。

13. 引自 Colours of Ana 网站。更多关于非裔美国人中饮食和身体形象紊乱的讨论,见 Marian Fitzgibbon,Melinda Stolley,"Minority Women: The Untold Story",Nova Online;Liz Dittrich, "About-Face Facts on Socioeconomic Status, Ethnicity, and the Thin Ideal",About Face Online;Mashadi Mataban, "Invisible Women, Silent Suffering",*Diversity or Division? Race, Class*

and America at the Millennium；Ruth Striegel-Moore 等，“Eating Disorders in White and Black Women”，*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0(2003. 7)：1326—1331。

14. 除了上述关于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非洲人、非裔美国人、移民和斐济人的研究外，能说明这点的研究还包括对夏威夷人、西班牙裔人、美洲土著、美国犹太人、印度人、阿根廷人、墨西哥裔美国人、阿拉斯加州人和俄国人的研究。

15. 由 Andrea Sattinger 报道，“The Bod Squad”，*Teen People*，2002. 11. pp. 108—116。

16. Dan Shaw，“Mirror，Mirror”，in *New York Times*，1994. 5. 29，p. 6. 见 Susan Bordo，*The Male Body*：*A New Look at Men in Pablic and in Private*，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9，有关这些发展的进一步讨论，特别参见“Beauty Rediscovers the Male Body”。

17. Harrison Pope，Katharine Phillips，Roberto Olivardia，*The Adonis Complex*：*The Secret Crisis of Male Body Obsession*，New York：The Free Press，2000，p. 149.

18. Liz Smith，What Cher Wants，*Good Housekeeping*，2002. 11，p. 112.

19. Alex Kuczynski，“Frowns Are Victims of Progress in Quest for Wrinkle-Free Look”，in *New York Times*，2002. 2. 7，p. A1.

20. 同上书，第 A26 页。

21. 健康当然也是有阶级性的。奥普拉开始采用的每一种新的节食方法和训练方案，对她的崇拜者来说都是灵感来源。但他们中有多少人能负担得起一张健身卡，请得起一位私人健身教练？又有多少人有时间去健身馆呢？各种杂志为高蛋白和低脂肪饮食孰优孰劣的问题争论不休，好像我们国家的“肥胖流行病”可以通过营养科学解决一样。但高质量、低脂肪的蛋白质价格昂贵。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同样如此，而且非常容易腐烂，除非你有时间经常购物。数以百万的美国人吃油脂、油炸和含汽的速食，因为这是最便宜的养家糊

口的方式。

22. 当《新闻周刊》为了让 Bobbi McCaughey(McCaughey 七胞胎的母亲)上封面而决定“修理”她的畸形牙齿时(《时代》忽视了这点),留心的人会看到一些无意的视觉揭秘。

23. 有关整容手术和其他形式身体改造的进一步讨论,见“Braveheart, Babe and the Contemporary Body”,载 Bordo, *Twilight Zones*。

24. 对于这些变化的明确阐述,见 Leslie Heywood, Shari Dworkin, *Built to Win: The Femnle Athlete as Cultural Ic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25. Sharon Lamb, *The Secret Lives of Girl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2001, p. 42, 43.

26. 引自 Rosalind Wiseman, *Queen Bees and Wannabees*, New York: Crown, 2002, p. 285。

27. *Teen People* 和 *Seventeen* 两家杂志竞相效仿。

28. 感谢 Julie Childers 为我指出这种解释方式。

29. 一般 16 岁女孩的身高是 5 英尺 4 英寸,体重 135 磅,胸罩罩杯的大小在 10 至 14 厘米之间。见 Kari Haskell,“Sizing Up Teenagers”,载 *New York Times*, 2002. 10. 13。

30. 当然,许多人不再认为这在“政治上”有问题,但如果一个学前儿童就已经看自己的头发不顺眼的话,我认为这种问题还是存在的。

导论

1. 详见 Susan Bordo, *The Flight to Objectiv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2. 乍看起来,好像身体在我们文化中不但不被想象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障碍,反而被宣传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主要途径。当然,人们经常用这种方式表现身体训练、增强体质、减肥和塑造形体:正如巴利健身中心最近的一则广

告所坚持认为的,"你不仅塑造身体,而且塑造生活"。然而,如我在这本文集的几篇文章中所认为的,这些形象和联想实际上是对意志("意志力"和"控制")的一种吸引,并且引发了与身体之间的对抗性关系。

3.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7, p. 146.

4. Dotothy Dinnerstein, *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 Sexual Arrangements and Human Malais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6, p. 133.

5. Timothy Beneke, *Men on Rape: What They Have to Say About Sexual Viole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p. 43.

6. 这里用引号表示我认为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种族"这个概念就是一种文化建构。但从现在起,我将不再使用引号。我还会经常使用"黑人"和"白人"这样的种族建构(而不是身份在民族或国家方面的名称),尽管它们的性质是有问题的。比如,当描绘种族意识形态的内容时,民族或国家的描写将是错误和误导的。对人类的种族划分是一种种族主义创造,但这种创造塑造和扭曲了人类的历史和经验;为了准确地描绘这种经验,种族术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7. 引自 Sandera Gilman, *Difference and Pathology*, Ithac: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85。

8. Beverly Guy-Sheftall, "The Body Politic: Black Women and Sexuality", 贝茨学院的一次演说, 1991 年。

9. 这篇导论涉及了对待奴隶制下非裔美国妇女的主题,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见 Angela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83, 以及 Barbara Omolade, "Hearts of Darkness", in Ann Snitow, Christine Stansell, and Sharon Thompson 编, *Powers of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10. Aristotle,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Richard McKeon 编(New

York：Random House，1941），*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Arthur Platt 译，729a 25—30，p. 676。

11. Hegel，*The Philosophy of Right*，T. M. Knox 译并加注，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 263—264。

12. Alan Guttmacher，*Pregnancy，Birth，and Family Planning*，修订版，New York：Signet，1987，pp. 20—22。

13. 例如见 Catharine Gallagher and Thomas Laqueur 编，名为"Sexuality and the Social Bod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的专刊，*Representations*（1986 年春），14；Sandera Gilman，"AIDS and Syphilis：The Iconography of Disease"，*October* 43（1987 年冬）：87—108；Mary Jacobus ，Evelyn Fox Keller and Sally Shuttleworth 编，*Body /Politics：Women and the Discourses of Science*，New York：Routledge，1990；Kathleen Kete，" La *Rage* and the Bourgeoisie：The Cultural Context of Rabies in the French Nineteenth Century"，Representations 22（1988 年春）：88—107；Thomas Laqueur，*Making Sex：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Emily Martin，*The Woman in the Body：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production*，Boston：Beacon Press，1987；Margaret Miles，*Carnal Knowing：Female Nakedness and Religious Meaning in the Christian West*，Boston：Beacon，1989；Susan Suleiman 编，*The Female Body in Western Cul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Simon Watney，"Aids，'Africa，' and Race"，*Differences*（1989 年冬）：83—86。

14. Don Hanlon Johnson，"The Body：Which One? Whose?"，*Whole Earth Review*（1989 年夏）：4—8。

15. Linda Zirelli，"Remenmoration or War? French Feminist Narrative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Representation"，*Differences*（1991 年春）：2—3。

16. 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and Punish*，New York：Vintage，1979；*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 1：*An introduction*，New York：

Vintage, 1980.

17.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in Alice Rossi 编, *The Feminist Papers*,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55—57。

18. 转述自 Nancy Cott,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2。

19. Pat Mainardi, "The Politics of Housework", in Robin Morgan 编, *Sisterhood Is Powerful*, pp. 447—454。

20. Williamette Bridge Liberation News Service, "Exercises for Men", *The Radical Therapist*, 1971. 12—1972. 1.

21. 有关这次事件的记录，见 Robin Morgan 编, *Sisterhood Is Powerful*, pp. 521—523。

22. Amy Collins, "Abreast of the Bra", in *Lear's* 4, no. 4(1991. 6):80.

23. Kathy Davis, "Remaking the She—Devil: A Critical Look at Feminist Approaches to Beauty", in *Hypatia* 6 no. 2(1991 年夏):23.

24. Andrea Dworkin, *Woman - Hating*, New York: Dutton, 1974, pp. 113—114.

25. 这些"经典"包括: Susan Brownmiller, *Against Our Will*, New York: Bantam, 1975; Mary Daly, *Gyn - Ecology*, Boston: Beacon, 1978;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Dworkin, *Woman - Hating*; Germaine Greer, *The Female Eunuch*,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Susan Griffin, *Rape: The Power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 and *Woman and Nature*; Adrienne Rich,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Signs* 5 no. 4(1980): pp. 631—660. 又见: Robin Morgan 编, *Sisterhood Is Powerful* 中收集的文章, Vivian Gornick, Barbara Moran, *Woman in Sexist Society*, New York: Mentor, 1971。

26. Omolade, "Hearts of Darkness", p. 354.

27. Susan Brownmiller, *Femininity*, New York: Ballantine, 1984.

28.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p. 138.

29. Foucault, "The Eye of Power", in *Power /Knowledge*, C. Gordo 编辑并翻译, New York: Pantheon, lgn, p. 155。

30. 当然,即使在外表的政治中也存在来自外部的压迫——比如,当女人因为太胖而被威胁要丢掉工作,或者因为看上去太老而被解雇时。

31. 特别参阅: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访谈, 载 Hubert Dreyfus,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32. 见 Harry Brod, *A Mensch Among Men: Explorations in Jewish Masculinity*, Freedom, Calif.: The Crossing Press, 1988; Michael Kimmel, Michael Messner 编, *Men's Lives*(第二版), New York: Macmillan, 1992; Michael Kimmel 编, *Men Confront Pornography*, New York: Meridian, 1991; Richard Majors, Janet Mancini Billson, *Cool Pose: The Dilemmas of Black Manhood in America*,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1991; Brian Pronger, *The Arena of Masculinity: Sports, Homosexuality, and the Meaning of Sex*,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33. Diane Johnson, "Something for the Boy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92. 1. 16): 13.

34. "文化傀儡"这个说法来自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强调"每一位有能力的演员对他或她所生活的社会都有全面同时又是详尽和敏锐的认识"(*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1, p. 73)。但吉登斯说这番话的意思不是像许多"后现代"作家那样认为的,指对于文化而言,我们是不受约束的,相反,他认为文化具有强烈的循环性、再生产性和"社会化功能"。吉登斯的意思是,这种社会化不是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的,而需要他们的积极参与。

35. Sandra Bartky, *Femininity and Domi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0；Wendy Chapkis，*Beauty Secret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6；Rita Freedman，*Beauty Bound*，London：Columbus Books，1986；Frigga Haug 编，*Female Sexualization：A Collective Work of Memory*，London：Verso，1987；Robin Lakoff，Raquel Scherr，*Face Value：The Politics of Beauty*，Bost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4；和 Naomi Wolf，*Beauty Secrets*，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1。沃尔夫的著作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且有希望引发新一代年轻女性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同时参见：Kathryn Pauly Morgan，"Women and the Knife：Cosmetic Surgery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Women's Bodies"，载 Hypatia 6，no. 3（1991 年秋）：25—53；Iris Marion Young，"Breasted Experience"，*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in Feminist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pp. 189—209。

36. Joan Jacobs Brumberg，*Fasting Girls：The Emergence of Anorexia Nervosa as a Modern Diseas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37. Susie Orbach，*Hunger Strike：The Anorectic's Struggle as a Metaphor for Our Age*，New York：W. W. Norton，1986；Kim Chernin，*The Obsession：Reflections on the Tyranny of Slendernes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1，and *The Hungry Self：Women，Eating，and Identit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5.

38. Richard Mohr，*Gay Ideas：Outing and Other Controversies*，Boston：Beacon Press，1992，p. 142.

39. Emily Martin，*The Woman in the Body*，pp. 128—135.

40. Joan Peters，"Mittelschnerz：A Lady's Complaint upon Reaching the Age of 44"，*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1991 年秋）：685—693. 彼得斯在文章的结尾呼吁我们"融合"这些"把我们剁成无效的小块"的"分离的阵营"（第 692 页）。

41. Ann Snitow，"A Gender Diary"，in Marianne Hirsch，Evelyn Fox Kel-

ler 编，*Conflicts in Feminism*，New York：Routledge，1990，p. 9。

42. Sherman Silber，*How to Get Pregnant with the New Technology*，New York：Wagner，1991，p. 375. 实际上，这种技术花费很大，而且很耗时，还迫使身体接受各种具有侵害性的流程和强大的药物：持续两周的一系列注射，刺激捐赠者排卵，更换接受者体内必要的荷尔蒙，让捐赠者和接受者的周期同步，大量的超声波和血液检测，进行卵泡穿刺术的外科手术，并将配偶子通过输卵管从捐赠者传输至接受者，继续对接受者进行三个月的荷尔蒙增补和监测。西尔伯让读者放心，所有这些"对患者来说真的没那么难"（第 276 页）。

43. Susan Faludi，*Backlash：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New York：Crown，1991.

这是谁的身体？

1. Kim Chernin，*The Obsession：Reflections on the Tyranny of Slendernes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1，同时参阅她的 *The Hungry Self：Women，Eating，and Identit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5。

2. Rachel Calam，Peter Slade，"Sexual Experience and Eating Problems in Female Undergraduat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8(1989)：392—397；Alexander McFarlane 等，"Posttraumatic Bulimia and Anorexia Nervos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7(1988)：705—708；Justin Schechter 等，"Sexual Assault and Anorexia Nervos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6(1987)：313—316。

3. Catherine Steiner-Adair，"The Body Politic：Normal Female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nd Eating Disorders"，博士论文，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1987。

4. Susie Orbach，在 *Hunger Strike：The Anorectic's Struggle as a Metaphor for Our Age* 中作了详细分析。Orbach 还是妇女治疗中心纽约研究院和伦敦妇女治疗中心的共同创办人，这两个中心开发了以客体关系和女性主义理论为基

础的治疗技术。

5. 特别参阅：Marlene Boskind White，William White，“Bulimarexia：A Historical—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载 Kelly Brownell，John Foreyt，*Handbook of Eating Disorders*，New York：Basic Books，1986，pp. 353－366；Lisa Fabian，“Body Image and Eating Disturbance in Young Femal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8(1989)：63－67；D. Greenfeld 等，“Eating Behavior in an Adolescent Popul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6(1987)：99－111；Robert Klesges 等，“Self-Help Dieting Strategies in College Males and Femal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6(1987)：409－417；Debbie Vanderheyden 等，“Critical Variables Associated with Binging and Bulimia in a University Population：A Factor Analytic Stud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7(1988)：321－329。

6. 作为这种方法的例证，见 Paul Garfinkel，Allan Kaplan，“Anorexia Nervosa：Diagnostic Conceptualizations”，in Kelly Brownell，John Foreyt，*Handbook of Eating Disorders*，New York：Basic Books，1986，pp. 266－282；Harrison Pope and James Hudson，“Is Bulimia Nervosa a Heterogeneous Disorde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7(1988)：155－166。

7. Craig Johnson，Mary Connors，*The Etiology and Treatment of Bulimia Nervosa：A Biopsychosocial Perspective*，New York：Basic Books，1987.

8. Harrison Pope and James Hudson，“Is Bulimia Nervosa a Heterogeneous Disorde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7(1988)：158.

9. Joan Jacobs Brumberg，*Fasting Girls：The Emergence of Anorexia Nervosa as a Modern Diseas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S. Lee 等，“Anorexia Nervosa in Hang Kong：Why Not More in Chinese?”*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4(1989)：683－688；Susie Orbach，*Hunger Strike：The Anorectic's Struggle as a Metaphor for Our Age*，New York：W. W. Norton，1986。同时参见这本文集中《解读苗条的身体》一文。

10. Brumberg, *Fasting Girls*, pp. 41－125.

11. D. J. Ben-Tovim 等,"Bulimia: Symptom and Syndromes in an Urban Populatio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23:73－80; A. Crisp 等,"How Common Is Anorexia Nervosa?",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8(1976):549－554; D. Jones 等,"Epidemiology of Anorexia Nervosa in Monroe County, New York: 1960－1976", *Psychosomatic Medicine* 42(1980):551－558; Marianne Rosenzweig, Jean Spruil,"Twenty Years After Twiggy: A Ret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of Bulimic-Like Behavi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6(1987):59－65。

12. 现在的临床医师也许还会偶尔(或者更加频繁地)看到在 19 世纪被诊断为"歇斯底里"的症状。但做出这种诊断的倾向大大减弱了。整日在床上睡觉、空想、游离和衰弱的女人更有可能被诊断为患有抑郁性失调,而不是歇斯底里或神经衰弱。当代对厌食症患者性格的临床描述,通常和被建构为"癔症型人格"(hysterical personality)的 19 世纪医学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的确,当时的厌食行为几乎总被视为一种歇斯底里症状。但现在和厌食症相联的是失调症的其他表现:情绪化、感性、自恋、抑郁。

13. Kelly Brownell, John Foreyt,"The Eating Disorders: Summary and Integration", in Kelly Brownell, John Foreyt, *Handbook of Eating Disord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p. 508.

14. 同上书,第 507 页。

15. Harrison Pope and James Hudson, *New Hope for Binge Eater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5.

16. Paul Garfinkel and David Garner, *Anorexia Nervosa: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82, p. 159.

17. Ira Sacker and Marc Zimmer, *Dying to Be Thin*, New York: Warner, 1987, p. 50.

18. Vanderheyden 等,"Critical Variables Associated with Binging and Bulimi-

a"; Vanderheyden 等, "Very Low Calorie Diets and Obesity Surgery After 5 Years", *International Obesity Newsletter* 5(1989. 5):33－38; Brett Silverstein, "Possible Causes of the Thin Standard of Bodily Attractiveness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5(1986):907－916。

19. Hilde Bruch, *Eating Disord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89; Hilde Bruch, "Perceptual and Conceptual Disturbances in Anorexia Nervosa", *Psychosomatic Medicine* 24(1962):187－194.

20. Roberta Marks, "Anorexia and Bulimia: Eating Habits That Can Kill", RN(1984. 1):44.

21. " Feeling Fat in a Thin Society", *Glamour*(1984. 2):198－201, 251－252.

22. Kevin Thompson, " Larger Than Life", *Psychology Today* (1986. 4): 39－44;又见 Sandra Birtchnell 等, "Body Image Distortion in Non-Eating Disordered Wo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6(1987):385－391。

23. Linnea Lindholm, G. Terrence Wilson, "Body Image Assessment in Patients with Bulimia Nervosa and Normal Contro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7(1988):527－539; A. Whitehouse 等, "Body Size Estim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9(1986):98－103; M. Willmuth 等, "Body Size Distortion in Bulimia Nervos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4(1985):71－78。

24. Thompson, "Larger Than Life", p. 42; Thomas Cash 等, "The Great American Shape-Up", *Psychology Today* (1986. 4): 30 － 37; D. Goleman, "Dislike of Own Body Found Common Among Women", *New York Times*, 1985. 3. 19; Dalma Heyn, "Why We're Never Satisfied with Our Bodies", in *McCall's*(1982. 5); Klesges 等, "Self-Help Dieting Strategies"。

25. 1991 年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终于出现了一篇文章,质疑身体形象紊乱这一概念的价值,认为"过去 16 年它虽然引人注意,但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有意义的研究……让公众和我们自己产生困惑……(而且)在没有进步可言的情况下暗示进步。乍一看这种说法的确是一种概念

上的突破，抛弃它无疑可惜，但我们相信该是继续前进寻找新观点的时候了”[George Hsu, and Theresa Sobkiewicz, “Body Image Disturbance: Time to Abandon the Concept for Eating Disord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10, no. 1(1991. 1), 28.]。Hsu 和 Sobkiewicz 愿意“继续前进”，我对此表示赞赏，但我发现他们的建议有其局限性，因为他们想要在关于“身体态度和感觉”的新研究中发现“身体形象紊乱”概念中缺少的独特的“病理学”。

26. 见 Garfinkel and Garner, *Anorexia Nervosa*; Craig Johnson and Danyl Pure, “Assessment of Bulimia: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in Kelly Brownell, John Foreyt, *Handbook of Eating Disorders*, pp. 406－449; Reinhold Laessle 等, “Cognitive Correlates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Eating Disord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7 (1988): 681 － 686; Deborah Thompson 等, “The Heterogeneity of Bulimic Symptomatology: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6(1987): 215－234。

27. Garfinkel and Garner, *Anorexia Nervosa*, p. 159.

28. W. Stewart Agras, Betty Kirkley, “Bulimia: Theories of Etiology”, in Kelly Brownell, John Foreyt, *Handbook of Eating Disorders*, pp. 367－378; F. M. Berg, “Starvation Stages in Weight-loss Patients Similar to Famine Victims”, *International Obesity Newsletter* 3(1989. 4): 27.

29. “Semi-starvation Diets Gain in Popularity”, *International Obesity Newsletter* 3(1989. 4): 25, 28－30。

30. Vanderheyden 等, “Very Low Calorie Diets and Obesity Surgery After 5 Years”.

31. *Time*(1988. 4. 18): 89.

32. “Girls, at 7, Think Thin, Study Finds”, *New York Times*, 1988. 2. 11; Jeffrey Zaslow, “Fat or Not, 4^{th} Grade Girls Diet Lest They Be Teasted or Unloved”, *Wall Street Journal*, 1986. 2. 11, p. 28.

33. Joan Jacobs Brumberg, *Fasting Girls: The Emergence of Anorexia Nervosa as a Modern Disea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34. A. Anderson, A. Hay, "Racial and Socioeconomic Influences in Anorexia Nervosa and Bulim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4 (1985):479—487.

35. Steiner-Adair, "The Body Politic"; Christine Tinko 等, "Femininity / Masculinity and Disordered Eating in Women; How Are They Relat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6(1987):710—711。

36. Garfinkel and Garner, *Anorexia Nervosa*, pp. 102—103; "Simon Gowers, John McMahon, Social Class and Prognosis in Anorexia Nervos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8(1989):1059; Janet Gross, James Rosen, "Bulimia in Adolescents: Prevalence and Psychosocial Correl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7(1988):51—61.

37. James Gray 等, "The Prevalence of Bulimia in a Black College Pop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6(1987):733—740; L. K. George Hsu, "Are the Eating Disorders Becoming More Common Among Blacks?", George Hsu, 6(1987):113—124。

38. Retha Powers, "Fat Is a Black Women's Issue", in *Essence*(1989. 10):75—78, 134—136. 又见 Georgiana Arnold, "Fat War", in *Essenc*(1990. 7):52—53, 104—105; Kathleen Hiebert 等, "Comparison of Outcome in Hispanic and Caucasian Patients with Anorexia Nervos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7(1988):693—696; Lionel Rosen 等, "Prevalence of Pathogenic Weight-control Behaviors Among Native American Women and Gir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7(1988):807—811。

39. Mary Mohler, "A New Look at Anorexia", *Ladies Home Journal* (1986. 4).

40. 参见注释2。

41. 参见 Dalma Heyn 对 Steven Levenkron 的访谈："Body Hate"，载 *Ms.*(1989.7):35—36。

42. Michael Strober, "Anorexia Nervosa: History and Psychological Concepts", Kelly Brownell, John Foreyt, *Handbook of Eating Disord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p. 41.

43. Brumberg, *Fasting Girls*, p. 3.

44. 断定布隆伯格根本不理解隐喻和类比，抑或领会像无意识的过程，或者我们的身体可能具有意料之外，或主体不甚明了的含义这一事实这些想法，这种做法很有诱惑力。但布隆伯格后来的态度更加复杂，因为她大量借用她所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厌食症患者拒绝食物的行为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象征性"声音"，一种具有"沉默而有力的形式"的反抗，抗拒家庭期待、感情压抑，和自主性的匮乏(*Fasting Girls*, p. 140)。

45. *Fasting Girls*, pp. 35—37. 颇有意味的是，布隆伯格几乎原封不动地从一篇文章中借用了这个精神分裂症的例子，这篇文章的作者赞成为厌食症患者强迫进食。Eliot Goldner, "Treatment Refusal in Anorexia Nervos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8, no. 3(1989.5):301。

46. *Newsday*(1984.2.12.):2.

47. Brumberg, *Fasting Girls*, p. 14; Paul Garfinkel, Allan Kaplan, "Anorexia Nervosa: Diagnostic Conceptualizations", pp. 270—271; "Gina Kolata, Bulimia Epidemic Fears May Be a False Alarm", *New York Times*, 1988.8.25, p. 86; Susan Squire, "If You Think a Woman Can Never Be Too Thin…", *Mademoiselle*(1984.10):180—181, 252—254.

48. 在这点上，即便是这些已经吸收了女性主义批判要素的人，距离实现系统化和政治化的理解还有一段距离。如果没有这种理解，像斯坦纳一阿代尔的研究这种有影响的发现就容易被理解为，暗示妇女的饮食问题是因为我们"设法向男人看齐"，不去发挥自然赋予我们的养育和同情能力所致。相反，

如果系统地分析就会发现，女超人综合征显示了基本关系方面的改变是多么微乎其微。参与到职业领域的妇女在那个领域中必须表现其男权主义风格和价值，因此人们不许她们放弃“女性特质”。事实上，公共工作日结束后，她们必须回到她们已经从事的全职工作，做称职的妻子和母亲，回归这些角色所要求的“女性”风格和价值（Arlie Hochschild 称之为“第二次转变”，Anne Maching，*The Second Shift：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uolution at Home*，New York：Viking，1989）。女超人综合征说明，不论妇女在这个文化中“可以”做什么，她们还得做“她们的”工作。

49. Weir Mitchell 引自 Elaine Showalter，*The Female Malady：Women，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1830－1980，New York：Pantheon，1985，p. 130；Hilde Bruch，*The Golden Cage：The Enigma of Anorexia Nervosa*，New York：Vintage，1979。

50. Bruch，*The Golden Cage*，p. ix.

51. Rudolph Bell，*Holy Anorexi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52. Brumberg，*Fasting Girls*，p. 46.

53. Jennifer Woods，“I Was Starving Myself to Death”，*Mademoiselle*（1981. 5）.

54. Brumberg，*Fasting Girls*，p. 7.

母亲是人吗？

1. 联合太平洋铁路诉波斯福德，141 U. S. 250，251（1891）。

2. Gilbert Ryle，*The Concept of Mind*，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49.

3. Stephen Wermiel，“Legal Beat：Bone Marrow Test”，*Wall Street Journal*，1990. 10. 1，p. 16.

4. 麦克福尔诉希莫案，No. 78－17711（C. P. Allegheny County，Pa.，Ju-

ly 16, 1978)，引自 Lawrence J. Nelson,, Brian P. Buggy, and Carol Weil, "Forced Medical Treatment of Pregnant Women: 'Compelling Each to Live as Seems Good to the Rest'", *Hastings Law Journal* 37(1986.5):255. 在伊利诺斯州判决(参见注释 3)之前出现的各类报纸评论明显持有这种观点，认为"一个人的生存权止于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开始之时"(Lynn Baker,"Are We Safe in Our Own Skins?",*New York Times*,1990.8.21,p.27)，并称父亲强迫这对双胞胎成为捐赠者，是"一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范例，在没有经过捐赠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身体侵犯"(*New York Times* 社论，1990.8.29,p.20)。

5. J. Nelson 等，"Forced Medical Treatment",p. 723。

6. 麦克福尔诉希莫案，引自 J. Nelson 等，"Forced Medical Treatment", p.755。

7. 342 U.S. 165 (1952)，引自 Nancy Rhoden,"The Judge in the Delivery Room: The Emergence of Court-Ordered Cesareans", *California Law Review*)74(1986):1983。

8. 其他具有法律依据的身体侵犯包括强制性接种疫苗，和未经同意对收容者进行治疗。前者得到同意，因为它们符合广泛的公众利益，而且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参与。未经同意对收容者进行治疗的历史(这篇文章的后面将会简要讨论它的一个方面，即结扎术的滥用)本身就是一桩丑闻。这些被认为有"精神缺陷"或"精神病"的人显然代表了另外一大类人，他们保证身体完整性和知情同意的权利经常被忽略和抹煞。这种抹煞不属于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除非它与这里讨论的具体主题相契合，但这种有限的处理并不意味无视它的相关性和重要性。

9. 斯克莫伯诉加利福尼亚州案，384 U.S. 757 (1966)。

10. 温斯顿、谢里夫等诉李案，470 U.S. 753 (1985)。

11. 即便是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的人的主体性也受到尊重；确定这种病人的愿望一直是做决定终止他们的生命维持系统时的关键问题之一(比如，Nancy Cruzan 和 Helga Wanglie 案)。而且未经同意的身体侵犯所造成的文

化恐惧甚至延伸到了死亡的身体;法律规定,未经同意不得使用尸体的器官和组织,即使它们能够拯救别人的生命。在此,对死尸"主体性"的尊重远远超出了活人的价值,如果人们普遍用一种完全机械的、非人化态度看待尸块的话,活人也许会受益。

12. 拉斯特诉沙利文案,59 USLW 4451 (1991)。

13. Philip R. Reilly, *The Surgical Solu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xiii.

14. Angela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Vintige, 1983, pp. 215—221.

15. Philip R. Reilly, The Surgical Solution, pp. 94—95.

16. 沃克诉皮尔斯案,560 F. 2d 609 (1977)。皮尔斯赢得诉讼,但与某一巡回法庭法官之间存在重大分歧。这位法官认为,皮尔斯医生关于绝育的策略无疑取决于经济因素,而非病人的健康状况。

17. Veronika Kolde 等,"Court-Ordered Obstetrical Intervention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16, no. 19(1987. 5. 7):1192。

18. 案由:A. C. 上诉人, 523 2d 611 (1987)。

19. 此外,人们也许会发现这些流程对胎儿的生命而言不是那么必要。在杰斐逊诉院方格里芬·斯波尔丁一案中(GA 86, 274 S. E. 2d 457 1981),患有胎盘前置的杰斐逊太太被命令进行剖腹产。这个命令从未强制执行,她也最终有惊无险地顺产了一位健康的婴儿。

20. 塔夫脱诉塔夫脱案,446 N. E. 2d 395 (Mass. 1983)。

21. 当有由于子宫颈(通常被描述为"无能的子宫颈")的脆弱而导致晚期妊娠流产的危险时,要进行宫颈环扎术,把宫颈缝起来以保证妊娠。

22. 哥伦比亚地区上诉法院这样描述它,推翻了巡回法院对安吉拉·卡德尔的判决(虽然太晚,对卡德尔没有影响,但正如我要讨论的,它仍然意义重大)。

23. Tamar Lewin, "Court Acting to Force Care of the Unborn", *New York Times*, 1998. 11. 28, p. 1.

24. 参见 J. Nelson 等,"Forced Medical Treatment",和 Rhoden,"Judge in the Delivery Room",还有 Janet Gallagher,"Prenatal Invasions and Interventions: What's Wrong with Fetal Rights", *Haward Women's Law Journal* 10 (1987):9—58。

有些法官已经尝试为这些矛盾提供具有法律依据的合理化解释。比如,哥伦比亚地区上诉法院推翻对安吉拉·卡德尔判决的反方律师认为,处于晚期妊娠的妇女属于"一类特殊的人",因为她已经"孕育了另外一个人",而且这个生命已经有了生存能力。因此,她就"将自己置于"一类特殊的人群之中,别人的生命完全依赖她们。如果要反对这种观点,可以合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这种奉献,如果它的确存在的话,为什么在孩子出生后就终止了,它为什么不适用于孩子的父亲呢?它在法律上是不适用的,这明显体现在一贯拒绝要求父母为他们的孩子捐献骨髓或器官的决定中(即便孩子的生命"完全依赖于"这种捐献)。我还认为,自愿"承担"维持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并不能为无法捐献器官或骨髓,或者进行血液检测提供法律上的合理解释。因此,问题依然是:照顾另外一个人需要不惜任何代价去付出吗?

25. J. Nelson 等,"Forced Medical Treatment",p. 714。

26. 对罗诉韦德案的频繁误用似乎是这种观点的背景,它以"保护胎儿生命的国家利益"为基础,为强制性剖腹产辩护。罗案的判决的确承认,这种利益随着妊娠的深入而增加,但也同时强调,它永远不能取代母亲的生命和健康利益,直到分娩期。的确,如美国产科医师和妇科医生学院诉索恩伯格所表明的,"当女人的生命和健康与胎儿的生命和健康相冲突时,前者永远是第一位的"(引自 7 J. Nelson 等,"Forced Medical Treatment", p. 744)。从(罗所承认的)保护胎儿生命的国家利益,到(罗和她的后代都不接受的)将这种利益提升至超越保持母亲健康的位置,这种变化将保护胎儿的生命转化成母亲自我牺牲的原则。(有关罗案误用的有趣讨论,见 Susan Behuniak-Long ,"Reproductive Issues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Roe v. Wade*: Limits and Essence",载 Robert Black and Miriam Mills 编,*Biomedical Technology and Public Pol-*

ic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0.)

27. 沃克诉皮尔斯案。

28. 哥伦比亚地区上诉法院,No. 87-609 案由:A. C., April 26, 1990, p. 1142。

29. Kolder 等,"Count-Ordered Obstetrical Interventions"。

30. 见,比如,Robertson,"The Right to Procreate and In Utero Fetal Therapy",*Journal of Legal Medicine* 333(1982):351-361。

31. 这些案件很少引发道德争论,而且报纸偶尔还会用完全将母亲非人化的语言描述这些过程,这是最让人心寒的。今年在锡拉丘兹,一位患脑动脉瘤脑的妇女已经脑死亡,但还被维持了 7 周的生命,直到孩子通过剖腹产出世。作为代理人,她的家庭成员确信,如果活着的话,这也肯定是她的意愿。我在这里不是想质疑他们的理解。但令人吃惊的是,没有人站出来质疑。在当地报纸的报道中,这个案件完全是一种技术上的成就,没有暗示这其中可能会含有任何道德冲突。这篇报道始终仅把这位脑死亡的妇女描述为一个身体:"奥布里说这位女子的身体或许会自行分娩";"婴儿最好在这位母亲真正垮掉前出世";等等(Amber Smith,"Braindead Pregnant Woman Kept Alive So Her Baby Could Be Born",*Syracuse Herald-American*,1991.11.3,p.1.)我强烈怀疑,即使这位妇女的家庭成员在做决定时不考虑她的意愿,他们的要求是不是就会被认为是有道德问题的呢?

比较 1989 年出现的一次高度公开的论战。马丁·克莱因(和他妻子的家人保持一致)希望得到法院指令,指定他为处于昏迷中的南茜·克莱因的监护人,以此获得权利对其实行堕胎(医生们认为,对于这位怀有 17 个月身孕的妇女的康复来说,堕胎是必要的,而堕胎后她也的确恢复知觉)。面对这个家庭的要求,主张维护生命权利的积极分子创造了一种全国性狂热,并发起(最终失败的)法律诉讼延缓克莱因的法院指令("Court OKs Abortion for Comatose Woman",*Syracuse Herald Journal*,1989.2.11,pp. A1-A4)。后来,还是那年,一位父亲轻易地获得了一项指令——他妻子的家庭对此表示强烈反

对——延长七个半周已经怀孕的脑死亡妻子的生命;孩子出生生命维持系统立刻撤走。在那起案件中,和更近的这起不同,这位妇女的意愿对这位父亲来说甚至都不是个问题;他为自己的要求辩解时所依据的仅仅是他想要孩子的渴望。我不是说他的辩论没有道德内容。我们对影响昏迷和脑死亡妇女生命的代理行为和理解的道德反应中存在明显的矛盾,这是我正试图指出的。因为按照文化观念来衡量,胎儿孵化器这种形象实在太普通,所以和其他这种案件不同,将一位昏迷中的孕妇当作纯粹的身体对待完全无法引起道德上的不安(见注释 11)。

32. *Guidelines for Legislation on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天主教主教管理委员会全国会议,1984. 11. 10,对此的报道载“New York State's Health Care Proxy Law: A Catholic Perspective”,纽约州天主教会议分发的小册子,Albany,未标注出版日期。

33. J. Nelson 等,“Forced Medical Treatment”,pp. 756—757。

34. Eileen McNamara,“Fetal Endangerment Cases on the Rise”, *Boston Globe*,1989. 10. 3,p. 1.

35. Ellen Goodman,“Pregnant and Prosecuted”, *Finger Lakes Times*, 1990. 2. 9.

36. Robb London,“Two Waiters Lose Jobs for Liquor Warning to Woman”,*New York Times*,1991. 3. 30, p. 7.

37. Cal Thomas,“Watch What You Say to a Pregnant Woman”,*Syracuse Herald Journal*,1981. 4. 18.

38. Rhoden,“Judge on the Delivery Room”,p. 1959.

39. “Two Waiters Lost Jobs”,p. 7.

40. 等候批准接受药物治疗方案的时间通常长达 6 个月,1989 年的一项纽约市调查发现现有的 78 家治疗中心中,54%的不接受孕妇,87%的不为享有公共医疗补助的快克可卡因吸食孕妇提供治疗(“Fetal Endangerment Cases on the Rise”)。

41. Katha Pollitt, “Fetal Rights: A New Assault on Feminism”, *The Nation*,(1990. 3. 26):410.

42. Robert Pear,“The Hard Thing About Cutting Infant Mortality Is Educating Mothers”, *New York Times*,1990. 8. 12,p. 5.

43. 胎儿权利的拥护者提出了“照顾的责任”,从道德上为他们支持的产科和生活方式干预辩护。Katha Pollitt, “Fetal Rights”,p. 415。

44. 引自 Gallagher, “Prenatal Invasions”,p. 58。

45. Michael Harrison,“Unbor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Fetus as Patient”,*Pharos*,(1982 年冬):19—24,引自 Ruth Hubbard, *The Politics of Women's Biolog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75—176。

46. Ruth Hubbard, *The Politics of Women's Biology*,p. 176.

47. 对这个问题非常有洞察力并且客观的分析,见 Rosalind Petchesky, “Fetal Images: The Power of Visual Culture in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载 Michelle Stanworth 编,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pp. 57—80。

48. 乔治・安拿斯说,“许多医生和胎儿,而不是一位和他们不同的女人产生认同”(引自 Lewin,“Courts Acting”,p. B10)。这种认同比诸如胎儿和医生之间的种族“差异”明显要重要得多,这种差异(可以说)让胎儿对母亲无助的依赖所产生的同情的深层心理来源黯然失色,这是特别有趣的一点。

49. Stefan Semchyshyn,Carol Colman, *How to Prevent Miscarriage and Other Crises of Pregnancy*,New York: Macmillan, 1989,p. 5.

50. 我要赶紧强调一下,这种批评不是针对选择冒这种危险的女人,而是抹煞或贬低这些危险的话语。

51. 关于这些变化的出色讨论,见 J. Nelson 等,“Forced Medical Treatment”,pp. 732—745.

52. 迪特里希诉北安普顿居民,138 Mass. 14 (1884)。

53. W. Prosser，引自 J. Nelson 等，"Forced Medical Treatment", p. 733。

54. 65 F. Supp. 138(D. D. C. 1946)。

55. 31 N. J. 353, 157 A. 2d 497 (1960)，引自 J. Nelson 等，"Forced Medical Treatment", p. 734。

56. 更不用说胎儿和成熟女人所受的尊重之间的差异：明尼苏达州制定了许多医疗程序，禁止未经同意侵犯有生命的女性身体。1990 年，一条法律在这个州生效，要求医院和诊所埋葬或火化已经死亡的胎儿，维护他们的"尊严"("Law Says Cremate or Bury Fetuses", *Syracuse Herald Journal*, 1990. 10. 1, p. 2)。

57. Terence Monmaney, Kate Robinson, "Doesn't a Man Have Any Say?", *Newsweek*(1988. 5. 23):74—75.

58. "Big Win for Pro-Lifers: Pennsylvania Passes Strictest State Abortion Law", *Finger Lakes Times*, 1989. 11. 15.

59. Peggy Orenstein, "Does Father Know Best?", *Vogue*(1989. 4):314.

60. Aeschylus, *Oresteia*, Richard Lattimore 翻译并作序,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引自 *The Eumenides*, p. 158。

61. James Hillman, *The Myth of Analysis: Three Essays in Archetypal Psycholog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8, p. 218.

62. 关于这些表现的讨论请参见本书的导论。

63. Aristotle,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Richard McKeon 编,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1, 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 Arthur Platt 译, 729a 25, p. 676。

64. 客观地讲，还有另外一种版本的预成和具象理论(即"卵源学说")，按照这个版本，上帝在创造女人的时候把微小的动物放进她的子宫。但这个版本的认可度远不及官方的精源论。不论在哪个版本中，女人都是起容器的作用。

65. 引自 Brian Easlea, *Witch-hunting, Magic and the New Philosophy*,

Atlantic Highlands, N. J. : Humanities Press, 1980, p. 148。

66. 428 U. S. 52 (1976),引自 Patricia Hennessey,"On the Rise: Men Make Claims in Abortion Suits",*Conscience* 9 no. 4(1988. 7—8):4。

67. "Nightline""堕胎权利"节目的副本,1988 年 7 月 22 日,Journal Graphics, New York, N. Y.

68. "Embryo's Rights Upheld",*Syracuse Herald Journal*,1989. 9. 21, p. A12.

69. "Doesn't a Man Have Any Say?",p. 74.

70. 就未出世的婴儿"H"而论,No. 84CO1 8804 JP 185 (1988),引自"Hennessey," p. 4。

71. 可以说,让社会和法律体系与对孕妇的治疗保持一致,而不是相反,这才是需要做的。也就是说,面对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每个人(不仅是孕妇)都应该成为善良的撒马利亚人。这篇文章不评价这种理想化状态,只是想说明,这些真正需要这种转变(而不只是表面空谈,实则想要证明当前的不平等)的人,需要通过孕妇之外的其他资源号召一些社会关怀和奉献,以此来证明他们的诚意。建立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为穷人和孕妇提供他们需要的帮助,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72. 引号中的说法都来自贝尔·胡克斯对恢复"黑人主体性"的讨论,这种讨论也适用于恢复其他的边缘化和非主体化身份,包括女人的生育身份:"必须将当代非裔美国人的抵抗斗争根植于一种非殖民化过程,这种过程不断反对重新铭刻'真正的'黑人身份的概念。不应该为了让我们自己成为主体,而把这种批判等同于取消受压迫和剥削的人的斗争。也不应该否认,这种经历在某些情况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批评位置去评述。这不是重新刻写现代主义对权威的大师叙事,这种叙事通过拒绝他者的发言权而赋予某些声音以特权。探索建构对抗性和解放性的自我和身份的方式,这是我们为争取根本的黑人主体性所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许多非裔美国人不愿评判本质主义,根源在于他们害怕这会让人们忽视非裔美国人的具体历史和经

历，和源自这种经历的独有感受力和文化。要充分地对待这种担忧，就要在批判本质主义的同时，强调‘经历的权威’的重要性。批判认为存在一个黑人‘本质’的想法，和认识到黑人身份已经明确存在于流放和挣扎的经历中，这两者间存在根本差别”(*Yearning*,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0, pp. 28—29.)。

73. Emily Martin, *The Woman in the Bod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pp. 139—165.

74. Angela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pp. 20—21.

75. Iris Young, "Pregnant Embodiment: Subjectivity and Alienation,"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9(1984.1):45—62.

76. 我曾经主张应该回避这种问题，认为胎儿的身份“实际上”不是在那里等待正确的解读，而是一种人类的决定，受特定社会团体中的惯例的影响。我对此仍深信不疑。但我不再相信这些形而上的考虑可以让我们摆脱责任，不去参与塑造这些惯例的公共进程。我们隐退至没有实质内容的元话语的港湾，却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不管我们是否选择参与这种进程，关于胎儿的文化决定和想象正在出现，而且目前它们已经开始赋予胎儿的不仅是人的身份，还有(如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的)超人的身份。

77. 如 Nancy Miller 所称：“认为作者已死的后现代断言……不一定对女人有利，而且过早地排除了她们的身份问题。因为历史上女人与出身、制度和生产的身份关系，和男人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女人没有(共同)背上太多的自身、自我和我思等重负。因为女性主体已经从法律上被排除在政治群体之外，并因此失去中心，‘没有了来源’，失去了机构性质，等等；她与完整性和文本性、欲望和权威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是不同的”(“Changing the Subject”，载 Teresa de Lauretis, *Feminist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06)。

作为意识形态的饥饿

1. 记者 Beatrice Fairfax，引自 Lois Banner, *American Beau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 136。

2. " Starvation Stages in Weight-loss Patients Similar to Famine Victimes"，*International Obesity Newsletter* 3(1989. 4).

3. Jean Baudrillard，*Simulations* (New York：Semiotext(e)，1983)，pp. 1—3；引文在第 2 页上。

4. Geneen Roth，*Feeding the Hungry Heart*，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82，p. 15.

5. 关于这种禁忌的一次极其有趣的讨论，见 Helena Mitchie，*The Flesh Made W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6. 引自 Joan Jocobs Brumberg 的 *Godey'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 179。

7. Mitchie，*The Flesh Made Word*，p. 5. 红色的肉类尤其被怀疑是引起性欲的源泉，这不足为奇。作为那个时代的典型现象，这种焦虑被严格地科学化：比如，从红色肉类产生热量的能力，和它对性器官的发育和月经的影响这些方面。但一种无法抗拒的联想性超定——肉类象征着野蛮、粗俗、原始、阳刚——才是这里真正的刺激源。这些联想今天仍然存在，被美国牛肉协会用于商业推销。它的电视广告由詹姆斯·加纳和赛比尔·谢泼德主演，推销语是："牛肉：真正的人的真正食品。"这里，19 世纪对肉类的反感、精致和优雅之间关联得到发挥，但这次对食肉者来说是有利的，他们现实的贪婪含蓄地与体弱的素食者的娇气形成对比。

8. H. O. Ward，*The Young Lady's Friend*，Philadelphia：Porter and Coates，1880，p. 162，引自 Helena Mitchie，*The Flesh Made Word*，pp. 16—17。

9. 引自 Helena Mitchie，*The Flesh Made Word*，p. 193。

10. Bram Dijkstra，*Idols of Pervers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 30—31.

11. *Malleus Malificarum*，引自 Brian Ealea，Atlantic Highlands，N. J.：

Humanities Press, 1980, p. 8; Hall, Oates, "Man-Eater"。

12. 女人们因此被警告"暴食的生活习惯"会破坏她们的容貌和可婚性。"暴食者"的皮肤会变厚，鼻子上的血管会破裂，还会引发唇裂和一种难看的"超级野兽"的面部表情(Brumberg, *Fasting Girls*, p. 179)。当然，现实中的女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表现出这些理想化和偶像化的建构，这是(一如往常一样)非常难以确定的；但所有的女人，任何阶层和种族的女人都感觉到它们的影响，就像用标准化的量杆断定她们自己的(而且通常是欠缺的)适当性。

13. Caroline Walker Bynum, *Holy Feast and Holy Fast: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Food to Medieval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191.

14. *Syracuse Herald-American*, 1988. 5. 8, p. D_1.

15. Charles Butler, *The American Lady*, 引自 Dijkkstra, *Idols of Perversity*, p. 18。马格丽·斯普林·赖斯(Margery Spring Rice)在30年代的英国劳动阶层家庭主妇中发现了同样的自我牺牲的现象。家庭主妇靠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在狭小的空间里做饭，在赖斯看来，她经常"'吃得比家里的其他人要少得多，这样就可以相对容易地度日'"。她从社会工作者的记录中举了大量的例子，包括"'由于要满足家庭的需要，她自己的食物十分有限'"；"'她是……一位好母亲，把大部分的家用钱花在给孩子买合适的食物上，但自己经常没有合适的食物吃'"；"'A夫人……为她的8个孩子准备了精美的食物……但自己却吃不下，因为饭准备好的时候她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有趣的是，"'孩子看上去吃得很好，人们不得不相信F夫人正没有必要地饿自己'"[*Workinf-Class Wives: Their Health and Conditions* (London: Virago, 1989; orig. pub. 1939), p. 157, 160, 162, 167]。

16.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New York: Viking, 1962, p. 221.

17. 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 London: Penguin, 1977.

18. Bell Hooks, *Yearning*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0), p. 42.

19. Marcia Millman, *Such a Pretty Face: Being Fat in America*, New

York：Norton，1980，p. 106.

20. John Schneider and W. Stewart Agras，"Bulimia in Males：A Matched Comparison with Femal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6 ，no. 2（1987. 3）：235—242.

神经性厌食症

1. Jules Henry，*Culture Against Man*，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3.

2. 在我 1983 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临床医师普遍用"厌食症"这个词表示一种饮食失调的总门类，其中限制摄入的（或者禁欲的）厌食症和心因性暴食症（特点是暴食、挨饿和/或暴食、呕吐来回交替）是两种不同的子类型（参见 Hilde Bruch，*The Golden Cage：The Enigma of Anorexia Nervosa*，New York：Vintage，1979，p. 10；Steven Levenkron，*Treating and Overcoming Anorexia Neruosa*，New York：Warner Books，1982，p. 6；R. L. Palmer，*Anorexia Nervosa*，Middlesex：Penguin，1980，p. 14，23—24；Paul Garfinkel and David Garner，*Anorexia Nervosa：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New York：Brunner/Mazel，1982，p. 4）。从那以后，随着临床医学越来越倾向于强调饮食失调之间的差异而非共性，贪食症也就开始具有了单独的类别。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关注厌食症和贪食症所共有的形象、焦虑和态度。虽然对于这篇文章的主题来说，差异似乎很重要，但我将在脚注中指出相关的差异，而不把文章的主要论点过分复杂化。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意味着忽视这些差异的重要性，我在《阅读苗条的身体》一文中讨论了其中的某些差异。

3. 有些病人听上去好像是自我饥饿的受害者，尽管历史上关于这些病人有分散的记载，但 W. W. Gull 在 1868 年牛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将厌食症作为一种独立的症状进行医学描述（为了和当时的医学分类学保持一致，他把这种症状称为癔病性消化停止）。6 年以后，Gull 开始使用神经性厌食症这种说法；同时，E. D. Lesegue 独立地描述了这种失调症（Paul Garf-

inkel and David Garner, *Anorexia Nervosa: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Brunner /Mazel, 1982, pp. 58—59)。有证据证明当时有一次神经性厌食症的小规模“爆发”(见 Joan Jacobs Brumberg, *Fasting Girls*),但直到过去 20 年里它的再次出现和惊人增长,20 世纪的临床医师才注意到这次历史事件(关于记载这种增长的资料,参见《这是谁的身体?》一文的注释 11)。在我写现在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没有认识到神经性厌食症在 19 世纪后半叶的范围。

4. Ludwig Binswanger, “The Case of Ellen West”,载 Rollo May 编, *Existenc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8, p. 288。当然,他是错的。这种症状在当时并不是新出现的,而且我们现在知道埃伦·韦斯特并不是她那个时代唯一患神经性厌食症的年轻妇女。但宾斯万格没有注意到其他病例,这的确能说明它很罕见,尤其和我们自己的时代相比。

5. Hilde Bruch, *Eating Disord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4.

6. Steven Levenkron, *Treating and Overcoming Anorexia Neruosa*, p. 1; Susan Squire, “Is the Binge-Purge Cycle Catching?”, *MS.* (1983. 10).

7. Dinitia Smith, “The New Puritans”, *New York Magazine* (1984. 6. 1): 28.

8. Kim Chernin, *The Obsession: Reflections on the Tyranny of Slendernes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1, p. 63, 62..

9. Paul Garfinkel and David Garner, *Anorexia Nervosa*, p. xi. 厌食症患者典型地患有许多生理紊乱症,包括无月经(月经停止)和反常的下丘脑功能(关于这些和其他与厌食症相关的生理紊乱的详细讨论,见 *Anorexia Nervosa*, pp. 58—89;和 Eugene Garfield, “Anorexia Nervosa: The Enigma of Self-Starvation”, *Current Contents* (1984. 8. 6): 8—9。下丘脑的功能紊乱是不是这种疾病的主因,或者这些典型的神经内分泌失调是不是由减肥、损失热量和感情压力所导致的,对此,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而且都有自己的理由。同样

的争论还出现在厌食症患者身上发现的反常的抗利尿激素水平，各种药品到处在美国吹嘘它能够“解释”厌食症并且是其治愈的关键。虽然对患厌食症的生化倾向尚有争议，但研究还在继续探索生物化学在这种疾病让自身永存的性质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还有饥饿的生理影响与特定的经验性症状之间的关系，比如厌食症患者对食物的着迷（参见 Bruch，*The Golden Cage*，pp. 7－12；Paul Garfinkel and David Garner，*Anorexia Nervosa*，pp. 11－14）。

10. 起初，人们发现厌食症在上流社会的白人家庭中普遍存在，但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正迅速改变（正如我们所料，在美国没有人可以在通俗形象的影响中独善其身）。人们发现这种失调症的分布正越来越均匀，波及之前未受影响的人群（比如黑人和东印度人），和来自所有社会经济阶层的人（Paul Garfinkel and David Garner，*Anorexia Nervosa*，pp. 102－103）。但女人患这种失调症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男人（*Anorexia Nervosa*，pp. 112－113）。

11. Chernin，*The Obsession* 以其出色的洞察力激发了我研究厌食症的兴趣，在缺乏对饮食失调的文化理解的情况下，它是一个杰出的例外。

12. Chernin，*The Obsession*，pp. 36－37. 我在这里用“我们的文化”这种说法可能会显得有些过于均质化，不尊重美国社会中不同民族、社会经济群体和亚文化等之间的差异。必须在此强调的是，我正在讨论的意识形态和形象所具有的力量恰恰是让文化均质化的力量。即便在大众传媒之前的文化中我们也能发现这种现象：19 世纪“完美女士”的理想让那些甚至没有钱实现它的人趋之若鹜。当然，电视让形象的大规模利用成为可能，而且我们幻想中的生活的强大塑造力将我们牢牢控制。尽管它们可能始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一个女人怎么富有、怎么瘦都不为过”），但媒体所宣传的关于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观念快速并有害地影响到每一个人，他们要么拥有一台电视，要么买得起一本破烂杂志，或者注意到了广告牌。低收入群体中厌食症发病率的变化（参见上面的注释 10）说明了这一点。

13. Christopher Lasch，*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New York：Warner Books，1979)，p. 88.

14. 我对女性厌食症患者产生的意象、语言和隐喻的探讨把我引向这三者，这是我选择它们的主要原因。之前在各个学院和会议上讲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时，我发现听众最普遍的反应之一就是他们会提出其他的轴；这篇论文与其说是要说明一种现象的最终意义或起因，不如说是想邀请大家与我一道继续“拆解”作为一种具体化型构的厌食症。但选出的这些具体的轴线又不仅仅出自自传式的理论基础。二元论轴用于识别并表述厌食症基本的总体意象。控制轴是对“为什么是此时”这种问题的分析。性属/权力轴延续了这种分析，但焦点是“为什么是女人?”这些轴线的顺序把我们从最普通、最具历史广度的连续性结构——自我的二元经验——带向不断收缩的、更加具体的比较和联系的领域。我开始做这些联系的时候没有考虑历史语境，而是利用不同的历史资源，发掘它们熟悉的连贯性，以此来呈现厌食体验。我还想在这一部分说明，希腊基督教传统为厌食症的发展提供了尤为肥沃的土壤。然后我转向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时尚和幻想这种更加具体的语境，主要在大众文化这个层面上(并因此通过“虚构”均质性)考虑当下的境况，而没有考虑性属差异。我在这个部分中做的联系显示了男人和女人共有的一种历史经验。最后，我的关注发生转移，考虑的不是将厌食症和其他普遍的文化现象联在一起的事物，而是将自己呈现为从它们中断裂出来的事物，它强迫我们正视当前的饮食失调流行病最终将会如何晦涩，除非它与妇女的具体境况相联。

读者将会注意到，这些轴线是按主题，同时也依据它们在厌食症中的交汇连在一起的：对控制的迷恋与二元论相关，而所讨论的性属/权力的动力学也含蓄地涉及了(对和女性相关事物的)控制问题。

15.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一卷：《导论》，New York: Vintage, 1980，p. 155。

16. 同上书，第 47—48 页。

17. Hubert Dreyfus，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 112.

18.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p. 95.

19.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New York: Vintage, 1979, p. 26.

20. 柏拉图,《斐多篇》,载 *The Dialogues of Plato*, Benjamin Jowett 编辑并翻译,第四版,修订版,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3, 83d。

21. St. Augustine, *The Confessions*, R. S. Pine-Coffin 译, Middlesex: Penguin, 1961, p. 164.

22. 《斐多篇》,81d。

23. 《斐多篇》,66c。有关笛卡尔认为身体是获取知识的障碍的论述,见 *Conversations with Burm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p. 8,和 *Passions of the Soul*,载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escartes*,两卷本, Elizabeth S. Haldane, G. R. T. Ross 译,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Vol. 1, p. 353.

24. 《斐多篇》,80a。

25. 的确,笛卡尔式的"指导心灵的规则",特别是《沉思录》中体现出的,实际上是超越身体的规则——它的激情、它的感觉,和早些时候当我们"沉浸"于身体和身体感觉时,那种挥之不去的判断中的"婴儿偏见"的残余。

26. Alan Watts, *Nature, Man, and Woman*, New York: Vintage, 1970, p. 145.

27. Hilde Bruch, *Eating Disorders*, p. 84.

28. Kim Chernin, *The Obsession*, p. 8.

29. 学生日记中的说法, 1984 年。

30. Bruch, *The Golden Cage*, p. 4.

31. Ludwig Binswanger, "The Case of Ellen West", p. 253.

32. Hilde Bruch, *Eating Disorders*, p. 253.

33. Steven Levenkron, *Treating and Overcoming Anorexia Neruosa*, p. 6.

34. Hilde Bruch, *Eating Disorders*, p. 270; St. Augustine, *The Confes-*

sions，p. 164.

35. Hilde Bruch，*Eating Disorders*，p. 50.

36. 同上书，第 254 页。

37. 学生日记中的说法，1984 年。

38. Hilde Bruch，*Eating Disorders*，p. 279.

39. Aimee Liu，*Solitaire*，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9，p. 141.

40. Jennifer Woods，"I Was Starving Myself to Death"，*Mademoiselle* (1981. 5)：200.

41. Binswanger，"The Case of Ellen West"，p. 251.

42. 它们为什么会在 20 世纪以如此清晰的姿态，并通过厌食症患者的声音显现？接下来的两种轴线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43. Augustine，*Confessions*，p. 165；Liu ，*Solitaire*，p. 109.

44. Binswanger，"The Case of Ellen West"，p. 343.

45. 学生日记中的说法，1983 年。

46. Jennifer Woods，"I Was Starving Myself to Death"，p. 242.

47. Liu ，*Solitaire* ，p. 109.

48. "我认为增加体重就是幸福、满足，接下来是懒惰，然后是萎缩，最后是死亡"（引自宾尼 · 克莱因的病例注解。感谢她为我提供了她的部分工作笔录，和她一起工作的是一位厌食症患者）。又见 Binswanger，"The Case of Ellen West"，p. 343。

49. 克莱因，病例注解。

50. Cherry Boone O' Neill，*Starving for Attention*，New York：Dell，1982，p. 131.

51. 同上书，第 49 页。

52. Liu ，*Solitaire*，p. 101.

53. Levenkron，*Treating and Overcoming Anorexia Neruosa*，p. 122.

54. 从我开始写这篇文章起，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性虐待或许是许多饮

食失调女性患者经历中的一个要素(见《这是谁的身体?》中的注释 2)。

55. Hilde Bruch, *The Golden Cage*, p. 73. 易饿的厌食症患者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她们往往性欲较强(Paul Garfinkel, Allan Kaplan,"Anorexia Nervosa",p. 41)。暴食暴吐的循环仿佛就是易饿的厌食症患者的象征,她们和饥饿之间的关系比禁欲的厌食症患者和饥饿之间的关系要更加微妙些。有关对暴食暴吐循环的文化动力学的讨论,参见本书中的《解读苗条的身体》一文。

56. Hilde Bruch, *The Golden Cage*, p. 33.

57. Aimee Liu, *Solitaire*, p. 36.

58. 同上书,第 46 页。在一项对女性厌食症患者的研究中,88%被问及的受验者说她们减肥是因为她们"喜欢意志力和控制自我的感觉"(G. R. Leon,"AnorexiaNervosa: The Question of Treatment Emphasis",载 M. Rosenbaum, C. M. Franks, and Y. Jaffe 编, *Perspectives on Behavior Therapy in the Eighties*, New York: Springer, 1983, pp. 363—377)。

59. Hilde Bruch, *Eating Disorders*, p. 95.

60. Aimee Liu, *Solitaire*, p. 123.

61. Hilde Bruch, *The Golden Cage*, p. 65.

62. Dinitia Smith,"The New Puritans", p. 24.

63. 学生日记的节选,1984 年。

64. 同上。

65. Trix Rosen, *Strong and Sexy*, New York: Putnam, 1983, p. 108.

66. 同上书,第 62,14,47,48 页。

67. Dinitia Smith,"The New Puritans", p. 27, 26.

68. Trix Rosen, *Strong and Sexy*, pp. 61—62.

69. 同上书,第 72,61 页。这种幻想不只局限于女性健身者。约翰·特拉沃塔描述他为影片《周末狂热》健身的经历:"(它)让我认识了身体的不可思议的方面……它可以如何被重新塑造,让你可以完全改造你自己,创造一个全新的你。现在身体在我眼中几乎就像可以被捏成各种形状的泥土。"(Travol-

ta,"You Really Can Make Yourself Over", *Syracuse Herald-American*,1985. 1. 13.)

70. Dinitia Smith,"The New Puritans", p. 29.

71. Durk Pearson and Sandy Shaw, *Life Extension* , New York: Warner, 1982, p. 15.

72. Kim Chernin, *The Obsession*, p. 47.

73. Dinitia Smith,"The New Puritans", p. 4.

74. Sidney Journard, Paul Secord,"Body Cathexis and the Ideal Female Figure",*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50:43－46; Orland Wooley, Susan Wooley,and Sue Dyrenforth," Obesity and Women-A Neglected Feminist Topic",*Women's Studies Institute Quarterly* 2(1979):81－92. 学生日记和与女学生的非正式谈话无疑证明了这点。

75. "Feeling Fat in a Thin Society," *Glamour*, 1984. 2:198.

76. 当比较过去50年美国小姐的评选标准时,也会显现相同的趋势(见Paul Garfinkel, Allan Kaplan,"Anorexia Nervosa",p. 107)。有迹象表明,这种潮流正发生转变,一个更加结实、运动和男性化的风格正成为最新的时尚规则。

77. 学生日记的节选,1984年。

78. Hilde Bruch, *The Golden Cage*, p. 58.

79. 这是禁欲的厌食症患者和易饿的厌食症患者之间的一个明显差别:在暴食暴吐循环中,饥饿的女性自我不断抗争,拒绝被消灭。而且,总的来说,这里讨论的对女性特质的拒绝并非贪食症患者所特有,他们努力想要具备一个看上去更加"女性"的身体。

80. 学生日记的节选,1983年。

81. O'Neill, *Starving for Attention*, p. 53.

82. 学生日记的节选,1983年。

83. Hilde Bruch, *The Golden Cage*, p. 72; Hilde Bruch, *Eating Disor-*

ders, p. 277. 其他人有双性同体的幻想:"我想去参加一个聚会,每个人都看着我,但没人知道我是最美丽的苗条女子,还是最帅气的年轻男子"(临床医学家 April Benson 在一次小组讨论中报道,"New Perspectives on Female Development",厌食症和贪食症研究中心第三届年会,纽约,1984 年)。

84. Levenkron, *Treating and Overcoming Anorexia Neruosa*, p. 28.

85. 比如说,可以参见 Levenkron,在 *Treating and Overcoming Anorexia Neruosa* 中的病例研究,特别是第 45,103 页;O' Neill, *Starving for Attention*, p. 107; Susie Orbach, *Fat Is a Feminist Issune*, New York: Berkley, 1978, pp. 174—175.

86. Liu, *Solitaire*, p. 79.

87. Hilde Bruch, *The Golden Cage*, p. 65.

88. 克莱因,病例注解。

89. Chernin, *The Obsession*, pp. 102—103; Robert Seidenberg, Karen DeCrow, *Women Who Marry Houses: Panic and Protest in Agoraphobia*, New York: McGraw-Hill, 1983, pp. 88—97; Bruch, *The Golden Cage*, p. 58; Orbach, *Fat Is a Feminist Issue*, pp. 169—170. 同时参见我在《这是谁的身体?》和《身体与女性特质的再造》两篇文章中对"抗议"这一论题的讨论。

90. Bruch, *The Golden Cage*, pp. 27—28.

91. 同上书,第 12 页。

92. Binswanger, "The Case of Ellen West", p. 243.

93.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意识到,饮食失调往往是 19 世纪"歇斯底里"症候学的一个要素——这个事实有力支持了我在此的阐述。

94. 有许多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著,见 Barbara Ehrenreich, Dierdre English, *For Her Own Good*,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9, pp. 1—29。

95. 见 Martha Vicinus, "Introduction: The Perfect Victorian Woman",载 Martha vicinus 编, *Suffer and Be Still: Women in the Victorian 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x-xi。

96. Ernest Jones, *Sigmund Freud: Life and Work*,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6, Vol. 1, p. 193.

97. 有关19世纪女性体弱和歇斯底里流行病的讨论,见 Barbara Ehrenreich, Dierdre English, *For Her Own Good*, Carroll Smith-Rosenberg, "The Hysterical Woman: Sex Roles and Conflict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Social Research* 39 Vol. 4(1972年冬):652—678; Ann Douglas Wood, "The 'Fashionable Diseases': Women's Complaints and Their Treatme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4(1973年夏)。

98. Barbara Ehrenreich, Dierdre English, *For Her Own Good*, p. 2.

99. 同上书,第102页。

100. Sigmund Freud and Josef Breuer, *Studies on Hysteria*, New York: Avon, 1966, p. 311.

101. 同上书,第141页;又见第202页。

102. 特别参见第76("安娜O"),277,284页。

103. Marjorie Rosen, *Popcorn Venus*, New York: Avon, 1973; Banner, *American Beau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 282—285. 本纳指出,克里斯汀·迪奥空前成功的长裙和绑带衬衫具有明显的维多利亚着衣风格。

104. Liu, *Solitaire*, p. 141.

105. Binswanger, "The Case of Ellen West", p. 257.

106. 这是我在下一篇文章《身体与女性特质的再造》中论述的主要观点之一。

107. Dorothy Parker, *Here Lies: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Dorothy Parker*, New York: Literary Guild of America, 1939, p. 48.

108. D. H. Lawrence, *Sons and Lovers*, New York: Viking, 1958, p. 257.

109. 依据种族、宗教、社会经济阶层和性取向这些变量,这种认为自己

“太过分”的感觉可能多少会说明些问题。但 Luise Eichenbaum 和 Susie Orbach(*Understanding Women: A Feminist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强调,她们的临床病人,不管是否患有厌食症,经常“以轻蔑的口吻谈论它们的需要,并以此为耻。她们感觉自己没有隐私,幼稚、贪婪,并且永不知足”(第 49 页)。女人是情绪化的养育人和家庭生活的实际管家,依据这种劳动分工,Luise Eichenbaum 和 Susie Orbach 又将这些感觉追踪至所有女性的发展所特有的婴儿经历。简要地讲(这种大致的概括无法体现她们丰富和复杂的分析):母亲们无意中对她们的女儿谈到,女人的需要是多余和不好的,必须被控制。母亲这样做是因为,她觉得女儿要能较好地适应——给别人,而不是为自己做饭的——照顾他人的传统女性角色,必须上这一课。另外一个原因是她与女儿之间的一种无意识的认同。女儿让母亲想起了她自己身体里的那个“饥饿、缺乏安全感的小女孩”,被母亲自己所受的如何做女人的“教育”所拒绝和压制:“女儿自由地表达自己需要,这让母亲惊恐不已。无意中,母亲用在心里对待她自己的小女孩部分的方式对待她的幼女。在某些方面,这个小女儿成了她拒绝和不喜欢的自己那部分的外在表现。她的童年和成年生活中的缺失导致了复杂的情感,这些情感既指向内部,努力否定她自己的小女孩部分,又向外投射在她女儿身上”(第 44 页)。尽管母亲真的想全心回应女儿的情感需要,但她自己的焦虑限制了她做出回应的能力。她传递出互相矛盾的信息,向小女孩表达了“这种意思,就是说,如果想得到爱和赞许,她必须表现出她特殊的一面。她必须隐藏她的感情需要,她的失望和愤怒,还有她的斗志……她开始觉得在自己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上出了差错,这又肯定意味着她所需要和想要的是有问题的……这立刻转化成了一种感觉,觉得不值得追求自己的冲动,并对此犹豫不决”(第 48—49 页)。当然,一旦长大成人,她会和文化意识形态打交道,接受女性特质方面的进一步的社会训练,她生活中的男性,因为他们自己在男性的超脱和自主方面所受的训练,也可能会觉得她“太过分了”,这些都会强化这些感觉(男孩不会引起母亲如此强烈的认同,此外,她也知道他将来的世界会满足他的情感需要(就是

说，她的儿子最终会由他未来的妻子照顾，而在照顾他人的技艺方面，她受过良好的训练），对他们而言，母亲在满足需要时的矛盾心理要少得多，因此在培养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更多的连续性。因此，Luise Eichenbaum 和 Susie Orbach 认为，男孩在成长过程中觉得他们的需要是合理、适当，并且是值得满足的）。

Dorothy Dinnerstein 在她的开创性著作 *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Sexual Arrangement and Human Malaise* 中也发展性地分析了认为女人“太过分”的男性体验。Dinnerstein 认为，女人有能力唤起对无助婴儿期的回忆，“没有资格进入”母亲身体的原始渴望，和“每一个婴儿母亲可怕的性独立”（第 62 页），这才是男人恐惧他所感受的女人“无法控制的情欲节奏”的原因。女性的冲动会让人想起母亲的自主性，它在某种程度上会表现为对他的自主性的威胁性限制。这导致了对女性冲动“强烈的幻想式怨恨”（第 59 页），而且，会在文化层面上引发“对欲壑难填的女性的原型式梦魇形象”（第 62 页）。

110. 引自 Brian Easlea，*Witch-hunting*，*Magic and the New Philosophy*，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80，p. 242。

111. 同上。

112. 参见 Peggy Reeve Sanday，*Female Power and Male Domin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 172—184。

113. 引自 Easla，Witch-Hunting，*Magic and the New Philosophy*，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80，p. 8。

114. Peter Gay，*The Bourgeois Experience*：*Victoria to Freud*. Vol. 1：*Education of the Sens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 197—201，207.

115. Kim Chernin，*The Obsession*，p. 38.

116. Barbara Ehrenreich，Dierdre English，*For Her Own Good*，p. 124.

117. 这次手术（因为弗立斯没能从患者的鼻腔内取出半米长的薄纱，差点要了她的命）或许在弗洛伊德对歇斯底里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对此

的有趣讨论，见 Jeffrey Masson 具有争议的著作 *The Assault on Truth: Freud's Suppression of the Seduction Theory*, Toronto: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4。不论人们是否完全认同马森对此事的阐释，他的描述揭示了 19 世纪治疗女性失调的重要方面，并就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基本假设提出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任何关于弗洛伊德动机的争论。这篇文中的引文出现在第 76 页中；马森从第 55 页至第 106 页讨论了埃克斯坦的病例。

118. Lois Banner, *American Beauty*, pp. 86－105. 这些努力之所以付诸东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和妇女权利运动之间的联系，这点很重要。Amelia Bloomer 提倡的这些裤子被认为是堕落和挑衅的特殊标志，《纽约先驱论坛报》预言穿灯笼裤的女人将会最终进"精神病院或州立监狱"(第 96 页)。

119. Lois Banner, *American Beauty*, pp. 149－150.

120. Amaury deRiencourt, *Sex and Power in History*,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4, p. 319. 这里的比喻意义和实际用途一样突出，而且是女性时尚的典型特征：占主导地位的风格通常在某种程度上规定，女人不应该占据太多的空间，我们的地盘应该是有限的。缠足如此，束身腰带亦然。

121. 引自 Amaury deRiencourt, *Sex and Power in History*, p. 319。

122. Kathryn Weibel, *Mirror, Mirror: Images of Women Reflected in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Anchor, 1977, p. 194.

123. Christy Ferguson, "Images of the Body: Victorian England"，莱莫恩学院哲学研究项目，1983 年。

124. 引自 E. M. Sigsworth, T. J. Wyke, "A Study of Victorian Prostitution and Venereal Disease,"载 Vicinus 编，*Suffer and Be Still*, p. 82。

125. 参见 Kate Millet, "The Debate over Women: Ruskin vs. Mill"，和 Helene E. Roberts, "The Painter's View of Women in the First Twenty-Five Years of Victoria's Reign"。两篇文章均载 Vicinus 编，*Suffer and Be Still*。

126. Peter Gay,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p. 197; Millet, "The Debate over Women"，载 Vicinus 编，*Suffer and Be Still*, p. 123。

127. Vicinus,《导论》,第Ⅹ页。

128. Lasch,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p. 343.

129. Kim Chernin, *The Obsession*, p. 148.

130. Charles Gaines, George Butler,"Iron Sisters",*Psychology Today*, 1983. 11:67.

身体与女性特质的再造

1. Mary Dougles, *Natural Symbols* (New York: Pantheon, 1982)和 *Purity and Danger*(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

2.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p. 94.

3. 关于"顺从"这个问题,见 Foucault, *Disciplineand Punish*, pp. 135—169。对女性实践的福柯式分析,见 Sandra Bartky,"Foucault, Feminini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载 Bartky, *Femininity, and Domination*;又见 Susan Brownmiller, *Femininity*。

4. 不可否认,从 20 世纪 70 晚期至 80 年代,男性越来越关注外表。但一轮又一轮的研究表明,在这个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性属差异。宾夕法尼亚大学 1985 年开展的研究显示,男人从总体上说比较满意自己的外表,实事上经常"以积极和自我吹捧的方式扭曲他们对自己的认识"("Dislike of Own Bodies Found Common Among Women",*New York Times*,1985. 3. 19,p. C1)。然而,人们发现女人会极端消极地评价和扭曲对身体的认识。其他研究表明,当女人背离评价魅力的主导社会标准时,她们会受到比男人更苛刻的评判。托马斯·卡什等称,虽然形势对男人来说已经发生改变,对女人而言却从来没这样糟过,"The Great American Shape-Up", *Psychology Today*(1986. 4), p. 34。他们引用 1985 年的一次看待身体形象的调查的 30,000 份答复的结果,与 1972 年的一次问卷调查的类似答复做比较,发现和 1972 年的被调查者相比,1985 年的被调查者对自己身体的不满意度要高得多,他们还注意到男

性关注的明显加强。但在 1985 年的被调查者中，最不满意自己外表的却是少女。目前女人是节食产品的最大消费群体，她们出入各种温泉会馆和节食中心，做小肠缩短和其他减肥手术。

5.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第一卷：《导论》, New York: Vintage, 1980, p. 136, 94。

6. 关于这些失调的性属和历史本质：歇斯底里的女性患者和男性患者之间的比例大约在 2:1 到 4:1 之间，而且多达 80%的旷野恐怖症患者是女性(Annette Brodsky, Rachel Hare-Mustin, *Women and Psychotherap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80, p. 116, 122)。尽管饮食失调的男性病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初有所增加，但据估计近 90%的厌食症患者是女性(Paul Garfinkel and David Garner, *Anorexia Nervosa: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Brunner /Mazel, 1982, pp. 112—113)。关于对女性精神病理学的详细说明，见 Elaine Showalter, *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 New York: Pantheon, 1985，这本著作特别关注了 19 世纪的失调症，但遗憾的是很少提及旷野恐怖症和饮食失调。关于旷野恐怖症中社会和性属问题的讨论，见 Robert Seidenberg, Karen DeCrow, *Women Who Marry Houses: Panic and Protest in Agoraphobia*, New York: McGraw-Hill, 1983。关于神经性厌食症的历史，见 Joan Jacobs Brumberg, *Fasting Girls: The Emergence of Anorexia Nervosa as a Modern Disea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7. 我提出这样一种范例，不是想假装表现我可以充分地对待这些失调中的任何一种所有具有的个体复杂性。某些交汇点，一些相似的模式会随着对这种现象的特殊解读——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政治解读——而显现出来，我是想把它们记录下来。

8. Showalter, *The Female Malady*, pp. 128—129.

9. 关于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的流行病，参见 Showalter, *The Female Malady*; Carroll Smith-Rosenberg, "The Hysterical Woman: Sex Roles and

Conflict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载她的 *Disorderly Conduct：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10. Martha Vicinus，“Introduction：The Perfect Victorian Lady”，载 Martha vicinus 编，*Suffer and Be Still*，pp. x-xi。

11. 见 Carol Nadelson，Malkah Notman，*The Female Patient*，New York：Plenum，1982，p. 5；E. M. Sigsworth，T. J. Wyke，“A Study of Victorian Prostitution and Venereal Disease，” 载 Martha vicinus 编，*Suffer and Be Still*，p. 82。有关更为全面的讨论，见 Peter Gay，*The Bourgeois Experience：Victoria to Freud*. Vol. 1，特别是 109—168 页；Showalter，*The Female Malady*，特别是 121—144 页。娇弱的女子是一种具有强烈阶级内涵的理想（就像今天的苗条一样），它不是维多利亚文化中关于女性特质的唯一概念，但可以证明它是那个时期仅有的对女性特质的最有力的意识形态再现，影响了所有阶层的妇女，包括那些没有经济实力完全实现这种理想的人。关于控制女性食欲和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特质建构的讨论，见 Helena Mitchie，Mitchie，*The Flesh Made W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2. Smith-Rosenberg，*Disorderly Conduct*，p. 203.

13. Showalter，*The Female Malady*，p. 129.

14. Erving Goffman，*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elf in Everyday Life*，Garden City，N. J.：Anchor Doubleday，1959.

15. Betty Friedan，*The Feminine Mystique*，New York：Dell，1962，p. 36.“我娶了琼……这是多么好的女孩……这是怎样的天旋地转……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我娶了琼……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爱情是盲目的……这是怎样的妻子！”这是此类节目主题曲的一部分。

16. I. G. Fodor，“The Phobic Syndrome in Women”，载 V. Franks，V. Burtle 编，*Women in Therapy*，New York：Brunner/Mazel，1974，p. 119；又见 Kathleen Brehony，“Women and Agoraphobia”，载 Violet Franks，Esther Rothblum 编，*The Stereotyping of Women*，New York：Springer，1983。

17. 见 Jonathan Culler, *Roland Barth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74。

18. 对于苗条理想的其他阐释性观点,见本书中《解读苗条的身体》一文; Kim Chernin, *The Obsession: Reflections on the Tyranny of Slendernes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1; Susie Orbach, *Hunger Strike: The Anorectic's Struggle as a Metaphor for Our Age*, New York: W. W. Norton, 1986。

19. 食物、饮食和烹饪的当代电视广告和广告如何重现这种女性特质的建构,对此的讨论,见本书《作为意识形态的饥饿》一文。

20. Liu, *Solitaire*, p. 123.

21. 与此相关的是凯瑟琳·斯坦纳一阿代尔 1984 年对女高中生做的惊人研究,研究揭示了食物和身体形象的问题,与对冷静、具有职业"自信"和迷人的女超人的效法之间的戏剧性联系。经过一系列的采访,这些女高中生被分成两组:一组对女超人的理想表示怀疑,另外一组则十分渴望。稍后进行的诊断性测试显示,支持女超人理想的这一组里 94%的人患有饮食失调。另外一组则 100%没有饮食失调的症状。尽管存在媒体形象,但无论是有意识地还是通过她们的身体,如今的年轻女子似乎觉得要同时符合两个领域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的价值在历史上的界定是完全对立的。

22. 见本书中的《神经性厌食症》一文。

23. Dianne Hunter, "Hysteria,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载 Shirley Garner, Claire Kahane, Madelon Sprenger 编, *The (M)Other Tongu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14。

24. Catherine Clement, Helene Cixous, *The Newly Born Woman*, Betsy Wing 译,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 42。

25. 同上书,第 95 页。

26. Robert Seidenberg, Karen DeCrow, *Women Who Marry Houses*, p. 31.

27. Smith-Rosenberg, *Disorderly Conduct*, p. 208.

28. Orbach, *Hunger Strike*, p. 102. 当我们仔细阅读许多歇斯底里症患者、厌食症患者和旷野恐怖症患者的自传和病例研究时,我们会发现,这些患者确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会因为一种具体女性角色的束缚而感到沮丧的女人。弗洛伊德和约瑟夫·布罗伊尔在 *Studies on Hysteria* 中,和弗洛伊德在后来的 *Dora: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中不断提到他们病人的抱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努力。此外,我们还知道,许多后来成为 19 世纪主要的社会活动家和女性主义者的妇女都患有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典型的厌食症患者是一个在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完美主义者,这实际上成了一种陈词滥调。尽管不是很明显,关于旷野恐怖症的文献中也有类似的主题。人们必须记住,借助病例研究要靠其他已经适应这种文化的个体的认识。比如,人们会怀疑,将厌食症患者表现为一个不断过分追求上进的人,这种普遍的做法也许是受我们文化看待有野心的女人的态度,即那种依然存在,抑或卷土重来的维多利亚主义的影响。人们不会通过阅读自传而摆脱这种阐释问题。但在自传中人们至少会遇到激发病人自己的心理现实的社会建构和态度。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中多处引用的关于厌食症的自传性文献,明显充满了对于家庭世界的焦虑和其他主题,表达了对女性特质传统观念的强烈反抗。

29. Kim Chernin, *The Hungry Self: Women, Eating, and Identity*, pp. 41—43.

30. Mark Poster,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p. 2.

31. Liu, *Solitaire*, p. 99.

32. Brett Silverstein, "Possible Causes of the Thin Standard of Bodily Attractiveness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5 (1986): 907—916.

33. Showalter, *The Female Malady*, p. 48.

34. Smith-Rosenberg，*Disorderly Conduct*，p. 207.

35. Orbach，*Hunger Strike*，p. 103.

36. Brownmiller，*Femininity*，p. 14.

37. Toril Moi，"Representations of Patriarchy：Sex and Epistemology in Freud's *Dora*"，载 Charles Bernheimer，Claire Kahane 编，*In Dora's Case：Freud-Hysteria-Femin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 192。

38. 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and Punish*，p. 136.

39. 同上。

40. 关注性化和客体化的政治仍然是反色情文学运动的重点(比如安德里亚·德沃金和凯瑟琳·麦金农的作品)。研究外表政治的女性主义学者包括桑德拉·巴特基、苏珊·布朗米勒、温迪·查普基斯、金·彻宁，和苏茜·奥巴赫。女性主义对米歇尔·福柯著作的兴趣逐渐浓厚，开始产生一种以实践为导向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参见，比如 Irene Diamond，Lee Quinby，*Feminism and Foucault：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8。

41. 见，如 Susan Suleiman 编，*The Female Body in Western Cul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42. Mitchie，*The Flesh Made Word*，p. 13.

43. 同上书，第 149 页。

解读苗条的身体

1. Keith Walden，"The Road to Fat City：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ight Consciousness in Western Society"，*Historical Reflections* 12，Vol. 3(1985)：331－373.

2. 见 Michel Foucault，*The Use of Pleasure*，New York：Random House，1986。

3. 见 Rudolph Bell, *Holy Anorexia*; Caroline Walker Bynum, *Holy Feast and Holy Fast*, pp. 31－48。

4. 见 Kim Chernin, *The Obsession: Reflections on the Tyranny of Slendernes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1。

5. 对此有大量的综合报道,见其中的 Thomas Cash 等,"The Great American Shape-Up",*Psychology Today*(1986.4);Dieting: The Losing Game, *Time*,1986.1.20。对于妇女的投入,见下面的注释 24。

6. 见 Mary Dougles, *Natural Symbols* (New York: Pantheon, 1982)和 *Purity and Danger*(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

7. 当然,这种方法假设通俗文化形象是有意义的,而且不仅仅是随意的结构,大量产生自时尚的奇想、麦迪逊大道的变迁,或者是后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其他人所认为的),一个产品或形象的吸引力完全来自纯粹的分化,来自它的文化定位,和它对新奇和新鲜事物的暗示。在这种后现代的逻辑中,盖尔·法思高(Gail Faurschou)认为,"时尚成为'最卓越'的商品,它的动力来自资本主义所有的持续、疯狂和再生的激情和力量。时尚是已经计划好的过时之物的逻辑——不仅仅是市场生存的需要,而且是欲望本身的循环,是那种没有尽头的过程,为了界定并占据资本扩张中最新的领土化空间,身体在这个过程中被解码和重新编码。"("Fashion and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stmodernit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1 ,Vol,1－2 [1987]:72.)虽然我同意法思高对时尚的总体性描述,但发生一种绝对的历史断裂后,形象中已经完全没有历史、物质和象征性断定,这种断裂的到来似乎本身就体现了后现代性的强迫性创新逻辑,而不是其祛魅者。对于这篇文章的论点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后现代的逻辑无法解释,在苗条理想的新奇性消退很久后文化对它的掌控。事实上,对于苗条主导地位的终结,新鲜事物的原则已经多次显示了试探性,但最终只是名义上的姿态,宣扬一种"更为柔和"、"更具曲线"的外表等等。有多少女人曾翻阅封面宣称这种转变已到来的杂志,却最终发现里面的形象本质

上还是与主导的标准保持一致！丰满的胸部也许是一种复兴，但它们附属于极度消瘦，并往往是运动员类型的身体。我认为，后现代性的纯粹逻辑是有限制的——这些限制正是这篇文章尝试发掘。

8. 见 Robert Crawford，"A Cultural Account of 'Health'-Self-control, Release, and the Social Body"，载 John McKinlay 编，*Issu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alth Care*，New York: Methuen, 1985，pp. 60—103。

9. Ira Sacker and Marc Zimmer, *Dying to Be Thin*, New York: Warner, 1987, p. 57.

10. Dalma Heyn，"Body vision"，*Mademoiselle*(1987. 4)：213.

11. 见 Lois Banner, *American Beauty*, p. 232。

12. 同上书，第 53—55 页。

13. 见 Keith Walden，"The Road to Fat City"，pp. 334—335，353。

14. 感谢马里欧·穆萨为我指出这点，并为我提供希瑟·洛克莉尔说的那句话。

15. Ira Sacker and Marc Zimmer, *Dying to Be Thin*, pp. 149—150.

16. Michel Foucault, *The Use of Pleasure*, pp. 64—70.

17. 见 Mary Dougles, *Purity and Danger*, pp. 114—128。

18. 见 Crawford, "A Cultural Account of 'Health'"。

19. John Farquhar，斯坦福大学医疗中心，引自"Dieting: The Losing Game"，*Time*，1986. 2. 20：57。

20. 见 Marcia Millman, *Such a Pretty Face: Being Fat in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1980，pp. 65—79。

21. 同上书，第 77 页。

22. Ira Sacker and Marc Zimmer, *Dying to Be Thin*, p. 32.

23. 这些引文来自 *Donahue* 的副本，由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多媒体娱乐提供。

24. 分歧很早就出现了。"我们不指望男孩长得那么英俊，"一位 9 岁的

女孩在上面引用过的加利福尼亚研究中说道。“但男孩希望女孩是完美的、漂亮的，还得瘦。”一位男同学同意她的看法，说：“胖女孩和正常的女孩不一样。”我的许多女学生曾在日记里描述她们的男友给她们施压，让她们保持或变得苗条。这些男人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有许多来自社会的支持。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对科妮莉亚·格斯特说他喜欢自己的女人“厌食”；她马上减掉了24磅[*Time*（1988.4.18）：89]。但很少有男人会如此过分地要求自己的女人。女演员瓦莱丽·伯提内莉（在*Syracuse Post-Standard*）说她丈夫埃迪·范·海伦如何“帮她保持体形”：“当我太胖时，他说，‘亲爱的，减肥。’然而当我太瘦时，他说，‘我不喜欢和你做爱，你得长点肉。’”

25. 这种研究中最著名的一次出现在*Glamour*杂志（1984年2月）上，已经被复制过许多次了：一项对33,000名女性所作的调查显示，75%的认为自己“太胖”。而只有25%的人高于都市生活保险标准，30%的人低于此标准（“Feeling Fat in a Thin Society”，p. 198）。又见Kevin Thompson，“Larger Than Life”，*Psychology Today*（1986.4）；Dalma Heyn，“Why We're Never Satisfied with Our Bodies”，*McCall's*（1982.5）；Daniel Goleman，“Dislike of Own Body Found Common Among Women”，*New York Times*，1985.3.19。

26. 关于将男人和思想，女人和物质联系起来的文化关联，例如，见Dorothy Dinnerstein，*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Sexual Arrangement and Human Malaise*；Genevieve Lloyd，*The Man of Reas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Luce Irigaray，*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27. Bram Dijkstra，*Idols of Pervers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 29.

28. “Mutable Beauty”，*Saturday Night*（1892.2.1）：9.

29. 玛丽·雅各布斯和萨利·沙特沃思和我谈到（私下交谈）晚期维多利亚文学中“新女性”有时男孩化的身材，她们认为我对晚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这种阐释是合适的，但我却只在当下的语境中谈这一点。

30. Dotothy Dinnerstein, *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 pp. 28－34. 早期的婴儿经历和看待丰满女性身体的态度之间有何联系，对此的讨论，见 Chernin, *The Obsession*。

31. 历史学家 LeeAnn Whites 对我说，当我们想起一个怀孕和哺乳身体的实际形态时，这种身体象征是何等的荒谬。更准确地说，沙漏体形是向男人推销女人的生育、居家活动范围的象征性广告，而不代表她具有生育能力的身体。

32. 见 Banner, *American Beauty*, pp. 283－285。

33. 多莉・帕顿如今已经减到一百磅，而且看上去的确弱不禁风，她用一句暗含反女性主义假定的话开始她的新节目："只要你开心，怎么样都行！"（想必她已经这样做了？）我认为这并非偶然。她现在在电视上的露面具有退化的倾向，乞求、渴望为别人服务；显然，她的包装者正利用她不断缩减的形体所带来的文化感染力。帕顿的体型当然不是双性同体的。事实上，和 Wheel of Fortune 中的凡娜・怀特（她也在事业的某个时刻减了好多体重，而且迷恋于保持苗条的身材）一样，对这些在一个女人的曝光率和权力都大幅增加的时代，渴望更为传统的女性特质的人来说，她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帕顿和怀特丰满的胸部唤起了一种养育他人的、母性的性特质。但当减肥按照厌食的标准进行后，这些胸部装点的是瘦到容易受伤的身体，胳膊和腿像小雄马的一样脆弱、瘦长。帕顿和怀特暗示了不用面对任何权力和危险的养育他人的女性特质的快乐。

34. *The Waist Land: Eating Disorders in America*, 1985, Gannett Corporation, MTI Teleprograms. 贪食症让这里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贪食症中，"女性"自我拒绝被消除，而且女子理想典型地没有被拒绝，而是被接受。

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性属怀疑论

1. Jean Grimshaw, *Philosophy and Feminist Thinking*, Minneapolis: U-

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

2. Susan Suleiman，“(Re) Writing the Body：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Female Eroticism”，载 Suleiman 编，*The Female Body in Western Culture*，p. 24。

3. 这并不是说我轻视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洞见。我在此的批评对象是对这些洞见的某些计划性使用。将大多数后结构主义思想(特别是福柯的著作)理解为提供阐释工具和历史批判，而不是可以全盘采用的理论框架，我认为这样更恰当。

4. 我在此关注的是性属分析论在北美的出现，如果在法国和英国的语境中讲述这个故事，则会产生多方面的差异。

5. Carol Gilligan，*In a Different Voi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但必须注意，吉莉根不认为她所描述的不同的“声音”本质上或只是和性属相关。她在探索性属差异的临床工作中“发现了”它们，但她的著作的主要目的，如她所言，是“强调”按照(但不仅是按照)性属的方向在文化上被再生产的“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别”(第 2 页)。

6. Dotothy Dinnerstein，*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Sexual Arrangements and Human Malaise*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6)；Nancy Chodorow，*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Gilligan，*In a Different Voice*.

7. Thomas Nagel，*The View from Nowhe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8. Minnie Bruce Pratt，“Identity：Skin Blood Heart”，载 Elly Bulkin，Barbara Smith 编，*Yours in Struggle：Thre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nti-Semitism and Racism*，Brooklyn：Long Haul Press，1984，p. 18。

9. 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哲学协会 1988 年东部会议上，我提交了一篇论文，讨论经典的哲学原则被上层社会的白人男性支配这个事实所造成的一些

后果。但 Bat-Ami Bar On 后来告诉我，这些男人中绝大部分是基督教徒。虽然我是犹太人，但我没有考虑这点，而且我必须长时间努力思考对我的那种排斥意味着什么。我感谢埃米的洞见让我做到这一点。当然，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方式；这个过程不应该（像现在经常地那样）充满对“曝光”和政治怀疑的不断焦虑。

10. Barbara Christian，“The Race for Theory”，*Feminist Studies* 1 14，Vol. 1(1988)：67—69.

11. 格利姆肖的《哲学和女性主义思想》代表了这样一位女性主义者的工作，她通过英美哲学分析风格中的问题，而非欧陆的后结构主义思想的范畴和传统公式，来表达这些理论关注。

12. Nancy Fraser，Linda Nicholson，“Social Criticism Without Philosophy：An Encounter Between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载 Nicholson 编，*Feminism /Postmordernism*，p. 35。

13. 同上书。

14. Donna Haraway，“A Manifesto for Cyborgs：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载 Nicholson 编，*Feminism /Postmordernism*。

15. Nancy Fraser，Linda Nicholson，“Social Criticism Without Philosophy”，p. 35.

16. Friedrich Nietzsche，*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New York：Vintage，1969，p. 119.

17. Michel Foucault，“On the Genealogy of Ethics”，对福柯的访谈，载 Hubert Dreyfus，Paul Rabinow，*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 232.

18. 弗雷泽和尼科尔森的文章对过去的女性主义理论表现出强烈的、具有历史意识的欣赏，批评上显得非常客观。相反，对相同文献的其他研究有时表现出一副要和以往的女性主义思想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用简化的、非

历史化的、夸张的和完全扭曲的语言描述它，而且从先进的女性主义方法的开明视角，将其表现为有致命的缺陷。

19. Susan Bordo, *The Flight to Objectivity*: *Essays on Cartesianism and 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pp. 114—118.

20. Donna Haraway,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p. 199.

21. 这些动力学，以及它们如何维系对有色人种的文学和批评风格的排斥，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讨论，见 Christian, "The Race for Theory"。

22. Susan Suleiman, "(Re)Writing the Body", p. 24.

23. Donna Haraway,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p. 219.

24. Jacques Derrida, Christie V. McDonald, "Choreographies," *Diacritics* 12, no. 2(1982): 76.

25. Cornell and Thurschwell, "Feminism, Negativity, Intersubjectivity", 载 Seyla Benhabib, Cornell 编, *Feminism as Critiqu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p. 143—162.

26. Susan Suleiman, "(Re)Writing the Body", p. 2.

27. Donna Haraway,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p. 205, 223.

28. Croll Smith-Rosenberg,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91.

29. Donna Haraway,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p. 191.

30. 通过不断并蓄意地赋予她所描述的身体的本质以歧义，哈拉维略去了这些暗示：它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她对"多语性"的提倡有时似乎指向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主义文化；有时又以个体的女性主义者为对象。她用"强大的异教杂语性"这种意象结束她的文章，取代旧女性主义对"共同语言"的梦想，这听上去像是一个文化意象——直到我们读到下一行，看到她将这种意象等同于"一个说方言的女性主义者"的意象。我认为这种含混性虽然带有戏谑的成分，而且是故意为之，但还是显示了她对电子人作为解放的"政治神话"的想像，和一种挥之不去的"认识论主义"之间的张力，这种"认识论主

义”将电子人表现为看待现实的“正确”观点的模式。我赞同前者，怀疑后者。

31. Friedrich Nietzche, *The Will to Power*, Walter Kaufmann 编辑并翻译，New York: Vintage, 1968, p. 272。

32. Donna Haraway,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p. 216.

33. Grimshaw, *Philosophy and Feminist Thinking*, p. 73.

34. 谈到“生育实践”的时候，我想到的不仅是怀孕和分娩，还有月经、绝经、哺乳、断奶，和自发和在诱导下进行的堕胎。当然，我并不否认所有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被建构，并在文化上被尊重。但这种多样性完全让我们无法从女性和男性身体现实的总体差别中提取要点吗？在我看来，得通过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理论规则解决这个问题。

35. Coppelia Kahn, “Excavating ‘Those Dim Minoan Regions’: Maternal Subtexts in Patriarchal Culture”, *Diacritics* 12, Vol. 3(1982): 33.

36. “On Separation from and Connection to Others: Women’s Mothering and the Idea of a Female Ethic,” 加拿大妇女哲学协会第 10 届年会主题发言，University of Guelph, 1987. 9。

37. Philosophy,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北卡罗莱纳大学妇女研究系列演讲，Chapel Hill, 1987. 10。

38. 我参照《女性主义怀疑论和哲学的“男子特性”》中提到的哲学的历史，详细讨论这一点。这篇文章刊于 Elizabeth Harvey, Kathleen Okruhlik 编，*Women and Reas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39. Patricia Williams, “The Bread and Circus Literacy Test”, Ms. 2, no. 4 (1992. 1—2): 37.

40. Grimshaw, *Philosophy and Feminist Thinking*, pp. 84—85.

41. 同上书，第 102 页。

42. 琳恩·阿诺特在未发表的论文“The Uncertain Future of Feminist Standpoint Epistemology”中有类似的提法。

43. 贝尔·胡克斯认为性别歧视是“一种促成种族统治的政治立场，让白

人男子和黑人男子分享一种对于性别角色的普遍感觉，以及男性统治的重要性。显然，两类人都将自由等同于男子气，将男子气等同于男人不加选择地使用女人身体的权利”。这种认识是特别深刻的。然后她继续将男性自由和自我决定的性化分析为一种男性特质的神话，不仅对女人是危险和“危及生命的”，对“盲目和被动”展现它的青年男子而言同样如此。（*Yearning*，Boston：South End Press，1990，p. 59.）

44. Maria Lugones，“Playfulness，‘World’-Travelling，and Loving Perception”，*Hypatia* 2，Vol. 2(1987)：3－20.

45. Cott，*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p. 282.

46. 同上书，第 277 页。

47. 同上书，第 281 页。

48. 同上书，第 231 页。

49. 同上书，第 232、237 页。

50. 同上书，第 235 页。

51. 这种去稳定化并不代表承认“种族”这个概念是一种文化建构。人们可以（像我一样）承认后者，同时坚持认为，当语境需要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从总体上谈论被标注为某一“种族”所具有的社会和历史后果。

52 Cott，*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p. 239.

物质女孩

1. 引自 Trix Rosen，Strong and Sexy（New York：Putnam，1983），p. 72，61.

2. “Travolta：‘You Really Can Make Yourself Over’”，*Syracuse Herald-American*，1985. 1. 13.

3. “Popular Plastic Surgery”，*Cosmopolitan*，1990. 5：96.

4. Tina Lizardi，Martha Frankel，Hand Job，*Details*，1990. 2：38.

5. Jennet Conant，Jeanne Gordon，Jennifer Donovan，“Scalpel Slaves Just

Can't Quit", *Newsweek*(1988. 1. 11):58—59.

6.《唐纳休》的副本05257,多媒体娱乐,辛辛那提,俄亥俄州。

7. Dahleen Glanton, "Racism Within a Race", *Syracuse Herald-American*, 1989. 9. 19.

8.《本质》杂志的读者调查(1989. 6):71。

9. 这篇文章首次出现以后,视康又改变了它的宣传策略,重新命名镜片的"补体",并强调它们是多么"自然"和细致。"没人看得出你戴了它们,"他们保证说。一则宣传"补体"的广告由一对同胞双生的黑人胎儿出演,一个眼睛是褐色的,另外一个戴蓝色的镜片,似乎要表现视康认为褐色眼睛没有什么"不妥"。这的确是自己说了算的事:"现在,选择你自己眼睛的颜色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了。"

10. Linda Bien, "Building a Better Bust", *Syracuse Herald-American*, 1990. 3. 4.

11. 这是詹尼斯·拉德威在一次对她作品的口头陈述中提到的,杜克大学,1989年春。

12. John Fiske, *Television Culture*, New York: Methuen, 1987, p. 19.

13.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and Punish*, New York: Vintage, 1979, p. 138.

14. Bill Moyers, "A Walk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PBS Boston.

15.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and Punish*, New York: Vintage, 1979, pp. 26—27.

16. Susan Suleiman, "(Re)Writing the Body: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Female Eroticism", 载 Suleiman 编, *The Female Body in Western Culture*. p. 24。

17. Jacques Derrida, Christie V. McDonald, "Choreographies," Diacritics 12, no. 2(1982):76.

18. Cathy Schwichtenberg, "Postmodern Feminism and Madonna: Toward an Erotic Politics of the Female Body", 犹他州大学人文中心举办的主题为"重写(后)现代:(后)殖民主义 /女性主义 /晚期资本主义"的全国会议上提交的论文,1990 年 3 月 30—31 日。

19. John Fiske,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d Television", 载 Robert C. Allen 编, *Channels of Discours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7, pp. 254—290。

20. 引自 John Skow, "Madonna Rocks the Land," *Time*(1985. 5. 27):77.

21. Skow, "Madonna Rocks the Land," p. 81.

22. Molly Hite, "Writing-and Reading-the Body: Female Sexuality and Recent Feminist Fiction", 载 *Feminist Studies* 14 Vol. 1 (1988 年春):121—122。

23. "Fat or Not, 4th Grade Girl Diet Lest They Be Teased or Unloved," *Wall Street Journal*, 1986. 2. 11.

24. Catherine Texier, "Have Women Surrendered in MTV's Battle of the Sexes?" *New York Times*, 1990. 4. 22, p. 31.

25. *Cosmopolitan*(1987. 7)封面。

26. David Ansen, "Magnificent Maverick", *Cosmopolitan*(1990. 5):311.

27. Ansen, "Magnificent Maverick", p. 311; Kevin Sessums, "White Heat", *Vanity Fair*(1990. 4):208.

28. Susan McClary, "Living to Tell: Madonna's Resurrection of the Fleshy", *Genders*, Vol. 7(1990 年春):2。

29. 同上书,第 12 页。

30. E. Ann Kaplan, "Is the Gaze Male?", 载 Ann Snitow, Christine Stansell, and Sharon Thompson 编, *Powers of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pp. 309—327。

31. E. Kaplan, *Rocking Around the Clock: Music Television, Postmod-*

ernism and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Methuen, 1987, p. 63.

32. McClary, "Living to Tell", p. 13.

后现代主体、后现代身体、后现代抗拒

1. Charles Jencks, *What Is Post-Mordernism*? 第三版,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89, p. 16。

2. 同上书,第 30 页。

3. Jane Flax, *Thinking Frag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3; Bell Hooks, *Yearing*,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0;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4. Jane Flax, *Thinking Frag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5.

5. 同上书,第 194 页。

6. 同上书,,第 226 页。

7. Bell Hooks, *Yearing*, p. 155.

8. Bell Hooks, "Postmodern Blackness", in *Yearing*, p. 29.

9. Jane Flax, *Thinking Frag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221.

10. Bell Hooks, *Yearing*, p. 31.

11. 同上书,第 21—22 页。

12. 同上书,第 229 页。

13. Jane Flax, *Thinking Frag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219, 183.

14. Bell Hooks, *Yearing*, p. 111.

15. 同上书,第 63 页。

16. Maria Lugones, "Playfulness, 'World' — Travelling, and Loving Perception", *Hypatia* 2, no. 2 (Summer 1987): 3—20.

17. Domna Stanton，引自 Scott Heller，"The Human Body and Changing Cultural Conceptions of It Draw Atten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Science Scholars"，*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1991. 6. 12)：A4.

18. 为了明确我在此对"物质"一词的使用，见本书的导论。

19. Erving Goffman，*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offman 也在 *Gender Advertisement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6)中讨论了自我展现中特别性属化的方面。

20. 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p. 136.

21. 同上书，第 93 页。

22. 同上书，第 92 页。

23. 同上书，第 91 页。

24. 同上书，第 137 页。

25. 同上。

26. 同上。

27. Suzanne Kessler and Wendy McKenna，*Gender：An Ethnomethodological Approach*(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Holly Devor，*Gender Blending：Confronting the Limits of Duality*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

28. Esther Newman，*Mother Camp：Female impersonators in America*，New York：Prentice-Hall，1972，p. 127.

29. Jan Morris，*Conundrum*，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74，pp. 25—26.

30. 《人物》专栏，*Syracuse Herald-American*，1992. 9. 4，p. A3。

31. 甚至桑德拉·迪伊在她那个时代也不认为自己是男人想要的。1992 年，她看上去非常消瘦，于是承认整个职业生涯自己都受食物和身体形象的困扰，而且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患有厌食症。

32. Bell Hooks，*Yearing*，p 22.

译后记

三年前的一次偶然机会，我读到了汪民安和陈永国主编的《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一书，从此便对“身体”有了全新的认识：身体不仅是物质的，更是文化和政治的；身体不是文化的起源，而恰恰是其产物。这正是苏珊·鲍尔多这本书想要说明的问题。苏珊·鲍尔多是西方当代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她的女性主义理论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身体研究”的开创者。鲍尔多的批评方法深受福柯的影响，主张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考察权力的运作，以及这种运作对身体的控制和塑造。《不能承受之重》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批评思路——对饮食失调的分析；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对苗条的解读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本书中，鲍尔多完全把身体当成一种文化现象来分析，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之作。正如莱斯利·赫伍德在前言中指出的，《不能承受之重》“在文化批评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让许多学术界之内和之外的人对我们的文化有了实质性理解”。

但鲍尔多的文化批评并没有流于表面，也就是说，她没有盲目

地挪用福柯的理论，而是在充分理解其精髓的基础上加以运用，这是她的卓越之处。具体地讲，鲍尔多主张在历史进程中考察抗拒和转变，反对在“后现代”的掩护下空洞地谈抗拒、个体创造性和权力的不稳定性。在《后现代主体、后现代身体、后现代抗拒》中，鲍尔多对朱迪思·巴特勒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解读，强调了历史意识在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中的重要性。这是全书论述的核心，是对身体讨论的一种延伸和升华；鲍尔多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女性主义思想与后现代思潮的一次碰撞。鲍尔多虽身处后现代语境，却能超脱于后现代，用批判的眼光对其进行审视和拷问，的确难能可贵。

《不能承受之重》材料翔实、推理严谨、表述严密，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和学术性，但这也对译者的翻译水平提出挑战。由于涉及大量的文化现象表述，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多方查阅，反复核实，力求准确。翻译的过程是痛并快乐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这次翻译，我对“身体”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对鲍尔多的女性主义理论产生了一定兴趣。在此我要感谢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王玉括教授，感谢他给了我这次机会，让我承受这份“不能承受之重”。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 Bill McCann，他帮助我澄清了许多语言问题和文化现象的翻译问题。虽然鲍尔多在西方理论界大名鼎鼎，但国内学术界对她的关注度并不高，希望本书的翻译能引起国内学术界对这位女性主义者的关注。由于时间仓促，译者水平有限，所译不当之处恳请学界前辈、同仁、学友批评指正。

綦　亮

2008 年 10 月 8 日